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

普列汉诺夫 机会主义文选

(一九〇三——一九〇八年)

下

(供内部参考)



普列汉诺夫
机会主义文选

(一九〇三——一九〇八年)

下

虚容译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

(一九〇三——一九〇八年)

下

虚容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四二二五工厂印刷

1965年7月第1版

1973年9月北京第2次印刷

书号3002·124 每册1.20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論策略和不策略的信	1
致工人們的信	1
第一封信	3
第二封信	16
第三封信	28
第四封信	41
第五封信	53
右傾在哪里,“正統思想”在哪里?	66
“共同的悲痛”	77
关于一封信	90
簡复(摘譯)	101
曼海姆	102
政論家短評——論策略和不策略的新信	123
第一封信	123
第二封信	152
第三封信	177
第四封信	197
第五封信	222
第六封信	250
第七封信	258
关于非常代表大会(致同志們的公开信)	267

《同志报》上的文章	273
給觉悟工人的一封公开信	273
給《同志报》一位讀者的公开答复	275
是解释的时候了(給編輯部的信)	278
旧調新唱	282
沒有根据的担忧	287
关于我同基捷韦帖尔先生的一致	290
这可能嗎?	291
“孟什維克”讲话! (致我的党内同志們的公开信)	294
好的就是好的	298
它到底在动!	303
在一九〇七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一九〇七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會議記錄)	306
开幕詞	307
在討論議程时的发言	308
关于杜馬党团的工作报告的发言	310
关于对待資产階級政党的态度的发言	323
关于工人代表大会的发言	327
在施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在政党和工会相互关系問題委员会上的发言)	330
第一种异文	330
第二种异文	331
小册子《我們和他們》序言	332
对工团主义的理論和实践的批判(摘譯)	345
第一篇文章——亞瑟·拉布里奧拉	346
第二篇文章——恩利科·列昂奈和伊万諾埃·波諾米	351
政論家短評	356
斯捷潘·果卢別所著小册子的序言	370
过去的教訓	380

馬克思逝世二十五周年 (摘譯)	401
-----------------------	-----

附 录

馬克思哲学的进化	403
----------------	-----

奧古斯特·倍倍尔 (摘譯)	418
---------------------	-----

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当采取什么 策略向外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一些問題	423
------------------------------------------------------	-----

普列汉諾夫机会主义文选索引	424
---------------------	-----

論策略和不策略的信

致工人們的信

這封信刊登在一九〇六年五月二十日第四號《信使報》上。第二天，列寧就在《浪潮報》上針對它發表了《糟糕的意見》（《列寧全集》第十卷第414—419頁）一文，逐點駁斥了普列漢諾夫這篇文章中的主要思想。

列寧指出，普列漢諾夫在對當前政治形勢的估計上，在無產階級對待政府、資產階級和國家杜馬的態度問題上犯了嚴重的錯誤，附和了資產階級對社會主義者的誣蔑，企圖引導黨離開革命鬥爭的道路，用杜馬同內閣的議會鬥爭來代替人民同舊政權的鬥爭。

列寧說，在“統一代表大會已經犯了一些錯誤，使黨向右移了一點”以後，普列漢諾夫又“犯了更大的錯誤，他遠遠地跑到右邊去了，他居然號召無產階級充分地、完全地、無條件地支持立憲民主黨人和立憲民主黨人的杜馬”。（同上第419頁）

工人同志們：

我們是在最近一個時期以來我們祖國生活中空前未有的緊要時刻向你們發出這封呼喚信的。

以戈列梅金部長為首的政府拒絕了國家杜馬的全部要求。它不赦免曾經因為進行爭取自由的鬥爭而被它宣布為罪犯的那些人，也不讓被它弄得一貧如洗的農民得到土地。現在該怎麼行動

呢？尽管义憤的烈火在你們的心田燃烧，为了你們自己的事业，为了我們整个的祖国，你們还是应当非常冷靜地考虑这个問題。你們必須避免錯誤。否則我們整个运动就会受到严重的、也許是无法补救的損失。

不要受人挑撥！政府的力量一天天在减退，因为我国人民每天都越来越清楚地認識到，他們从政府那里，除了愈来愈多的压迫之外，什么也等待不到。政府对这一点是看得清的。它想趁它的力量仍然大过你們的时候，向你們挑战。不要受它的挑撥；不要受現在决心号召你們拿起武器的那些痴心的糊塗虫言詞的引誘，現在应战必然会遭到惨敗。

但是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我国政府一面組織黑帮分子的暴行，不断压制自由思想的任何表现，一面却不干涉对国家杜馬提出最尖銳的批評。你們知道它为什么这样做么？

因为它要使你們变成反动派的工具。

戈列梅金对自己說：“現在，我們拒絕实行国家杜馬的要求引起我們和它的冲突，如果这个时候革命者都攻击杜馬，那是好得很的。杜馬在人民心目中越不值錢，人民就越不会支持它，要封住它的嘴巴就越容易，必要时干脆予以解散，回头我再用机关枪对付革命者。”

工人同志們！

你們一定要粉碎戈列梅金先生这套計劃。不要因为資產階級政党在杜馬中占統治地位就感到不安。戈列梅金先生敌視杜馬，不是因为資產階級在里面占統治地位，而是因为其中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为所有的人要求自由，为农民要求土地。

戈列梅金先生拒絕杜馬的要求，目的不是反对資產階級，而是反对全国人民。所以全国人民应当迫使戈列梅金先生对这种拒絕表示遺憾；**全国人民应当齐心协力地支持杜馬。**

在这种場合下，任何动摇都会損害我国人民。这种动摇表明他們还不理解当前最迫切的政治任务是什么。

要順利地為社會主義而鬥爭，必須有政治自由。而要在我國實現政治自由，我們必須揭穿我國反動黨派的陰謀。

如果你們現在不把你們的全付精力，你們的全部注意都投在這件事情上，你們就會遭殃，整個國家也會遭殃。

反動派正在利用你們的致命的錯誤，從而給自由事業一次可怕的打擊。

請不要對我們向你們發出這封呼喚信感到奇怪。早在八十年代初期，我們就預言你們將在歷史舞台上出現，並且像信神的猶太人期望彌賽亞一樣期望它。我們曾經反復不斷地說，我國的解放運動將作為工人階級的運動而勝利結束，否則就根本不會勝利。現在，事變證明我們的期望是正確的，而由於工人的英雄行為，我國的解放運動離勝利已經不遠了。在這等時刻，我們不能沉默，我們認為自己有責任向你們指出什麼是反動派希望引誘你們掉進去的政治陷阱。

對你們忠心耿耿的 格·普列漢諾夫

第一封信

小冊子《論策略和不策略的信》收集了下面五封信和《右傾在哪里，正統思想在哪里？》一文，於一九〇六年六月下旬至七月之間由“小東西”出版社出版。它的主要內容，用列寧的話說，就是“教導不明智的工人社會主義者對待立憲民主黨人要客氣點”。（《列寧全集》第十一卷第389頁）

第一封信最初發表在一九〇六年五月二十日第四號和五月二十一日第五號《信使報》上，是一篇重要的反面文章。它在一系列重大的革命策略問題上背叛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五月二十六日，《前進報》發表了列寧

的长篇文章《普列汉诺夫同志是怎样论述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列宁全集》第十卷第431—452页),全面地批判了普列汉诺夫的机会主义言论。

列宁指出:普列汉诺夫丝毫不了解当前革命形势的特点、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任务和策略原则,不了解什么是立宪幻想以及它的危险性;用非历史的观点把某一时期支持反政府的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的具体问题同否定支持反政府运动的一般原理混为一谈;看不到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资产阶级中最不革命的阶层会愈加迅速地脱离革命,看不到立宪民主党人色彩的资产者被迫同旧政权实行妥协,革命民主派色彩的资产者被迫同旧政权进行坚决的斗争;当俄国自由资产阶级早已并且继续背叛人民自由事业的时候,硬说背叛还没有开始,只有将来才会背叛。

普列汉诺夫整个策略的实质,就是在革命斗争时代散布“政治和平”的虚伪观念,削弱或者松弛一切阶级斗争,麻痹各阶级之间以及人民同旧政权之间的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对抗,企图用议会斗争的任务来代替争取政权的根本任务,为了自由主义的暂时胜利,忘记实际生活已经提出的更崇高的民主任务,为了迁就暂时的情绪、状况和关系的可能性,忘记无产阶级的长远的、主要的、根本的利益。

普列汉诺夫一方面主张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从当前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勾销掉,把丰富具体的政治斗争归结为抽象的“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另一方面又企图从理论斗争领域中把无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政党的政治观点的斗争排除出去,当立宪民主党人日益严重、日益显著地危害革命事业的时候,硬说揭露这些妥协派分子的动摇性和背叛行为超过了事变的进程和群众的

要求！

列宁說：“普列汉諾夫的机会主义妨碍和危害了教育群众认清立宪民主党人这一必要的工作”（同上第449頁），“正如过去为了反对伯恩斯坦，必須反复地和詳尽地解释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現在为了反对普列汉諾夫，也必須这样做”（同上第445頁）。

八十五号波尔塔瓦《钟声报》^①登了一篇文章，題目是《社会民主党和国家杜馬无产階級党团》。这篇文章涉及一个对我们最重要的实际問題。这当然好。但是它对問題的回答缺乏应有的明白性。这自然不好。明白性随时随地都需要。而現在，在我们当前的境况下，它对我们是绝对必要的。如果我们党已經犯了一些严重的政治錯誤，那么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唯一是因为它对自己的任务理解得不十分明白，或者也可以說，十分不明白。

不用說，思想上的这种不明白性在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有其原因。但这是第十件事，像《父与子》中的巴札洛夫所說的一样。^②不好也罢，好也罢，人的思想明白也罢，模糊也罢，人的行为对也罢，錯也罢，一切都可归咎于历史老人，一切都与历史老人“有牽連”。但正是因为一切都可归咎于他，所以在我們看来，引证历史一点也不能为我们的錯誤开脫。引证历史吧，可自己別搞錯。

上面提到的那篇波尔塔瓦《钟声报》的文章里所表現出来的那种不明白的思想究竟是什么呢？

請您自己判断一下。

文章作者肯定說：“只接受社会民主党的綱領，还不能使个別人，甚至一整批人成为社会民主党党员。要做到这一点，必須完全

① 《钟声报》是合法的社会民主党的日报；自一九〇六年一月十八日至六月八日在波尔塔瓦出版。参加該报工作的主要是孟什維克。——譯者注

② 俗語。意思是，这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事，这是不重要的事。——譯者注

接受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原则。”

这是正确的，但可惜的是不明白性也就从这里开始。应当很好地接受，而且还要**完全**接受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原则，这是沒有說的。但是必須預先弄清楚这些原则是什么。而我們这位波尔塔瓦的同志並沒有做过这件工作。……或者至少他沒有費点力气好好儿地向我們讲清楚他自己显然要“完全”加以接受的那些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原则究竟是什么内容。

他仅仅发表了下面一个意見：

“社会民主党显然区别于其余許多政党的特殊标志，除了它的綱領以外，就是它对待一切其余的資產階級政党的不調和的階級立場。”

这是不充分的。而且就是不充分的东西也是用最不能令人滿意的方式叙述的。这里看来有一处誤刊，也大概有几处笔誤。

先談誤刊。“对待一切其余的資產階級政党的立場”一語中“立場”一詞看来应当讀作“反对立場”。否則就不通。

假如我們把这个誤刊改过来，那么不通就通了。但那时仍然有笔誤造成的麻煩。第一，原来我們党应当站在对待“一切其余的資產階級政党”的反对立場上；这等于把自己也算成了这样的政党。

文章的作者自然不会这样想；所以他應該把不适当地从他的笔下滑出来的“其余的”一詞刪去。其次假使我們作了这些修改，我們就不会說对待其余的資產階級政党的不調和的階級立場，而會說由社会民主党的階級观点决定的、对待資產階級政党的不可調和的反对立場。这样一来，我們所研究的、作者的思想就不再是叙述得很坏的了，但由于过分簡短，它仍然不能令人滿意，甚而至于还是錯誤的。作者把一切其余的資產階級政党看成一堆反动透頂的东西。然而国际社会主义最优秀的代表們早就认为，如果社会民主党忘記了不同的資產階級政党是塗有不同色彩的，忘記了对于无產階級說来这些政党中間究竟哪个党掌握政权远不是完全

無所謂的，社會民主黨就會犯理論上和策略上的大錯誤。

西歐社會民主主義的無產者都很好地懂得這個道理，所以只要他們不可能通過自己的候選人，他們在重新投票時並不會放棄投票，而通常都會投票贊成資產階級政黨中間最進步的政黨的候選人。這便是拉薩爾早已向德國工人推薦的那個策略，雖然他同德國資產階級進步人士也進行過頑強的和殘酷的鬥爭。然而在我所分析的這位波爾塔瓦社會民主黨政論家的原理中是根本沒有這個策略的一點影子的。誰接受了他的原理，誰就決不能“完全接受社會民主黨的**策略原則**”。他就會“接受”某種**完全不完整的東西**。

但這還算不得大禍事。糟就糟在我們這位波爾塔瓦的同志甚至沒有從必要的歷史見地來闡明他錯誤地當作**完全的真理的那個部分的策略真理**。他寫道：

“我們把這些一般性的原理運用於議會的工人團時，可以說，只有當這個集團在杜馬的活動中貫徹了社會民主黨的基本策略原則時，它才能反映俄國無產階級的最有戰鬥力、最有覺悟的這一部分人的真正的意向，換句話說，才能稱為社會民主主義的集團。

“不陷入杜馬中的一般立憲民主黨的反政府色彩的泥潭，不作在杜馬中占多數的立憲民主黨人的尾巴，而與這個多數針鋒相對，揭露他們的狹隘意圖及其同‘右翼’政黨、同政府進行勾結的傾向——這就是無產階級的代表應當採取的唯一的、同時也是真正社會民主黨的**策略**，我們應當堅定不移地向國家杜馬中的工人代表宣傳這個策略。任何其他策略都會模糊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這個集團的成員自命為無產階級在杜馬中的代表），使他們變成資產階級政黨的附庸，變成反對無產階級在俄國革命總進程中獨立的任务的工具。”

要是我們這位波爾塔瓦的同志曾經把自己的一般性原理運用於法蘭西的社會黨，那麼他不必把自己的文章的最後幾段話作任何

重大的修改，只要更动几个字就行了：把“立宪民主党人，立宪民主党的”改为“激进派，激进派的”；把“杜馬”改为“众議院”；最后，把“俄国革命”改为“社会历史运动”。这是异常方便的。但正是这种异常方便性使人怀疑《钟声报》所作出的結論是否令人滿意。要知道，法国現在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和俄国根本不同。一百一十年以前，法国就已經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而俄国只是現在才经历它……在法国，摆在无产阶级面前的是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问题；在俄国，暂时还只說得上用最新的资产阶级的关系来代替我国的旧制度。法国有民主共和国，我国則有“逃之夭夭！”难道这些重要的区别不足以对《钟声报》向俄国无产阶级的代表們开的策略药方作若干重要补充么？看来我們这位波尔塔瓦的同志认为，这样一些补充是不需要的，俄国无产阶级的策略应当“完全”模仿法国或英国无产阶级的策略。但这是一个錯誤，它只是证明我們这位同志不正确地理解了“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原则”。

無論如何波尔塔瓦的作者同在《共产党宣言》中非常激烈地攻击四十年代“真正的”德国社会主义的馬克思有很大的分歧，这种社会主义在重复法国社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的攻击时忘記了法国的批評的前提……是具有相当的物质生存条件 and 政治机构的現代资产阶级社会，換句話說，即是当时德国仅仅尚待爭取的那些社会条件。^①

讀了《钟声报》，可能以为現时在俄国当权的是民主派改良党，而立宪民主党对它采取反对立場，这种立場，由于这两个党派之間的意見分歧不大，不能是切实的。

可惜，民主派改良党还没有当权；可惜，現在做我国总理的不是馬·馬·柯瓦列夫斯基，同时立宪民主党人并没有对他，而是对戈列梅金先生和上面提到的“逃之夭夭！”采取反对立場。这就使

^① 参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496頁。——譯者注

我們整个国家的政治局面根本改变了，因此也就改变了我国无产阶级策略任务。

无产阶级的策略，正如任何其他阶级的策略一样，应当严格符合它最近的政治目的。然而我国无产阶级最近的政治目的现在并不是为自己夺取革命专政，而是使人民的专制取得胜利，即推翻我国的旧制度。可以把这种制度称为前资产阶级制度。当这种制度存在的时候，无产阶级便不可能成熟到实行自己的阶级专政。因此谈论我国无产阶级当前的策略也就是谈论目前政治形势在它面前所提出的种种特殊的政治任务，否则就什么也没有说……

《钟声报》的这位同志对于这些特殊的政治任务只字未提。这种情况使得他向我们的议会工人团提出的劝告失去任何实际意义。

对于我们说来，困难不在于认识资产阶级利益和无产阶级利益的对立。在我们的队伍中，对这种对立的认识可以说已经成了固定的偏见。困难在于认识了这种对立和始终完全按照自己的这种认识行动时，能够确定我们活动的一些方式，使我们有可能——为了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利益——利用我国资产阶级现时的反政府的情绪。

Hic Rhodus, hic salta! ①

誰看不見这个困难，誰以为用譴責和嘲笑——例如对“立宪民主党人”——的办法能够輕易地解決問題，誰就根本还没有了解馬克思主义者对問題的提法，誰就明白地表现出，他的脑子里还有很不小的一堆旧的民粹主义的或布朗基主义的偏见。一八四八年革命前夕，馬克思很清楚地懂得类似的譴責和嘲笑只会扰乱問題。因此他才严厉地批評“真正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因此他才使共产主义者不对不合理地热心于保卫无产阶级的人的那些不策略的越軌行为負任何責任。

① 这里算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語出《伊索寓言》中《說大話的人》。轉意是：这里是最主要的，就在这里证明吧！——譯者注

一八四七年，馬克思在《〈萊茵觀察家〉的共产主义》一文中发表了如下一段意味深长的見解：“如果德国社会主义者的一定的派別經常叫囂反对自由資產階級，而結果，除了德国各邦政府，这种做法对任何人都沒有好处，又如果，現在像《萊茵觀察家》一类的政府机关报竟根据这些人士的詞句，硬說不是自由資產階級，而是政府代表无产階級利益，那么共产主义者不論和前者还是和后者，都沒有任何共同的地方。”^①

恩格斯也在一篇篇幅不长但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短文《保护关税制度还是自由貿易制度》中要求讀者注意：資產階級尽快地建立政治統治权对于工人階級是多么的重要。

恩格斯把这个观点运用于当时的德国时，甚至用它考察了自由貿易問題。類似的見解在波尔塔瓦这位同志的策略議論中是連一点点影子也沒有的。莫非他觉得这是机会主义的見解么？

馬克思談到自己的党时写道：它“一分钟也不停止培养工人尽可能更加明确地認識資產階級利益和无产階級利益間敌对的对立性”^②；它希望“德国工人能够利用資產階級統治本身所带来的那种政治的和社会的条件，作为反对这个資產階級的武器”。^③但是他越是清楚地認識这种武器的巨大的革命意义，他就越会坚决地力求帮助历史制造出这种武器。而他以及全体有觉悟的无产階級在这种場合下能够給予历史的帮助，就在于坚决支持資產階級为了自己的統治权同旧制度进行斗争。

当《共产党宣言》刚出世的时候，資產階級同旧制度的这种斗争主要是在德国进行的。

因此，《宣言》直截了当地說：“在德国，只要資產階級采取革命

① 參看《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ss von Karl Marx, Fr. Engels und Ferdinand Lassale》〔《卡尔·馬克思、弗·恩格斯和斐迪南·拉薩尔軼文集》——譯者注〕第二卷第433頁。——著者注〔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207頁。——譯者注〕

②③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503頁。——譯者注

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①《宣言》的这番話并不是为我們的人忘記了，而是被他們理解得极端狹隘。我記得，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时代，某些“急进的”同志攻击我，說我不該从这些話中作出我們有义务支持俄国的任何反政府运动的結論。

这些同志觉得，我在偷換概念，用反政府运动代替《宣言》上提到的革命运动；这些同志不了解，在专制制度的条件下，资产阶级的反政府运动乃是一种革命的現象，它在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事业中构成一个很大的正号。但是这些同志所不曾懂得的道理，馬克思却透彻地了解。一八四七年，他在上面提到的《〈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一文中热烈地支持普魯士资产阶级在联合省議會中所采取的甚至远不坚决的反政府立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学家梅林同志发现，馬克思由于性子急躁而超过了他自己的目的，因为在这里所談到的那个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反对派拒絕普魯士政府提出的所得稅草案的行为中，资产阶级依循的是反动的动机。^②

我不会反对这个看法。我只想說，如果馬克思也有过錯誤，那么他的錯誤一定最能說明他的整个策略的特点，而且是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策略針鋒相对的。所有願意向我国工人阶级說明无产阶级策略的真正原則的人都應該深入地想一想这个道理。波尔塔瓦的《钟声报》想想这点也将是有好处的。

在第二号《党内消息》中一位“布尔什維克”同志热心致力于解决我們現在所經歷的究竟是哪一年：一八四七年还是其他什么年的問題。^③我可以满怀信心地答复他說：我們現在所經歷的是一八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 503 頁。——譯者注

② 參看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三联书店一九六三年版，第一卷第 345 頁。——譯者注

③ 指列宁的《俄国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任务》一文，見《列宁全集》第十卷第 113—123 頁。这里提到的問題見第 114 頁。——譯者注

四七年，而且恰恰是这一年的那几个月，在这几个月内写出了激烈譴責“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了解資產階級解放运动的重要性的《共产党宣言》和保卫資產階級自由主义的《〈萊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一文。換句話說，我們現在所經歷的时期說明上面这么“一个布尔什維克”所捍衛的策略在实践上是最巨大的和最有害的政治錯誤，而在理論上則是对馬克思的真正的背叛。馬克思透彻地了解，德国自由資產階級同专制制度斗争完全不是为了无產階級的利益。^①

历史唯物主义理論的奠基人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清楚地看到了自由派的意图的真正性质。但同时，正是作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他不能不鄙視那些由于資產階級政治代表追求資產階級目的那个完全自然的情况而感到不安或愤怒的人士的議論。他说过：“无產階級不会問資產者是把人民的幸福看作自己的主要目的呢还是把它看作自己的次要目的，他們是不是想把无產階級当作炮灰来利用。无產階級不会問資產者希望的是什么，而是問他們被迫去做什么。它問的是什麼更能够帮助它达到它自己的目的：是現时的政治制度，还是自由派所追求的資產階級統治”^②等等。

这样一来，按照馬克思學說的全部精神，問題就从**主觀的領域轉到客觀的領域**，从考虑自由資產階級的道德品质的領域轉到**政治考虑的領域**。

而在我們这些馬克思學說的拥护者看来，早就該把問題轉到后面这个領域里来了。这样一轉移，我們就会避免許多不灵活的和失算的行为。

上面我已經說过：声称我們应当不断地在工人的思想中提高对工人利益同資產階級利益的对立性的認識，这个真理早就在我們的思想中形成了固定的偏見。而偏見是枯萎的、硬化的、走了味

① 參看《一七八九年式的革命还是一八四八年式的革命？》，載《列寧全集》第八卷第229—231頁。——譯者注

②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210頁。——譯者注

的、失去了生命的清新气息的真理。

这是真理的木乃伊。而当这种木乃伊被当作真正的、生动的真理时，它就必不可免地会产生谬误。在这个场合下，谬误就在于人们谈论资产阶级利益和无产阶级利益的对立时是按照“是就是是，非就是非，除此以外，都是鬼话”的形而上学公式来判断这种对立的。如果两种利益是对立的，那么无产阶级就不能同资产阶级一道走；而如果有时看起来这样做会对它有利，那么这就是有害的错觉，资产阶级在欺骗，资产阶级在背叛，资产阶级在变节，等等，等等。

因此，无产阶级用不着企图依靠非无产者居民阶层的支持来孤立反动派。因此，它也用不着考虑“分开走，一起打”。

这完全是机会主义。很多人都把这种论调当作 *nec plus ultra*^① 社会民主主义的急进主义。但是这种所谓的急进主义也是真理的木乃伊。它不会给无产阶级事业带来方便，而会给它造成困难，妨碍工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利用资产阶级“被迫于”它的利益和前资产阶级制度的保卫者的利益的对立性而采取的行动。至于说到在工人思想中提高对这个对立性的认识，那么他们希望主要通过对资产阶级党派和资产阶级活动家说些不体面的话来推动它前进。但是不体面的话不是批评。批评确实会提高认识，相反地，不体面的话却会使认识模糊。就拿背叛这个不体面的话来说。

我们经常叫喊资产阶级背叛，可是当它真的“背叛”，——也就是说当它同官僚制度和解的时候，——当我们真的需要到处叫喊资产阶级背叛的时候，我们的叫喊已经产生不了应有的效果，结果就重复小牧童的故事，当狼没有出现的时候，却大喊“狼来了！狼来了！”^②

工人对他们的利益同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性的认识是通过经

① 极端的，尖端的；最好不过的。——译者注

② 这个故事出自《伊索寓言》；《儿戏的牧人》篇。——译者注

驗來提高的。經濟鬥爭的經驗向他們說明問題的經濟方面，政治鬥爭的經驗向他們說明同一問題的政治方面。但是工人在同專制制度的鬥爭中和資產階級一道行進這個事實，絲毫不會給工人掌握政治鬥爭的經驗造成困難。完全相反！工人會在這裡看到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不徹底性，其所以如此，只是因為資產階級不能走得像無產階級那樣遠，不能不掉在它的後面。而這個不可避免的落後現象對於無產階級說來，乃是不可代替的生動的教訓。我們的批評自然应当向無產階級說明這種教訓的意義。但是第一，批評是一回事，而說不體面的話又是一回事。

在四十年代的德國，同其他政黨辯論時專門說不體面的話的人並不是共產主義者，也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而是像海因岑這類的饒舌家。他們的大作馬克思曾經稱為“粗俗文學”^①。

在這方面我們沒有任何必要模仿海因岑。第二，要使我們的批評產生良好的作用，它就應當有根據。這就是說，我們不應當向資產階級提出不該有的、或者夸大的、或者過早的責難。這樣一些責難不但不會使我們接近我們的目的，而且會使我們離開它。一般說來，政治上靈活是一件大事情，當問題涉及策略的時候，應當特別經常地記住這一點。

現在俄國的实际形勢是：我們的力量每天都在增加，反動力量每天在減少。因此，我們獲得勝利的机会每天都在增加。歷史現在大聲地和清晰地向俄國人民講解政治科學的課程，我們不應當用過分性急的行為來中斷它的講授。

我之所以這樣說，因為我們某些同志好像抱怨國家杜馬在自己存在的最初一周內沒有同官僚制度發生衝突。但這無異於抱怨杜馬沒有給自由事業帶來巨大的損害。

愛德加爾·金芮在他的《革命》中說得很好：每個黨遲早都會犯使它陷入深淵的、不可饒恕的錯誤。

^①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322頁。——譯者注

我国政府已經犯了許多不可饒恕的錯誤。这些錯誤已經使它处于深淵的邊緣，但是还没有把它推下去。一旦政府解散杜馬，它就要跌入深淵。但是跌入深淵的政府可能給人民带来或大或小的（視使得政府跌入深淵的环境而定）損害。無論这种說法初看起来多么奇怪，然而不可怀疑的是，政府跌入深淵开始得越早，这个过程就会越长而且越痛苦。

为了縮短和改善这个过程，应当把它的起点推迟一定的時間。看起来是最长的道路实际上原来是最短的。这一点我們一分钟也不应当忽視。过早的冲突会过早地中断人民群众的政治教育。著名的«permanence»^①究竟好在哪里呢？

就在于它不使人民感到滿足和沉寂下来，就在于它使得人民处于經常紧张的状态中，就在于它会极其迅速地提高人民的政治思想。

那么，現在成了人民注意的中心的杜馬会怎样影响人民呢？

它甚至会喚醒睡得最酣沉的人；它甚至会推动最落后的人前进；它会在群众中打破历史遗留下来的最后的政治幻想。这就是說，杜馬和«permanence»一样是朝同一方向发生影响的。自然，如果用空想主义的精神进行推論也可能反駁說：«permanence»到底要好一些；因此，“«permanence»万岁！”但是奇迹的时代过去了，反动堡垒的城墙不会因为革命空談的声响而塌陷的。

为了«permanence»,就必须有一种我們还没有的力量，而在沒有这种力量时，应当重視正在創造和加强它的东西。所以，当我们在我們的某些同志的大作中看到一种可以說是对待杜馬的书呆子态度时，我感到奇怪。他們說：“杜馬不应当从事組織工作。它的工作应当是純粹鼓动性的。”但是必須記住，正是杜馬的組織工作具有最大的鼓动意义。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反动的政党要妨碍这个工作，从而使得自

① “不断”。——譯者注

已在居民的心目中信誉扫地。

伏尔泰说过：除了枯燥的作品以外，一切种类的文学作品都是好的^①。我则认为：杜馬的一切工作都是好的，只要因之可以解开我国人民眼睛上最后的布带。凡是有助于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的東西都是好的；凡是有碍于这一工作的東西，都是坏的。“这就是整个哲学的意义”^②。其余一切都是偏見、不灵活的作法或有害的书呆子习气。所以我们必須尽可能迅速地抛弃这其余的一切，抛弃所有这些偏見、不灵活的作法和书呆子习气。这是我们党最切身、最紧迫的利益所要求的。偏見、不灵活的作法和书呆子习气已經給党带来了許多严重的損害。

在一篇旨在反对我的辯論文章中，一个“布尔什維克”同志把我比做了伯恩施坦。这是十分机智的做法，但是这位十分机智的“布尔什維克”沒有看出，我是伯恩施坦的反面。爱德华·伯恩施坦主张重新审查馬克思，我則建議我們党重新审查妨碍党掌握我們导师的策略思想的那些概念。我也邀請把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原則叙述得如此不能令人滿意的波尔塔瓦《钟声报》从事这一工作。我将在下面几封信中着手进行这项工作。

（譯自《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十五卷第 91—101 頁）

第二封信

这封信最初发表在一九〇六年六月十一日第二十三号和六月十三日第二十四号《信使报》上。

它的基本思想是：人民认为杜馬具有广泛的权利，可以滿足他們的要求，这是幻想。应该怎样破除这些幻想呢？“誰希望根除人民对当前宪法的幻想，誰就应该帮助他們去試圖利用这个宪法”。人民群众的政治經驗只有通

① 这句格言出自伏尔泰的诗体喜劇《浪子》（一七三八年）序言。——譯者注

② 語出海涅的诗作《思想和幻想》。——譯者注

过他们自己的政治活动来取得，而不能用先进分子的演说、决议、呼吁来代替。所以“唯一革命的策略”是“通过鼓动工作的文火使人民处于一定会引导他们去理解这些革命的决议和赞成这些革命的决议的那种地位”。

根据这个论点，普列汉诺夫大肆攻击布尔什维克，说他们用唯心主义的观点解决策略问题，从无政府主义立场看待宪法，说他们像维利希-沙佩尔派一样“把自己的意志当作革命的主要动力”，说他们“像革命的宗派分子”一样“使群众分裂”，说他们是“没有人民的雅各宾党人”等等。

这篇文章再一次暴露了普列汉诺夫“丝毫不了解什么是立宪幻想，也就是说，他丝毫不了解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目前形势”（《列宁全集》第十卷第441页），“热中于……议会制度的幻影，而忘记了争取政权的根本任务。”（同上第442页）

杜馬同政府的冲突正在日益尖锐起来。因此策略问题现在对我们说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应当充分弄清楚这些问题，以便不重犯过去的错误，因为重犯过去的错误会造成无法补救的和不可估量的灾难。

当前的策略问题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所谓立宪幻想的问题。《信使报》已经说到这个问题；但是再谈一谈这个问题将是有益的。

有人对我们说，我们不应支持人民中间的立宪幻想。说这种话的人的想法实质上是正确的；但是这种实质上正确的思想在他们那里表达得极不成功。

我了解高喊反对“立宪幻想”的无政府主义者。在无政府主义者心目中任何宪法都是同机会主义魔鬼的有害的勾结。因此当无政府主义者听说一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希望利用这个国家现存的宪法以便对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教育时，他们就大叫：“叛变！你

們在無產階級中間支持有害的立憲幻想！”

無政府主義者在這個場合下的議論是完全合乎邏輯的。然而如果他們得出不正確的結論，那只是因為他們的**基本原理不正確**罷了。

過去有個時候我國的革命者整個地接受了這個不正確的原理。他們當時處在米·阿·巴枯寧最強大的影響下。大家知道，巴枯寧是無政府主義的始祖之一。當時我國的革命者贊成無政府主義的信念，認為任何憲法都是同機會主義魔鬼的有害的勾結，所以當時他們攻擊“立憲幻想”是完全忠實於自己的。

現在則不然。現在我國有覺悟的革命者中占絕大多數的社會民主黨人都不贊成無政府主義對憲法的看法。在他們看來，任何特定的憲法無非是特定國家中現存的力量實際對比情況的法律表現。他們並不想在這種情況中看到什麼損害無產階級利益的東西。因此他們公正地認為，無政府主義對“立憲幻想”的攻訐簡直是荒謬的。

從無政府主義者的觀點看來，任何特定的憲法只要它存在就都是壞事。從社會民主黨人的觀點看來，憲法可能是壞的，但不是因為它存在，憲法存在是必要的和有益的，而是因為它很壞地反映着國內實際的力量對比情況。當社會民主黨人相信特定的憲法在後面這個意義上不能令人滿意時，他自然就會力求使所有他代表和保衛其利益的那些人，即所有的工人也都相信這一點。但是在使工人相信這一點的時候，他並不要起來**反對一般的“立憲幻想”，而是反對對特定憲法的幻想**。這種憲法或者已經過時，或者剛一出世就不正確地反映了實際力量對比關係。

我們中間那些現在高喊反對“立憲幻想”的人究竟採取怎樣的觀點呢？

他們自稱是社會民主黨人。因此堅持無政府主義觀點對他們是不相稱的。假使不相稱，那麼他們口頭上攻擊一般的立憲幻想就沒有任何意義。他們不應該反對一般的立憲幻想，而要反對對

特定宪法的幻想，即对大家都知道的事件以后欽賜給我国的那部“宪法”的幻想。

情况也的确如此。我們那些同我們意見不一致的同志并不是攻击一般的宪法，而正是攻击我国当前的宪法。他們并不贊成无政府主义对一般宪法的观点。如果責备他們犯了这个罪过，那是不公正的。他們的罪过在于他們虽然不贊成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但不知为什么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表达方式；在于他們虽然反对特定的宪法，但是他們所使用的說法却只有在他們希望反对一般宪法的那个場合下，即只有在他們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那个場合下才有权使用。

这是很大的罪过。政治上同科学上一样，确切的表达是重要的。我們的同志們既然像无政府主义者一样表达，所以第一，他們就在为工人之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开辟道路，第二，他們就在为自己之了解我們对問題的观点造成困难。

这个观点的内容是什么呢？

我們过去的“布尔什維克們”称我們是机会主义者。

我决不认为他們全都衷心地认为我們是这样的人。不，对于他們中間許多人說来，这根本就是一种蠱惑性的手段，他們希望利用这种手段敗坏我們无产階級心目中的信誉。但是，他們中間自然也有一些人相信我們有机会主义。比方因为我的一封登載在《信使报》上的信^①而抨击我的“一个工人”确实无疑地认为我轉到伯恩施坦先生的观点上去了。

不知道是由于怎样一种观念的結合，这位工人使得我想起了一个善良的老妇人，她曾給烧死胡斯的那个火堆送去一捆木柴。据說胡斯看見这个可尊敬的老人以后喊道：«Sancta simplicitas!»^②伟大的捷克人沒有怀疑老妇人的誠心。如果他有時間，他自然会力求說服这个慷慨的妇人以及所有像她一样真誠而且头脑简单的

① 指《致工人們的信》，參看本书第1—3頁。——譯者注

② 拉丁文：“天真純朴的人！”——譯者注

男女不再相信他的思想本身包含任何危險的和對他們有害的東西。那時他自然就不會用拉丁語說話。他就會用慷慨的老婦人的語言說話，而且儘可能說得簡單些。誰知道呢！或許她也會接受他的信念。我且試着同我的論敵同志們進行商榷。我也試着儘可能說得簡單些。

你們反對當前我國的憲法。不過，你們把話說成是好像反對一般的憲法。我完全同意你們的看法。不過，正如你們已經看到的，我不贊成你們不正確的說法。對！當前我國的憲法是壞透了。它沒有反映出現今俄國實際的力量對比關係；它只是官僚制度掩蓋這個真正的情況，用不正確的方式表現它，**混過歷史關**的一種過時的企圖。對於這個問題我們之間是不可能有意見分歧的，然而如果你們希望更尖銳地批評我國的憲法，我是不會爭論和反駁的。

我國當前的憲法壞透了。無論我或你們同樣相信這一點。而且我們有義務儘可能迅速地把我們的這一信念首先告訴無產階級，其次是告訴現在能夠支持無產階級的政治要求的那一部分城鄉小資產階級（我是在最廣泛的意義上使用小資產階級一詞的，即把它理解為“勞動農民”，只要他們不是受資本家僱傭而勞動）。我們有義務粉碎這些居民階層對我國當前憲法所抱的那些幻想。

同志們，我希望你們像我一樣承認有這種義務。否則你們關於必須破壞立憲幻想的議論就會完全失去任何合理的根據。

你們也不會肯定說，這些幻想將近完全消失。只要知道人民群眾向國家杜馬提出的質詢和要求，就足以理解人民對當前我國的憲法的幻想還有多么強烈和牢固。要知道，如果人民向杜馬提出**廣泛的要求**，那麼這唯一是因為他們認為它具有**廣泛的權利**，可以滿足他們的要求。但是杜馬根本沒有廣泛的權利。因此很明顯，人民對真實情況的了解是極其錯誤的；因此很明顯，他們對當前我國的憲法抱着很大的幻想。

這些幻想必須破除。**人民應該知道真實情況**。他們應該知道，官僚制度極度削減了他們的代表的權利。為了使我們能夠獲得一

部正确反映現時俄国社会力量对比情况的宪法，这样做是必要的。

怎样做到这一步呢？

到这个問題为止，我們都同意你們的看法。从这里开始，我們就分道揚鑣了。

你們說：“既然我国宪法撥給人民代表的权利是微不足道的，那么人民代表机关就会变成对人民的嘲弄，因此我們不应当支持以人民代表資格参加杜馬的那些人。我們支持他們，同时就是支持人民中間的立宪幻想。”

我們回答你們說，这正是你們的錯誤所在。

你們使我們想起一个小孩，他期望母亲給他一大堆糖果，然而只得到一块干硬的蜜糖餅干。小孩噘着嘴，拒絕吃蜜糖餅干，于是母亲畏縮了，就打发他到小店鋪里去买糖果。

历史舞台不是儿戏，我們的母亲——官僚制度也不会因为受它监护和关怀的居民对它噘嘴而感到不安。如果我們鄙弃这个溫柔的母亲被迫丟給人民的那一小点毫无价值的权利，那并不会使它感到不安，反而会增加它的自信。我們越是不利用这一小点权利，俄国人民的經驗就会越少。而俄国人民的經驗越少，对于我們的母亲——官僚制度說来就越好。

为了使人民相信撥給他們的代表的权利是微不足道的，必須使他們亲身看到，虽然他們的代表享有这些微不足道的权利，但是在同十分强大的官僚制度进行斗争时代表們所能完成的工作是多么的少。

当人民看到現时无权的国家杜馬能够为他們完成的工作是多么少的时候，他們就会理解，問題不在于有代表，而在于使这些代表处于一种能够把他們的意志变成法律的地位。換句話說：那时人民就会抛弃自己对于当前我国宪法的幻想，而着手取得另一部**真正的宪法**。这正是我們大家所追求的目标；这正是“所要证明的”东西。

結論是什么呢？結論就是下面这个似非而是的奇談怪論：誰

希望根除人民对当前我国宪法的幻想，誰就應該幫助他們去試圖利用这个宪法。其实这里面沒有任何奇談怪論，而且还是最自然不过的道理。为了使人民相信官僚制度硬塞給他們的那柄武器不中用，必須让人民把这柄武器抓到手里來，并且实际試驗一下。只有那时他們才会看到它的一切缺点，只有那时他們才会說：“这柄武器不中用，应当另找一柄。”

在你們看来，人民根本不需要把这柄毫无价值的武器抓到手里來。你們认为人民自己的經驗在这种場合下完全可以用你們的決議、演說和呼吁书來代替。但是任何演說、呼吁书和決議都不能代替人民自己的經驗。誰不懂得这个道理，誰就根本不了解国际社会主义党的策略，誰就会离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看法，而轉到唯心主义观点方面去。西方的无政府主义者就是这样行事的。在俄国，你們——我們过去的布尔什維克同志們——也是这样行事的。

老实說，这并不使我觉得奇怪。在《右傾在哪里，正統思想在哪里？》一文中，我們已經說过，你們是真正的布朗基主义者，你們的策略观点中沒有任何一点馬克思主义的气味。令人奇怪的倒是那种刚愎自信的态度，你們經常用这种态度引用馬克思的話來证实和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观点。由于这种刚愎自信的态度，我曾經不止一次地（用涅克拉索夫的話說）

为伟大的名字抱屈。

那么，什么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呢？这个原理就是，不是意識決定存在，而是存在決定意識。

把历史唯物主义的这条基本原理当作你們策略推理的基础吧（而馬克思主义者是不能不把它当作这样的基础的），那时你們就会立即异常明白地看到，对于一般人民，而特别是对于工人階級說來，任何演說、決議、呼吁都不能代替他們自己的政治經驗，并且他們只有通过他們自己的政治活动才能获得这种經驗。至于馬克思和恩格斯，則他們的策略观点完全是以我刚才所指出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依据的。正因为如此，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策略才

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者。后者对策略是持唯心主义观点的。他們认为，真理一旦为他們这些社会主义者所发现，人民就毋須通过自身的斗争来了解它，而可以从社会主义改良派的著作中認識它。

演說、決議、呼吁之所以好不是因为它是經驗的代替物，而是因为它是經驗的解釋者。你們这些社会民主党的布朗基主义者希望使你們的鼓动演說和你們的革命著作在人民对待当前我国宪法的态度方面能够代替他們自己的經驗。我們馬克思主义者則希望让工人階級凭自己的經驗来体验我們的鼓动员将对他們所說的話以及我們的政論作者为他們所写的文章。只有在这个場合下，我們的演說和我們的著作才会对他們的意識产生重大的影响。只有在这种場合下，他們才会打破他們的幻想。

这就是我們之間的区别。因此，只有对这个问题毫无認識才会設想：好像这种区别的存在是由于一些人倾向于机会主义，另一些人主张采取更革命的行动方式。实际上我們之間的区别要深远得多。它涉及我們革命的世界观最根本的原則。区别是如此之大，就像国际工人协会內部馬克思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之間所存在的那种区别一样。如果反对我們的同志們不喜欢这个比方，我可以另举一个例子。我认为，我們之間的意見分歧同当年使得**共产主义者同盟**內部产生分裂的那个分歧是一模一样的。大家知道，这次分裂的由来起于維利希-沙佩尔派同馬克思-恩格斯派的斗争。馬克思曾經这样描写过斗争双方在观点上的区别：

“……少数派（維利希和沙佩尔派）用教条主义的世界观代替批判的世界观，用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代替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少数派不是把现实关系、而是把自身的意志看做革命的动力。我們对工人說：你們应当再經歷五年^①、二十年、五十年的內战和人民运动，这不仅为了改变現存的关系，而且也为了改造自己本身，使自己有能力进行統治。反之，少数派却說：‘我們現在应当取得統

^① 馬克思的原文是：十五年。——譯者注

治权，否則我們就不会有什么事可做了。’”^①

你們正是丧失任何批判能力的教条主义者。你們把自己的意志当作革命的主要动力，而当我們向你們指出现实关系，你們却叫喊我們有所謂机会主义。你們以为革命者希望考虑这种现实关系就是“不会有什么事可做”。你們这一派同維利希-沙佩尔派一模一样。要知道，这一派只是采用馬克思的術語和某些根本沒有消化掉的、馬克思思想的片断的那个布朗基主义的德国变种罢了。

誰把自身的意志当作革命的主要动力，誰就必然要成为**革命的宗派分子**。他就不了解现实关系的力量，因此他就会以为可以随时随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和模样来改造群众。假使他的这番举动沒有得逞，他就决心毫不怜惜地抛弃群众。他就会力求——用馬克思的話說——“按照特定的教条主义的处方規定运动的进程，而不是在階級运动的现实因素中为自己的鼓动工作寻找真实的基础。”^②宗派用来替自己的存在辯护的理由，拿同一个馬克思的話來說，并不是它同工人运动**共通**的地方，而是它不同于工人运动的、**特殊的示播列**^③。你們，布朗基主义者同志們，总是用自己特殊的示播列来打擾群众，从而大有使群众分裂之勢。例如請回想一下，你們曾經怎样要求工人代表苏維埃馬上宣布而且一定要宣布自己是社会民主党的苏維埃。你們当时像宗派分子一样行动。你們在那时以前是宗派分子，至今也仍然是宗派分子。

你們不可能不是宗派分子，因为你們不善于以现实关系作为你們策略的基础。你們牢牢地站在**烏托邦式的唯心主义立場上**，并且天真地以为革命的神恩只会保佑站在这个立場上的人。

至于我同你們的意見分歧，你們不止一次反复挖苦我說，我是

①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 465 或 639 頁。——譯者注

②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 131 頁。——譯者注

③ 參看上書同頁。示播列：шнблет，音譯。意即行話、暗号、口令、符咒等。典出《旧約》《士師記》第十二章。——譯者注

从远处看事变的。这恐怕是你们同我辩论时的主要理由。但是第一，你们这个宗派的奠基者列宁不是早就从同一个远处来看我们的运动么？他从这个远处把你们如此珍重的一切“示播列”送给了你们。第二，看来你们认为政治观点的明白性同地理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而且在这方面你们使我想起了不久以前在意大利同主张自由思想的报刊进行辩论的、信神的天主教徒（马克思说，“任何宗派都是信仰宗教的”）。主张自由思想的罗马报纸以惋惜的口吻指出一个事实：在维苏威火山爆发时期，相信迷信的那不勒斯人竭诚地向当地的圣雅努斯^① 祈祷，并且期待它的拯救。天主教的机关报刊对于这一点刻薄地回答说，自由思想的作家们坐在罗马自己的编辑部里是舒舒服服的，但如果他们搬到了维苏威火山脚下，他们就会明白，向雅努斯祈祷是必要的。同志们，你们在维苏威火山爆发时期比罗马那些主张自由思想的政论家离维苏威火山更远，而且你们也不曾信仰雅努斯。但是，正像你们所认为的一样，如果教你们搬到那不勒斯去，你们是不是会充满对它的信仰呢？我希望不会。我想，你们在那不勒斯不会传染上天主教徒的宗教迷信。同样，即使把我和你们之间的、使我不能得到经常同你们见面的乐趣的地理距离缩短到零，我也不会接受你们的政治迷信。你们早就该懂得我们的意见分歧就其基础来说是深刻的、具有原则意义的！

作为策略方面的唯心主义者，你们自然要用唯心主义的标准来评价所有其他的政党；你们力求确定它们的或多或少**善良的意志**。当一个演说家发表急进的演说时，你们就对他鼓掌叫好；当他态度温和时，你们就怀疑他有机会主义。可是如果你们如此不成功地加以抵制的国家杜马刚开始存在的时候就赏给了你们好些显然革命的决议，你们甚至会同这个杜马妥协。我们用另一种标准评价政党。在我们看来，重要的不是这些党派说什么，也不是它们

^① 雅努斯，最初为罗马司出入的门神，后来成了任何开始之神，据说这个神有两副脸，对着相反的两方面。——译者注

通过怎样的決議，而是它們的演說和決議怎么能够影响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并且通过这个思想影响我国实际的力量对比关系。如果一次革命的演說或者一个革命的決議会使我們脱离群众，并把群众推入反动派的怀抱，那么我就要說，在人民沒有成熟到理解它們以前不应当发表这个演說，不应当提出这个決議。同时我所关心的是：通过鼓动使人民处于一定会引导他們去理解这些革命的決議和贊成这些革命的決議的那种地位。这是唯一名副其实的馬克思主义者的策略。

同时这一般說来也是唯一革命的策略。

当真正革命的政党出現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它們本能地坚持的正是这种策略。罗伯斯庇尔是这样办的，反对吉伦特党人的雅各宾党人也是这样办的。吉伦特党人則沉醉于革命的空談，根据罗伯斯庇尔最出色的說法，他們以为“人民的命运取决于一些夸夸其談的人”。

順便談談罗伯斯庇尔。如果你們，我国的布朗基主义者同志們，生活在一七九二年夏天，你們一定要宣布罗伯斯庇尔是机会主义者，而把吉伦特党人当作最极端的革命者。在这年的夏天，吉伦特党人像你們一样大声地叫喊“积极发动”，而罗伯斯庇尔則像我們一样警告他們。人們責备他，說他挫折人民的銳气。但他回答說：“你們說我挫折人民的銳气么？不，我在教育他們。教育自由的人，这意味着喚醒他們的英勇精神，意味着不让他們的英勇精神变成把他們的自由砸上去就会被粉碎的岩石。”所以我們現在警告无产階級不要去搞臭名远揚的“积极发动”，因为我們不希望他們获得政治自由的机会被他們自己的英勇精神所破坏。我們說：不要点起阴謀家起义的篝火；应当在群众性的革命鼓动的文火上把官僚制度媽媽烤熟。这就是我們的策略观点的區別所在。現在让我國工人階級有觉悟的分子来判断，我們中間誰更好地了解革命事业成功的条件。

有人把你們称做雅各宾党人。这是一个錯誤。你們是布朗基

主义者；而布朗基主义和雅各宾主义，这是“两个大有軒輊的东西”。正像复辟时代王朝正統主义者对他们认为是（不过沒有充分的根据）雅各宾主义者的后裔的那些人的看法一样，我对你们的看法也是：«Vous êtes des jacobins moins le peuple»（你们是沒有人民的雅各宾党人）。王朝正統主义者輕蔑地对这些雅各宾党人喊道：«Quelle misère!»（你们多么可怜啊！）我也要对你们說，同志们：沒有人民的雅各宾党人，这是一种极其可怜的什么东西！如果你们以为紧紧地靠近这种可怜的什么东西意味着远离机会主义，你们就大錯特錯了。

正是因为我們不沉醉于革命空談，正是因为我們认为全部問題在于从政治上教育群众，我們才不希望使杜馬同政府的冲突过早地弄得极端尖銳化。我們不希望本末倒置。极端尖銳化只有在全体人民的政治思想，或者更确切些說，最大多数人民的政治思想达到应有的成熟程度的那个时候才会是有益的，現在却还没有到达这一步。那末，你们是不是願意看一看普通的薩馬拉农民的思想中是怎样反映当前的事件的呢？

“去年整个俄国都举行了暴动，并且要求新的秩序。沙皇命令从全俄选出最优秀的人，以便召集他們到彼得堡来同他一起写出使所有的人都过舒服生活的法律。現在压迫农夫的地方自治会的首长、各县警察、乡村小警官将不再存在。代替他們的是农民自己选举出来的好人。这些好人将忠誠地遵守所有的法律。一切土地都交归农夫……农民从現在很少送到农村中去而且到得很迟的报纸上了解到的正是他們所想的那些东西；沙皇很好地接見了选举出来的人，并且叫他們在上帝的帮助下为了穷人的利益拟訂种种法律。杜馬向皇上作了某些答复，而答复的那些事都是应该办的。

“后来农民知道，部长們来到了杜馬，并且想驅逐‘选举出来的老头子’。但是‘老头子們’斥責了他們。結果部长們从杜馬里逃跑了。起初部长們不仅很想从彼得堡驅逐老头子，而且还想把他們全部发配到西伯利亚去。但是‘老头子們’寸步不让，并且說道：

‘不行，最好你們到西伯利亞去，可以在那里看守白菜。我們可要留在这里起草法律，因为农夫們为了土地才把我們派到这里来。’这种情况特別使农民高兴。他們坚信，只有坐在国家杜馬里的人才能支配俄国。”（《伏尔加河中下游东岸通信》——《伏尔加流域地区》第一〇八号）

請你們仔細想想作这种議論的农民的心理，請你們——我的可敬的論敌同志們——告訴我，这些农民是不是会准备为了你們的“口号”而“积极发动”。我肯定地认为不会。

假使不会，那末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应该使我們的有計劃的鼓动工作迫使这些农民通过公民教育的道路，以便打开他們的眼界，使他們一个一个地失去自己最后的政治幻想。这就是为什么我說到有計劃的群众性鼓动工作的文火的緣故。你們却叫喊机会主义。Quelle misère!

我以上所說的話还远不是我必須對你們說的全部看法。不过暫時告一段落。下一封信再談。

（譯自《普列漢諾夫全集》第十五卷第 101—112 頁）

第三封信

这封答复列宁的《普列漢諾夫同志是怎样論述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一文的信最初发表在一九〇六年第十二号《劳动呼声报》上（《劳动呼声报》是孟什維克派的日报，一九〇六年六月至七月在彼得堡出版）。

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在說明布尔什維克是布朗基主义者。普列漢諾夫用什么罪状来证实他給布尔什維克定的这个罪名呢？归結起来有以下四条：（一）否认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有一致性；（二）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举行起义，夺取政权，让无产阶级和农民取得胜利，而不是资产阶级取得胜利；（三）脱离资产

階級就是脫離群眾，脫離群眾就是布朗基主義；（四）依靠勞動農民就是布朗基主義。

列寧指出：普列漢諾夫對布爾什維克的這些非難完全是“臆造”和“糊塗思想”（《列寧全集》第十卷第437頁）；他的基本錯誤就在於不懂得什麼叫做資產階級革命的徹底勝利；他輕視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學說和無產階級作為先鋒隊的作用，錯誤地認為自由資產階級是資產階級革命的當然的主人，而根本不懂得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是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徹底勝利的唯一可能的社會支柱（《列寧全集》第十一卷第39—40頁）。

文中特別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作者對農民的态度。如果說普列漢諾夫在一九〇五年八月和十一月還談到農民是俄國革命的非常強大有力的後備軍的話，那麼這時他就越來越對農民持否定态度了。他寫道：“‘勞動’農民早就是俄國布朗基主義者的空想主義希望賴以支持的一條大鯨”。他譴責列寧“美化勞動農民”，認為這就等於“美化資產階級”。他的邏輯是：勞動農民是小資產階級，而小資產階級也就是資產階級，正如嬰兒仍然是小孩一樣！

布朗基主義者同志們！

你們肯定認為，更正確些說，你們所相信的那些人肯定認為，我現在已經“不是那個人”了。從前，我堅決反對機會主義。現在，我同樣堅決接受機會主義。如是云云。但是，你們錯了。

一個人坐在開始運行的火車上。它旁邊停着另一列火車。在他看來，似乎是另一列火車在運動，而他所坐的火車却繼續停着。你們正體驗着這種幻覺。自從第二次代表大會以後，你們發生了巨大的轉變。你們放棄了馬克思主義觀點而沉醉於布朗基主義。而我，說起來過去也是一個“布爾什維克”，則仍然堅持馬克思的觀點。可是在你們看來，你們仍然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我則沉醉於機

会主义。你们希望有证据吗？现在就举几个。

你们不喜欢我对《钟声报》所作的评论。^① 你们认为，这评论就证明我有机会主义。可是我的机会主义邪说究竟在哪里呢？我对《钟声报》说过什么呢？

我说过，关于我们的策略的问题不能靠简单地援引资产阶级利益同无产阶级利益敌对的对立性来解决。但是这话同我五年前所说的完全一样。那时，不管谁怀疑我有机会主义，你们全都会对他哈哈大笑。请看这段话。

“俄国远不像西欧国家那样富裕，也远不像西欧国家那样有教养。但是，俄国的社会发展对社会主义并非毫无影响。在俄国，十九世纪给二十世纪留下了一件珍贵的遗产：**社会民主工党的萌芽**。历史环境无疑地有利于这个萌芽的迅速发展。如果一国可以而且应当向其他比它进步的国家学习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社会主义的俄国就可以而且应当向西欧社会主义者学会许多东西。西欧社会主义的全部历史给我们的最主要的和绝对无可代替的教训就是：在每一个特定的国家里工人政党的最近的任务和策略是由这个国家的现实的社会关系决定的。忘记这些关系而按照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行事，无异于脱离现实基础。”^②

这是我在第二号《火星报》（可以看得出来是“旧的”、很“旧的”《火星报》）的社论《在二十世纪的门槛上》中写过的话。那时整个《火星报》编辑部都赞成我这些论点；那时整个编辑部都认为它们是完全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精神的。现在列宁，这个过去的编辑部成员，认为它们是机会主义的。究竟谁变了呢？谁的火车开动了呢？

你们说，更正确些说，那些在你们那里制造“舆论”的人们替你们说，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形势了。你们很喜欢拿“形势”变化作论

① 指列宁的《普列汉诺夫同志是怎样论述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一文，参看《列宁全集》第十卷第431—452页。——译者注

② 参看《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十二卷第65—66页。——译者注

据。一般說，这种做法完全没有什么坏处。如果做法得体，这甚至很好。然而坏就坏在你們常常恰恰是做得不得体。換句話說，常常是你們理屈詞穷了，你們就援引“形势”变化。为了使你們不在这方面不必要地跌跟斗，我預先提醒你們，《在二十世紀的門檻上》一文中所叙述的并不是編輯部对刊登这篇文章的那个时候的“形势”的看法，而是該編輯部对应当怎样（說得更順当些：不应当怎样）解决我們的策略問題的看法。很明显，我們正在坚决地把这个一般的、否定性的看法应用于我国的任何“形势”。同样很明显，如果这个观点現在使你們惊奇，那是因為你們所坐的火車在你們不知不觉的情况下离开了“馬克思主义”車站。

我在同一个一九〇一年的第二、三期《曙光》合刊上写过如下的一段話。

“**社会**方面的支持会加速人民革命力量的增长和促进这种力量的胜利。这是不容置辯的真理。理解这个不容置辯的真理对于所有对政治并非漠不关心的俄罗斯儿女說来是絕對必要的。因为現在，当開場白已經表过，伟大戏剧的第一幕已經开演的时候，自由的朋友們应当灵巧得像蛇一样。要知道每一个錯誤都会延緩他們胜利前进，每一个疏忽他們都得付出失敗的代价。除非我們的革命者认为‘政治’是不值得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去作的事业，否則他們就不能輕視‘社会’。然而只要政治斗争在他們的綱領中占有地位，他們立即就会認識到，保证得到社会的同情對他們多么重要。”^①

我这段話引自《往后怎么办？》一文。《曙光》杂志和《火星报》編輯部曾經对这篇文章大加贊許，甚至可說是极度贊許。^②根据編輯部的建議，我們的一个省委会重印了这篇文章。那时我发表的思想被认为是“正統的”。現在，当我重述和發揮这些思想，指

① 參看《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十二卷第 161 頁。——譯者注

② 列宁大概了解，为什么我說**极度的**贊許。如其不然，那么我在向他提起一个不失为滑稽可笑的情节之后大概是会加以說明的。——著者注

出为了胜利我們必須孤立反动派时，人們却譴責我有机会主义。再問一次：究竟誰叛变了？誰仍然停留在“馬克思主义”車站上？又是誰离开了这車站？

我要再一次对你們这些布朗基主义者同志說，不要自討苦吃，別叫嚷什么“現在不是那个形势了啊！”我这篇文章也不是說的一九〇一年的“形势”。它說的是，将来，在我当时即已見其端倪而現在正在我們面前进行的那出伟大戏剧演出的时期，我們應該如何行动。我的文章恰恰預先估計到了——用你們心爱的字眼！——我国当前的“形势”。

我在同一篇文章中写道：“誰沒有用这种或那种方式来促进那个能够消灭我国現存制度的力量的发展，誰就根本不会为自己祖国的解放做出任何貢獻。如果誰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例如，由于笨拙或者不耐心——而妨碍这种力量的发展，誰就对自由犯了严重的罪过，即使也許是不自觉地犯的。”^①

在我的文章里，这段話曾經用了着重字体。因为我当时认为这里所表达的思想十分重要。我那时是說誰笨拙和不耐心呢？說的是主张过早的“积极发动”的那些人。当时編輯部——是“旧的”編輯部呢！——像贊同我的整篇文章一样，也贊同了我的这一段話。現在呢！列宁对我反对过早的“积极发动”的积极言論^②表現了多么强烈的憤怒啊，真可謂«Tempora mutantur et nos mutamur in illis!»（时变矣，吾輩与之俱变！）

再說一遍，同志們，你們发生了巨大的轉变。而且这种轉变越大，你們就越是对我仍然忠实于你們原来的思想方式感到生气。

怪事！當我們現在所經歷的这幕历史戏剧还刚刚在准备上演的时候，你們曾力求成为馬克思主义者。虽說你們远沒有充分做到这一点，但你們毕竟反对了我国旧有的革命偏見。現在，当历史已經在演出自己伟大的戏剧，当你們本人不得不扮演你們在这出

① 參看《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十二卷第 153 頁。——譯者注

② 文字游戏。“发动”和“言論”在俄文中是一个詞。——譯者注

戏剧中应该扮演的那个角色时，你们却完全接受了这些偏见中的某些偏见，你们原来是布朗基主义者。何必多此一举呢？何必自找麻烦呢？何必叫主观主义者苦恼呢？一开始你们就站在布朗基主义的旗帜下，那会更好一些。

你们喜欢“积极发动”。马克思也喜欢这样。但有各式各样的发动。其次，这样一个说法是对的：“当两个人说同样的话的时候，这并不是一个意思。”马克思是彻头彻尾的革命者。你们的“积极发动”具有暴动的性质。充其量它们可以使你们尝到法国布朗基主义历史上如此屡见不鲜的那些大失败中的一次失败。革命从这样一些“发动”中会得到什么呢？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许多东西。因为它们会使革命的胜利变得极度困难。

马克思说过：“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①你们喜欢我们导师的这个思想。你们赞扬这个思想。你们觉得你们似乎是马克思主义者。但这也不过是幻想，是视错觉，不多不少。“当两个人说同样话的时候，这并不是一个意思。”马克思说过：“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应当由物质力量来推翻，但是理论一旦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②你们，当你们开始谈论“武器的批判”的时候，你们忘记了群众，忘记了应当把群众吸引到独立的政治行动中来。于是你们的理论就不外是“技术准备”的理论。你们在这里仍然忠实于布朗基主义的精神。你们关于“武器的批判”的议论无非是把当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如此辛辣地嘲笑过的那种杜林式的暴力论搬到策略议论领域罢了。正像在杜林那里全部政治史是用“手握利剑的人”^③出现在舞台上解释的一样，在你们这里，历史向我们提出的全部政治任务是用“掌握技术的人”的出场来解决的。好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那还用说！

我认为必须在这里重申我在上一封信中所说的话。我根本不是说，你们总是忽视群众。因为一般说来，布朗基主义者是从不忽

^{①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60页。——译者注

^③ 参看《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165页。——译者注

視群众的。我只是說，出于可悲的誤解而被你們认为是革命的那些措施，沒有为群众的主动性留下余地，而沒有群众的主动性也就沒有革命。你們也訴諸群众，但是你們所采取的行动却把胜利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掌握“技术”的人的地下工作上面。这样，胜利的希望就被你們減縮到极其可笑的最低限度。手段同目的不一致乃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特点。

当我写这段文字的时候，四面八方都传来俄国騷动的消息。这些消息使人想到我国可能在最近的将来爆发新的革命。不过如果这次革命不是发生在現在，而是发生在将来比較有利的情况下，它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得无比。但我不认为現在絕對不可能取得胜利。天曉得！尽管人民还缺乏坚决战斗的充分准备，人民現在也許会取得胜利。但是我确信，如果現在还很无把握的胜利終将落到人民这方面，这也并不是由于你們的布朗基主义策略，而是由于摒弃这种策略。这种策略不会加强革命运动，而会大大削弱革命运动。

上面我說过，从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期起，你們就发生了惊人的巨大轉变。但是惊人現象的发生当然也不会无缘无故。使得你們离开馬克思主义基础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原因是：你們不了解这个根本上革命的理論。

你們对它的了解总是极端片面。你們总是按照“是就是是，非就是非，除此以外，尽是鬼話”的形而上学公式进行推論。当年，达兰貝尔打算写一本**反物理学**，即写出一系列同物理定律截然相反的原理。这位著名的百科全书派硬說，利用普通的物理学就可以很輕易地办到这点；只要使这种物理学說具有片面性就行了；只要忘記我們在現實中处处应当对它們加以修正的那些地方就行了。达兰貝尔开玩笑时所幻想的事情，就是你們抱着极其严肃的态度在做的事情。你們并且毫不动摇地相信你們說出了革命智慧的最后結論。不过你們不是把达兰貝尔的可笑的方法应用于物理学，而是应用于关于人类社会的學說。正像达兰貝尔打算依据公认的

物理学原理写出反物理学一样，你們也依据公认的馬克思的原理編造出反馬克思主义。

你們对于资产階級利益和无产階級利益具有不可調和的对立性这一学說的理解是最糟糕最片面的。你們现在的反馬克思主义策略完全是以片面理解这种学說为根据的。

不过，在这方面犯錯誤的不止是你們。你們以前，我們的“經濟主义者”犯了这种錯誤。而在“經濟主义者”以前，民粹派和主观主义者也犯了这种錯誤。

当年，我国主观学派的一位最卓越最著名的代表、已故的尼·米海洛夫斯基曾写道：

“在具有金字塔式的結構的社会里，一切改革如果不是直接为了劳动階級的福利，而是为了整个社会的福利，那末結果就只能加强金字塔的上层。这个規律是如此簡單，它的作用是如此經常地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在生活中表現出来，而关于它的各种各样的局部表現人們又談論得如此之多，以致我們的确有权把它当作讀者自身的观察和思考的結果告訴給讀者。”^①

尼·米海洛夫斯基十分相信他指出的“規律”的正确性，所以他毫不躊躇地称它为“社会学最重要的一般規律之一”。我国所有的主观主义者和民粹派在这个問題上自然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大家知道，这一伙可敬的人都根据这条“重要的一般規律”抨击資本主义，因为俄国資本主义的发展，按照他們的“反物理学”的本意看来，一定会給“劳动階級”造成巨大的和无法补救的損害，因为它“只能加强金字塔的上层”。这些善良的人在这个“只能”上面花費了許多笔墨。

我們已經把他們駁倒了。怎么駁倒的呢？那就是指明，“只能”一詞放在这里是完全不恰当的。我們同我們的这些論敌的全部激烈的爭論，实质上都是圍繞着与这个詞相联系的概念进行的。

^① 《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二版，第二卷，第 259 頁。——著者注

“社会学最重要的一般規律之一”不过是一个对于资产階級利益和无产階級利益的敌对对立性做了很坏的——亦即抽象的、片面的——理解的学說。

所謂无产階級利益同资产階級利益的对立，說的是由于资产階級的收入是从工人階級所創造的現成产品中得到的，所以资产者得到的越多，則留給工人的就越少，反之亦然。这是像白昼一样明白，像二二得四一样无可爭論的事情。但是从这里完全不能得出結論說，工人不管在怎样一种社会政治条件下創造那些应在工人和资产階級之間进行分配的产品，对于工人說来都是一样的。这些条件可能对他或多或少是有利的。馬克思曾經說过：德国工人階級不仅吃資本主义发展的苦头，而且也吃它不够发展的苦头。这就是說，由于德国資本主义不发达，德国工人不得不在本身还帶有前資本主义旧制度相当多的印迹的那些社会政治条件下从事劳动。消除这些条件不仅无害于德国无产階級，而且对他們很有利，簡直还是必要的，尽管这对资产階級也同样必要，而且在大的程度上更有利于资产階級。这就是我国的民粹派和主观主义者所不了解的道理。当我们本着我們固有的基督徒式的博愛精神试图向他們說明这一点的时候，他們就封我們为资产階級的辯護士。整个爭論就是从这里来的。

这个爭論的結果是不利于我們当时的論敌的。“社会学最重要的一般規律之一”被认为是不成熟的思想的一个簡單錯誤。我們胜利了。至今一想起这个胜利我們就理所当然地感到自豪。但是已故的这位主观社会学家的“規律”找到了替身。它在我国“經濟主义者”的头脑中造成了混乱。

不錯，它在这些新的头脑中采取了新的形态。从經濟学方面来看，这个規律是彻底地垮了：“經濟主义者”一分钟也不怀疑，反对資本主义的发展意味着模仿塞万提斯所歌頌的西班牙騎士。在經濟学方面，“經濟主义者”——不过他們对这門科学也沒有大量的知識——遵奉了馬克思。但是当問題涉及政治的时候，他們就

有些莫名其妙了。这并不是說，“經濟主义者”根据政治自由“只能加强金字塔的上层”这一点而认为政治自由对工人阶级的发展是有害的。不，他們在确定政治現象和經濟現象的联系时簡直是一团混乱。主要的东西，即以两个阶级的利益的不可調和的对立为特征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在他們看来，好像在我国是存在于地点和时间的具体条件之外似的。因此“經濟主义者”也忘記了，我国的經濟斗争一开始就必然要轉变为政治斗争。

因此，他們同样忘記了，从社会上和政治上清除我国过时的农奴制残余无论对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都是有利的。而当我們提醒他們注意这一点时，他們就譴責我們“企图抛弃阶级斗争的观点和促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接近”^①。我們在同“經濟主义者”論战时曾經不得不着重反駁他們的这个錯誤。

經常有这样的情况：一种錯誤引起了和它相反的另一種錯誤。我国某些比較年輕的、馬克思主义修养較差的同志們（例如列宁）在攻击“經濟主义者”时超出了区别真理和謬誤的那条界綫，而开始证明，我們的党应当**在社会的一切阶级中**行动。看起来为了最后采取完全正确的观点，只有消除这个新的錯誤一途了。結果并不如此。列宁和他今天的同道們現在已經沒有**在社会的一切阶级中**进行活动的絲毫願望了；但是他們現在却更加坚决地对我們仍然采取“旧”《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观点的人提出某个时候“經濟主义者”对我們（因之也就是对他們，即对我們当时的同盟者）提出过的同一个責备，即責备我們抛弃了阶级斗争的观点而促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接近。这如果不是可悲的，也会是可笑的。如果我不是清楚地知道，引导列宁同志迷失路途的魔鬼就是那个簡單的方法論上的錯誤，那末我就会同普希金一起喊道：“魔鬼在原野里

① 关于这一点請參看我的論文《再論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載《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十二卷。——譯者注〕，这篇文章最初登載在《曙光》杂志第一期上，以后收入論文集《在两条战綫上》，后来同小冊子《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并在一起重印过。——著者注

給我們引路，可是看来它把我們引上了迷途”。正是这个方法論上的錯誤从前把“經濟主义者”弄糊塗了，而在更早的时候使得米海洛夫斯基得出了“社会学最重要的一般規律之一”这个不成功的公式。如果列宁現在大吹大擂地反对我，譴責我有机会主义；如果他依据“物理学”写出他策略方面的“反物理学”；如果他援引馬克思来使我們退回到布朗基那里去，并且以社会民主党的名义复活民粹主义，那么这一切之所以在他那里发生，唯一的原因就是他很坏地——即片面地、抽象地——理解了所謂无产階級利益同資产階級利益对立这一真理。他以为，既然无产階級的經濟利益同資产階級的經濟利益是对立的，那么这两个階級的政治利益即使在不得不共同反对前資产階級社会殘余时也不可能有任何共通之处。他的全部所謂革命的策略都是建立在这个錯誤的基础上的。

法国布朗基主义者們在退出馬克思所领导的国际时写过（在他們看来，国际的策略是反革命的）：“我們的力量就在于我們的孤立”。因此，如果我国現时的布朗基主义者不把“劳动”农民当作例外的話，我就会說，这个簡短的公式本身包含着我国布朗基主义者的全部策略智慧。不过这个例外沒有使他們免于片面性，沒有使他們不犯錯誤。一般說来，这个例外乃是只证明規則有效的那种例外。

“劳动”农民早就是俄国布朗基主义者的空想主义希望賴以支持的一条大鯨。只要回忆一下特卡乔夫和吉荷米洛夫就够了（自然，我指的是“第一种式样”的吉荷米洛夫^①）。布朗基主义者越是美化“劳动”农民，他們就越牢固地坚持自己的阴謀家的策略。而

① 列夫·亚历山大洛維奇·吉荷米洛夫（一八五二——一九二三年）——七十年代的土地与自由党人，“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委員，主张采取布朗基主义的革命路綫，从八十年代末起成为叛徒、反动分子。“‘第一种式样’的吉荷米洛夫”指前期而言。普列汉諾夫在《我們的意見分歧》一书中批判了作为俄国布朗基主义者的吉荷米洛夫，在《专制主义的新辯护人或列·吉荷米洛夫先生的煩惱》一文中批判了“第二种式样”的吉荷米洛夫。——譯者注

使列宁离开“馬克思主义”站的火車越是靠近“布朗基主义”站，这个理論家(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話)就越經常地开始用社会革命党的語言談論农民。在这方面，他那本关于修改我党土地綱領的小册子^①是极有教益的。这是一个很坏很坏的預兆！

瓦紐哈是个強壯的小伙子，
是个机灵的人！
可別向敌人的暴力屈服啊，——
这样就可以活得长久……^②

在我們馬克思主义者看来，現代商品資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农民无非是独立小商品生产者的一個变种，而我們之把独立小商品生产者算作小資产者并不是沒有根据的。

因此，如果列宁現在美化劳动农民，他就犯了他虛伪地譴責我們的那同一个罪过：**美化資产階級**。不錯，他美化的資产階級是小資产階級。但是这种辯护使我想起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談到的那个姑娘。她生了孩子却辯解說：这孩子很小。資产階級就是資产階級，正像孩子就是孩子一样。而如果列宁通过或多或少不正确的办法得出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階級同小資产階級可以有共同的政治利益的思想，那么他就應該比較冷靜地对待这样一些人的思想：这些人說，在我国当前的政治形势下，資产階級經濟利益和无产階級經濟利益的对立不会妨碍这两个階級具有部分共同的政治利益。

既然我国的布朗基主义者們現在提出“經濟主义者”曾經提出來反对我們和他們的那同一个責备來反对我們，那么很自然的，我就只得在同布朗基主义者爭論的时候重复一下我当年駁斥“經濟

① 指列宁的《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綱領》一文，參看《列宁全集》第十卷第139—167頁。——譯者注

② 引自涅克拉索夫《馬車夫》一詩。普列汉諾夫把原詩中的 *рослий* (魁梧的) 一詞改為“机灵的” (*ловкий*)。參看《涅克拉索夫著作和通信全集》，一九四八年莫斯科國立文学書籍出版社第一卷第108頁。——譯者注

主义者”的論据时所用的那些論据。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不仅必須向工人說明把工人利益同企业主利益分开的那个敌对的对立性，而且也必須向工人說明存在于工人的利益和专制制度的利益之間的那个敌对的对立性。不过专制制度的利益并不止是同工人的利益針鋒相对。因此，不止是工人才关心同专制制度作斗争。如果俄国社会民主党忽視了这个重要的情况，不善于利用它来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謀利益，它就会犯不可原諒的錯誤。它不能輕視俄国的那些充滿着反政府精神的居民阶层……我們不仅沒有权利輕視存在于居民中間（即“社会”中間）的反政府思潮，而且必須經常力求向这些思潮的拥护者表明我們的那些使我們变成专制制度最坚决和最不妥协的敌人的政治意向。我們用不着害怕同我国社会的反政府阶层接近；应当关心的只是不要讓我們被他們弄得服从他們的影响和领导。”^①

在我們的布朗基主义者同志們看来，只要一承认我們同资产阶级有部分共同的政治利益，我們立即就会服从资产阶级的领导和影响。不过这又是“反物理学”，它再一次表明他們对资产阶级利益和无产阶级利益的对立性理解得多么坏。任何东西——也許只有我們自己邏輯思想的弱点除外——都不会使我們从一个极端陷入另一个极端。可以分开走，但同时应当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便一起打。不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需要有某种比我国布朗基主义者同志們借以“使自己同资产阶级对立起来”的那些不策略的越軌行动更严肃得多的策略。

究竟是怎样的策略呢？这是很重大的問題。这一点下一封信将要談到。

（譯自《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十五卷第 112—122 頁）

① 參看上面已經引证过的論文：《再論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著者注

第四封信

这封信刊登在小册子《論策略和不策略的信》上。文章充滿着所謂“策略辯证法”的空洞說教，通过歪曲对方的观点向布尔什維克进行攻击。

普列汉諾夫关于改良、让步以及目的与手段間的一致的抽象議論表明他“忘記了”国际社会主义关于革命和改良的相互关系的“起碼知識”：“历史的真正动力是阶级之間的革命斗争；改良是这种斗争的副产品。”普列汉諾夫在策略方面接受了资产阶级哲学家的学說：前进的动力是社会上所有認識到某种制度“不完善”的人的团结精神。可以說，貫串普列汉諾夫整个后半生的策略的基础之一就是这样一种唯心主义的、改良主义的“必須选择”論：随时随地支持“比較好的东西”；在反动派和同这种反动派对立的势力中的极右派之間进行选择。（《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57、58頁）

在《論夺取政权問題》和《与友人通訊选录》中，普列汉諾夫硬說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是絕對不能容許的，这是原則問題。但是在这里，他却說，这是一个合目的性的問題，在特定条件下参加內閣可以是急进主义的表现。列宁早就在論文提綱《普列汉諾夫和新火星报》中指出过：“原則还是合目的性？”普列汉諾夫“弄糊塗了”。（参看《列宁文集》俄文版第五卷第361頁）

作者在信的末尾还提出了一个“领导广大群众并且同广大群众一起进行公开的政治活动”的尾巴主义口号，用来同所謂“阴谋家的地下状态”对抗。这个口号的实质就是輕視党作为先鋒队的作用。它也是普列汉諾夫后来之贊成阿克雪里罗得的工人代表大会思想的先声。列

宁在《革命界的庸俗习气》（《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229—239頁）一文中严厉地斥責了这种謬論。

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科学社会主义奠基者的世界观充滿着辯证法的精神。而辯证思維的特点首先就是它的具体性。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說明黑格尔唯心主义辯证法的特点时早就說过，在掌握辯证的世界观的人看来，“抽象的真理是沒有的；真理永远是具体的；一切取决于時間和地点的情况。”^①

但是，如果抽象的真理是沒有的，如果一切都取决于時間和地点的情况，那就很明显，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继承者进行实际活动时不能以一成不变的原則为指南。随着時間和地点的情况的改变，这些指导原則显然也应当改变。的确，我在上一封信中說过，在我們的实际活动中指导我們的原則应当是提高无产阶级的自觉性，而在現时俄国的政治条件下則是提高一般人民群众的自觉性，換言之，也就是提高非无产阶级的劳动居民阶层的自觉性。因此庫克新娜^②也許想揭穿我的矛盾。但是这里只有表面上的矛盾，这个矛盾仅仅对于 chère Eudoxie^③（像西特尼科夫^④称呼她的一样）說来才是不可解决的。实际上提高无产阶级的自觉性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們全部实际活动的标准，只是因为这是在当今社会內从事这种活动的主要目的。正像我們所知道的，社会民主党不限于只是从思想上影响工人阶级。它教育他們，丰富他們的政治經驗，領導他們同他們經濟上和政治上的敌人进行斗争。但就是在这方面它也主要是力求提高工人阶级的自觉性。例如，和无政府主义者相反，它很重視那些能够改善他們的状况或者——更确切

① 参看《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三联书店一九五八年版上卷第421—422頁。
——譯者注

② 庫克新娜，《父与子》中的人物。——譯者注

③ 亲爱的艾夫多克西。即指庫克新娜。——譯者注

④ 西特尼科夫，《父与子》中的人物。——譯者注

得多地說——能够防止这种状况的絕對恶化和相对恶化的个别改良。但是無論他們认为这些改良就防止无产階級状况恶化这一点來說是多么重要，它們对无产階級更重要得多的意义在于：爭取这些改良的斗争本身以及实现它們的社会后果，都会有助于提高工人的自觉性，有助于在他們中間传播这样一种信念，即：他們只有鏟除了資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后才能根本改善自己的状况，即完全摆脱經濟依附和政治压迫。社会民主党永远不会支持妨碍提高工人階級自觉性的改良。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提高是我們在現代社会中的实际活动的主要目的。目的—确定，我們自然就会从目的的角度来評价一切用以达到目的的手段，它自然也会成为評价手段的标准。只要无产階級还存在，即只要替占有生产資料的人生产剩余价值的階級还存在，这个階級爭取自己的解放的斗争就不会停止；而只要这个斗争不停止，他們就必須为自己事业的胜利而尽可能地提高自己的階級自觉性。因此，在这个范围内，我們认为提高这个自觉性是一个不变的标准和經常的目的。但是关于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又怎样說呢？在它們之中是不是有一些我們可以承认是不变的（即使是在上述范围内）手段呢？不，不存在。因为时间和地点的情况在上述范围内也在改变。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即在达到我們的目的的手段这个意义上——我也要說，我們沒有策略活动的一成不变的指导原則。所謂的矛盾就是这样解决的。

在《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序言中，馬克思写道，合理形态上的辯证法，即唯物主义辯证法，在对現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也包含着对它的否定和它的必然灭亡的理解；它从运动过程中考察一切业已形成的形式，因此也就是从这种形式的过渡方面考察这种形式；它不崇拜任何东西，它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①

如果辯证法这样对待一切現存事物，那么这就說明它也要同样对待我們选择来达到我們目的的手段，即我們的斗争方式。在对每一个这种方式的肯定理解中，辯证法也包含着对它的否定的

^① 參看《資本論》，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一卷第 XXIII 頁。——譯者注

理解，即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它可能是不合目的的，因而我們必須拒絕它。如果辯证法对每一个业已形成的形式是从它的过渡方面来考察的，那么这本身就說明，它也从同一个方面来考察我們斗争的每一个特定的形式。如果辯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因为它本质上是革命的，那么由于同一原因它也就不能崇拜我們斗争的任何一种指导原則。它不允許把任何一种指导原則抬高到絕對（即抽象）真理的地位。“抽象的真理是沒有的；真理永远是具体的；一切都取决于時間和地点的情况。”

倍倍尔曾經极其鮮明地表示过同样的思想，他說，为了达到目的，他甚至准备同魔鬼和它的外婆作交易。这位成为德国无产阶级的极其精明能干的領袖的极其精明能干的德国旋工在表示这个思想的时候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他的話体现了唯物主义辯证法。

誰不理解倍倍尔如此形象地說明的思想，誰从絕對的观点来看“魔鬼”，誰总是害怕同魔鬼打交道，誰一碰到魔鬼就在自己身上划十字，那么，誰就还没有提高到革命的唯物辯证法的水平，誰就仍然是个形而上学的革命者、半截的革命者。

在我們的队伍里，这样的革命者該有多少啊！在我們的队伍里，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随时随地准备“弃絕撒旦和它的一切事业”的人該有多少啊！由于命运的恶毒的嘲弄，以致我們尽管在口头上狂热地抓住馬克思和他的辯证法不放^①，实际上却常常是最糟糕的形而上学者。当話題涉及“撒旦”（亦即“魔鬼”，不过是用另一个比較別致、比較典雅的名称美化了的魔鬼），當我們听到人家

① 当我說我們口头上狂热地抓住馬克思和他的辯证法不放的时候，我自然不是指現時我国的布朗基主义理論家。在哲学領域内这些人甚至口头上也不贊成馬克思。他們是以他的“批評者”的姿态出現的。在他們这些站在經驗一元論的观点的人們看来，辯证法是“早已超越了的阶段”。但是在我們过去的布尔什維克的队伍中，我遇到了一些在这种場合下拒絕跟着自己的哲学理論家走的人。这些人口头上贊成馬克思，所以我刚才說过的以及我就要在正文中說的話特別适用于这些人。——著者注

說“撒旦”的時候，我們就會按照古老的基督教遺訓趕緊“向它吹鬍子和唾口沫”，一秒钟也不允許有这样的想法，即：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我們在一定的情况下不仅可以、而且应当同撒旦，甚至同它的外婆作交易。同“魔鬼”——更不用說它的外婆了——作交易被我們認為是在任何情况下都絕對不能容許的和不可饒恕的“机会主义”。在我們對待我們的实际活动的原則方面，我們在大多数場合下仍然是十足的形而上學者。我們對這些原則所作的判斷，时常沒有一點辯證法的影子。

有时不成熟的思想的这些过錯达到了十分滑稽可笑的地步。我記得，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发生了“孟什維克”同“布尔什維克”的糾紛。当时我說，布尔什維克应当让步，因為他們在“当权”，因為我們的“权力”在当前情况下沒有任何重大的必要不作让步。于是有人反駁我說：“但是要知道让步是机会主义啊”。而当我回答說，让步本身不可能有絕對的意义，正像對待我們的一切活动方式一样，應該从是否合乎革命的目的这个角度来看待让步，于是我的對話人，像法国人所說的，鼓起了两只大眼睛，換句話說，表示了极端的惊异。当我對他們說，就思維的特点而言，他們并不接近馬克思主义，而是无比地接近于托尔斯泰主义，他們就更加惊异了。然而实际情况确是如此。

托尔斯泰伯爵的思維有什么特点呢？特点就是完全沒有辯證法的因素。由于这个缺点，我国的这位天才的小說家的一切实际結論都具有絕對的、因而也是抽象的性质。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伯爵是無論如何也不願意做一个“机会主义者”的。而且正是这个情况使他成了革命的敌人。就拿“不抗恶”來說吧。暴力是不好的。机会主义、同“魔鬼”和它的外婆作交易也應該受到斥責。而不好的东西、應該受到斥責的事情，都是不能容許的。因此不能用暴力同恶作斗争；因此不承认“不以暴力抗恶”的原則的革命者們，在托尔斯泰看来乃是一些誤入歧途的人。也就是由于同一个原因，托尔斯泰的继承者契尔特柯夫先生不止一次地責备他們不一貫。

托尔斯泰先生和契尔特柯夫先生的确是首尾一贯的人。不幸的只是他们的一贯性使得他们胡说八道。为什么它使得他们胡说八道呢？因为它具有抽象的性质。当一定范围内完全正确的某个原理被认成是抽象的（即绝对的）真理，那时它就会因此丧失掉同那些条件——只有这些条件存在它才仍然是正确的——的一切逻辑联系，那时它就必然变成错误的。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者托尔斯泰伯爵永远是根据抽象的原理进行思考的，因此他在自己的最后结论中总是弄到胡说八道的地步，那是毫不奇怪的。

我的那些深信让步是机会主义的标志的对话人、即过去的“布尔什维克们”，在不以暴力抗恶的问题上当然是不赞成托尔斯泰的意见的。但是他们没有料到，只要他们承认暴力是在一定的情况下他们有权利用而且必须利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手段之一，他们也就是在同魔鬼作交易并且成了“机会主义者”。他们没有料到，当某一种手段在我们的心目中具有了绝对的、一成不变的原则的意义时，它就不再适用于目的了，并因而大有同目的发生矛盾的可能，而且实际上往往就是如此。

费希特说，什么样的人，就为自己选择什么样的哲学。这自然不适用于对哲学完全漠不关心并且不能自圆其说的人。但是托尔斯泰伯爵不在此数。虽然他的全部“智慧都化成了才能”，以致只留下很少的逻辑思维能力，但是他的世界观毕竟自成系统；他的哲学毕竟一如其人。而他这人则是很少关心社会生活的；他操心的主要是他个人的精神上的美。他在对待活动方式的态度上是不妥协的，其简单原因是，它丝毫没有追求任何社会目的的强烈愿望。但是革命者的特点恰恰是百折不回地追求他为之贡献出自己的力量的那个社会目的、那个斗争。因此托尔斯泰的不妥协性是完全跟他不合拍的。在他看来活动方式不可能具有绝对的意义。他必须从合目的性的观点来考察它们。^①

^① 也许托尔斯泰主义者会根据这一点谴责我宣扬耶稣会作风。但是他们错了。我并不为不道德的手段辩护。何况耶稣会教徒的所谓“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

如果从前某个时候同我討論让步的“布尔什維克”同志在自己的世界观方面是能够自圓其說的人，他們就会了解，像“让步是机会主义”等这种話在馬克思主义者的嘴里是完全沒有意义的。在这里，一切都依赖于时间和地点的情况。当让步增加我們党的力量的时候它就是好的；当让步减少这种力量的时候它就是坏的。不过如此而已。而在那时，让步恰恰只会增加这种力量。“这是常識！”——也許讀者会喊道。——当然，——我回答說。——但是在我們国家里，一般說来，沒有常識的人是很多的。所以我得从社会民主党人变成“文化教員”；所以我得教人識字：人、手、足、刀。可見我在这种場合是大公无私的，其证据就是，我正是力求启迪自己的論敌的智識。

最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許多“思想家”所缺乏的这种常識，却是所有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始終很好地具备的。既然我談到策略，所以我以軍事艺术为证。在这种艺术中是沒有我国布朗基派“最高領袖們”如此珍視的絕對原則的。就拿李卜克內西的名言“应当永远轉入进攻！”來說吧。这話說得很好。但是自然，就連李卜克內西本人也从来沒有想过把这句极好的話变成絕對的策略原則。同时不言而喻，任何一个严肃的統帅無論如何不会願意始終采取进攻的策略。一位很喜欢采取坚决的軍事行动的人写道：“在山地战中，誰攻击，誰就处在不利的地位上。甚至在进攻战中，妙处也在于只作防禦，而让敌人进攻。”②

为什么是这样呢？拿破侖繼續說道，因为“在山地永远可以找到許多無論如何不应当去攻击的极强固的陣地。”③

手段”也是不合目的的。至于托尔斯泰主义者对待手段的不妥协态度，則这种态度的胜利恰恰就是不道德行为的完全胜利。Summum jus——summa injuria（語出西塞罗的論文：《論义务》。直譯是：最高的正义是最高的不义。或譯：最高的合法是最高的不法。意思是說：仅仅遵循法律的文字，乃是对法律精神的粗暴破坏。——譯者注）。——著者注

②③ 《Commentaires de Napoléon I》〔《拿破侖第一評傳》。——譯者注〕，巴黎一八四七年法文版第一卷第57頁。——著者注

軍事权威早就承认过，在这类問題上一切都以时间和地点的情况为轉移。而我国現时的布朗基主义者却决不想理解这一点。因此他們的軍事艺术很像受到托尔斯泰伯爵称贊的列阿德將軍的艺术，他“毫无計謀地”命令自己的士兵“直冲桥头”，其实他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使攻击获得成功：

烏拉喊得急，
后备来不及。

所以結局是十分糟糕的。勇武的、但是“毫无計謀的”將軍遭到了决定性的失敗：

朝着費玖欣納高地，
几团入馬发起攻击，
結果弄得一敗塗地！……

依我看来，大概不可以把列阿德將軍当成軍事长官的典范。但这是題外的話。我这里想說明的主要意思是，我們中間那些作策略議論的人，不妨稍稍研究一下不是轉义而是本来意义下的策略，即研究一下**軍事策略**。他們从这里会学到許多东西。例如任何一个有見識的軍人都会對他們說，戰爭中会战是罕見的現象，而調動軍隊則是軍事首長大概每天都要處理的事情。他們是不是知道把这个規則翻譯成政治語言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在革命鬥爭中，“技術”具有突出意義的場合是罕見的，明智的戰士的主要任務在於影響群眾，群眾的向背決定着社會力量的對比，因此也就決定着鬥爭的結局。策略是一門很好的學問，先生們！但是毫不了解策略的人要議論策略，他是得不到策略的，而只會得到不策略。那可就根本沒有什麼用處了！

現在往下講。如果我們的實際活動原則在任何場合下都不應當有絕對的意義；如果鬥爭方式的價值決定於它們的合目的性；如果只有對目的漠然無動心的人才能對方式採取不妥協的態度，那麼請問，是否可以从政治上劃清機會主義和急進主義之間的界綫呢？而“機會主義”概念本身是不是經不起批判的某種東西呢？

不，不是！不仅可以而且应该从政治上划清机会主义和急进主义之间的界线。

究竟怎样做到这点呢？到哪里去找标准使我们可以区别机会主义方式和急进主义方式呢？

标准就在我们的目的中。如果手段从属于目的，那并不意味着手段对目的是无所谓的。

完全相反！手段要成为合理的，它就必須和目的相适应。而要适应目的，它就必須——按照黑格尔絕妙的說法——体现出目的的本性，就必须完成和实现目的。^①在現时的社会中，我們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工人阶级的自觉性。因此达到这个目的的每一个手段都必须为目的的局部的完成和实现。我們活动中的每一步驟都应当把群众的自觉性提高到更高的水平。

这是明白的。但如果这是明白的，則同样明白的是，我們那些完全体现出我們的目的本性的斗争方式是急进的方式，而不能完成和实现这种本性的那些斗争方式则是机会主义的方式。不这样也不可能。因为我們的目的是現时社会能够给自己提出的所有目的中最革命的目的（当这个目的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实现的时候，現时的社会就将让位于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正是那些最适应于这个目的的手段应该当作最革命的手段。这就是标准。自然，它并没有使我們在每一个特定的場合不思考就可以确定我們所采取的这个斗争方式对工人阶级的自觉性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但是如果真的有一个使人不必进行思考的标准，那么长在我們肩膀上的脑袋就会很方便地为謝德林笔下的小器具之类的简单机械所替代了。我們的某些最高領袖——所謂极端派的領袖——也許不会有什么理由反对这种替代的。但是很抱歉，我宁願要头脑，而不要小器具。因为我們这个动物学上的种冠以 *homo sapiens*^② 这个自

① 参看黑格尔《小邏輯》第二一二节附释，三联书店一九五四年版第 398 頁。——譯者注

② *homo sapiens* 是生物学中人的科学名称，原意是有理性的人。——譯者注

豪的称呼并不是沒有緣故的。

举两个例子來說明我的思想。第一个例子是米勒兰先生。为什么他参加內閣受到了严厉的斥責呢？因为这对提高法国无产阶级的自觉性产生了有害的影响。一部分法国工人由于信从了“手上的山雀胜过天空的仙鶴”^①这个俄国諺語所表达的規則，因而决心为着細小的改良而放弃我們整个运动的最終目的即社会主义。另一部分因米勒兰的政策对他們的这些同志发生腐化影响而公正地感到气憤的法国工人，却因此开始更坚决地追求最終目的。然而由于对社会党人失去了希望，于是他們就通过“純粹的工团主义”这条錯誤道路向这个目的前进，并且部分地接受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因此，值得惊奇的是国际社会民主党直到一九〇四年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才坚决譴責法国的机会主义。一般說来，不能认为社会党人参加內閣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不能容許的。可以設想有这样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形下参加內閣不仅不会模糊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性，而且相反地会提高这种自觉性。那时参加內閣就不会是机会主义的表现，而是急进主义的表现。一切都依时间和地点的情况为轉移。

至于我，我早在一八九九年給《共和国报》的信中（該报曾向全世界社会党人征詢他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曾回答說，用任何絕对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在我看来都是形而上学的。^②这自然不妨碍我鉴于米勒兰政策对法国工人的上述有害影响而在一九〇〇年巴黎国际代表大会上投票反对它。

順便說說。利用我指出的标准是不难弄清楚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问题的。这种参加会使无产阶级政党变成执政党。然而对于它說来，为了教育全体工人群众，繼續做一个反对党，是无比有利的。所以这种参加会成为不可容許的机会主义的表现，而如果我們过去的“布尔什維克”曾經幻想这样做，那

① 相当于我国所謂“多得不如少得，少得不如現得”。——譯者注

② 參看《普列汉諾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二卷第505—506頁。——譯者注

么这只是表明他們以革命思想极左翼的代表自詡是何等地沒有根据。

另一个例子是爱德华·伯恩斯坦先生。他的臭名昭著的策略是什么呢？就是依靠資產階級某些阶层的的支持来取得某些直接的政治改良和經濟改良。这本身还不是坏事。然而坏的是，由于德国的这些阶层是保守的，所以伯恩斯坦先生为了取得他們对社会民主党人的同情，就着手修改馬克思主义，其目的无非是从这个极端革命的学說中驅逐革命的精神。但是这样清洗过的馬克思主义，不用說，必然会对德国无产階級的階級自觉性产生极其有害的影响。正是因为如此，——而且只是因为如此，而不是由于任何其他原因，——爱·伯恩斯坦先生的策略应当认为是极端机会主义的和极端有害的策略。

我們的布朗基主义者听說伯恩斯坦先生是机会主义者，但是不懂得他何以是机会主义者。因此他們天真地认为社会民主党人任何利用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不滿情緒的企图都是机会主义。同时正是这些人不管恰当与否一味地拿“形势的变化”作論据。可以看出，他們这种做法簡直是机械式的。他們不了解，“估計”“形势”的变化恰好是要考虑已經发生变化的時間和地点的情况。

現在我們有足够的理論材料来解决我在上一封信的末尾提出的一个重要策略問題：我們党在为了反对共同敌人而同反政府的小資產階級接近时，怎样才能不受它的影响，換言之就是怎样才能不陷于机会主义的泥坑。

一切軍队的命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全体軍官的优良素质。要使我們的軍队（亦即我們的党）不受小資產階級的影响，我們就必須防止小資產階級對我們的軍官們，即對我們的理論家們、我們的思想家們的影响。然而他們在这方面的情况却是相当糟糕的。虽然他們中間有許多人认为自己有义务对“自由派”采取粗魯的和无知的态度（在大多数場合下他們都过分地和不很費力地做到了这一点），但是这远不是說，資產階級的理想對他們沒有

影响。有的“极端派”在不论什么样的群众大会上向反对自己的自由派說了一大堆最恶劣的粗魯話以后，回到家里却废寝忘餐地閱讀**頹废派**作家（資產階級个人主义最坏方面的这些最典型的代表人物）的作品。我不知道讀者您怎么样，我在我們的社会民主党人中倒遇到过許多人真誠地醉心于頹废派的詩歌、尼采的“超人說”，甚至——决不騙人！——馬赫和阿万那留斯的哲学。所有这些人部分說来已經离开了馬克思主义的立場，部分地說来抛弃了无产階級强有力的精神武器，在理論方面有一只脚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諺語說：“騎着病馬是走不远的”。我則认为，如果我們的軍隊受那些只会用粗魯的謾罵“使自己同資產階級对立起来”同时又貪婪地吮吸資產階級思想的毒素的軍官的領導，它也走不远。如果我們真的不希望受資產階級的影响，那末我們应当尽可能迅速地消灭这个由来已久的禍害。我們党內的負責职位不应当让那些自觉或不自觉地反对我們學說的人来占住。

對我們軍隊的士兵没有什么可反对的：他們超过了一切可能的稱贊。但是他們人数还很少。我們只有把广大群众調动起来才能消灭敌人。我們成功的秘密就在这里。然而群众并没有全都站在我們方面。还需要吸引他們站到我們方面来。为了吸引他們站到我們方面来，必須教育他們。为了教育他們，必須像我在上几封信中不止一次地說过的那样，推动他們走上主动性的道路，使他們有可能每天都增加自己的**政治經驗**的积累。然而主要把希望寄托在“技术”上面的我国布朗基主义者的策略則违反这一切。因此他們的策略同革命的**利益背道而馳**。因此这种策略犯了比机会主义还更严重的罪过；它簡直就是**反革命的**策略。

請回顾一下还不很久以前的杜馬选举的历史。我們的布朗基主义者——不过可惜不只是布朗基主义者——曾經宣传抵制是扩大我們党的影响的手段。然而假若一种斗争方式得到现实生活的支持，那它就像空气一样，即使您把它从門口赶出去，也会从窗口飞进来。这里也是如此。許多在工人选民单位中拒絕投票的

工人，却作为房客投了票。他們投票拥护誰呢？当然不是我們。因为我們缺席了。結果是：我們並沒有加强自己党的影响，而是加强了反政府的小资产阶级的影响。这是不是明智呢？您自己判断吧。

由此看来，要不受非无产阶级政党的影响，我們必須怎么办呢？

第一，我們必須根本改进我們社会民主党军队的軍官組成。第二，我們必須——“为自己，也为自己的子孙后代”——断然拒絕現時我国的布朗基主义者的策略形而上学，并且彻底掌握由于誤解而被他們认为是机会主义的、然而实际上却是我們时代唯一革命的策略的那个策略，因为只有这个策略才会最大限度地發揮我們对群众觉悟的革命影响。

我們越是繼續处在阴謀家的地下状态，我們就沒有机会在我国現时的解放斗争中取得領導权。如果我們得不到这种領導权，我們就只好扮演次要的配角。一旦我們扮演这种角色，我們就会不由自主地、而且大概还会不知不觉地陷入反政府的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那时，無論“技术”也好，或者从老掉牙的革命者（一个有教益的例子是：“社会革命党人”）那里搬过来的“口号”也好，都会无济于事。要避免这种情况只能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領導广大群众并且同广大群众一起进行公开的政治活动……

下一封信再談！

（譯自《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十五卷第 122—133 頁）

第五封信

这封发表在小册子《論策略和不策略的信》上的信的中心思想是：“在反对旧制度的斗争中俄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部分契合的”。他的理論根据就是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录下来的两段关于“资产阶级在

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的話。列宁曾經多次指出，普列汉諾夫对于俄国资产阶级采取了完全非历史的态度，而用抽象的說法代替具体的历史問題，“他忘記了，随着革命的进展，这个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各个阶层的地位是要发生变化的”（《列宁全集》第十卷第438頁），“资产阶级民主派上层开始脱离革命。下层开始觉醒”（同上第329頁）。

普列汉諾夫引用來证明他的論点的另一个理由是阿姆斯特丹国际代表大会的一项关于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決議。列宁写道：这是“用阿姆斯特丹的決議作为誘餌把对方当作愚蠢的小鳥来捉弄……从泛泛的空談得出关于在一定的情况下实行一定的策略，关于对资产阶级民主派各政党的态度，关于革命‘一般性质’的具体原理，却不从精确地分析俄国革命中各阶级的利益和地位的具体材料，得出这个‘俄国革命的一般性质’的結論”，这实质上是“公然嘲弄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同上第十一卷第395頁），也是对“馬克思主义的起碼常識”的否定（同上第389頁）。列宁曾經把由孟什維克占多数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批准”阿姆斯特丹这项決議一事称为“大笑話”（同上第十卷第342、343頁）。

如果一个作家希望他的思想不受曲解，他应当尽量使自己的叙述切合可以說是讀者最不費力的那种領悟能力，即切合讀者公众中最沒有領悟能力的人所特有的那个理解水平。这样自然免不了重复。但是它应当先有精神准备。Repetitio est mater studiorum. ①

我在上一封信中說过，我們不可能有实际活动的绝对原則。在

① 溫故而知新。——譯者注

目前社会的范围内，这种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因此，凡是有助于提高觉悟的东西都是好的；凡是有碍于提高觉悟的东西都是坏的。究竟什么东西有助，什么东西有碍，这一切都以时间和地点的情况为转移。

现在要问，资产阶级政党能不能帮助工人阶级提高觉悟呢？

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清楚地了解，庫克新娜现在可能谴责我犯了比转到伯恩斯坦立场还更严重的罪过（这已经是“古老的故事”了）；就是说谴责我背叛了伯恩斯坦本人，即背叛了保存在这个可敬的作者头脑中的最后一点革命的思想。但是有什么办法呢？看来我解决我们的策略任务的种种企图注定要使这位充满热情的女士痛苦。别去同命运作对吧……

况且在这种背叛中我有两个十分可靠的同谋者。这就是他们在五十八年前写过的话：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揭示了，怠惰因循习气乃是粗野的、中世纪的、至今都深受革命派^①称许的暴力行为的自然的补充。它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组织，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经常发生变革，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资产阶级以前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震荡，永远的变动和不安定，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古来形成的见解和观点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制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褻瀆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相互关系和他们的生活地位。”^②

① “革命派”(революционер)，《共产党宣言》德文原本为“反动派”(die Reaktion)。——译者注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468—469页。——译者注

这就是我的同謀者的看法，最好是說，引誘我失足的人的看法。而当我現在重新翻閱这一段光輝有力的文字时，我就断然同意“背叛”，并且坚决地說：資產階級在历史上曾經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資產階級如果不使全部社会关系經常发生变革，它就不能生存下去，因此这个資產階級不能不促进无产階級階級觉悟的提高。这就是为什么我們必須把那些希望現在停止俄国資產階級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人看成是凶恶的反动分子或者看成是得了不治之症的唐·吉訶德的緣故。停止这些关系的发展无异于同时阻止无产階級向自己的最終目的前进。

但是如果現在只有凶恶的反动分子或得了不治之症的唐·吉訶德才能力求去阻止資本主义的发展，那么怎样称呼那些一面譴責經濟关系领域中这类的反动企图，一面却通过自己的策略妨碍我国資產階級取得政权的人呢？你們可以任意称呼他們，但我要絕對肯定地說，你們沒有权利称他們是具有邏輯思維能力的人。德国人說，*«Wer A sagt, muss auch B sagen.»*^①然而这些思想家一方面充滿热情地說一，另一方面却同样充滿热情地拒絕說二。他們一只脚走进一个房間，另一只脚却走进另一个房間。

不要說資產階級只是在經濟关系领域中起过革命的作用吧。不，它同样也在政治上起过这种作用。我这样說的时候特別是指它对工人階級的影响。

“資產階級处于不断的斗争中：最初是反对貴族，后来又反对其利益同大工业的发展相矛盾的那些資產階級阶层，它反对其他国家的資產階級的斗争从来不会停止。在每一个这样的場合，資產階級都不得不向无产階級呼吁，要求无产階級援助，这样就把无产階級推上政治运动的道路。于是，資產階級自己就把自己的政治知識即把反对自身的武器給予了无产階級。”^②

既然如此，怎么可以不对我上面提出的、关于資產階級政党能

① “誰說到一，就得說二。”——譯者注

②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476頁。——譯者注

不能帮助无产阶级提高阶级觉悟的问题作出肯定的答复呢？

当资产阶级在反对旧制度时向无产阶级呼吁，要求他们援助，把他们推上政治运动的道路，从而把自己的政治知识给予他们的时候，它无疑是在完成极其重要的革命事业。我们中间那些认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任何呼吁都是“欺骗”的人，是大错特错了。资产阶级在向无产阶级呼吁时对他们谈论破坏旧政治制度的必要性，这并不是“欺骗”他们，而是对他们说出最不容争辩的真理。因此无产阶级的有觉悟的代表不应当因为它向工人们说出了这个真理就对它破口大骂。相反，而要让它懂得，他们本身就很好地知道这个真理。要让它懂得，只要资产阶级政党同旧制度斗争，它们就能指望觉悟工人的强有力的支持。

当问题涉及破坏旧制度的时候，资产阶级利益同无产阶级利益完全不是对立的。诚然，这些利益相互之间也不是同一的。但它们是部分契合的。而且它们的这种契合应当为我们中间那些想要向无产阶级指出他们的政治道路的人所理解和注意。否则我们在政治上就会重犯当年民粹派在经济领域内犯过的同样的错误。因为我们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必然会——在我们不知不觉之中并且和我们的愿望相反——具有反动的性质。

现在很明白，凡是认为自己必须反对——而且有时用考虑不周和粗鲁无礼的言语反对——同官僚制度进行斗争的资产阶级所提出的一切主张的人，简直还不善于提高到现代社会主义的观点。这是放弃了自己的某些偏见的民粹派分子。这是采取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术语的布朗基主义者。这是随便什么样的空想主义者，但不是马克思的学生。在马克思的学生看来，这种“策略”一定是道地的不策略。

但是如果在同旧制度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利益同资产阶级利益不是对立的；如果两者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契合的，那就可以得出结论说，在上述条件下，即在同旧制度斗争的时刻，无产阶级政党同资产阶级各党派在政治上的接近还不是意味着这个党倾向于机会

主义。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在这里，正如一般說来在策略中一样，绝对的、一成不变的答案是不适宜的。一切都取决于这种接近是怎样发生的。《Da liegt der Hund begraben》。①

大家知道，我們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曾經規定，在自己对待资产階級政党的态度上我們应当以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的決議为指导。讓我們回忆一下国际阿姆斯特丹大会在自己的决定中究竟說了些什么吧。

“大会最坚决地駁斥修正主义者企图背叛我們的久經考驗的和卓有成效的策略，即企图提出向現存制度让步的政策来代替通过战胜我們的敌人以夺取政权。”②

如果我們忽然想要为着向現存制度让步而同这个或那个资产階級政党接近，那末我們就会同阿姆斯特丹的决定发生根本的矛盾。試問，要是接近的目的——而在这个条件下更是无比可能的——是同現存制度作斗争呢？那时怎么样呢？阿姆斯特丹的决定是否会束縛我們的手脚呢？不，不会束縛。至少就我刚才摘引过的那一段話說来是如此。

“这种修正主义策略的后果会把提出尽可能迅速地变現存的资产階級社会为社会主义社会当作自己的目的的党，因此也就是把最好意义下的革命党，变成满足于对资产階級社会进行改良的党。”③

这段話以无产階級在资产階級社会的基础上进行斗争为前提，因此它沒有規定他們在推翻旧制度的资产階級革命时期应当采取什么策略。

接着大会表示自己坚决相信，階級矛盾不是在衰退，而是在逐漸增长。以反对像伯恩施坦先生和彼·司徒卢威先生之流的“衰退”理論家为宗旨的这一部分決議，显然是預先譴責由于否定资产

① 問題就在这里。——譯者注

②③ 參看《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資料(第二国际)》，三联书店一九六四年版第99頁。——譯者注

階級社會中矛盾尖銳化這個無可懷疑的事實而產生的那些同資產階級政黨接近的活動的。而且大會之譴責這種接近是做得很對的。因為這種接近會模糊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但是這段決議自然不是反對另有原因的那種接近的，比方因為資產階級社會的利益同警察國家的存在不能並容而產生的接近。

阿姆斯特丹大會在指出資產階級社會中階級矛盾的增長時宣稱：

(一)“(國際社會)黨不會對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的政治和經濟制度負責，因此它拒絕撥出支持統治階級掌握政權所必需的任何經費。”^①。

讀者自己會懂得，以俄國尚待建立的那些政治制度的存在為前提的這一段決議，也根本沒有談到我們在爭取這些制度的鬥爭過程中所應當採取的那個策略。這段決議所能涉及的——而且無疑是涉及到了的——只是在我國舊制度崩潰以後不背叛國際社會主義的條件下我們可以採取怎樣的措施問題。就是說，從它的觀點看來，可以解決的問題只是關於我們黨參加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問題。而且很明顯，它不得不用否定的態度解決它。在這方面，這段決議的意思同下面一段的意思是完全一樣的：

(二)“按照一九〇〇年巴黎國際社會黨大會上通過的考茨基決議，社會民主黨不得企求參加資產階級社會的政府。”

由此可見，這一段話只有在我們忽然想要例如同農民民主派達成我們共同參加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條件的協議的那個場合下才是譴責我們的。只要這段話給我們留下行動的自由，我們就不會對這一點堅決地表示自己的意見。

“其次，大會譴責掩蓋階級矛盾以便促進同資產階級政黨合作的任何企圖。”^②

這裡指出了我認為構成阿姆斯特丹決議的精神和社會黨全部

①② 參看《第一國際第二國際歷史資料(第二國際)》第100頁。——譯者注

策略的基础的根本原則。

在我看来，正是因为这一段話，我們的代表大会才提醒我們的中央机构注意阿姆斯特丹決議。这段話表现了觉悟无产阶级全部策略的基本思想。它說，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是我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进行活动的主要任务。既然掩盖阶级矛盾阻碍着觉悟的提高，那么我們就应该坚决地駁斥和譴責掩盖矛盾的任何企图。任何这种企图本质上都是机会主义的。但远不是同资产阶级政党的任何接近都等于掩盖矛盾。如果照已故的尼·米海洛夫斯基当年述及的而且——用他的話說——“像紅衫女郎一样”喜欢“清一色的和鮮明的评价”的那些苏兹达尔人^①的办法行事，那就等于掩盖矛盾。政治上和其他地方一样，苏兹达尔人是沒有細致地区別事物的能力的。因此他們自然不能了解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利益怎么能够同无产阶级利益部分地契合。苏兹达尔人不承认任何“部分”。按照他們肤浅的邏輯可以得出結論說：只能是要么完全契合，要么完全不一致，并导致矛盾。因此，如果我們选择苏兹达尔人作为我們党同某个资产阶级政党接近的工具，那末他——只要他同意做这样的工具——恰好会从掩盖阶级矛盾开始。但是，沒有沾染苏兹达尔人的政治哲学的人不难理解，尽管资产阶级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尖銳化，无产阶级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正是由于矛盾尖銳化的普遍規律——在这个社会的发展道路为黑暗的反动势力所阻塞的任何地方，都可能而且一定要互相契合的。只有理解了这个道理，他才会为了自己的事业利用这个部分的契合，一分钟也不会采取措施来掩盖资产阶级社会中已經暴露或者将来可能暴露出来的那些矛盾。

大概不需要在这里证明苏兹达尔主义和馬克思主义是不能兼容的了。

現在我請讀者注意一下阿姆斯特丹通过的决定的最后一节。

^① 参看本书第180頁注。——譯者注

“大会希望，社会民主党議會党团将继续利用因党团成员人数的增大和拥护他們的选民总数的大量增加而建立起来的那个日益发展的力量来闡明社会民主党的目的，并按照我們綱領的原則剛毅頑強地保卫工人階級的利益，力求巩固和扩大政治自由和平等权利，进行比迄今为止还更坚决的斗争来反对軍国主义和海上称霸主义，反对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政策，反对一切种类的专橫、压迫和剝削，坚决地促进社会法制的发展和工人階級的历史任务和文化任务的实现。”^①

这里所說的話同我們所爭論的策略問題也沒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它也是以确定地建立起来的議會制生活，而不是以沒有建立議會制度以前的斗争为前提的。而且这里所說的观点可能在我們的策略方面給我們某些很有益的指示。例如，这里指出，社会民主党有义务力求扩大和巩固政治自由。讀者，您是不是以为阿姆斯特丹大会向国际社会民主党指出这一义务时，同时认为如果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希望利用非无产階級政党或多或少热爱自由的意願，它就会背叛自己呢？不，大会根本沒有也不可能有类似的想法。除开少数自然也钻到那里去了的苏茲达尔人以外，所有的人都懂得，社会民主党不仅有权利用这些意願，而且应当利用它們，如果它希望随时随地进行“反对一切种类的专橫、压迫和剝削”的斗争的話。

总之，阿姆斯特丹決議根本沒有說出反对我所主张的策略的任何話，而是說了很多拥护它的話。

当我指出提高工人階級的觉悟是我們在解决我們的一切策略問題时应当运用的标准时，我正是坚持了阿姆斯特丹決議的精神。我可以提醒我們党的中央机构注意这一点。

不久以前——就在前些日子——庫克新娜挖苦地对我說，“資产階級称赞”我^②。但是經過我在我的这些信中所作的一番解释

① 参看《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資料(第二国际)》第100頁。——譯者注

② 参看《列宁全集》第十卷第438、442—443頁。——譯者注

以后，很容易了解，援引“資產階級的稱贊”根本不可能使我感到不安。在我看來，問題不在於誰稱贊我，而在於為什麼稱贊我。如果資產階級為了事業稱贊我，那麼我很高興地接受它的稱贊。然而為了判斷它是不是為了事業稱贊我，顯然需要某種嚴肅的原則，而不是外在的標志，說稱贊正好是來自資產階級。庫克新娜不考慮這一點；但是我希望，讀我的著作的人不止她一人。

如果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資產階級利益同無產階級利益是部分契合的，——只有無政府主義者才能否認這一點，——那麼我可以因為資產階級理解這個契合而稱贊它，這絲毫不背叛自己，我也可以懷着滿意的心情閱讀資產階級因為這種理解而稱贊我的那些話，也同樣分毫不背叛自己。人、手、足、刀。庫克新娜在政治上的識字能力多麼差啊！她是跟教堂里的哪一個執事先生學習的呢？

當馬克思寫道，對於無產階級說來，重要的**不是資產階級希望什麼，而是它被迫去做什麼**，——他恰恰是从我現在所堅持的而且一個對**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深思熟慮過的人所不能不堅持的同一個觀點來看無產階級對待資產階級的態度這個問題的。我應當承認，我們的同志們加之於資產階級民主派（部分說來）和杜馬（一般說來）的大多數責備，在我看來都充滿着傷感的**唯心主義**精神。人們責備杜馬的，正是**杜馬的希望和我們的希望不一樣**。但是杜馬怎樣希望以及它希望什麼同我毫不相干。對我說來，重要的是它被迫對我國官僚制度採取反對立場，以及它的這種反對立場嚴重地激動着全國的人心和極其迅速地培養着群眾的政治覺悟。因此杜馬起着革命的作用，即使其中占統治地位的黨派希望“和平的結局”也罷。既然杜馬因此起着革命的作用，那末，如果無產階級拒絕在杜馬同官僚制度的衝突中支持杜馬，它就會背叛自己固有的革命使命。

說到無產階級能夠用以支持杜馬的方式，我們不應當以這些方式從革命空談的觀點看來具有怎樣的**形態**為指導，而要以它們的**實際革命後果**可能怎樣為指導。

从革命空谈的观点看来，杜馬本来应当起的那种作用好像是极其简单的和十分短暂的。不久以前我在一份法国画报上看到一幅形容加斯科尼人^①的漫画。这位加斯科尼人宣称：«Je voudrais être roi pendant cinq minutes, moi, juste le temps nécessaire pour donner ma démission».（我想做五分钟的皇帝，即做卸职所必要的时间那样久。）如果只是为了放弃王位才需要王位，试问为什么要去追求王位呢？我们中间某些人看来希望使杜馬变成这样的加斯科尼人。他们希望召集杜馬只是为了立即解散它。然则为什么要召集它呢？那么说坚持抵制就会更好一些、更彻底一些。

如果我们从杜馬“希望”什么的观点来看它的活动，那么当它由于自己的决定而使自己同官僚制度的冲突一触即发的时候，即在官僚派先生们着手解散它的那个历史时刻，我们自然要大大为它鼓掌叫好。但是从杜馬的决定可能产生的那些革命后果的观点来看，我们就应当作另一种判断。从这个观点看来，过早地爆发冲突应当认为是有害的。冲突可以教育人民群众。为了使这种教育达到合乎愿望的结果，必须使冲突继续一定的时间。如果它在这个时间以前结束，那么人民的政治教育就不会达到应有的高度，革命的事业也会因此受到损失。结论就是：这里和任何地方一样，我们应当灵巧得像蛇一样；革命的空谈是极坏的政治斗争手段。

我上面引证的《共产党宣言》的一段话中说道，资产阶级会把自己的政治知识给予无产阶级。我又补充说过，它把这种知识给予无产阶级时就是起革命的作用。不过它在教育无产阶级的同时，自然也就把自己的政治观点传授给他们。而它的政治观点，根据它的社会地位，不能不是半途而废的、不彻底的。换句话说，资产阶级传授给无产阶级的知识是片面的。正是这种情况决定着我们自己的政治教育的作用。我们应该消除这种片面性：我们应该做到全面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我们应该帮助他们自立，在他们

① 加斯科尼，法国省名，在法国文学作品中加斯科尼人意指吹牛大王。——译者注

自己的旗帜下組織起来。簡言之，在这里我們必須用一切力量同資產階級**进行斗争**。但是斗争有各式各样。空想主义者进行斗争不同于馬克思主义者。

当空想主义者决定参加反对資產階級对工人階級的影响的斗争时，他就郑重地和公开地声明說，資產階級的影响是有害的，并且建議无产階級鄙弃資產階級。假使无产階級不遵照这个郑重的、公开的建議，那末空想主义者就会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并且严格遵照自己空想的、多少“极端的”、多少“革命的”药方开始用自己原有的办法行动。他这样做无疑是在挽救自己的“純洁性”，但这也是巩固資產階級对工人群众的影响。

馬克思主义者不这样行动。他不会根据資產階級不可能彻底地同旧制度进行斗争就鄙弃資產階級。他坚定地号召无产階級在这个斗争中支持它，不过要使这种支持具有这样的性质，以致无产階級給予資產階級的支持越是有效，資產階級对工人階級影响的有害方面就会更加全面更加坚决地被消除，資產階級授予无产階級的那个武器就会更加对准資產階級自己，这个武器也就会变得更加銳利。而这个真正革命的——以及唯一革命的——結果之所以取得，正是由于无产階級对待資產階級同旧制度进行的那个斗争不再漠然无动于衷，而是最积极地参加斗争，从而使这个斗争在馬克思主义的革命化的影响下具有新的規模和新的历史意义。一句話，馬克思主义者走的是历史发展的阳关大道，而空想主义者沿的是自己的教条主义的独木小桥。

資產階級的不彻底性不是在无产階級鄙弃它的时候对无产階級表現得最明显，而是当无产階級在它和旧制度的斗争中**同它一起走**的时候表現得最明显。无产階級只有同它一起走，才会看清它的行动，因此也才会了解它的行动的不彻底性。

自然，我們应当无情地和不倦地揭露这个不彻底性。但是揭露它只能通过批判，可是我們却經常满足于說些不体面的話。

举一个惊人的例子。我們对立宪民主党人說了的确三籬筐(而

且还是满满的)不体面的話,但是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在我們的报刊上看到对立宪民主党土地改革草案进行认真的批判。要知道这里面有很多最严重的缺点。我們关于公正的概念同立宪民主党根本不相符。在立宪民主党人看来是对大土地占有者公正的贖偿,在我們看来却是对这些老爷有利而对人民則不公正的征課,——这种征課达到几十万万的数額。我們揭露这种不公正的現象,也就是揭露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們对这种不公正的現象談得非常少。我們为着些芝麻小事,为着些个别的用語急躁得不得了,而且好像是在半睡不醒的状态中忽略了主要的問題,即忽略了我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准备把新的枷鎖加在人民脖子上这样一个問題。同时我們之所以这样行动,正是因为我們自己还没有抛弃掉革命空談的枷鎖。

跟着立宪民主党人走的有“劳动派分子”。他們的公正观和我們的公正观也不一样。同时这种公正观还是由空想的泥足支持的。我們应当用我們的批評的大铁錘打碎这双泥足。而我們之所以沒有这样做,又是因为我們醉心于芝麻小事,而忽略了一件唯一能够十分突出地表明我們自己的綱領具有确定不移的革命邏輯的武器。

我們的任务应当是这样的:即不要从事浪漫主义的空談,不要阴謀家的炼金术,不要吹毛求疵地挑剔,不要說空洞的漂亮話,而要进行严肃的、冷靜的、革命的、可以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和扩大我国整个解放运动的規模的批判工作。只要我們认真地实现这个任务,那时——也只有那时——我們就开始真正“使自己同资产阶级对立起来”;迄今为止我們那种反对资产阶级的越軌行为部分說来仍然是沒有成效的,部分說来仍然是对我們自己事业的利益有害的。我国那些声嘶力竭地叫喊革命的人完全不懂得怎样抓住可以利用来把整个俄罗斯翻轉过来的那根革命的杠杆。这些夸夸其談的人都是些仿佛巴扎洛夫談到过的浪漫主义者。

由于自然的联想,巴扎洛夫又使人記起庫克新娜。这位对我

采取极不友好的态度的女士，在这里赶紧揭穿我的矛盾。她大喊大叫，說我在自己的呼吁中談到过杜馬希望給农民土地。我的确談到过杜馬的这个希望。这种希望也确实存在。但是我在自己的呼吁中沒有談到过杜馬希望根据什么条件給农民土地，我也沒有放弃过自己的、批評这些条件的权利。我沒有談到这些条件是由于十分简单和十分容易了解的原因。戈列梅金先生之所以生杜馬的气，不是因为杜馬要求“公正的”贖偿，而是因为它想破坏（用他的話說）大土地占有者老爷們神圣的私有权。我們认为不认为这个权利是神圣的呢？不，不认为。因此，当戈列梅金先生用这个权利的名义抨击杜馬时，我們就应当反过来抨击戈列梅金先生。因为这是明明白白的，Chère Eudoxie！

我們的策略随时随地也都应当这样。当资产階級作为革命階級同旧制度进行斗争的时候，我們就同它一起走。当资产階級放慢脚步，当它不再是革命階級的时候，我們就批評它。

我本人在著作上的策略也将这样。凡是我国资产階級民主派政論家受到过时的革命教条或反动教条反对的地方，我就支持并且还将支持这些政論家，而凡是他們企图把资产階級教条同生动的革命思潮对立起来的地方，我就要批評他們。他們已經做了这样的尝试。同时某些不策略的尝试，例如对正統思想进行攻击，并不比革命空談的英雄們不策略的越軌行为有任何高明的地方。不过这个问题以后再談。一天的难处一天就够受了。

（譯自《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十五卷第 133—145 頁）

右傾在哪里，“正統思想”在哪里？

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一九〇六年六月八日第二十号《信使报》上。

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以后，由于在一切主要策略問題上都通过了孟什維克的決議，党内和广大的无产階級

群众中間产生了一个問題：誰代表真正的馬克思主义，誰是机会主义者？

針對这个問題，普列汉諾夫写了这篇攻击和譏諷布尔什維克和列宁的小品式的文章。

他用旁敲側击的語調攻击布尔什維克不服从決議、不守紀律、不“忠順”、偽善。他把社会民主党內的革命派諷喻为“庫克新娜輩”、“西特尼科夫輩”，說他們“把一切都庸俗化，都予以歪曲，都弄得一团糟，都描写得令人作嘔”。他时而譴責布尔什維克是写出“粗俗文学”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时而譴責他們是以“个人”为“出发点”、“陷入空想”的无政府主义者，时而譴責他們是专搞“阴谋”、“不懂得群众的革命主动性多么重要的布朗基主义者”。列宁指出，普列汉諾夫“臆造这种自相矛盾的非难布尔什維克的話，最好不过地打击了”他自己。（《列宁全集》第十卷第437頁）

綏里方說：“阿唷，你！这就是
右边呀，連左右也分不清！”^①

最近，我們的报刊对于我們党內所謂布尔什維克和孟什維克这两派人之間所存在的意見分歧談得很多。分歧的确存在。然而对存在分歧感到惊奇的人本身就值得惊奇。他們对党的統一代表大会寄予了真正令人惊奇的希望。他們以为，只要統一了，也就一致了，只要一致了，也就用不着爭論了。但代表大会不可能消除分歧。它的任务根本不在那里。任务首先在于认清党內的多数站在哪一边，第二在于确定在这种条件下处于少数地位的人能不能同多数在一个組織內进行工作。現在，这双重任务都圓滿地解决了。

^① 參看果戈理：《死魂灵》，魯迅譯，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61頁。——譯者注

說到現在我們黨內占統治地位的意見，那麼代表大會上發生的事情使人想起福音書上一句預言：“最後的將是最先的。”“孟什維克”原來是“布爾什維克”。因此當讀者在報刊上遇到“布爾什維克肯定說”或“布爾什維克以為”之類的詞句時，他一定要在腦子裡作一次修改，“布爾什維克”應當讀作“過去的布爾什維克”，即過去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占多數而現在原來處於少數地位的人。當然也必須對“孟什維克”作類似的修改。“孟什維克”現在是 *ci-devant*^① 孟什維克。

其次，代表大會表明了，儘管我們黨的兩派之間存在着意見分歧，可是這兩派中間任何一派都不希望分裂，至少不是公然希望分裂。我承認這是有些奇怪的，但這畢竟是事實。

這就是所以奇怪的原因。在第二次黨代表大會上，無論是在大會將近結束時成為“孟什維克”的那些人或者是處於多數地位的那些人，都以同樣的熱情捍衛了——由於受到極少數出身於過去的“經濟派”的某些同志的攻擊——《曙光》雜誌和《火星報》編輯部起草的綱領草案。無論這些人或者那些人都深信不疑的“正統派分子”。因此——這就已經很多了——他們之間根本不存在綱領方面的意見分歧。但這還不是最重要的。他們之間也根本沒有過策略方面的意見分歧。這不是猜想，而是事實。只有當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的鬥爭已經開始了的時候才在這次代表大會上輪到討論策略問題。情況是怎樣的呢？布爾什維克一致地、沒有爭論地、沒有異議地、沒有絲毫動搖地通過了幾乎全部（除開很少數例外）由孟什維克起草的策略決議草案。似乎這種情況會使得以當時的多數派為一方和以當時的少數派為另一方之間達成協議不僅是合乎願望的，而且也是極其容易的。結果並不如此。協議沒有達成，而多數派和少數派之間的爭論導致了正式的分裂。現在情況完全翻過來了。現在的布爾什維克——*ci-devant* 孟什維

① 以前的。——譯者注

克——同現在的孟什維克首先在土地綱領問題上發生了分歧，其次在整整一系列最重要的策略問題上發生了分歧。然而代表大會還是應該稱為**統一**代表大會；它畢竟消除了分裂，至少形式上是這樣。這是十分有趣的政治上的反常現象！關於這種現象我已經聽到過不少或多或少中肯的俏皮話，但是不妨也認真地談談，可惜篇幅不允許我在這裡詳細說明這個問題。我只談一點。假使我們黨的上屆代表大會能夠完成多少鞏固的統一事業，假使我們現在的孟什維克——報刊上不知為什麼繼續管他們叫布爾什維克——答應“忠順地”進行活動，那麼這就是我們對無產階級（而且唯一只是對無產階級）應盡的義務。

無產階級對知識分子的糾紛已經厭煩了。分裂比辣蘿卜還使他們討厭，而且他們已經十分明確地使所有應當知道這一點的人了解到：他們希望統一。所以他們的有覺悟的和有組織的那一部分代表的代表大會消除了分裂和統一了黨。榮譽和光榮歸於無產階級！

誠然，代表大會僅僅建立了形式上的統一。誠然，過去的布爾什維克、現在的孟什維克，是忠順的……怎麼可以這樣說呢？……他們是這樣的忠順，以致無私的觀察者可以不無根據地問自己：如果他們變成了不忠順的，那麼他們的行為又會在什麼方面起變化呢？不過這已經是暫時不與我們相干的另一個問題。自然，做忠順的人比**希望做看起來**忠順的人要好些。但是當人們希望看起來像什麼的時候，這永遠是有充分原因的。所以，如果我們現在的孟什維克實際上只**希望做看起來**忠順的人，那麼這原因應該到我國無產階級心理中去找。再說一遍，這裡的問題在於無產階級不希望分裂。

但是不言而喻，我們黨的两派的統一（在上屆黨代表大會上實現了這種統一，儘管他們之間現在存在着意見分歧）不可能消除這些實際存在的意見分歧。同樣不言而喻，只要這些分歧存在，那麼掩蓋它們就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有害的和有罪的，把它

們告訴黨，用批評的眼光闡明它們的全部深刻內容，從而促進正確觀點的勝利，乃是必要的、有益的和應當的。我們現在的孟什維克同我們現在的布尔什維克進行爭論，這根本不是什麼壞事。難怪法國人說，意見衝突可以產生真理。不過進行爭論時必須記住：*est modus in rebus*（需要知道分寸），或者換句話說，**在黨內應當守紀律**。在任何一个稍微尊重自己和稍微值得尊敬的社会民主黨內，少数派都有權捍衛自己那些与多数派有分歧的觀點。但是它必須按照多数票通過的那些決議行事。否則就不會有紀律，即不會有社会民主黨。否則少数派的忠順只是口頭的。否則他們就是偽善者。雖然偽善是惡德向美德作的一種讓步這個說法是對的，但无產階級應當憤怒地摒棄這種毫無價值的讓步。因為它們同无產階級是不相稱的。讓无產階級的敵人們去做偽善的事吧；他們沒有偽善是不行的。然而无產階級的事業是正義的事業，在它的代表人物中間不應該有偽善者的地位。

所以，我國的某些報刊對過去的布尔什維克即使處在少数派地位也繼續保衛自己的觀點感到驚奇是用不着的。這本來是十分自然的事。

當然，可以要求，也應當要求互相爭論的兩派在發表尖銳的意見的同時不使用粗魯的言詞，不造成互相敵視的局面；在這種局面下，結果只有把或多或少具有刑事性質的指控互相加之於對方。我們的論辯著作就其手法說無論如何不應當使人想起馬克思稱之為**粗俗文學**（*grobianische Literatur*）^①的那種東西。但是無論這種要求多么合理合法，都應當事先有精神準備；在某些個別情況下，要求仍然得不到滿足。在任何偉大的社會運動中總有一些分子扮演代數總和中負值的角色。向這些分子提出稍微高尚的要求也是用不着的。就拿我國的任何一次社會運動來說，比方拿六十年代的運動來說（大家知道，現在遠不只是一些社會主義者在替它說公

①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 322 頁。——譯者注

道話)。要知道这次运动除了十分正派的人士以外还有庫克新娜和西特尼科夫参加。要知道伊·謝·屠格涅夫在这方面是正确的。但是庫克新娜輩和西特尼科夫輩妨碍不了这个运动在我国社会生活中起伟大的作用。庫克新娜輩和西特尼科夫輩是不会死亡的。他們会钻到任何进步运动中去。他們——不必隐瞒！——在我們社会民主党人中間也遇得到。为了相信这一点，只要再讀一遍过去“布尔什維克”文献的某些論战著作就够了，——这些著作显然是庫克新娜写的。要期待这位女士知道分寸和礼貌，那是办不到的。

她把一切都庸俗化，都予以歪曲，都弄得一团糟，都描写得令人作嘔。但是对此是毫无办法的。既不能用十字架，也不能用錘子摆脫开庫克新娜輩和西特尼科夫輩。只有不理他們的庸俗言論，而仅仅用严肃的話向幸而构成我們队伍的压倒多数的、严肃的人呼吁。

与其因为我們上届党代表大会沒有解决它甚至不可能提出来的那个任务，即沒有結束我們的爭論而伤心，倒不如根据柯茲馬·普魯特柯夫的建議去探究一下事情的根源^①，并且問一問自己：我們的意見分歧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正确地解决这个問題会消除很多誤会以及这样一个十分錯誤的观点：我們現在的孟什維克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极左翼，他們的策略观点是“正統”馬克思主义的反映。

这真是不可容許的和“好笑的”謬見。在我們現在的孟什維克这里重新发生了早就在无政府主义者那里发生过的同一桩可笑的咄咄怪事：人們把他們当成了另外一个什么人，像《欽差大臣》里的奥西布所說的那樣。^②

① 柯茲馬·普魯特柯夫是十九世紀的俄国作家，他說过一句著名的格言：Смотри в корень!（寻根究底!）——譯者注

② 參看果戈理：《欽差大臣》，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96—97頁。——譯者注

的确，在西方，就是在我国甚至也可能有許多社会主义者（自然，这些人的头脑是缺乏明确的概念的）准备承认：无政府主义是比社会主义更先进的社会运动；这是更遥远的未来的理想；可是，既然这个遥远的理想在离我們較近的时间里始終是不能达到的，那就必須暂时滿足于社会主义理想。总之，他們得出的結論是：沒有花紋紙就应当写在普通紙上，但花紋紙毕竟好些，这个花紋紙就是无政府主义。这是很大的錯誤，陷入这个錯誤的人表明他們不了解无政府主义不同于現代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无政府主义不仅同現代社会主义沒有任何共同点，而且簡直是同它針鋒相对的。現代社会主义把**社会**及其发展当作出发点；无政府主义的出发点是**个人**。現代社会主义站在**科学**的观点上；无政府主义則陷于**空想**的領域，同时它不仅按其本质來說是空想的，而且是空想主义蜕化的产物。它甚至沒有过去的空想主义体系所固有的形式上的邏輯性。它沒有滿足最起碼的邏輯要求。它在發揮关于个人权利的議論时忘記了权利是一种規範，为了建立这种規範人們之間必須具备一定的关系，也就是說至少必須有**两个人**存在。当魯濱遜仍然独处孤島时，他对法律規範是沒有任何需要的。“无政府主义”的个人，这是迁移到空想主义的抽象概念的无人島上去了的魯濱遜。自然，他也不需要法律規範。用无政府主义的語言說，这就意味着，个人的权利是无限的。而且这个結論（它是粗魯的方法論錯誤的产物）被奉为**理想**。从这里已經可以明显地看出，无政府主义是完全不能同現代社会主义相提并論的，这两个理論是建立在完全不同的思維的基础上的，所以，认为无政府主义者是国际社会主义大軍的左翼无异于根本沒有弄清楚問題。

只有从一个方面来看，即从这些理論都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的那个方面来看，才能把两个建立在不同思想基础上的理論互相比較。而从这一方面看来事情必然是这样的：同一定社会发展的較高阶段相适应的那种学說是更先进的、更“左傾”的学說。試利

用这一标准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作一比較的評價吧，那时你們就会看到，事情完全不像孤陋寡聞的人們所想像的那樣。空想社会主义适应于資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較早阶段；現代科学社会主义适应于資本主义社会比較成熟的時代。到了产生科学社会主义的那个時候，空想社会主义就已經傾向于沒落了。科学社会主义代替了空想社会主义。既然如此，那么請判断一下，这两个学說哪一个应当在右边，哪一个应当在左边。不管你們多么不偏不倚，你們还是得承认，无政府主义的位置根本不在左边，而认为它是社会主义左翼的人很像科罗燻契加屬下的农奴娃儿，她本要給乞乞科夫指引道路，但是她——用綏里方的話——連左右也分不清。

我們現在的孟什維克就下面这个方面說很像无政府主义者：即只有出于誤解才能承认他們是社会主义中先进学說的代表。

如果有人建議我用不多的几句话說明現在在我党兩派之間存在的那些策略上的意見分歧，那么我可以这样說：

一部分人，即过去的孟什維克、現在的布尔什維克，或多或少堅定地和彻底地坚持着符合馬克思理論的策略观点；另一部分人，即現在的孟什維克、过去的布尔什維克，埋头于布朗基主义。全部問題都在这里，同时他們之間发生的一切爭論以及由这些爭論引起的一切忿恨都可以因此得到說明。

恩格斯在形容布朗基的特征時說道：“他在政治活动方面实质上是‘实干的人’，这种人深信很好地組織起来的少数人只要在适当的时机努力发动起义，就能够通过最初几次胜利把人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这样就能实现革命。……根据布朗基把任何革命都看成是人数很少的革命者的Handstreich^①自然应当得出成功以后必須实行专政的結論，不过这不是无产階級整个革命階級的专政，而是为数很少的人的专政，他們发动了起义，而且早就預先組

① 爆发。——譯者注

織在一个或几个人的专政的权力之下了。”^①

整个这一段話都可以完全适用于我們現在的孟什維克。这些“实干的人”恰恰像布朗基一样看待革命。他們現在毫无理由地說，他們善于重視群众的作用，而布朗基則不善于重視它。这不合乎事实。在布朗基主义者的綱領中給群众留出了一定的、而且甚至是很大的地位。这一点，从我刚才引证过的恩格斯的話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同时，凡是稍微熟悉法国社会主义史的人都清楚地了解这一点。但是布朗基主义者对群众的态度之所以是空想主义的，因为他們不懂得群众的革命主动性有多么重要。他們的計劃中其实只有阴谋家在活动，而受到为数不多而組織得好的人吸引的群众只是从旁帮助。所以——而且仅仅因此——恩格斯說，布朗基把任何革命都看成是人数很少的革命者的 Handstreich。布朗基主义的这个根本罪过也就是我們現在的孟什維克的最主要的罪过。他們像布朗基一样不懂得群众应当是有主动精神的。因此他們也像布朗基一样不了解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这种教育只有通过群众在政治上的主动精神才能取得——乃是革命成功的主要条件和革命者的主要任务。他們的全部策略計劃都建立在与此相反的条件上，即建立在不了解上述条件和任务的基础上，而他們向上一届代表大会提出的全部決議就充滿了这些策略計劃。我們現在的少数派充滿着这样多的布朗基主义精神，所以按共策略观点的本质来看，他們同我們俄国的布朗基主义即已經不存在的“民意主义”是根本沒有任何区别的；同样的“阴谋”，同样的“武装起义”（民意派分子說：造反），同样的革命者“夺取政权”。差别只在于最杰出的民意党人——安·热里雅鮑夫比我們現在最杰出的布朗基主义者尼·列宁具有更加可靠得多的政治嗅觉。热里雅鮑夫很好地懂得，“社会”的同情对阴谋家多么重要。

^① 恩格斯：《流亡者的文献》第二篇《公社的布朗基主义流亡者的綱領》，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論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 第 275—276 頁。——譯者注

然而从历史的观点看来，布朗基主义同馬克思主义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

恩格斯在繼續說明布朗基的特点时写道：“你們可以看得出来，布朗基是老一辈的人。”^①

我們現在的布朗基主义者列宁这一伙人也就是这样的“**老一辈的人**”、过时的革命观点的代表。这些人中間許多一度都是馬克思主义者。他們所有的人到現在还都把自己算作馬克思主义者。但这是錯觉。在这些人的策略观点（以及許多其他方面的观点）中，早已沒有一点馬克思主义的气味了。

讀者，請您說，如果不违背邏輯和常理，能不能认为这些“**老一辈的人**”是我們党内最先进的左派的代表呢？^②

当然不能！这些过时的革命偏見的复活者，**这些革命思想方面的反动分子**不是我們社会民主党的左翼，而是它的右翼。这好像同他們的泛泛的革命空談有矛盾。但是泛泛的空談根本证明不了什么。布朗基主义者也是十分喜爱革命空談的，所以恩格斯甚至拿他們同（用他的話說）在泛泛的革命空談方面創造了人类最高

① 恩格斯：《流亡者的文獻》。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 276 頁。——譯者注

② 在自己的另一篇文章中，恩格斯說布朗基主义者是这样一些人，他們“恰好在举行革命所必需的条件尚未具备的时候力求規定革命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制造人为的危机，举行革命……他們是革命的炼丹术士，并且具有旧时代的炼丹术士所固有的那种概念混乱和那种观点狹隘的特点。”用恩格斯的話說，他們通常都具有无畏的勇敢精神和頗大的革命技能的特点，他們建立过最初的街垒，搶劫过武器庫，組織过反抗运动并且領導过它，簡言之，他們是街头起义的軍官。但是这些勇敢的軍官并不是无产階級运动的**未来**，而是它的**过去**。随着无产阶级运动向前发展，阴谋家也就失去了自己的影响，同时，他們在一些秘密的工人团体中发现了危险的竞争者，这些秘密的工人团体給自己提出的目的不是直接举行起义，而是**組織工人階級的力量和提高他們的階級覺悟**（參看我为第三十六号“旧”《火星报》写的社論〔參看《普列漢諾夫全集》俄文版，第十二卷《三月望日》一文。——譯者注〕）。这里所說的一切全都可以适用于我們現在的孟什維克、俄国革命的这些真正的炼丹术士。——著者注。

紀錄的无政府主义者相提并論。大家也都知道，在国际工人协会中，布朗基主义者反对过馬克思，譴責他仿佛妨碍該协会采取革命的——讀作：陰謀家的——策略。但是这种情况現在大概不会把任何人弄糊塗。現在，凡是熟悉西方工人运动的人都懂得，真正的革命者、实际上的而不是仅仅口头上和主观願望上的革命者，是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布朗基主义者。耶穌說过，并不是所有重复說“上帝！上帝！”的人都能进入天国。我們大家則應該对自己說，并不是所有叫嚷“革命！革命！”的人都在从事革命的事业。

既然如此，我认为早就該放弃“布尔什維克”、“孟什維克”这些旧的用語了。它們以前就是很不妥貼的，因為它們根本沒有指出它們所表示的两派的观点的区别。不过，当这个区别限于組織方面的細小事情时，这些用語也許还可以容忍。但現在，当互相爭論的两派可以說站在不同的两岸，当他們在社会党人的行动方式問題上的意見分歧彼此相距得这样遙远的时候，早就該抛弃陈旧过时的術語了，早就該回忆起經院哲学的旧規則了：这条規則說，名称应当符合事物的本性。因此应当把一些人有权取得的**布朗基主义者**的称号加在他們身上，应当称呼另一些人是**馬克思主义者**，这是他們所应得的称号，至少是由于他們的意图的一般性质，如果不考虑这些意图的所有个别的、有时不成功的表現的話。

然則“正統思想”在哪里呢？

C'est selon^①，——像法国人所說的。

布朗基主义的正統思想在布朗基主义者方面，**馬克思主义**的正統思想在馬克思主义者方面。这还需要解释么？

（譯自《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十五卷第146—154頁）

① 看情况而定。——譯者注

“共同的悲痛”

本文发表在一九〇六年八月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六期上。

一九〇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沙皇政府下令驅散了第一届国家杜馬。散布立宪幻想的立宪民主党人公开表示了“共同的悲痛”。七月二十二至二十三日，主要由立宪民主党人組成的二百名杜馬議員集会于維波尔格，并且通过了宣言。宣言号召人民对政府进行“消极抵抗”，在沙皇沒有决定选举新杜馬以前不納稅和不出壯丁。

这篇文章就是针对杜馬被驅散后的形势和党的策略任务而写的。

普列汉諾夫正确地譴責了維波尔格宣言沒有提出召开立宪會議的革命口号，批評了立宪民主党人的不彻底性，并且把“劳动”农民同他們对立起来，他还分析了无产階級、“劳动”农民和自由資產階級对于召开立宪會議的态度。但是他不懂得在爭取召开立宪會議的斗争中，工人政党只能同革命民主派的政党，而不是同“一切政党”达成战斗協議，他迴避了当前应当采取什么斗争手段以及使用这些手段的条件和意义的問題，他不了解形势的发展要求斗争方式更果断更富有进攻性，以至承认全民起义，提出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的問題，却本着他固有的“实力論”空談什么“我們需要的不是发泄，而是胜利的革命”。

八月二十九日，《无产者报》发表了列宁的《策略上的

动摇》。(見《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160—164頁)列宁一方面贊揚了普列汉諾夫放弃他在杜馬时期所采取的极右翼立場，同时也闡明了他在策略問題上許多不徹底的地方，揭示了他的种种动摇，指出了他企图加強孟什維克、削弱布尔什維克的錯誤立場。

杜馬被驅散了。驅散杜馬一事使俄国公民大为惊愕。

《我們的生活报》在第四九四号的《国家杜馬的解散》一文中形容彼得堡人的心情时說道：“由于事出突然，誰也弄不清楚所发生的事情，誰也沒有为自己拟定过行动計劃。”在該报的同一号上，弗-佐夫先生报道說，坐車到維波尔格来参加今后将著名的會議的一位議員曾經表示过：“今天大家都有同样的想法，我們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悲痛，而且这种悲痛这样紧密地联起来，結成了一个。”

在《新时报》(第一〇八九三号)上，亞·克斯·先生說道，在华沙車站上他遇到过三位西部省份的农民議員。用他的話說，这些議員“真正流着眼泪离开了首都。临別前他們曾去到喀山大教堂，再一次走过塔夫利达宮，同自己的杜馬告了別，一言不发地走上車站。”这的确动人。但得承认，我并不完全理解这种悲痛的心情。确切些說：只有从不了解真实情况，即主要是不了解国家杜馬的政治作用的那些議員的立場来看，我才理解这种心情。

杜馬会要被驅散，这一点本是众所周知的。而且它同內閣的冲突越是尖銳，就越可以明显地看到，如果政府不願意让步，邀請立宪民主党人参加政权，那么它就只有采取“解散”杜馬的步骤(在这里且使用一下《我們的生活报》溫和的說法)。

全部問題在于政府究竟什么时候向这方面或那方面采取自己的决定。自然，要是政府不那么迅速地采取决定，就会更好得多。但是对誰更好呢？無論如何不是对政府。对于政府說来，恰恰相反，最好是尽可能迅速地使冲突弄到极端尖銳的地步。其所以最好，因为在当前我国的政治气氛中它的力量正一天天地消失。在

这种气氛的影响下，它的最后支柱——军队正在瓦解。不过它的这个最后支柱的瓦解过程还只是刚刚开始。假如现在事情弄到手执武器地进行公开斗争的地步，则除了极少有的例外情况，军队都会站在“秩序”一边。要是瓦解过程进行得更久些，就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局面：大部分军队就会转到自由方面来。这一点政府清楚地知道，因此政府为了自卫赶紧驱散了杜马。我要再一次指出，非常遗憾，它终于想到这步棋了。但是我仍然不理解反对我国旧制度的人们为什么会产生苦闷的心情。难道他们的期望都寄托在政府的想不到上面么？难道他们的毅力只是靠希望政府想不到来维持的么？如果这样，他们的毅力就很不足轻重了。只是靠指望敌人失策才相信自己会胜利的战士是糟糕的战士。

其次，我们的“共同的悲痛”根本不是像初看起来可能觉得的那样大。社会发展的进程取决于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解散”杜马并不会向反动方面改变这个对比关系，而是向革命方面改变它。

我国的布朗基主义者顽固地坚持这样一种信念：我们应当抵制杜马，因为否则我们的策略就会促使人民中间的“立宪幻想”巩固起来。实际上，为了打破人民的“立宪幻想”，本来不应当抵制杜马，而要积极参加杜马的工作。只有经验才会告诉所有还没有看清这一点的人，——可惜这样的人还有很多——，现在我国所存在的那种形态的人民代表机关并无任何权利、任何法律效力。我国的人民代表机关在法律上的软弱无力暴露得越多，人民思想上那种认为十月间赐给我们的“宪法”可能是我国社会生活复兴的工具的幻想就会破除得越多。而一旦消灭这种幻想，人民就会取得另一种真正的宪法和另一种真正的、可以保证自己实行专制的代表机关，——那时他们将必须懂得他们现在还不懂得道理，即：他们最迫切的经济利益要求根据著名的四项公式^①召开立宪会议。

“解散”国家杜马是一课生动的教训，它清楚地告诉人民，十月

^① 所谓“著名的四项公式”即指一般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宪法所规定的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记名的四项选举原则。——译者注

“宪法”的真正意义是什么。誠然，如果学生〔按指“人民”。——譯者注〕只是在他获得了如此大大地促进了杜馬中革命派同反动派的斗争的、更加可观的政治訓練以后才取得这課教訓，对他就会更有益得多。这也說明为什么——再說一遍——政府不这么迅速地驅散杜馬就会更好一些。但是不管怎么样，无可怀疑的是这課生动的教訓現時会使学生的政治觉悟提高得很大很大。而自由战胜奴役的一切把握就取决于这种觉悟，而且唯一只是取决于这种觉悟。有什么可以悲痛的呢？

有一点倒是值得悲痛的，那就是一切和平解决俄国正在經歷的危机的希望都会随着杜馬的“解散”而渐渐消失，“像蜡烛对着火就消融一样”。这个危机刚开始，所有沒有被政治上的教条主义弄昏头脑的活动家就早已明白，这样的希望乃是一种完全沒有根据的“幻想”。

看来，在維波尔格开会的前届国家杜馬議員向人民发出的宣言证明，甚至始終用不高兴和不信任的态度对待革命的行动方式的人現在也在放弃和平解决危机的幻想。签署宣言的議員們既然号召俄国公民不繳賦稅，不出壯丁，因之也就是号召他們走上革命的道路。整个西欧的报刊都是这样理解他們的告人民书的。它們当然也沒有理解錯。如果人民遵循自己过去的代表們的劝告，他們就会同政府进行公开的革命斗争。这一点大概不需要加以解释。

然而如果这是对的，如果“解散”国家杜馬甚至使得許多不屬於“左派”政党的議員相信和平发展在俄国是不可能的，如果維波尔格宣言号召人民走上革命斗争的道路，那么試問：在这篇宣言中是否說明过人民代表向人民发出的革命呼吁所应当說明的一切东西呢？

我以为，沒有，沒有說明过。

我认为議員們在自己的呼吁书中所采取的那个观点是不正确的。他們所建議的不繳賦稅和不出壯丁乃是具有最不容置疑的革

命意义的一种行为。但是如果我国有觉悟的那部分人民只限于这些行为，那就会使他們的革命反抗力量降低到最小限度，这自然是完全不符合解放运动的利益的。为什么議員們不向人民提出任何别的建議呢？是因为所有别的建議在他看来都是不合目的的么？还是因为他們想为人民的抗議保持合法的性质呢？^①

然而后面这个想法未必会成功，因为对当局的“合法的”反抗很快就会变成“不合法的”。至于合目的性，那末在战争中最合目的的是使敌人受到最大的損失。維波尔格宣言建議人民采取的方式恰恰就不是用一切办法使敌人受到損失，要知道为了自由我們应当这样做，而且一定要这样做。

議員們在自己的宣言中本来应当提出的主要問題是：在人民代表机关实现人民的要求以前可能遭到解散的那个人民机关在何种程度上符合人民的利益。只要提出这个問題，它自己就可以否定地回答自己。而对这个问题的否定答复就会直接地使議員們得出結論說，人民的利益要求召开立宪會議，而如果在召开这个會議之前将召集新的杜馬，則参加这种杜馬就只应当看成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一个阶段，看成是为立宪會議准备政治条件的一种革命工作。宣言的一切其余的内容本来都应当圍繞这个主要思想加以安排，它們本来应当从这个主要思想合乎邏輯地推导出来。

只要作出必須召开立宪會議的結論，自然就会明白，为了在实践中实现这个結論需要做什么。在这里首先应当邀請有觉悟的公民在其余的居民阶层以及——last not least^②——軍隊中大力传布这个結論。应当表明，人民有充分的可能从精神上影响同他們亲如骨肉的軍隊。应当表明，当革命的思想深入軍隊，那时就再也沒有什么东西妨碍人民的解放了，那时对付反动派就会輕而易举

① 他們說道：“政府沒有权利在沒有人民代表机关的同意下向人民征收賦稅和号召人民服兵役。因为現在，当政府解散了国家杜馬的时候，你們就有权不給政府一个士兵，一块錢”等等。这恰恰是合法性的观点。——著者注

② 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譯者注

了。当革命思想实现了这个先决的——必要的和必然的——条件时究竟应该做什么，这一点宣言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作说明。宣言的读者自己会懂得，谈论这一点时间还太早，因为“一天的难处，一天就够了”。只有当“一天的难处”是埋葬我国的——暂时还继续活着和继续为害的——旧制度时，才可能，也才应当谈论这一点。一句话，宣言本来应当说：“你们要准备好，因为时间临近了！”而且人民会听从宣言的呼声的；他们会作准备，而且他们越是更努力地作准备，时间就越会临近……

第四九四号《我们的生活报》载：“内政部已经通令整个帝国，通令在指示各省省长照例向所有的村镇和农村居民大会开读各项圣谕时，命令他们采取力所能及的一切措施使圣谕为每一个农民完全了解。”

从内政部方面说，这是很聪明的。拉萨尔说得对：“反动派的仆人不是饶舌者，但愿意进步方面有更多这样的仆人。”内政部懂得，目前冲突的结局取决于“每一个个别的农民”说什么，所以它主动采取步骤来影响“每一个个别的农民”。自由的朋友们也应当采取措施，使全体人民正确地理解当前的政治任务。现在这是最重要的。因此所有参加这个运动的那些党派为了在这个事业中互相支援本来应当立即商量好。

我们大家都承认“分开走，一起打！”这个策略公式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希望达到胜利，“一起打”是必要的。但是为了“一起打”，应当预先商量好。否则“一起打”就可能只是偶然的事情，而完全不是实现预先想好的计划。

为了通过自己的宣传“一起打”敌人，敌视我国旧制度的党派应当就这种宣传的基本思想彼此预先商量好。而在驱散杜马以后，只有立宪会议是满足人民的经济需要和一切其他需要的政治工具这个思想才可能成为这样的思想。

在第一二五号《言论报》的《论时局》一文中我读到这样的话：“关心自己的阶级利益还为时过早，必须首先保证仅仅是一纸具文

的权利所完全不能维护的**全民的事业**。”这是十分正确的。

对此只要补充一点：既然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同全民利益**根本没有任何分歧，所以无产阶级没有任何必要为了全体人民的普遍利益而忘记自己阶级的利益。

对于“劳动”农民就不能像对无产阶级一样用同样坚决的口气说这种话。他们的**阶级利益**在一定的条件下可能同**全民的利益**发生相当大的分歧。不过他们的**阶级利益**不仅不会由于召开立宪会议而受到损害，而是恰好相反，只有通过这样的会议才能多少切实有效地满足和维护这种利益。这就说明为什么“劳动”农民有觉悟的代表一定会用同情的态度对待这种会议的召开。至于杜馬中立宪民主党所代表的那些社会阶层，则有某种理由可以认为，正是由于耽心自己的“**阶级**”利益受到损害，他们将对召开立宪会议的思想持一定程度的怀疑态度。关于对应当归属农民的那些私有土地的“公平补偿”问题可能使他们感到不安。他们可能认为，在立宪会议的心目中对这些土地最公平的补偿就是根本不给补偿。不过应当承认，这种耽心不是没有根据的。正是因为这样，立宪民主党所代表的社会阶层现在应当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利益对他们更珍贵：自己的**阶级利益**呢还是**全民的利益**。他们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不愿意在这一点上作预言。只要指出一点：立宪民主党对待人民中间宣传召开立宪会议的思想的否定态度清楚地告诉所有有眼睛的人，立宪民主党人保卫**全民的利益**只有一定的范围，只是在这种利益不同他们的**阶级利益**发生冲突的场合下，而在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就会让前一种利益牺牲于后一种利益。就是因为这个道理我才认为，如果《言论报》尽可能经常地提醒自己的读者注意：“关心自己的**阶级利益**还为时过早，必须首先保证仅仅是一纸具文的权利所完全不能维护的**全民的事业**”，那它就做得很好。如果《言论报》的读者们同意这一点，那么他们一定会主张召开立宪会议，因为在当前我国的条件下，多少切实有效地“维护**全民事业**”的其他办法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的。要知道新杜馬可能像

旧杜馬一样被驅散。要知道只有**实行专制的人民**的代表才无须耽心反动佞臣們的阴谋。

这个无可爭論的真理应当向全体俄国公民解释清楚。而驅散杜馬則大大地有助于人民領会这个无可爭論的政治真理。当他們領会了这个真理时，反动佞臣們的好日子就最終地过完了。

齐心协力地、有計劃地、不倦地、广泛地在人民和軍隊中間宣传召开立宪會議的思想，乃是对驅散国家杜馬唯一适当的回答。誰在这个或那个借口下拒絕这一思想，誰就会使人明白，他实质上并没有找到适当的办法来回答斯托雷平先生之流的行动，他虽然很不乐意，还是容忍着这些行动，他只是在口头上，只是装做反对这些行动罢了。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号召人民不納稅等等的做法都无济于事。誰号召人民反抗，誰就有义务向人民說明，他們应当以什么名义进行反抗。然而維波尔格宣言的作者們是怎样向人民說明这一点的呢？他們号召人民保卫什么权利呢？他們自己清楚地知道：現时我国人民的**政治权利同政治上的无权**根本没有区别；人民有“天赋的”权利为自己夺取广泛的**写作权**，这是唯一值得人民重視的**权利**。但这些权利不是杜馬給他們的。因为杜馬的活动随时都可能由于反动佞臣們奇怪的思想而暂时中断。

业已夭折的杜馬本身是微不足道的。它的全部政治意义都取决于它是对我国人民进行政治教育的工具。抵制杜馬之所以是很大的錯誤，只是因为它不让人們利用这个武器。参加杜馬可以使人民的政治觉悟超过为我国“第一屆議會”所設置的那些极端狹隘的范围，可以使这种意識发展到立宪會議的思想。驅散杜馬应当像杜馬迄今为止的**活动**一样也成为政治上教育人民的一种武器。必須利用杜馬的驅散告訴人民：現时我国的“宪法”是根本无能为力的。然而在当前我国的条件下，只有立宪會議才能制定真正的宪法。所以說，在人民和軍隊中間宣传这个會議的思想，現在是爭取政治自由的斗争的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

这并不是說，反动派的敌人們应当抵制人們答应我們将在明年二月召集的那届杜馬。完全不是！抵制过去是、而且現在仍然是有害于人民的政治教育事业的。但是反动派的敌人們在拒絕抵制，即拒絕采取这个不适当的斗争手段时应当通过宣传立宪會議的思想来进行下届杜馬的选举工作。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参加选举对于人民的政治教育說来才会产生它能够产生的一切結果。

斯托雷平先生的政府由于人民几乎到处都对驅散杜馬采取平靜态度而欢欣鼓舞。它們对这种平靜态度高兴得濫許願言：据說我們將是自由的，而且毫无必要对杜馬感到惋惜。不过我不准备談論政府的自由主义有什么价值，这一点俄国公民們都很清楚。我要問的是：斯托雷平先生怎样想像人民对驅散杜馬可能采取什么反措施呢？他是不是期待**立即起义**呢？看来是的。但如果他当真期待起义，那他就大錯特錯了。在目前，起义也許只可能是人民憤怒的发泄，只是一种可以被当局不費气力地鎮压下去的暴动。然而**我們不需要暴动和发泄。我們需要的是胜利的革命。**而胜利的革命还应当由一系列的宣传工作和組織工作准备起来。看来連那些不久以前还把发泄一通——用我国七十年代的人們的話說——同革命的行动方式混为一談的革命者現在也懂得这个道理。現在甚至这些落后的、拥护自由的人也懂得这个道理，所以革命的事业現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巩固了。

我国无产阶级的平靜只是证明，在他們中間**自发性正在由自觉性所代替**。而这是革命成功的首要条件。

誠然，在农民中間自发性还是强烈的，因此要耽心的是一旦农民弄清楚驅散杜馬對他們意味着什么，他們就再也不会平靜了。而过早的农民爆发对革命运动的胜利将是有害的，因此自觉地参加这个运动的人有义务用一切力量暂时尽可能不去破坏使得斯托雷平先生如此高兴的那种平靜状态。

总之，如果人民的平靜使斯托雷平先生高兴，我們就要力求繼續让他高兴一下。我們要关心的是使平靜状态暂时不遭到破坏，

直到革命胜利有了保证时为止。

在第一二六号《言論报》上描繪了七月九日(旧历)这个星期天在薩馬拉省波克罗夫斯基鎮就驅散杜馬而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听众們高呼：“一定要召开立宪會議！”，而演說者們則劝告人民“等一等，看看彼得堡和莫斯科对解散杜馬說什么話，暂时散会，大家要保持平靜。”

波克罗夫斯基的演說者們建議人民保持平靜，这并不会巩固斯托雷平先生的地位，而是在削弱他的地位，所以我們需要有更多的这样的平靜。

至今还有一些大工业中心如伊凡諾沃-沃茲涅先斯克、頓涅茨基、勃良斯基，我們在那里的影响还完全不是像它本来可能有的和应当有的那么强大。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我們在宣传、鼓动和組織方面还需要做的工作是何等的多。在这些中心，黑帮分子还是强大的，換言之，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是薄弱的。提高这种觉悟是多么容易，这一点《言論报》(第一二五号)巴赫穆特的一位通訊記者所报道的下述事实就是一个证明。

这位通訊記者先生指出現在巴赫穆特县常常举行規模很大的工人集会时补充說：

“工人在群众大会上的公开往来已經产生了效果。还在不久以前，謝尔比諾夫矿場的黑帮分子和流氓无賴曾經大出风头。在迫害时期，这个矿場就为迫害分子提供了骨干力量。

“現在矿場变得无法認識了。不仅以前的流氓行为沒有了，而且相反，这个矿場的工人們自动組成了五百人的战斗队。队员們分成了两个連。每連有連长一人，小队长十人。这个队保卫着工人所有的會議和大会。在謝尔比諾夫这个地方，工人們建立了自己的‘工人人民法庭’，他們不願意同政府方面的司法机构打交道。这个人民法庭在謝尔比諾夫十分正确地發揮着作用。”

只要有計劃地进行工作，我們很快甚至可以使无产阶级最落后的阶层站到革命的旗帜下来。跟随他們而来的是农民。在这里，

只要我們工作，我們就會工作得很有功績。這是我黨全體黨員都知道的。而從同一家《言論報》的另一篇通訊中也可以看出來。

該報駐尼熱哥羅得的通訊記者在描寫社會革命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在農村中組織的群眾大會時提到農民中間進行的組織工作。

“群眾大會以後就進行組織工作。建立了有黨派色彩的特殊的農村政治俱樂部。書籍和各派的報紙都送到那裏。成立了由五到十到十五個農民組成、有一個地方甚至由四十個農民組成的小型的工作指導‘委員會’。一個鼓動員暫時就定居在這個小團體里，並且在其中進行工作。他把同情自己黨的人按十到十八人分成小組，空閒時同他們討論自己黨的綱領。這種事社會民主黨人干得特別好。農民們喜歡每十到二十人一起進行座談，從農奴制的歷史、帶有階級矛盾色彩的革命史、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無產階級的狀況、資本主義的發展開始，到土地問題、社會主義和各黨綱領簡評為止。

“小團體座談了若干次以後，農民們往往要求進行爭論。於是他們的願望就會實現。在森林的一個什麼地方，立憲民主黨人、社會革命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就會站在他們面前互相辯論。

“這一切對於我國農民具有很大的政治教育意義。在這些大會上往往可以看到婦女和姑娘。

“小團體的活動結束以後，農民們就組織黨小組，更多的是組織非黨的普通民主主義小組，並且分擔外來者的工作，他們自己作宣傳，並且在村民大會和各種人民集會上發言。

“我們知道，這些月來光講社會民主黨就在各县一百多個鄉村進行了工作。”

這已經非常好了，不過還必須做得更加好。必須使整個農民的俄國都處在我們黨的這種影響之下。做不到這一點，我們就不能勝利。反之，做到了這一點，我們就不能不勝利。

不過我們要一定勝利，還得遵守一個條件：**經常影響軍隊**。還

在一九〇五年出版的小册子《国家杜馬》中，帕·奥尔洛夫斯基同志就曾写道(第18頁)：

“让人民齐心协力地积极行动起来吧，那时士兵們就会轉到他們方面来，就会起来反对吸血鬼。”甚至輕率的帕·奥尔洛夫斯基同志本来也不該这样的輕率。軍隊已經受到了革命的宣传，但人民“齐心协力地积极行动起来”暂时毕竟还不足以使軍隊轉到他們方面来。不。尽管軍隊中革命宣传无疑取得了成功，在这里还必须进行很頑强的革命工作。我們的这个工作是能够得到有觉悟的居民阶层的帮助的。这些居民阶层会利用自己同軍隊的联系对它产生革命化的影响。而这种联系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因为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在役士兵。但是，在号召人民投入战斗以前，这个工作毕竟是需要做好的。否則我們就不是为自己服务，而是为斯托雷平先生以及他那一派的其他“自由主义者”服务。在西方，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也不会写出帕·奥尔洛夫斯基同志写过的那种話。然而在我国，他却驕傲地自詡为社会民主党內先进派别的代表。不过我希望，現在这个“先进者”本人已經沒有胆量重复他去年輕松愉快地写下的那番話了。無論如何不容怀疑的是我国无产階級有足够的健全思想恰如其分地評价帕·奥尔洛夫斯基同志的輕率。

无产階級不会在对斯托雷平先生有利的时候投入战斗。只有在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他們才会投入战斗。只有当革命的情緒控制了全体人民和相当大的一部分軍隊时，时机才是对他們自己有利的。局势显然是在朝这方面发展。需要做的工作只是使“社会”支持革命者的努力。如果“社会”像革命者一定会履行的一样来履行自己的义务，那末我們目前“共同的悲痛”变成我們共同的欢乐的泉源的那个时刻，已經不用期待很久就会到来了。

* * *

附言：这篇文章是在驅散国家杜馬的直接印象下写成的，因此也就是还在斯維阿波尔格、喀琅施塔得、达什拉加尔等地的武装起

义之前以及在很大的程度上由这些起义引起的总罢工之前写成的。关于这些起义和这次罢工的意义，我将在我的下一期《日志》中讨论。现在我暂且指出，我对它们的全部认识使我更加坚信我在这一期中所发表的那个看法，即：我们不需要发泄一通；发泄只会削弱我们；我们需要的是胜利的革命，然而要取得胜利还必须进行准备。

（译自《普列汉诺夫全集》第十五卷第 157—168 页）

关于一封信

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九〇六年八月出版的第七期《日志》上。继《分开走，一起打》之后，它再一次充分暴露了普列汉诺夫“对军官的市僧看法”。（《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403页）作者不敢对军官进行阶级分析，不敢对军官这个反动阶层做出公开的无产阶级的估计，害怕在军队中对工农出身的“士兵”进行阶级敌对思想的宣传。在整个一九〇六年里，普列汉诺夫拼命地指责布尔什维克夸大起义的技术任务，但是他自己不仅闭口不谈起义的群众根源，闭口不谈农民和无产阶级分子在起义中的作用，相反，对于“作为公民的军官”能够为革命事业提供技术指导的意义却推崇备至，在客气而又客气地“纠正”了一个自由派军官关于“士兵”和维特内閣时期的“安定性”等等的资产阶级观点以后，竟然武断地说，只有军官参加才能结束暴动，没有军官就只能毫无计划地浪费大老粗的力量！

列宁在一九〇七年四月写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一月军事和战斗代表会议的记录》一文对这种孟什维主义的言论进行了详细的批判。参看《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397—406页。

我面前摆着一个俄国军官关于我国目前形势以及关于军队中革命宣传任务的信。

把这封信交给我的那位同志慨然允许我在这里引用信中的大

部分文字。讀者可以親自看到，這封信所涉及的实际問題对于自由事业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首先我簡略地叙述一下我认为应当怎么样。

“整个俄国分成了两个陣营：解放的朋友和改良的敌人。

“长时期以来，官僚制度惊慌失措地注視着我国前所未聞的运动，并且一直处在旁观者的地位。

“俄国专制制度不过徒有其表而已，它早就只有一小撮官僚分子了。所以它終於向人民作了让步。但是这些让步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不过是許了一系列的諾言。只有实现这些諾言，立宪的俄国的新时代才会开始到来。

“这些諾言就是十月十七日宣言。宣言没有任何保证地許諾了諸如信教自由、言論自由、人身不可侵犯、集会自由和作为立法机构的人民代表机关的自由等公民权利。

“可是，这些让步中暫時还没有任何一个让步实行过和实现过。大赦（人民的第一个正当要求就是大赦旧制度下所有的蒙难者）沒有实行，而这本来就会成为政府有誠意的证据。为了实现人民代表制思想，社会要求普遍的选举权利和直接选举，而回答这个要求的是十二月七日关于扩大选举权的法律。

“这一切你們自然都清楚……而且比我更清楚。既然如此，究竟还有什么好写。因此，我且撇开国家杜馬时期、維特临时內閣时期人民的情緒不談。有一点可以說說：即这是一个比較平靜的、等待时机的时期。

“但是事变雷厉风行地发展着。政府不顾席卷全国的强大运动的浪潮而采取鎮压的行动只会加强革命运动。大炮和刺刀的威力、戒严状况、加强警备——这一切在同人民的精神作斗争时是无能为力的。它們阻止不了革命，而只会通过鮮血和尸体引起革命。在我看来：官僚制度或者会作特殊的让步，或者会继续同俄国作战。但归根到底会陷于孤立。除开一小撮人以外它沒有同盟者。这一小撮人早已向国内一切觉悟分子宣布了战争。他們所捍卫的不是

俄国的福利，而是自己的肥缺等等。

“政府的最后支柱——军队——很快就会表示自己的态度，那时一切都会完蛋，旧制度就会死亡。现在士兵中间经常发生的一切骚动明白地告诉政府说，‘我们已经不愿意为你服务了，你再也别指望我们的力量了。’如果所有的军队一下子宣布自己不愿意为官僚制度服务，那末拯救我们国家的问题早就结束了。英明的政府只能用来自上层的革命回答来自下层的革命。亚历山大一世早就说过这个思想。

“所以军队中进行鼓动的错误在于撇开军官来影响士兵。为了领导军队，而且是在特殊的条件下领导军队，需要主脑人物有本领和（主要的是）知识，需要合理地指导这支可怕的力量，而看来更重要的是需要掌握这种本领来使这些乌合之众具有高尚的精神，因为没有内心的团结，那才是真正的乌合之众哩。

“这些武装的群众在通常控制着激动的人们的那些最卑劣的感情的推动下，如果没有首领，就会在某种程度上不知不觉地变成野兽般的匪帮，他们就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扫除自己道路上的一切，一旦走入歧途，他们就会成为对社会的危害，而危害的程度则和以前社会需要他们的干预一样。

“由于疏远军官阶级，认为他们是社会不觉悟的分子，是鹰犬这样一些普遍的错误，愤怒的军队始终没有领导者。政府就利用这种情况，并且用所谓义务、荣誉、誓词等种种高尚词句来影响军官。同时那些军官看到人们像疏远鼠疫一样疏远他们，于是也就凶狠起来，并且会真正变成野兽和政府的拥护者。也许他们衷心愿意为祖国的事业服务，但是害怕和怀疑人们是否允许他们这些军官加入自由战士的行列却妨碍他们这样做。

“领导军队的不是那些同它没有任何共同点的人，就是不仅没有学会命令和控制乌合之众、就连服从也还没有学会的那些士兵中间的毛头小伙子。所以往往发生一些像阿斯哈巴德斯基事件之类的可笑事件：那里的整个驻防军几乎坚持了六天，后来再也坚

持不下去了，就向团队司令交出了主謀人，并且险些儿下跪求饒。

“目的当然已經达到，这个駐防軍清楚地证明了：一旦有事政府是不能指望它的，因为它不可靠。

“但是一半的胜利还不是胜利。这是社会和政府早就同样承认的。以前的制度还没有被彻底击潰，另一方面，革命也没有停止。

“正像河流不会跑到草原里去一样，觉醒了的人权意識也不会像奴隶一样沉默。卢比科已經过了，*alea jacta est*——再回过去已經不可能了^①。政府只会在过去的那一边寻找自己的同盟者，也只有在那里才找得到他們。一切相信国家的未来的新事物如果不是反对政府的，那末无论如何也不会是拥护政府的。

“事件不断地发生。很难預料，現時为旧制度的捍卫者过分的热心所刺激的溫和派不会主动前进，而且迟些时候，当他們懂得自己的論点錯誤以后不会要求为祖国造福的那些权利。

“只要更用力地呐喊，立即就会从所有方面得到反应；应当促使軍事长官站到自己方面来，那时整个团队在自己的軍官的领导下都会投入爭取俄国的幸福和福利的战斗。为什么要重犯錯誤呢？要知道每一个士兵也都是人民的儿子，他只有或者由于恐惧或者由于在同志們面前感到羞耻才会沉默。而要消灭这种感情，我敢担保，誰也不能像他的长官那样迅速、那样好地做到这点。要知道如果一个士兵同人民联系，其实他就是用一道墙，用一个巨大的障碍物同人民隔离开来。应当創造条件让受到侮辱的軍官們积极参加爭取幸福的斗争。不应当凌辱和激怒他們。

“我之所以就这个問題写了許多話，因为我自己是軍官，我深深地觉得自己受到可耻的凌辱。”

这里有某些地方是不确切的。例如，不能把維特內閣时期称

① 卢比科是古代河流的名称，流入亚得里亚海，公元前四十九年凱撒不願元老院禁令，率领自己的軍团渡过該河，并且高呼“*alea jacta est*”，于是內战因此而起，結果凱撒占领了羅馬。成語“卢比科已經过了”意指采取了决定性的步骤，相当于我国所謂“破釜沉舟”、“做了过河卒子，只得拼命向前”。——譯者注

做平靜的。但这是不关重要的細節。重要的是这位可尊敬的写信人一般說来不但正确地而且清晰地描写了目前的形势。他把我国官僚制度的政策称为同俄国的战争。这种說法是十分恰当的。官僚制度实际上在同我們的祖国进行殘酷的战争，而俄国的公民們可能会說（正像莫斯科国家的居民們当年在自己的呈文中說过的一样），官僚制度的侵襲“比土耳其人和韃靼人更加厉害地”使他們感到痛苦。現在，官僚制度在同俄国的这场战争中**最主要的是依靠军队**。信的作者公正地說，“如果所有的军队一下子宣布自己不願意为官僚制度服务，那么拯救我們国家的問題早就結束了。”但是期待所有的军队，期待整个的军队都发表类似的声明，自然是不可能的。第一，军队中永远有一些决意“凭良心”同俄国作战的分子。信的作者也許在《轉变报》上讀过第一百二十号《二十世紀》上也轉載了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說，近卫重騎兵团的軍官先生們怎样折磨了阿·斯·斯米尔諾娃，因为她对(旧历七月二十八日)通过謝尔基也夫街的該团部队的过分愉快的情緒作了諷刺性的批評。近卫重騎兵团的一个軍官逮捕了斯米尔諾娃女士，并且把她解到在查哈利也夫街集会的軍官們那里。人們立即給了她一頓粗野的辱罵。接着又用暴力把她带到了警卫室。随后，——这个受害者的兄弟在報紙上公布軍官們的这种豪迈的伟大行为时叙述說，——“在那里，根据公爵^①的命令，七个士兵用短鞭子抽了我姊妹二十五下，打得她流血受伤，背上青肿多处。后来人們連赶帶罵地把她撵走了。”^②不用說，殘忍地虐待斯米尔諾娃女士的近卫重騎兵团的紳士們始終都会是官僚制度在反对俄国的战争中的可靠的支柱。这些 *chevaliers sans peur ni reproche*^③ 不会接受……“黑

① 看来是指团长。——著者注

② 从第二十五号《同志报》上可以看出，“公爵”曾經命令鋪上千草，并且建議开来的士兵“享用一下女郎”，但是士兵們拒絕了。居心惡毒的貴族！高尚的战士！——著者注

③ 見义勇为的騎士。——譯者注

帮分子的政策”以外的任何政策。遺憾的是这些見义勇为的騎士不只在一個近衛重騎兵团里存在。不过我深信，在近衛軍人如此輕視的“广大陸軍”中，这种騎士的百分比要少得多。第二，軍隊中即使可能形成自己的輿論，也决不会有一個机关能够成为这种輿論的表达者。但是为了使我們的国家摆脱官僚制度可耻的沉重枷鎖，为了拯救俄国，并不需要等待軍隊一致的声明，像信的作者所說的那樣。只要某一部分軍人(数目大到什么程度視情况而定)热烈地同情自由就行了。而数目頗大的一部分軍人是会拒絕参加官僚制度同俄国的战争的，这一点絕對不能怀疑。否則就只好對我們的祖国不再抱什么希望了……

用信作者的話說，政府用“所謂义务、荣誉、誓詞等等”的高尚詞句影响軍官。凡是熟悉我国軍事生活方式的人都知道这是事实。当軍官内心产生敌視专制制度的情緒的时候，他通常都要經歷一幕内心痛苦的悲剧，因为他相信荣誉和誓詞禁止他为自由服务。不过这个信念沒有任何严正根据。如果它在我国軍官界流传得这样广泛，那是因为軍官界对政府所謂义务和光荣的“高尚詞句”采取了毫无批判的态度。

只要稍微分析一下这些詞句的内容就会相信它們是絕對站不住脚的。

义务和荣誉是伟大的东西。背叛自己的义务和丧失荣誉感的人应当受到最大的鄙視，無論他穿戴的是什么——工作短衫、“普通”便服还是軍裝。但問題在于应当怎样理解义务和荣誉。这个問題正是在这个值得我們注意的場合下特別容易解决。試申言之。

如果信的作者說我国官僚制度在同俄国进行战争是正确的，那么关于軍人的义务和荣誉的問題就已經解决了。义务和荣誉禁止他們参加这场罪恶的和可耻的战争。我国官僚制度自然坚信，俄国軍隊的存在正是为了同俄国作战。但是軍官先生們沒有义务支持它的这个信念。相反，他們有义务不支持这个信念。誠然，他們宣誓要为政府服务。但他們也宣誓要为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祖

国服务。如果政府的利益同祖国的利益发生矛盾，那又怎样呢？“根据荣誉和誓词的要求”军人应当站在哪一边呢？站在哪一边是很明显的！耶稣说过：“人不是为安息日而生的，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的。”同样应该说，国家不是为政府而存在的，政府是为国家而存在的。所以如果政府同国家进行战争，则政府就会变成犯罪的组织，变成匪帮，变成内部的敌人，所有思想健全的公民，首先是国家为了自卫而出钱武装起来的那些人，就应当奋起反对这个敌人。俄国现在正经历着这样的时刻。也正是因为这样，军人在道义上有义务对政府以荣誉和誓词的名义向他们提出的要求进行严格的批判的审查。可惜至今只有他们中间的少数人履行了这个义务。但是事变是不等人的。各处都在流血。破了产的和受到残酷压迫的国家在痛苦地呻吟。因此可以指望，按其职业本身就有保卫国家的义务的那些人都奋发起来保卫国家的时代，已经为期不远了。

我知道，在各个部队里都可以找到一些同情谢苗诺夫团和近卫重骑兵团御用军人伟大行为的先生。因此我才说，整个军队是不会反对政府的。但是我又知道，在各部队里可以找到许许多多正直的人，他们——用雷列耶夫的说法——不愿意在决定性的时刻玷辱公民的称号。这才是我们国家战胜同它斗争的政府所需要的。军事组织有计划的共同努力同“自由”战士争取自由的行动密切配合起来，将非常迅速地结束政府的抢劫行为。

看来信的作者很好地懂得军事组织的意义和军官们在这些组织中本来能起的和本来应该起的那种领导作用。他指出我们的错误在于宣传员撇开军官来影响士兵，他抱怨一些在为自由而斗争的党忽视军官阶层，抱怨“认为他们是社会不觉悟的分子，是鹰犬”。这个抱怨作为一种征兆来说使我感到高兴。它表明，我国军官阶层的有思想的代表人物由于政府强迫他们扮演“鹰犬”角色而感到苦恼，并且迫不及待地力求同新政治制度的拥护者们接近。然而我不认为这种抱怨是有根据的。也许在以前，专制制度的敌人没有清楚认识到，为了自己事业的胜利，他们是多么需要军官

的同情。但是現在所有的人都懂得这种同情具有极大的重要意义。至于說軍官是鷹犬这种看法，那末这里必須区别两件事：第一，軍官阶层**可能**是什么这个看法本身；第二，有时在大家知道的那些令人伤心的、然而不幸是經常不断发生的事件影响下人們过去和現在对这个阶层所下的那些判断。在我們的社会里大概沒有人真正持这样一种显然是沒有根据的看法：即认为在軍官的制服下跳动的心臟不可能热爱自由。誰不記得十二月党人呢？誰不紀念他們呢？其实他們中間“非軍人”却是微乎其微的例外！但是，当我国軍隊所制造的血案染紅我国城市的街道的时候，当这些“篤信基督教的軍人”使我国的村鎮和农村彻底破产，使那里的居民遭受空前未有的痛苦的时候，人們对軍官提出了許多最严重的抗議和最严厉的譴責。在这种情况下，人們凭着一时的印象，有时完全忘記了：不能认为**所有的**軍官都是同变成自己祖国的劊子手的那些軍人一致的。但是只要信的作者仔細想一想比方軍隊的“討伐”远征所造成的局面，那时他自己就会同意，对这样一些远征所提出的抗議和譴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和非常自然的。在我国的反犹太暴行的时代，軍隊——**因此也就是軍官**——的这些暴行起着“掩护”凶暴的酒气醺醺的流氓无賴的作用！这些暴行使人們有理由作出許多最不利于我国軍官阶层的判断。但是在这个情况下，下这样的判断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只有在**作为公民的**軍官的解放活动使人忘記**作为御用軍人的**軍官和**作为流氓无賴的**軍官的可耻行徑以后，它們才不会存在。但是無論怎么样，无可爭論的是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提出“凌辱和激怒”軍官作为目的，每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会尽他的能力所及，“創造条件让受到侮辱的軍官积极参加爭取幸福的斗争”。我願意承认，由于一些如果加以考察就会使我們离題太远的原因，到現在为止，我們在士兵中間进行的工作比在軍官中間多一些。^①我也承认，要使我們的軍事組織正确地进行活

① 而且我們在士兵中間的工作迄今为止并不是有計劃的。我們的人把主要的注意都放在掌握特种武器的士兵身上，如炮兵、工兵等等，而对于步兵則很少注

动，绝对必须吸引军官参加。如果——像《新时报》不久前指出过的——我国军人的暴动像演戏一样轻而易举地受到镇压，则这种情况在颇大程度上是由于起义的士兵没有得到军官们必要的支持。我甚至认为，只有军官参加军事组织才能结束这些毫无计划地和徒劳无益地消耗革命所必需的力量的暴动。^②所以我要请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注意信的作者所指出的这个大错误。不过即使如此，我还应该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修正意见。我觉得信的作者对“乌合之众”的看法是过于阴暗了。

他说：“这些武装的群众在通常控制着激动的人们的那些最卑劣的感情的推动下，如果没有首领，就会在某种程度上不知不觉地变成野兽般的匪帮，他们就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扫除自己道路上的一切。”

不用争辩，首领是必要的。但是激动的人们远不总是由卑劣的感情控制的。我认为例如《波将金》号上起义的水兵心灵里充满的感情就值得高度的赞美。这些水兵真诚地向往自由，他们不仅决不惨无人道地蹂躏“自由的”人们，而且十分努力地——最努力不过地——摈弃了一切可能这样或那样损害居民利益的事物。不错，那些波将金人打死了自己的某些军官。然而是谁迫使他们这样做呢？一个军官。同样不错，“暴动的”士兵中间个别的一些人的行为有时往往是很残酷的。不久以前，《新时报》就曾愤怒地大肆攻击杀死军官符罗钦斯基的老母亲的行为（在喀琅施塔得）。这家卖身投靠的机关报把杀人者险些儿描绘成吃人的生番。而且它似乎是正确的。但是它忘记了问一问杀害符罗钦斯基高年的母亲的那些士兵同她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恩怨。比起长官本人来，一个

意。不过目前步兵将会反对我们，直到我们对胜利的预计不再有任何根据时为止。在这里我们也有错误。几个月以前一位做过步兵军官的同志曾提醒我注意这个错误。叶尼塞人在喀琅施塔得所起的作用再一次向我表明，这位同志是对的。——著者注

② 我们上届代表大会的决议就注意到军事组织的活动必须同革命运动一般的进程和任务取得一致。——著者注

士兵常常更受长官的妻子和母亲的欺负。这一点信的作者知道得自然不比我差。我了解，残酷性毕竟是残酷性。但是不幸——很大的、极大的不幸！——也就在于：在目前情况下这种残酷性有时是免不了的，而且这种不可避免的情况并非士兵的过错。现在的阴森可怕的农奴制压迫着士兵。他的财物被窃夺，他的行动受管制，他的个人尊严处处受到严重的侮辱。士兵长期地忍耐着。而当他终于起来反抗时，结果就如常言所说，委屈和愤怒使他忘记了一切。关于这一点《新时报》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告诉我们什么东西。然而在判断起义的士兵的行为时这是应该记住的。同样也应当记住，把俄国的士兵和水兵控制在自己严密统治下的农奴制，现在比“旧日黄金时代”更难使他们屈服了。士兵和水兵现在已经不是过去那样的人了。人类尊严的意识已经在他们身上觉醒了。谁有这样的意识，他就根本不能容忍我国的士兵不得不忍受的那些屈辱。信的作者知道我国的士兵过的是什么生活。他可以设想一下，他本人曾经体验过士兵们不得不忍受的那一切侮辱。他可以把手捋在良心上说，他是不是相信他会永远保持镇静，而不会产生不可遏制的怒火。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农奴制总是要引起血腥的报复。这不光只是俄国如此。

波克罗夫斯基博士不久前在《军人之声》上写道，“由于种种情况，士兵们的神经大大地受到了损伤”。我觉得，神经受损伤对于起义的士兵变得残酷不起决定作用。为什么他的神经会受损伤呢？部分是因为俄国生活的一般条件。部分是因为我所指出的士兵的那种极端痛苦和屈辱的处境。而且这种处境，归根到底自然还是由那些一般条件决定的。士兵在上级的种种压迫下越是没有人自尊重感，他的神经就越受损伤。而提高士兵的自尊心同时也是反对“卑劣的感情”的最好的保证。

我这样说，唯一的原因是我有点耽心，信的作者不是用现在已经不可能这样看待士兵的那种态度看待士兵，因为现在的士兵已经进步得不能跟过去同日而语了。甚至那些和“好动手打人的上

司”毫无共同点的、正直的和主张自由思想的軍官，有时也喜欢依照頑固的老习惯把士兵看成是完全沒有觉悟的群众。但士兵是人民的儿子。觉悟深入民間以后，也会深入到士兵队伍里去。这种情况同样会大大促进作为公民的軍官对士兵的影响，那就不用多說了。

不过，也許我沒有好好地理解信的作者。那样就更好了：那时我們就更容易談通了。而談通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这一点不待說就可以知道。官僚制度同我們祖國的罪恶战争拖延得已經太久了，这个罪恶的战争使它付出的代价也太高了！

如果这位尊敬的信的作者願意对我提出一些意見或异議，他可以相信，我将十二分滿意地把它們登載在自己的《日志》上。同作为公民的軍官直接交流思想，我觉得很愉快。其次我认为，对于这样一些軍官說来，早就該断然說出自己的主张，并且积极参加与軍隊中的宣传工作有关的一切問題的討論。这方面，他們也是內行。

（譯自《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十五卷第 176—185 頁）

簡 复

(摘 譯)

这篇《簡复》登在第七期《社会民主党人日志》上。它暴露了普列汉諾夫对列宁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統一代表大会的报告》和布尔什維克提出的召开第五次党代表大会的主张的敌視态度。

.....

答复把列宁論我党代表大会的“报告”^①送給我的同志們。我的确沒有这个“报告”。謝謝。你們认为列宁对代表大会上所进行的討論可能作了完全錯誤的解释，这当然是对的。在下一期《日志》中我要拿几个明显的例子來說明这一点。此刻由于时间和篇幅都不够我不能做这个工作。但是难道会有讀者受这个惊人的报告的影响么？

我要用两句話說明我对举行新的代表大会是否适宜的看法。現在召开新的代表大会无异于最无益地、甚至是最有罪地浪费党的經費和时间。但是列宁不这样看。他想到：为什么不召开新的代表大会呢？假使我仍然居于少数派地位，我什么也不会丧失，假使多数人站在我这一边，我就会贏得很多东西，而且还会得到如此渴望的指揮棒。所以他全力以赴。无产阶级的利益在这里是根本不考虑的。因此，工人应当憤怒地拒絕过早召开代表大会的任何企图；这是知識分子的淘气行为。

(譯自《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十五卷第 188 頁)

① 指《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統一代表大会的报告》，參看《列宁全集》第十卷第 286—351 頁。——譯者注

曼海姆

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九〇六年第九——十期《现代生活》杂志上，是作者宣揚他的工会中立論的主要著作之一。列宁在《施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沃伊諾夫（安·瓦 卢那察尔斯基）論党同工会的关系一书的序言》以及《工会的中立》等文章（均載《列宁全集》第十三卷）中，詳細地批判了普列汉諾夫的观点。

代表大会也像书籍、像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样，有“自己的命运”。而且它們的命运，也像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命运一样，的确常常是令人惊异的。就拿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來說吧。这个党的右翼即所謂修正主义者說，他們在曼海姆取得了对馬克思主义者的胜利。各国資产階級报刊也支持他們的这个意見。但是，就像本可預料到的一样，資产階級政論家們走得比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远得多。如果相信这些政論家現在說的話，那就可能认为全世界的社会民主党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曼海姆公开承认了自己的軟弱无能，和坚决拒絕了自己以前的策略。某些极其“庄重的”报纸，比方《时代报》，在这种場合下就走到直接歪曲曼海姆代表大会的決議的地步。然而就連那些热情沒有發揮到这种极致境界的資产階級机关报，也还是完全錯誤地解释了曼海姆所通过的決議。虽然有例外的情况，但那也是十分罕見的，它們只是证实着一般的規則。而且这是根本不会使人觉得奇怪的。非常自然，資产階級不会懂得有觉悟的无产階級的領袖引为指南的那些見解。其所以这样，正是因为它是資产階級。然而如果这一

次它又成功地——正像它时常（遺憾得很）成功地做到这点的一样——在反对資產階級的人們的头脑中造成混乱，那是极其有害的。所以我认为必須在这里談一談曼海姆代表大會的某些決議。

大家知道，这次代表大會的“关键”是关于总罢工的問題，而这个問題本身又和社会民主党同工会的关系問題紧密联系着。这两个問題我在本文中都要加以分析，不过由于叙述过程本身出現的原因，我且从第二个問題讲起。

—

党同工会的关系应当是怎样的呢？这个問題，人們用各种不同的語言写了很多和說了很多。但是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对此至今仍然有不少錯誤的观念。在曼海姆討論这个題目时所引起的辯論再一次說明了这种情况。从辯論中可以看出，在这种場合下甚至某些馬克思主义者对自己导师的思想也是弄得不够清楚的。我們首先且来溫习一下这个思想。

有些人以为，馬克思主义从邏輯上讲最后是輕視工会的。就在曼海姆，比利时人安賽尔——一个著名的“机会主义者”，但是他的活动有很多革命的內容——在表示自己对代表大會的情緒感到滿意时曾經对我說过：“讓我們首先把工人群众組織起来，然后馬克思主义者再去向他們进行宣传。”而当我反駁他說，馬克思主义者之重視組織群众并不逊于他的同志們，因为在馬克思主义者看来，沒有群众也就沒有社会主义运动。这时他感到奇怪：«alors, nous sommes d'accord!»（“这么說，我們之間一致了！”）——他滿意地喊道。看来安賽尔忘記了，早在自己的《哲学的貧困》中，馬克思在駁斥蒲魯东时就热烈地坚持过工人的工会組織。

他在那里針對当时的、也包括蒲魯东在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說道：“經濟学家和社会主义者一致譴責工人同盟……但是，不管什么經濟学家和社会主义者，不管什么教科书和烏托邦，同盟片刻不停地随着現代工业的发展和成长而日益进步和扩大。現在甚至

可以說，同盟在一國內的發展程度可以確切地表明該國在世界市場等級中所占的地位。工業最發達的英國就有最大的而且也組織得最好的同盟。”^①

接着他指出工會產生的歷史必然性。

“大工業把大批互不相識的人們聚集起來。競爭把他們的利害關係分開。但是維護工資不致下跌這一对付老板的共同利益，使他們在同一个反抗思想即組織同盟下聯合起來。因此，同盟總是具有雙重目的：停止工人之間的競爭，以便能夠同心協力地同資本家競爭。如果反抗的最初目的只是為了維護工資，那末後來，隨着資本家本身在壓制工人的思想的基礎上而實行聯合，這些工人的孤立的同盟就組成爲集團，並且面對着始終聯合的資本，維護聯盟對於他們說來就變得比維護工資不致下跌更爲必要了。這在何種程度上是正確的，下面的事實可作說明：使英國經濟學家異常吃驚的是，工人們獻出相當大一部分工資支援這些經濟學家認爲是單只爲了工資而建立的聯盟。在這一鬥爭（真正的內戰）中，未來戰鬥的一切要素在聚集和發展着。達到這一點，同盟就具有政治性質。”^②

在《共產黨宣言》中，我們遇到完全相同的對於工會組織的觀點。

那里說道：“無產階級經歷了各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它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是從它開始存在的那一天開始的。

“最初是個別的工人，然後是某一工廠的工人，然後是某一地方某一工業部門的工人，同直接剝削他們的個別資產者作鬥爭。他們攻擊的對象不僅是資產階級的生產條件，並且是勞動工具本身；他們搗毀機器，毀壞那些通過競爭奪去他們的工資的外國商品，燒毀工廠；他們力圖支持趨於沒落的中世紀工人的地位。

“在這個發展階段上，工人們還是分散在全國各處並爲競爭所

^①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 194—195 頁。——譯者注

^② 參看同上，第 196 頁。——譯者注

分裂的群众。这时候，工人群众的运动还不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联合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所造成的，这个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应当而且也还能够把整个工人阶级发动起来。因此，在这个阶段上，工人们并不是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而是打击自己敌人的敌人，即打击专制君主制度的余孽、地主、非工业资产阶级和中等阶层的下层代表。因此，这时的全部历史运动都操在资产阶级手里；每一个成功地取得的胜利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

“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为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在增加，它愈来愈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工人们的利益和生活状况也愈来愈趋于一致，同时机器生产使一切劳动部门之间的差别愈来愈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企业主彼此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工业危机，使工资愈来愈不稳定；机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生活地位愈来愈没有保障；个别工人同个别资本家之间的冲突愈来愈具有两个社会阶级的冲突的性质。工人们开始举行罢工来进行反对资产者的共同斗争；他们联合起来保卫他们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了可以在积极斗争的时候支持他们的一些经常性的团体。有些地方，这个斗争转变成为公开的起义。

“工人们有时也会成为胜利者，但是为时不长。他们斗争的重要结果并不是直接的成功，而是工人的愈来愈扩大的团结。促进这种团结的，是由大工业的发展所造成的交通工具的改进，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

“只是由于这种联系，才必须把个别地区的工人们所进行的、到处都具有同一性质的斗争变成整个民族的阶级斗争了。而每一种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①

这种对待工会在现代无产阶级运动史上的作用的观点，在我们这里产生了很大的和有害的误解，这种误解成了我国所谓经济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474—475页。——译者注

主义者一切理論論断的基础。我所引证的这几段話就被这些“經濟主义者”解释成这样的意思：社会主义者只有在无产階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才应当开始，也才可能开始政治斗争。从这里就产生了臭名昭著的“阶段理論”。在小册子《論鼓动》中这个理論差点儿沒有用《共产党宣言》的原話来叙述。因此，当时我們的絕大多数同志都把它当作最无可怀疑的、最真实的馬克思主义加以接受。然而在这里恰恰发生了很大的誤会。

“阶段理論”本身中包含了馬克思思想的一部分；但只是它的一部分，而且因此是对整个这一思想的歪曲。在“阶段理論”中仍然完全沒有說明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同馬克思在上述著作中所描写的工人階級的運動的关系应当是怎样的。其次，这个理論完全沒有給上述党派的活动留下地位。它的根本缺点也就在这里。而且由于它的这个缺点，全心全意献身于无产階級事业的人們在它的影响下可能跟在小資产階級左翼思想家的后面重复說：“工人运动的胜利并不需要社会民主党存在”。而正是因为这些人重复了这个极其錯誤的思想，他們就不自觉地完全抛弃了他們希望牢牢地依靠的那个馬克思主义的基础。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章中說明过党同階級的关系。

在那里我們讀到：“共产党人并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們沒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們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者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他工人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民族无产者的运动中，共产党人強調和坚持整个无产階級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者反对資产階級的斗争所經歷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終捍卫着整个运动的共同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世界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永远力求前进的部分；在理論方面，他們比其余的无产階級群众

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工人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的工人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即使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①

在这里，初看起来或许也可能觉得《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们是反对建立特殊的共产党的——用现在的术语说即社会民主党。看来他们也这样说：共产党人并不是一个特殊政党。但是如果这样，那么为什么我引证的他们的名著叫做《共产党宣言》呢？显然，事情在这里并不像初看起来那么简单。当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共产党人不是特殊的政党时，“特殊的”这个形容词应当理解为**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意义，像同一句话末尾所表明的那样。

这种**对立性**过去是不存在的，也不可能存在，因为其他的工人政党也或多或少广泛地，或多或少充分地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②，而共产党人——再说一遍，用现在的术语就等于：社会民主党人——“并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但是如果共产党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那么它毕竟同它们**有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它就是：“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捍卫着整个运动的共同利益”，因此他们是“最坚决的、永远力求前进的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因此，要探求的关系，原来是**先进部队同其余的军队的关系**，这支军队的一些个别部分——即“其他的工人政党”以及一般的组织——本身能够以不同的速度前进。然而现在应当记住，这是特殊的先进部队，所谓特殊是同军队的所有其他部分比较而言，即同“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比较而言，——它“善于了解工人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它集中地表现出**这个运动的指导思想**。这就使它承担着特殊的义务，正确地履行这些义务对于整个运动的过程和结局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领导思想的代表者自然应当起**领导者的作用**。不过工人阶级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479页。——译者注

② 例如英国的宪章运动。——著者注

不是把“指揮棒”交給某个人物或某个集团——即交給某个“专政者或委员会”——并且靠着党章中一些多少有威胁性的条文来維持自己队伍中的紀律的阴谋家的秘密团体。领导工人阶级的并不是形式上被賦予领导者的权力的人，而是对它的思想获得实际影响的人。究竟誰对它具有实际影响呢？归根到底就是比其他人看得更清楚和更远的那种人，就是其“意識”更明白和更充分地反映着“存在”发展进程的那种人。我們已經知道，在社会民主党人的头脑中最明白和最充分地反映着“存在”发展的进程。因此，社会民主党人也应当力求对无产阶级思想获得具有指导意义的影响。他們怎么能够对它的思想获得这种影响呢？那就是像一个好教导师一样，通过促进自己的学生**本身觉悟**的提高来获得对学生的思想影响。因此，社会民主党——即“共产党”——也应当力求**通过促进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提高**来获得对无产阶级的影响。党的最主要的任务就在这里。

不用說，这一任务的解决会有助于尽可能广泛地**組織无产阶级的力量**。但是無論这个第二項任务多么重要，它的解决也必須从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第一項任务的观点来评价：**阻碍提高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組織**应当受到社会民主党人坚决的排斥。

二

上面所說的話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

在《**哲学的貧困**》中，馬克思說道：

“經濟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工人。資本的統治为这批人創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資本說来已經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們仅仅談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逐漸团結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們所維持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①

^①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196頁。——譯者注

总之，最初无产阶级是“自在的阶级”；它的利益同剥削者的利益是对立的，但它还没有意识到这种对立性的全部广度和深度。斗争提高它的觉悟，使它变成“自为的阶级”。而随着它之变成“自为的阶级”，它的斗争就获得了政治性质。在这里工人政党的作用就在于它利用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力量和一切手段来促进这一提高无产阶级觉悟的过程，促进这一使“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使经济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的过程。

本质上热衷于使无产阶级的觉悟仍然处于不高的状态的剥削者，力图阻碍这一转变过程。各式各样的剥削者党派因此加入同力求获得对工人思想的影响的工人政党的斗争。而这个维护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斗争本身是具有政治性质的。这不是说，斗争的直接对象是政治权利或政治权力，而是说，提高工人觉悟的斗争会创造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治权利和政治权力所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虽然作为整个阶级的无产阶级斗争只有在在自己发展的后期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如果不是最后阶段）上才会变成政治斗争，但是作为无产阶级先进部队、负有提高整个这一阶级的政治觉悟的责任的工人政党的斗争，一开始就应当成为政治斗争。我们的“经济主义者”不懂得这个道理，因此他们说过，政治斗争在俄国暂时还不适宜。他们的根本错误——再说一遍——就在于他们根本不清楚党同它所代表的阶级的关系应当是怎样的。由于这一错误，他们就看不到社会民主党存在的必要性。

“经济主义者”说过：我们只应当超过工人群众一步。但是我们同群众之间的距离难道是由我们决定的吗？如果工人政党很好地了解“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而工人阶级的其余部分还根本不了解这一点，那末这个党同工人阶级其余部分的距离就有很多“步”^①。自然，这在许多方面是尴尬的。但是怎样解决这个

① 这里自然是拿只有假设中才可能有的极端场合说的。但是其所以拿这样的场合来说，正是因为它特别明显地说明了应当在现实中建立怎样一种党和阶级之间的关系。——著者注

困难呢？其他的办法是沒有的，应当帮助群众尽可能迅速地走完这些步。而为了帮助他们花费最小的力量和时间走完这些步，必須十分明白地在自己面前提出自己的**最終目的**。人們通常力图用群众还没有成熟到理解这个目的的理由加以辯护的、对待这个目的的漠不关心的态度，乃是同叛变只有一綫之隔的机会主义。最終目的越是从我們自己的視野内消失，要促进无产階級从“自在的階級”变为“自为的階級”的过程对于我們說来就会变得更加困难。至于我国的“經濟主义者”在对待现代工人运动的最終目的、而因此一般說来也就是对待社会民主党綱領的漠不关心的态度上犯了极大的罪过，这一点我在小册子《Vademecum》^①中所发表的大批材料清楚地說明了。

我們且放下經濟主义者。他們只有作为清楚地說明我的思想的例子才是我所需要的。現在，当这一思想看来已为讀者所明了的时候，就該运用它来解决德国同志們在曼海姆有所爭論的那些問題。

除社会民主党以外，德国現在沒有任何工人政党，但是德国現在有很多强大的和发展极为迅速的**工会**。社会民主党究竟应当怎样对待工会呢？

馬克思曾經主张**工会中立**。^②这也是容易明白的。如果社会民主党必須促使无产階級从不自觉的階級变成自觉的階級，那它就不能要求作为整个階級的无产階級立即让自己掌握它的綱領。为了掌握这个綱領，換言之，为了理解工人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結果，应当达到非常高的发展水平，这种水平起先只有个别的**集团**才能达到，而后无产階級的个别**阶层**才逐个地达到。其余絕大

① 《指南》。按指《供〈工人事业〉編輯部参考的〈Vademecum〉序言》一文。这篇文章收在《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十二卷第3—42頁上。——譯者注

② 請讀者注意，有各式各样的中立。馬克思对工会中立的看法完全不像資产階級經濟学家和政治家那样。这一点，不仅我們俄国許多人忘記了，就是在国外，特别是在保加利亚，也有許多人忘記了。——著者注

部分的无产階級在长时期內仍然是远远落后的。但是无产階級这个极大的、多少落后的部分不能不同所有的剝削者进行斗争，而且他們的这一斗争，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正在提高他們的階級覺悟。工会就是这个斗争的产物，也是斗争的一种工具。因此，社会民主党有义务支持工会，在工会會員中間进行积极的宣传工作，但絕對不要强迫他們接受自己的綱領。这种强迫的作法会大大地縮小工会运动的規模，也就是說，会妨碍工人进入馬克思所說的那种最能够培养工人去完全掌握社会党人的綱領的“社会主义学校”。^①而这就意味着社会民主党人用不理智的热情阻碍自己的思想的传播，即給解决自身的任务造成困难。

不是意識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識。在这个意义上，——而且自然只是在这个意义上——，馬克思才說，工人运动发展中的一个步驟比整整一打綱領更重要^②。正如我在另一个地方已經說明过的，这完全不等于說馬克思认为綱領沒有意义，恰恰相反，他认为綱領是提高階級覺悟的很重要的因素。但是只有当綱領加强对生活的革命化影响的时候，它才是这样的因素，而当它削弱这种影响时就不是这样的因素了。强迫工会接受社会主义綱領恰恰会削弱这种影响，使一部分工人反对社会主义。因此馬克思才主张这些工会中立。

馬克思在国际中的活动告訴我們，他善于用怎样无与伦比的圓通手段对待向之宣传自己的思想的无产階級。在这种活动中，

① 英国和美国的例子仿佛与此相反，在那里工人的工会很强大而社会主义运动則比較軟弱。但是这两个国家过去一直处在，而且現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处在决定两国无产階級思想落后的特殊的經濟状态下。至于美国，甚至維尔涅尔·桑巴特先生也承认这一点。他說，阻碍这个国家中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切因素現在都正在消失，或者正在变成自身的对立面，因此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期待社会主义将在美国广泛地发展起来。（参看他的《Warum gibt es keinen Sozialismus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为什么美国沒有社会主义？》——譯者注）一书，图宾根，一九〇六年第141—142頁）。——著者注

② 参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14頁。——譯者注

他同强迫工人接受自己的社会主义观点的作法相距得再远不过了。如果拿国际工人协会的綱領(“規章”^①)同《共产党宣言》中所发表的綱領比較一下,把这个宣言同国际的第一篇宣言比較一下,也許可能以为馬克思在六十年代初期比一八四八年要“溫和”一些。某些資產階級思想家大概也有这样的想法。并且不止一些資產階級思想家而已。巴枯宁和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布朗基主义者,也认为他的策略是机会主义的表现;区别仅仅在于資產階級著作家贊同这个所謂的机会主义,而革命的空想主义者們則譴責它。我想,无需乎证明上世紀六十年代的馬克思仍然是像四十年代一样的同一个馬克思。变化不是发生在他身上,而是发生在他不得不在其中进行活动的那些**社会政治条件**方面。在六十年代,他以为可以对世界无产階級比較广泛的阶层发生思想影响,这在以前还是他完全做不到的。也就是这种情况曾經使得馬克思开始用另一种語言說話。在《規章》和国际的第一篇宣言中,他只暗示了他在一八四八年明白而且坚决地表示过的观点。他不願意,而且也不能够以一个笨拙頑固地坚持自己学說的每一个**字母**的宗派主义者的姿态出现在“全世界无产者”面前。对于他說来,重要的是用学說的精神教育工人的思想。他在自己的六十年代的各种杰出的政論著作中所采取的那种謹慎的叙述手法更好多地达到了这个目的。直率地說,他不願意吓退工人;他估計到了当时先进国家无产階級的机会主义情緒。也正因为这样,他才使自己更容易同机会主义作斗争。

看起来这可能是奇談怪論。但是,早就該懂得机会主义不是某种片面的、一成不变的东西了。例如說,工人的机会主义是一回事,“知識分子”的机会主义又是一回事。工人(我指的是聰明的工人)之接受机会主义,主要是因为还没有看到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的**階級利益的对立性的全部深刻程度**。知識分子(我指的

^① 按指《国际工人协会規章》,參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363—366頁。——譯者注

是聪明的知識分子)之成为机会主义者,主要是因为看見这种对立性的全部深刻程度而本能地耽心它的社会政治后果。一种人仍然是可能性上的(“自在的”)急进派;另一种人只在自己身上保存着一种可能性,即进一步向后运动的可能性。社会民主党人必須寬恕前一种人;他必須同后一种人斗争到“最后一口气”。社会民主党人对待还没有意識到自己的阶级地位的工人的机会主义的温和态度将有助于使机会主义的无产者变成急进主义的无产者;社会民主党人对待“知識分子”的机会主义的温和态度只会加强这个后者对工人的影响,从而延緩他們的阶级觉悟的提高。無論这里或那里都是机会主义,但那里的机会主义具有完全不同于这里的机会主义的另一种本性,因此在这里对待它的态度应当完全不同于那里。过去馬克思就是这样做的,現在德国的馬克思主义者也是这样做的。德累斯登代表大会从一方面证明了这一点,曼海姆代表大会又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这一点。

三

不过关于这一点下面再談。現在我們且看一看我以上所說的話在何种程度上有助于解决社会民主党同工会的关系問題。

在曼海姆的九月二十六日(新历)會議上,大卫反对所謂“工会是手段,而社会民主党則是目的”的那种意見。他說:作为政党來說,社会民主党也只是手段。这是完全正确的,不过这什么也沒有证明。在馬克思主义者中間,誰也沒有想去断定說,作为經濟組織的工会应当成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即成为政党的手段。相反,从馬克思的观点看来,政治斗争是达到經濟目的的手段,即达到生产資料社会化这个目的的手段。但是正像我們已經看到的,工会所进行的斗争正在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并且引导他去掌握社会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工会乃是“社会主义的学校”。正像学校是获得知識的手段,而获得知識是目的,一样,工会也是使无产階級从不自觉的階級变成自觉的階級、从“自在的階級”变成“自为的階級”的手段。

随后大卫补充說：“不言而喻，工会应当充滿着社会主义的精神”。这只有在我們把工会恰恰看成是可以充分发展无产阶级思想的一种手段的那个場合下才“会”获得正确的意义。

从这里自然不應該得出結論說，在馬克思主义者看来，工人們利用工会所取得的那些局部的成果是沒有意义的。不，这些成果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們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它們保证无产阶级有可能进一步提高觉悟。它們也是手段。

在同一次會議上，克瓦尔克說道：“党不应当說：我們走在前面，而工会則应当跟在我們后面。”他是对的：不应当說这种話，因为这是很不策略的；而这其所以很不策略，是因为这可能使那些还没有掌握社会主义观点的无产者离开工会。但是这些工会的那些早已成熟到掌握这种观点的成員必須懂得，工人政党是先进部队，工人的其余部分一定要跟在它的后面，除非它不願意彻底坚持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某些过分情願地以“小事”（Kleinarbeit）限制自己的視野的德国工会領袖有时則似乎开始忘記了这一点。^①而且这种情况由于知識分子中的机会主义者即同一个大卫及其一伙人对他們的影响而得到了支持。考茨基希望結束这种情况，他提出了自己的对倍倍尔-列金決議草案的补充案。工会首腦們反对这个补充案，因为他们认为这好像是教訓和譴責自己的一种什么东西。他們終於使得曼海姆代表大会只通过考茨基所提出的补充案的一部分，而且使得倍倍尔本人坚决地表示反对补充案的其余部分。在同法国社会党代表拉波波尔特先生会晤时，大卫曾經宣布这一事实是修正主义的胜利。我国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言論报》也是这样了解它的。但是工会首腦們其实只在形式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实质上他們通过伯梅里堡和莱赫里的嘴公开承认了考茨基的思想是正确的。因此根本談不到考茨基的失敗。如果倍倍尔自己认为必須对职工运动首腦們作形式上的让步，那是

① 參看德国工会科伦代表大会的著名決議。——著者注

因为鉴于工会首脑們本人这一次作了几个十分明确的原則声明，类似的让步不会造成任何損害。

所有的人都会同意考茨基在曼海姆的言論，这种言論是用不同于他在德累斯登所用的那种語言說的。这也是完全合理的。在德累斯登，德国的馬克思主义者們同“知識分子”的机会主义发生了冲突，所以他們向它进行了无情的全綫攻击。在曼海姆，他們不得不同工人組織的机会主义打交道。于是他們显示了很大的溫和精神。这只是表明他們懂得了自己导师的策略。

在曼海姆就工会問題通过的決議，在德国修正主义者看来好像是对德累斯登的一种什么历史性的报复；但是实际上，曼海姆只是补充了德累斯登所做的事情。如果馬克思主义者在曼海姆采取了另一种策略，如果他們甚至拒绝对工会作形式上的让步，那么他們就会大大加强机会主义者的障地，而且也許会在将来自己同他們的一次冲突中使他們有机会成为胜利者。然而德国馬克思主义者沒有犯这个錯誤，并因而使“知識分子”的机会主义遭受了新的失敗。我觉得好像知識分子机会主义者自己在心灵深处也感觉到这一点。所以如果大卫公开宣布自己是胜利者，那么用法国人的說法，他只是 *bonne mine au mauvais jeu*。^①

在代表大会上证明应当通过考茨基的补充案的冬凯尔也表示說：“其中所叙述的內容是不言自明的。这样的事情沒有說出来，却在实行。”但是既然如此，那么显然从这里得不出应当通过考茨基的补充案的結論，而是得出应当按照它的精神行动、但不要把它包括到決議中去的結論。看来发言反对补充案的第二部分的倍倍尔就是本着这种見解的。“作为成員参加工会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在自己的同志中間传播社会主义思想，这实际上是不言自明的。”^②然而在科伦代表大会以后，完全不談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接受考茨基的补充案的第一部分。但是不要使各工会的

① 哑子吃黄连，有苦說不出。——譯者注

党的首脑們对我们提到这个真理觉得难受，——虽然这种心情是没有充分理由的。这会妨碍他们按照我们的想法行动。因此我们不接受考茨基补充案的第二部分。”这就是倍倍尔在曼海姆本来应当发挥的见解。而且冬凯尔不能不承认，如果德国无产阶级的这位领袖的确作了这样的议论，那是完全符合他冬凯尔发言的精神的。这样的事情通常都不说出来，却在实行，而如果真要把它们说出来，有时言简意赅是有好处的。

除了补充案以外，考茨基还对倍倍尔-列金所提交的决议草案提出了修正案。这个修正案说，工会也同社会民主党一样是必要的，然而草案却说，工会就其意义说不逊于党。代表大会通过了这项修正案，这自然是做得很对的。这样它就消除了甚至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正如我上面所说的）有时也主张的那种对待工会的错误观点。

工会作为工会而论，其目的在于同企业主进行斗争，为工人争取向这个企业主出卖劳动力的、比较有利的条件。如果工人的全部视野都局限在这种斗争之内，那就意味着他容忍加在他的脖子上的资本的桎梏，而只关心于减轻一点它的重量。换句话说，这意味着无产者还容忍资本主义。只有当他开始想到完全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完全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时候，他就不再容忍资本主义了。然而无论或多或少传染上无政府主义精神的法国“革命”工团主义者怎么说，光凭经济斗争，光凭工会是不可能达到这样的目的的。如果政权不转到无产阶级手中，就不可能达到目的。工人认识了这个道理以后，自然决不会就不做自己的工会的成员了，但是他已经不再局限于这种工会的观点，而变成一个自觉的社会民主党党员。但是如果他只有在达到阶级觉悟的较高阶段以后

② 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届代表大会不止一次地通过决议说，党员应当参加工会。因此，无产阶级军队的先进部队（社会民主党就是这样的部队）不但有这样的特点，即集中地表现整个运动的基本思想，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要使自己的成员同时也参加这个军队的其余部分的组织。必须记住这一点。——著者注

才会成为这样的党员，那么，说工会按其意义不逊于党就不正确了。这种提法没有充分表达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而是表达了虽然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立场上但是承认工人应当既通过工会也通过政治斗争来捍卫自己的利益的那些——像现在英国人所說一样——工人自由派(labour liberals)的观点。在这些“自由派”的心目中，政党的意义的确是和工会的意义相等的。对于社会民主党人說来，問題就不一样了。他願意承认，工会也像无产阶级之組織为特殊的政党一样是必要的。但是他号召工人参加的那个政党在自己的綱領中写下了完全消灭这样一些生产关系的思想：在这些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无产者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力，而他們的工会則不得不进行改善出卖劳力条件的斗争。因此，无产者起先只限于进行工会斗争，后来就进步到变成自觉的社会党党员，从而表明他达到了比較高的发展水平。而高的发展水平比低的发展水平具有更大的意义。

但这是不够的。凡是沒有任何特殊的經濟条件干預的地方，工会斗争的邏輯本身就会推动工人走向更高的阶级觉悟水平，即超出純粹的工会斗争。

倍倍尔-列金決議案也希望表达后面这个思想。但是考茨基提出的和代表大会通过的修正案則很成功地消除了可能給正确地理解这个思想造成相当大的困难的、笨拙的提法。

四

現在当我们弄明白了党同工会的关系应当是怎样的以后，我們也就不难了解曼海姆代表大会最主要的決議中涉及“大規模的罢工”的那一部分。

誰举行一般的罢工呢？工人。——誰能够举行“大規模的罢工”呢？——也是工人。——有組織的工人即工会在“大規模的罢工”中应当起怎样的作用呢？最主要的作用是：他們应当构成罢工队伍的核心。是这样的么？无疑是的。好，往下讲。

社会民主党在工会由于某种原因沒有表现出对举行大规模罢工的很大的热心的場合下应当怎样对待这种罢工的問題呢？显然它应当抱着很大的谨慎态度对待这个問題；如果不理睬其行为将决定整个事情的进程和結局的工会而用罢工来威胁敌人，那就是夸夸其談和揮舞馬糞紙作的劍。

党对待这个問題的谨慎态度应当表现在什么地方呢？第一，向工会解释，他們的策略不仅取决于他們的意志，解释“大规模的罢工”是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下无产阶级的敌人强迫他們举行的。第二，力求向这些工会表明，党本身就很好地了解被称为“大规模罢工”的那种政治行动的全部严重性和全部冒险性，表明它只有在万不得已的場合下才采取这种行动，并且认为任何輕率地玩弄“大规模罢工”、任何冒失地号召举行这种罢工都是犯罪行为。

向德国工会解释第一点是倍倍尔在耶拿代表大会上的工作，向他們解释第二点是他在曼海姆代表大会上的工作。

誰认为倍倍尔在耶拿說过的話同他在曼海姆代表大会上說过的話之間有矛盾，誰就根本沒有弄清楚实际情况。

年輕的李卜克內西說过，在曼海姆通过倍倍尔的嘴說話的是他的蒼白的头，而不是他的年輕的心。但是难道年輕的心应当是輕率的么？如果由于工会在他們的最近一次（即科伦）代表大会上如此明白地表现出来的那种情緒而“号召进攻”，难道不是輕率的么？無論倍倍尔的心多么年輕，但他从来不像那样一些年輕的和年老的“領袖”（这样的領袖在政治上不发达的国家里数目特別多）永远决心（按照著名的諷刺性軍歌的說法）“毫无計謀地直奔桥头”，既不問他們自己队伍的力量和情緒如何，又不問敌人的陣地怎样。倍倍尔不迷恋空談，他需要的是胜利；胜利要求认真的和冷靜的考虑，考虑不是心灵的工作，而是头脑的工作。

出席曼海姆代表大会的一位外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在自己的关于大会的通訊报道中希望我們的德国同志們更多地作好“战斗准备”（Schlachtfertigkeit）。但是何謂战斗准备呢？它的内容是什么

呢？它的表現是什么呢？是向軍隊發出熱情的命令呢，還是妥善地組織戰鬥力量呢？看起來在於組織。但這恰恰就是倍倍爾在曼海姆代表大會上發表的演說所證明的。他沒有“號召退却”，像某些出版機關所了解的那樣，他只是解釋了**勝利的進攻需要有什麼條件**。在事情的這一方面，他早在耶拿就曾要求自己的黨注意這一點；但是既然他的同志中間的某些人，甚至也許可以說是很多人仍然忘記了這一點，他就不得不在曼海姆進一步討論它，更詳細地發揮自己的思想，更有力地表達這個思想。這就使人有了一個藉口，說他在“退讓”。但是，我再說一遍，實際上沒有任何退讓。

生活在那裡同倍倍爾開了一個很厲害的和不明智的玩笑。生活是常常同賦有廣大的政治使命的領袖們開這種玩笑的。他們懂得必須採取一定的新的鬥爭手段，並且向自己的同志們指出這種手段。但他們同時也懂得，**只有存在一定的條件時**才能實際使用這種手段。然而在他們的同志們中間卻有一些掌握了他們的結論、但不考慮結論是怎樣得出來的人。這些人大談特談新的手段，卻忘記了使用這種手段取得成功所必需的種種條件。他們這樣做就根本歪曲了自己的領袖們的思想，所以領袖們不得不暫時放下自己的思想敵人而抨擊那些用不合理的熱心**擁護**這種思想的人。於是後面這些人就生氣和叫嚷，說領袖們“已經變了”，他們“已經拖累了”等等。“這是古老的故事，但它永遠是新鮮的”……而且永遠是極端枯燥的、愚蠢的……

不過談到德國是怎樣提出“大規模的罷工”問題的時候，應當記住：根據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央機關報的意見，最近幾個月來**修正主義者**比馬克思主義者更堅決得多地主張發動這種罷工。這個事實再一次證實，特定鬥爭手段的急進精神還完全證明不了擁護這種手段的人是急進的。難怪羅馬人說，當兩個人說同樣的話時，並不是一個意思。

在曼海姆就總罷工問題所通過的決議具有一個極大的優點：

保证了德国各工会对決議的同情。虽然它也声称，在耶拿和科伦之間，即在去年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決議和同一年工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決議之間沒有任何意見分歧，但是实际上意見分歧无疑是存在的：工会对待大规模的罢工表现了比党更少得多的热情。曼海姆关于沒有意見分歧的声明只是证明这种意見分歧已經不存在了，問題此刻已經得到解决。分歧意見可能是通过两种途徑来消除的：要么是党对工会的立場作了让步，要么是在倍倍尔作了解释以后，工会已經前进到党的立場。凡是記得例如伯梅里堡在科伦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并且把这些发言和同一个伯梅里堡在曼海姆說过的話比較一下的人，都一定会承认：实际上正是工会前进了。而这恰恰是所需要的。

另一些人肯定說，其实只是这些工会的首脑們前进了，因为工会會員群众沒有前进的必要，因为他們以前就同情党的观点。如果这是实际情况，那就更好了。但是第一，很难判断这在何种程度上合乎事实；第二，如果倍倍尔甚至完全确信这是实际情况，則他那时就不会、也不應該“号召”立即“进攻”。他十分清楚地知道，成功的进攻所絕對必需的組織工作还没有完成。只要指出德国的铁路职工还没有組織起来就足够了。

当倍倍尔說德国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像俄国的实际情况时，他是正确的。我們現在正經歷着居民中一切生气勃勃的力量都起来反对“旧秩序”的保护者的时刻。相反，德国无产阶级則处在孤立的境况中，这种境况的不利地位只有借助广泛的和严谨的組織才能部分地得到补偿。而且俄国的經驗十分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大规模的罢工”是一种必需极端謹慎地加以使用的武器。

但是我准备承认，倍倍尔現在对“大规模的罢工”获得胜利的可能性的看法比一年以前更不乐观。这里同他的“苍白的头”毫无关系，或者說——因为西方无产阶级的領袖从来不否认头脑的功用——在这里，他的苍白的头的作用就在于它注意到了生活的某些重要的教訓。

在自己的耶拿演說中，倍倍尔表示坚信“大規模的罢工”可能具有純粹和平的性质。在今年发生著名事件的时期，德国“上流社会”的行为“表明，很难指望德国只发生和平的罢工，因为德国‘上层社会’自己的一切作为都使得无产阶级要进行积极的斗争。但是积极的斗争比‘叉着手的革命’要求大得无法比拟的力量。”从这里就不可辯駁地要得出一条十分重要的策略上的結論：“叉着手的革命”不过是同“上流社会”作积极斗争的前奏，这种“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力量强大得足以使无产阶级能够胜利地从罢工轉到必不可免的积极冲突的时候才可以发动。而这就意味着，在罢工事业中任何急性行为都会对整个德国工人运动产生非常不幸的后果。因此倍倍尔要用特殊的毅力“阻止”自己的某些同志去盲目相信耶利哥的城墙曾因号角的声音而塌陷^①。临来的斗争越是困难，就越应当努力地为它作准备，——这就是倍倍尔在曼海姆对他在耶拿說过的話所作的补充。

但是这样一来——有人反駁我說——“大規模的罢工”就会置之高閣，而曼海姆代表大会的決議只是这种罢工的思想死亡的見证。

我对这种說法的答复是：只有深信著名的«Zusammenbruch»^②已經不可能了的修正主义者才能这样想。而誰不贊同这种信念，誰知道在現代德国如此迅速地沿着經濟发展的道路行进时社会矛盾怎样剧烈地尖銳起来，誰就不会同意这种說法，誰也就会认为曼海姆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決議是考虑到摆在德国无产阶级面前的十分严重的冲突以后才制訂的十分严肃的实际行动綱領。

相信耶利哥的号角的人們又說道：如果这是对的，那么倍倍尔就不应当拒絕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关于进行反对軍国主义的宣传的建議；最后，他的关于德国干涉俄国内部事务的声明也不会那样相当的坚决。

① 参看本书上册第268頁注①。——譯者注

② 崩潰、破产。——譯者注

我的答复是：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之間在反軍国主义宣传問題上的意見分歧完全不具有原則意义。它只涉及这种宣传的实际組織工作。倍倍尔不仅在原則上承认这种工作的必要性，而且不无根据地补充說，德国社会民主党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社会党更坚决地进行这种宣传工作。

至于德皇政府之干涉俄国事务，則应当記住寓言喂不飽夜鶩这句諺語。問題不在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关于这种干涉現在在說什么，而在于如果发生这种事情他們能够做什么。他們的組織力量越是强大和牢固，他們在德国人民中間的影响越是传播得广泛，他們能够做到的事情就会越多。整个“关键”就在这里。因此不应当夸大这里所談到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声明在某个場合下所获得的那种形式的意义。形式常常取决于外部环境。为了阻止德国的宝剑杀死俄国的自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实质上正在做他們所能做的一切。这一点在曼海姆以前不能怀疑，当倍倍尔在那里說过話以后这一点就更不能怀疑了。^①

（譯自《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十六卷第 226—246 頁）

① 当我在一九〇六年十月六日（新历）这一号的《新时代》上讀到卡·考茨基的文章《曼海姆党代表大会》时，这篇文章已經写好了。我很愉快地确认，除了某些細节以外，在評价曼海姆代表大会上考茨基同我的意見是一致的。——著者注

政論家短評

論策略和不策略的新信

第一封信

《論策略和不策略的新信》是普列漢諾夫緊接着《論策略和不策略的信》之後寫的又一本討論黨的策略路線和方針的重要的機會主義著作，一九〇七年由彼得堡的格拉哥列夫出版社出版。這本文集的根本錯誤在於：作者“完全沒有了解一般資產階級革命和農民資產階級革命之間的相互關係”，“不了解當前資產階級革命的特点是農民革命”，“不能了解……資產階級在俄國革命中起反革命作用的原因，不能明確地肯定究竟哪些階級有能力在這次革命中獲得完全的勝利，而陷入一種錯誤的見解，認為在資產階級革命中無產階級應該支持資產階級，資產階級革命的主要人物應該是資產階級，如果資產階級被嚇跑了，革命的聲勢便會減弱，如此等等”。總之，“普列漢諾夫根本弄不清楚，在只有作為農民革命才能獲得勝利的資產階級革命中，社會民主黨總的策略基礎究竟是什麼。”（《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328—329、331頁）

在這本小冊子中充滿着“嚇人的”、“滑稽可笑的”“叫囂”，“漫罵布爾什維克的聳人聽聞的字眼和盛氣凌人的態度，簡直無窮無盡，思想卻一點也沒有”。（同上）

第一封信以《家里》為題最初發表在一九〇六年第九——十期《現代生活》雜誌上。文章的總的鋒芒完全針

对着布尔什維克的策略观点。全文共五节。第一节通过对立宪民主党赫尔辛基代表大会決議的分析，批評了立宪民主党人的不彻底性。第二节充滿着攻击布尔什維克的陈腔濫調。第三节至第五节是对“劳动”党的批判。普列汉諾夫在最后三节中进一步暴露了他对农民在革命中的伟大作用的否定态度。他說：“劳动农民由于自己的地位則是保守分子，或者甚至是反动分子”，“此刻我們应当特別注意批評它”。列宁指出，普列汉諾夫的錯誤在于他批評民粹主义者的理論时，忽略了这种理論在反对农奴制的斗争中所包含的历史上现实的和历史上合理的内容，他虽然正确地批判了“劳动原則”这种落后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但是忘記了这种理論反映着先进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忘記了这种理論是同农奴制旧俄国作最坚决斗争的旗帜。（同上第217頁）普列汉諾夫否认俄国存在大量的待垦地的事实，这表明他根本不懂得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同上第233頁）。

如果我們拿普列汉諾夫对立宪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党的批判跟列宁同时期的著作比較一下，例如拿本文第一节同《关于立宪民主党代表的总结》（第十一卷）、拿第三节至第五节同《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維克》比較一下，我們就可以发现两者显著的差别。

—

当我写这篇普普通通的批評文字时，人民自由党正在赫尔辛福斯^①举行代表大会。俄国和国外的人們都很关心这次大会。这

^① 即赫尔辛基。一九〇六年九月立宪民主党在赫尔辛福斯举行的这届（第四届）代表大会否定了維波尔格宣言。——譯者注

当然不奇怪。立宪民主党在俄国社会生活中已經起了——一部分是由于自己的功績，部分是由于“左派政党”犯了巨大的策略錯誤——十分重要的作用。将来它也注定要起非常重要的政治作用。因此甚至那些同它的观点相距很远的人也不能不关心它的代表大会的決議。虽然我不贊成立宪民主党的綱領，也不同意它的策略，却也不能漠不关心地对待这些決議。首先我要指出一个大概毋庸置疑的情况，即赫尔幸福斯代表大会的代表們对于我国居民現在抱着什么情緒并不很信任。《言論报》的通訊人說道：“据一些个别的代表报道，居民的情緒各地极不相同。”自然也不能不这样。但是科茲馬·普魯特柯夫早就主张在多样性中寻求統一。現在人民中**占优势**的情緒傾向于哪一方面呢？看来，在赫尔幸福斯开会的代表們沒有弄清楚这个問題。然而只要人民自由党沒有对这个問題形成明白的概念，它在很大的程度上就不得不摸索着盲目地行动，这对于它的行动結果自然是不利的。为什么它不了解現時人民的情緒呢？回答这个問題并不困难，因为它同人民沒有足够的联系。

我說这話不是要責备它。这里，摆在我們面前的不是过錯，而是不幸。这是很大的不幸。但是因这种不幸而受到損失的不光是一些立宪民主党人。应当坦率地說：无产阶级政党同它所代表的階級也沒有現時它本来应当有的那一切联系。这在很大的程度上自然是由于一些可恼的“无法轉移的”情况。但是問題不在于怎样說明这一点，而在于怎样“摆脱不幸”，怎样扩大同居民的联系。这里沒有篇幅考察这个問題。但是在这里強調說明，为了我国解放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利益，参加这个运动的一切政党都应当采取一切措施力求在新的和更加广泛得无比的基础上組織自己的力量，将是适当的和有益的。我之所以认为強調这一点是有益的，因为对組織任务有了正确的观点以后一定也将有助于正确的策略概念的发展。不过在策略方面，也像在組織方面一样，我們大家可以看到同样一些很不足的地方。但是，且回到赫尔幸福斯代表大会上来吧。

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策略決議是这样說的：

(一)代表大会表示贊同議會党团在国家杜馬中的活动，并且承认，这种活动符合于第三届党代表大会上作出的策略总指示。

(二)代表大会承认維波尔格号召书^①的政治意义，并且表示原則上同意它的内容，它贊成在起草号召书上表现出主动精神的議會党团的活动。

(三)代表大会认为，消极抵抗的思想，如果得到广泛的和有組織的应用，是和人民自由党的一般策略原則一致的；并且承认，消极抵抗可以用来作为对付实质上是侵犯人民代表机关的权利的行為的那些行动的最切实有效的反抗形式。

(四)代表大会承认，广泛地和有組織地应用消极抵抗，無論一般說来，或者具体地通过拒絕在一九〇六年征召时服兵役的形式，事实上都是实现不了的，它发现不可能建議立即地、但必然是部分地实现消极的抵抗。同时，代表大会坚持必須在人民意識中广泛地传播、論证和加强消极抵抗思想。

(五)代表大会认为党的最近任务在于同居民建立最紧密的联系，这無論对于选举运动的准备工作或者对于組織社会力量說来都是同样必要的。

(六)代表大会认为党在运动行将到来时的选举綱領必須在国家杜馬中对御前演說作出答复，根据党綱加以补充說明，并且号召人們特別注意于扩大国家杜馬的立法权和預算权的必要性。

在这个決議中首先引人注意的是一个小小的、但是可以說很值得挑剔的缺点：在第四点的开头少了一个字眼“但是”。決議的第三点贊成消极抵抗思想，并且承认这种抵抗可能是反对侵犯人民代表机关的权力的最切实有效的形式。第四点却发现这种抵抗現在是实现不了的。所以在这里看来本来應該放进“但是”一詞，甚至还可以补上“可惜”两字：思想是好的，但是可惜实现不了。这

^①“維波尔格宣言”是一九〇六年七月九日至十日(第一届国家杜馬被驅散后)杜馬代表在維波尔格通过的号召书，到会代表主要是立宪民主党人。——譯者注

样会“更圆通些”。然则为什么赫尔幸福斯決議的作者們沒有这样写呢？这个问题看起来空洞无聊。但实际上这里隐藏着一个重要的和可以說是“国家的”^①原因，像果戈理的一位主角所說的那样。

問題在于赫尔幸福斯是維波尔格的否定。在杜馬被驅散以后集会于維波尔格的代表們向人民提出了消极抵抗的建議。参加赫尔幸福斯人民自由党第四届代表大会的代表們則认为現在不可能进行消极抵抗。这样他們就废除了維波尔格宣言，而且据我所知，他們这样做甚至沒有同曾經派有代表在維波尔格号召书上签名的其他党派联络过。我且不說这件事是坏是好。我只要說明为什么忽略了“但是”这个字眼。而其所以有这种忽略乃是为了把赫尔幸福斯給維波尔格吃的药丸包一层糖衣，为了使实际上是否定的态度具有肯定的外貌。由于这个狡猾的文学手法，赫尔幸福斯決議的第四点就获得这样一种外表，好像它繼續在“表示贊同”，实則它是表示否定。決議的作者是些乖巧的人！他們很好地懂得，药丸越是不合口味，就越需要包糖衣。而这粒药丸是很不合口味的。

我要問一問乖巧的決議作者，他們在第二点中如此乐于承认其“政治”意义的維波尔格号召书現在还剩下了一些什么呢？剩下的无非是一个抽象的見解，即所謂消极抵抗有时可能会是必需的和有益的。但是过去的杜馬議員們之所以到維波尔格去开会难道是为了提出这样一些抽象的見解么？假如真是这样，那他們就会完全像一八四八年德国那些众所周知的《Vaterland verloren》^②的《fünfzig Professoren》^③一样。但是应当贊揚他們的是，他們到那里去开会不是为了做这件事。他們是想向人民指出摆脱驅散杜馬所造成的那种局面的、切实可行的出路。乖巧的赫尔幸福斯決議現在用溫柔的語言對他們說，他們沒有找到这样的出路，或者正确些說，他們指出了錯誤的出路。这是极端可悲的，尽管令人寬慰的

① 意即“政治的”。——譯者注

② 失掉祖國。——譯者注

③ “五十教授”。——譯者注

是沒有“但是”这个字眼。

其所以可悲，因为实际上出路找得很不对头。直接稅在我国預算中占着微不足道的地位。所以拒絕繳納这种賦稅对国庫不会有什么影响。組織人民拒絕繳納間接稅一般說来总是极端困难的。因之也就用不着仔細地去考虑它。至于說到出壮丁，我已經在另一个地方指出过，这种措施現時对解放运动不会是有益的，而会是有害的。我的讀者中間有許多人反对这个思想。但是，正像从报上可以看到的，米留可夫先生在赫尔辛福斯代表大会上报告說，某些农民在致人民自由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些信件中表达了同样的思想，而且他曾用同样的理由捍卫过它。这个消息很使我高兴过，因为它告訴我，首先必須懂得这个思想的那些人正在懂得它。但是如果不出壮丁是有害的，而拒繳賦稅按其意义說对国庫是微不足道的，那么贊成維波尔格宣言就根本没有什么意义了。而且無論如何，現在在通过赫尔辛福斯決議以后，維波尔格宣言就只剩下这样一个抽象的思想：即消极抵抗有时可能既是有益的又是必要的。但是我上面已經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满足于这样一种抽象的見解无异于效法历史上留下了相当不好的名声的那些人。維波尔格号召书沒有說明它本来可以說而且应当說的观点。这是无庸怀疑的。維波尔格号召书的作者們也許要反駁我說，我用这样輕蔑的态度对待消极抵抗的思想是沒有道理的，因为要知道，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去年在耶拿所談論的那个大規模罢工也是消极抵抗。这倒是正确的。但是这个思想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那里是 «mit ein bisschen andern Worten»^①（用稍微不同的話）表达的。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耶拿談論大規模罢工时，他們所說的消极抵抗思想並沒有抽象論題的意义。它是一种实际措施，采取这个措施誠然是未来不定什么时候的事，但是这个问题已經用只有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論和实践才能有的充分的明晰性闡释清楚了。

① 下面括弧里的話就是譯文。這句話出自歌德《浮士德》中的瑪甘泪。參看人民文学出版社郭沫若譯本第一部第 184 頁。——譯者注

在耶拿开会的代表們沒有向德国工人隱瞞过任何东西。他們对工人們說明了——用拉薩尔的說法——“現在的情况”。同时这种說明本身就具有重要的实际行动的意义。維波尔格宣言的作者們是不是这样做的呢？不是，他們的做法完全相反。他們說明了过去不存在的東西。当不宜談論消极抵抗的时候，他們却开始談論它来了。这是一个錯誤。为什么他們犯了这个錯誤呢？原因很簡單。因为在維波尔格集会的大多数代表拒絕了簽署明白地和确定地說明“現在的情况”的宣言。因为从当时的情况——以及現在的情况——中合乎邏輯地推导出来的結論过去和現在都不符合立宪民主党綱領的普罗克魯斯特床^①。这些如此乐于譴責无产阶级政治代表的狹隘性的人自己就暴露了任何有思想的工人阶级思想家从来未曾有过的、同时也不能有的那种狹隘性。

狹隘性的坏处就在于它会大大地削弱有这种特性的那些社会集团和那些政党的力量。在所考察的場台下人民自由党所暴露的狹隘性削弱了它对人民群众的影响，从而也就降低了它在为人民自由而斗争的事业中的作用。这对立宪民主党人說来自然也是很大的不幸；但这不是由“无法轉移的情况”所引起的不幸，而是由立宪民主党自己的本性引起的不幸。这种不幸同时也就是罪过。

人民自由党的罪过在于它本身害怕这种自由取得完全的胜利。它的关于集会自由的倒霉的法律草案就证明了这一点。它用否定的态度对待如果得到实现首先就会完全消除人民代表机关听凭我国反动政党任意摆布的状况的那些政治要求也证明了这一点。讀者会懂得我这是指什么說的。像庫茲明·卡拉瓦也夫先生之流的立宪民主党人害怕（至少是迄今为止害怕过），如果这种要求实现了，如果人民代表机关的命运变得只以人民的意志为轉移，那么这种情况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幸的根源。誰沾染上这种恐惧心理，他就**不能**在爭取人民自由的斗争中貫徹到底，他就不敢說出

① 古希腊神話故事：强盜普罗克魯斯特将抓来的人放在一张床上，长者砍去其足，短者拉长之。与汉语中的“削足适履”、“胶柱鼓瑟”同义。……譯者注

“現在的情况”。赫尔幸福斯代表大会用什么来代替消极抵抗的思想呢？什么也沒有，因为根据赫尔幸福斯代表大会的決議立宪民主党将在进行新的杜馬选举时提出的、而且是作为旧杜馬对御前演說的答复的基础的那个綱領，既沒有給人民新的口号，也沒有給人民新的思想。赫尔幸福斯代表大会沒有做过任何工作来向人民說明解散杜馬的政治意义。这就是說，它是不希望說出“現在的情况”的。而且就我所知，他們的那些決議中沒有一項決議指出杜馬原来可以成为完全不是被召集的，也沒有一項決議說到在这种場合下应当怎么办。赫尔幸福斯代表大会既然对这一点表示沉默，那就是加倍地拒絕說出“現在的情况”。

有人回答我說，“一天的难处就够受了”，現在这类決議只可能有单纯理論見解的价值。好吧！但是有各式各样的理論。“从理論上”說明“現在的情况”，这显然就会是費尔巴哈所指的那种理論。費尔巴哈說：“什么是理論呢？这是仍然在我的头脑中的思想。什么是实践呢？这是从我的头脑轉移到群众的头脑中去了的思想。”从理論上說明“現在的情况”会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活动的意义。它会大大地促进人民政治觉悟的提高，并从而有助于組織人民的反政府力量（組織这种力量的必要性已經在赫尔幸福斯指出来了）和組織消极抵抗（消极抵抗的思想在同一个代表大会上也受到了贊許）。这难道不明白么？

这自然是很明白的。但我国現时的政治形势的特点也是同样明白的。依据这个特点充分地說明“現在的情况”，意味着直接接近于这样一个結論，即：立宪民主党应当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政綱和策略。然而这正是它所不願意的。立宪民主党人也許非常真誠地希望同我国的旧制度算清賬。在同它作斗争时他們向群众呼吁，建議群众提出一定的政治要求。但是在提出这些建議时，他們不能不耽心群众会变成要求过高的人。于是这种耽心限制了他們在反对旧制度的斗争中所能完成的事业。然而那些沒有理由耽心群众要求过高的人一定要让群众注意到这个限制。

二

我赶紧在这里声明，我耽心我刚才提到的人们恐怕会急忙抓住我的话，浅薄地曲解它。

及时说明“现在的情况”是一件大事情。但是正像任何其他大事情、甚或小事情一样，它也应该做得恰如其分。我国的“左派政党”正是因为他们希望通过抵制向人民说明“现在的情况”才抵制了旧杜馬。但结果，抵制是进行这种说明的很坏的办法。

为了说明现在的情况，引起空气的某种振动是不够的，说出某种言论是不够的：必须使你要号召的那些人清楚地理解。而人民——主要就是农民——恰好就不懂得“左派政党”希望用抵制加以说明的思想。他们积极地参加了选举，因为他们热烈地相信杜馬；而他们之所以热烈地相信杜馬，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现时他们的代表机关的无权地位。“左派政党”希望通过抵制就这个问题向人民加以说明的那个思想，在绝大多数场合下仍然完全是人民所不能充分理解的。要向他们说明这个必要的政治真理，要打破他们的“立宪幻想”，本来必须怎么办呢？本来必须使他们根据经验相信，幻想同现实很不一样；本来必须采取一切措施让生活尽量迅速地使他们得到自己的生动的教训。而这就意味着必须既参加杜馬的选举，又参加杜馬的工作。本来也只有用这种办法才可能使杜馬从停滞的工具（我国守旧派就希望把它锤炼成这样的工具）变成进步的工具。当杜馬被解散的时候，生活给予俄国人民的第一课生动的政治教训就完结了。往后就只有简要地总结这个教训，使它更清晰地铭刻在学生的记忆中。这本来也就是在維波尔格集会的代表们的任务。他们不正确地理解了和不正确地解决了自己的任务。“左派政党”理应尽力匡正他们的这个错误。它们应向人民说明人民所获得的政治教训的意义。可以说，它们也做过这个工作，虽然只是做了一部分，而且还犯了它们未能避免的一些错误。政治不是似乎凭一次教训就可以研究好的一种简单的科学。

即使所有同官僚制度进行斗争的政党用全付本领着手向人民说明他们从生活中获得的第一课生动的教训，那时这个意义对于许多居民阶层说来大概也仍然是难以明白的。即使在那个时候，这些阶层也会需要新的生动的政治教训。可是实际上，同官僚制度进行斗争的党派是颇不善于向人民说明第一课教训的意义的。因此他们应当更加认真地对待现在行将到来的第二课教训。换句话说：他们应当更加积极地准备好迎接新的选举和使得选举可能根本举行不了的那些偶然事件。

我的某些同志企图揭发我的矛盾。他们说：“一方面您断言，杜马本身没有意义，因为它的权利是微不足道的；而另一方面您又坚决建议支持它。为什么要支持软弱无力的杜马呢？”我想，我现在已经相当通俗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而且就连我的批评者中间最不机灵的人现在也懂得了我的意思。我们是有义务说明现在的情况的。但是要使人民相信我们，首先就必须让生活告诉他们，我们讲的是真理。现在生活已经部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但只是部分罢了。因此我们现在就不能限于只说明现在的情况，虽然现在说明这一点也是必要的，虽然那些根据某些理由不作这种说明工作的自由战士采取了很错误的做法。显然，我们不仅应该大声地和坚决地说明“现在的情况”，此外还应该注意使人民也有机会根据经验来检验我们的话是否正确。只有采取这种策略才能在生活中实现这样的公式：通过杜马走向人民代表机关的更高得无比的形式。这难道不容易懂得么？其次。我预先知道，敏慧的读者会根据我对维波尔格号召书和赫尔幸福斯代表大会的评论揭发我的矛盾。他会说：“您自己大谈特谈立宪民主党人的不彻底性，然而您自己又建议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杜马。”

我的确主张这样做。如果错了，那也是同好伙伴一起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八年曾经建议工人支持资产阶级，因为它在同旧制度作斗争时是进步的。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主张应该支持资产阶级的进步意图的同时，立即补充说，如果资产阶级暴露

出保守的或者反动的意图而同无产阶级发生冲突，就应该同它进行斗争。我继他们之后重复着同样的思想。所以我可以大胆地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全部哲学的意义”也就在于此。谁不懂得这一点，他就不懂得工人阶级在从旧制度到符合于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制度的过渡时期所应当采取的政策。谁不满意这种政策，并且企图用更“极端的”政策来代替它，拒绝给资产阶级以任何支持和谴责它的一切意图，他这种做法也就是谴责它同旧制度作斗争，即等于给这种制度以可贵的效劳。自然，这些效劳常常是非出本心的和不自觉的。但是要知道，整个地狱都是由善良的愿望铺成的^①。

另一方面，谁在希望支持资产阶级进行反对旧制度的斗争的同时，开始对工人阶级的意图甚至在这种情况下也同资产阶级的意图远不一致的情况表示沉默，他就会暴露出他的**机会主义**，即模糊工人阶级的意识，从而削弱它在反对同一个旧制度的斗争中的力量。因此，这种人也会通过他们的善良愿望帮助铺设地狱。在类似我们所经历的过渡时期，工人阶级政治代表的全部技巧就是善于避开患了政治幻觉病的**宗派主义**的斯基拉和有不可救药的近视毛病的**机会主义**的哈利勃达^②。可惜的是不容易得到这种技巧！

为了掌握这种技巧，应当放弃恩格斯当年十分中肯地说明过、并且定其名为形而上学的那些思维方式。

恩格斯说：“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不变的、僵化的、永久如此的对象，它们应该一个一个地、彼此不相关联地加以研究。形而上学者在完全的、直接的

① 语出英国作者约翰逊（一七〇九——一七八四）。——译者注

② 斯基拉（Σκυλλα）和哈利勃达（Χάρυβδις）是希腊神话中的两个生活在狭窄的墨西拿海峡两岸和吞食航海者的怪物。典出荷马的《奥德赛》。成语“陷于斯基拉和哈利勃达之间”意指腹背受敌。这里的意思则指两个对立的极端。——译者注

对立中进行思维；他的说法是：是就是是，非就是非，除此以外，皆是鬼话。在他看来，事物不是存在就是不存在；在他看来，对象不能同时既是自身又是任何其他的东西；肯定的东西和否定的东西是绝对互相排斥的，原因和结果也是互相完全对立的。我们初看起来，这种思维方法好像是十分正确的，因为它是所谓常识所固有的。但是人的常识在家庭四壁之内的日常生活中，虽是极可尊敬的伴侣，但一踏上广大的研究的世界时，它就会立刻经历最惊人的变故。同样，在一定的或多或少广泛的领域内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形而上学世界观迟早也会达到它的限度，超过这些限度它就会变成片面的、有局限性的、抽象的，并且会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中，因为它在事物的后面看不到它们的互相联系，在它们的存在后面看不到它们的产生和消灭，在它们的静止状态后面看不到它们的运动，总之，在树林后面看不到森林。”^①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例如在最近几十年内之所以会犯那些错误，正是因为他们不善于在社会现象的相互联系中考察这些现象，因为他们它们在它们的存在后面没有看到它们的产生和消灭，而在它们的静止状态中没有看到它们的运动。^② 如果现在他们中间许多人很难理解无产阶级的策略应当如何，则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又是因为他们像形而上学者一样进行思考。同这种由来已久的毛病作斗争是非常困难的，——而因为这种毛病远非“偶然”现象，所以

① 参看《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20页。——译者注

② 不过不光是我们才用形而上学的方式进行思考。现时意大利工团主义者相当大一部分错误就是由于他们的思维的形而上学性质引起的。在一九〇六年罗马举行的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大会的一次会议上，工团主义者列昂奈说过：“党不是历史的因素，而是它的产物。”好像“产物”不可能反过来成为因素似的！这使人想起恩格斯的一个论点，他说：“关于原因和结果的概念只在应用于个别的现象时才有意义，但是我们如果从这个现象的总的世界范围内的联系来考察这个现象，我们就会相信，这两个概念便结合起来，变成关于全世界的交互作用的概念，其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互易位置，此时此地为结果的彼时彼地将为原因，反之亦然。”（参看《反杜林论》第21页。——译者注）——著者注

就更加困难。所有經濟上和政治上不发达的国家里的急进的知識分子都有这种毛病。倍倍尔在去年德国社会民主党耶拿代表大会上說过，当他还是很年輕的时候，就开始注意政治生活，那时一些經常談論革命并且希望成为极端急进派的人政治上非常不成熟使他大吃一惊。現在倍倍尔“已經成了鬚发斑白的老头了”，但如果他有机会例如同我国过去的布尔什維克談过話，他就会清晰地回忆起自己的青年时代，并且会體驗到同样驚訝的感情。而且光只有布尔什維克么？不善于領悟——而特別是在政治上运用——恩格斯用来同形而上学的思維方法相对立的辯证思維方法，現在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乃是我們共同的缺点。幸而有人認識到这个缺点，并且采取种种措施来消除它。

或許有人反駁我說，現在已經顧不到采取这样的措施了，現在應該**行动起来**。但問題也就在于行动應該得到正确思想的指导；否則它就可能成为自杀的行为。学学德国人吧。倍倍尔在耶拿做完了关于总罢工的报告以后，对自己的同志們說，他們首先应当尽可能更好地領会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他們应当用比以前更大得多的热情来研究科学社会主义。他說：“如果我們在一年之內把自己組織的成員数目增加一倍，大大地加强工会，并且把我們的定期刊物的讀者增加百分之五十甚至百分之百，那并不是奇迹。这样，党就会有一支可以大胆地面对最严酷的未来的力量。”这是一句金玉良言。像倍倍尔这样的人善于用光輝的思想来指导自己的实际行动！但是在我們这里如倍倍尔一样的人多不多呢？必須使他們大大地多起来，因為我們現在的处境已不輕易，而我們的未来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自然不可能随意地成为倍倍尔或者任何其他杰出的政治活动家。但我說的不是**同一性**，而只是**相似性**。不大的三角形可以和希奧普斯金字塔^①的一面相似，大家知道，这个金字塔比埃及所有其他的金字塔都大。**同一性**不以我們为轉移，然

^① 希奧普斯(庫佛)，公元前第三千年埃及法老。他的陵墓(金字塔)是世界建筑方面的卓越古迹之一。——譯者注

而就**相似性**而言，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通過自己頑強的努力取得很多成果。

三

但是無論如何毫無疑問的是，我們必須在資產階級政黨表現出進步意圖的場合下支持它們，而當它們的進步意圖在減弱並且逐漸變成自己的反面時則必須**批評**它們。這是公理。不過知道和記住這條公理是不夠的；必須善於運用它。然而只有明白什麼時候他應當強調它的前一半（我們**支持**資產階級政黨等等），以及什麼時候應當特別着重地宣布後一半（**批評**它們等等）的人，才善於運用它。誰沒有具備這種可貴的本領，他就有陷入民間故事所形容的一個鄉下笨蛋的尷尬境地：舉行葬禮時大跳其舞，而在婚禮上却致追悼詞。這個倒霉的笨蛋動機是頂好的。但是這些動機實際上除了令人討厭以外根本不會產生任何結果。每當我看到我的同志有任何一點最小的地方同這個心地善良的傻小子相像時，我都會感到非常痛心。為了採取公允的態度，我必須補充說，布爾什維克陣營中那些反對我的人始終保持着他們所犯錯誤的整個一半。當話題涉及資產階級政黨的時候，“布爾什維克”總是致追悼詞。但在目前形勢下這個特殊的“**不徹底性**”什麼也補救不了。和自己熱烈的希望相反，“布爾什維克”仍然不善于有效地參加我國舊制度的葬禮，這個制度同樣壓迫我們大家，它早已過完了自己的時代，而且——用士兵的口頭禪來說——早已把口糧撥到彼岸世界去了。

再說一遍：支持是必要的，但批評也是必要的。同時不只是支持和批評立憲民主黨人。試拿同我們的舊相識“社會革命黨人”和新冒出來的人民社會黨有這樣多共同點的所謂勞動黨來說吧。“勞動”黨自然比立憲民主黨人“左傾些”。但對我們說來它無疑是站在右邊的。此刻我們應當特別注意**批評**它，因為在最近的將來它要起巨大的作用，同時還因為我們在許許多多場合下必須要用我們

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来**支持**它。如果我们支持它而不同时揭露妨碍它站在无产阶级观点上的那些特点，那么我们就在工人们的思想中造成最有害的混乱，就会大大阻碍他们提高阶级觉悟。

其次，既然我们至今都没有充分地批评这个党，——而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因为我们许多人宁愿从事于**派别纠纷**和小集团的外交活动，——所以已经部分地造成了损害；在无产者的思想中已经部分地产生了混乱。

大家知道，“劳动派”的主要特点在于他们拒绝站在任何一个阶级的观点上。按照他们的意见看来，这是过分**狭隘**的。他们同时站在**三种**观点上：（一）站在**农民**的观点上；（二）站在**无产阶级**的观点上；（三）站在**知识分子**的观点上。这确乎是**广泛**的。可惜的是对于政治活动家来说，——甚至对于最**广泛**的政治活动家来说，——同时站在三种观点上是不可能的，就像一个商人——甚至是生来就最讲究排场的商人——不可能同时乘坐三辆轿式马车一样。无论怎么狠也只得坐一辆。全部问题仅仅在于坐**哪一辆**马车，换句话说，按照事物的不可阻止的力量，按照社会关系的不可克服的逻辑，这马车在朝**什么方向**和一定会朝**什么方向**奔驰。

我国“劳动派”坐在哪一辆马车上呢？他们硬要人相信是坐在劳动的马车上。但这只是一句“空话”：因为从未有过这样的马车。说“劳动”而不同时补充说明怎样一种劳动，就无异于根本**没有说出任何东西**。

什么是劳动呢？劳动是一种活动，在劳动过程中人对自然对象或者他以前的生产活动所制作的对象进行一定的、对他必要的改造。换句简单的话说：劳动是生产使用价值的一种有目的的活动。但这是抽象的定义。它只是就**人和自然间的关系**来考虑劳动过程，然而人的生产活动——使用价值的生产——一定要以**实际生产过程中人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为前提。根据马克思的无可争辩的见解，人们为了进行生产，一定要互相发生一定的关系。马克思把这些关系称为生产关系。只有在这些生产关系——或者

換言之：生产的關係——內部和通過這些生产關係，人对自然的生產活動才會實現，即上面這個抽象的定義所指的那個勞動過程才會實現。作為有目的地影响自然的活動，作為使用價值的生產過程，勞動乃是——用同一個馬克思的話來說——人類生活永恆的、天然的条件。它在任何形态的社会生活中都是必要的，因此它本身不能說明任何一個社会生活形态的特征。“像根据小麦的味道不能确定它是誰播种的一樣，从播种过程也看不出它是在何种条件下生产的：是在殘酷地監視农奴的監工的皮鞭下呢？还是在資本家貪婪的監督下？从这里也看不出它是由誰生产的：是耕耘自己的兩由格尔^①的辛辛拿达人^②呢？还是用石头击杀野物的野蛮人呢？”^③

馬克思用嘲笑的口吻補充說，根据这个十分合乎邏輯的理由，著名的英国經濟学家托倫斯上校在野蛮人的石头中发现了資本的萌芽。^④要是馬克思活到了今天，他可能会說，此外我国的“劳动派”，而在他們之前还有“社会革命党人”，根据同一个惊人的邏輯理由把农民和工人混为一談，并且宣布自己是一般劳动的党，而不問这劳动是在哪些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下进行的。

然而全部問題就在这些关系中。生产关系決定一切社会制度。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变，人們的一切社会关系以及一切社会意图都会或多或少迅速地变化。

因此，凡是忽視生产关系的人都会使自己失去任何可能来正确地理解社会发展的进程。我国的“劳动派”就这样做了，像在他們之前“社会革命党人”所做的一樣，而現在“人民社会党”的成員們又在这样做。不过他們也沒有認識到必須理解社会发展的进

① 由格尔，古羅馬面积单位，約等于二千五百平方米。——譯者注

② 辛辛拿达，美国地名。——譯者注

③ 《Das Kapital》，第一卷，第三版，第163頁。〔參看《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179頁。——譯者注〕——著者注

④ 參看上書同頁。——譯者注

程。在他們那里，**理解為善良的意志**所代替，而善良意志的主要體現者在他們的心目中則是進步的**知識界**。知識分子、農民和僱傭工人這三合一的進步的知識界的地位正是由以下一點決定的：“進步的知識分子”的“善良的意志”會從社會生活中消除充滿勞動黨的綱領的那些經濟矛盾。

全部問題都在生產關係。**僱傭工人**是在一些生產關係下勞動的；**農民**——即所謂勞動農民，也就是不去購買別人的勞動力的農村小生產者——則是在完全不同的生產關係下勞動的。這一點決定着他們的社会地位有深刻的差別，因此也決定着他們的階級利益有深刻的差別。僱傭工人的階級利益在於消除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因為在這些關係下生產資料屬於靠剝削生產者過活的一個階級的人。僱傭工人不能不力求消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事實上甚至在他還支持資產階級偏見的時候他就起來反對資本主義了。農民不能不力求鞏固或者恢復這樣的生產關係，在這些生產關係下，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都是私有財產，或者說都由小生產者占有。誠然，我國的——确切些說是**大俄羅斯的**——“勞動”農民現在都起來反對土地私有制，或者多少堅決地、多少自覺地要求“平均利用土地”。但是如果不是特殊的——由於特殊的歷史條件——方式^①保證農村小業主能夠占有小塊土地，這會是什麼樣的土地利用呢？僱傭工人按其社會地位來說是**革新分子**；勞動農民由於自己的地位則是**保守分子**，或者甚至是**反动分子**。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才在自己的宣言中寫道，農民，像小的工業生產者一樣，力圖“使歷史的車輪倒轉”^②。我們現在正經歷着一個非常特出的和可以說極其罕見的历史時刻，這時農民想“使歷史的車輪倒轉”的意圖變成了社會進步的泉源。因此農民就應當得到代表着主要的革新者的階級即僱傭工人的階級的利益的黨的支持。但是他們之所以應當受到這個黨的支持，正是由於歷史的辯證法使

① 指生產方式。——譯者注

②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477頁。——譯者注

得他們这种要倒轉历史車輪的意图变成向前发展的因素。而且在支持他們的时候必須對他們采取批判的态度，因為他們的意图就是在現時也有**兩重性**的特点。而“劳动党”只是把他們的意图简单地理想化，同时由于陷入理想化的迷雾中，就完全忘記了——像我們已經看到的——問題不在劳动，而是在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下进行劳动。

現時“劳动”农民的思想家們，主要是“社会革命党人”陣营中的思想家，很像那种时髦的“博学”的基督教辯護士。像这些辯護士研究科学思想的动态是为了在其中发现資料用来充实自己那些根本不科学的教条一样，“劳动”农民的思想家們之研究科学社会主义文献也是为了寻章摘句地来证实自己的空想主义观点。在馬克思的著作中寻章摘句特別使他們感到滿足。大家知道，这些人“也是”馬克思主义者呢，因為他們希望馬克思会帮助他們駁倒……馬克思。例如他們喜欢引证《資本論》的一段話，好像从这段話中可以得出結論說（自然这是一种难以思議的牵强附会，但是沒有牵强附会辯護士們就过不下去），馬克思把农民的社会地位同雇佣工人的地位等同起来了。凡是稍微領会了馬克思学說精神的人，自然都会懂得这是胡說。在馬克思看来，农民——即在商品生产条件下进行劳动的現代农民——是把工人、小資本家和土地占有者結合于一身的小生产者^①。誠然，馬克思說，在資本主义社会

① «Als Schranke der Exploitation für den Parzellenbauer erscheint einerseits nicht der Durchschnittsprofit des Kapitals, soweit er kleiner Kapitalist ist, noch andererseits die Notwendigkeit einer Rente, soweit er Grundeigentümer ist» (《Das Kapital》, III. Band, 2 Teil, p. 339—340) (“对于小土地所有制农民，一方面，在他是小資本家的限度內，資本的平均利潤，不表現为剝削的限界；另一方面，在他是土地所有者的限度內，地租的必要，也不表現为剝削的限界”。（《資本論》，第三卷，第二編，第339—340頁），參看《資本論》，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三卷第1051頁第六篇第四十七章。——譯者注）王德威爾得（順便說說，他从来不是馬克思主义者）也承認，农民身上結合着工人、資本家和土地占有者三种身份。（《Le socialisme et l'agriculture》（《社会主义和农业》。——譯者注），布魯塞爾-巴黎，一九〇六年，第6頁。）——著者注

中小农出卖自己的产品时常常得不到它的全部价值（这个价值本来等于三部分的总和，而这三个部分，由于生产者本身的重重性，是同**工資、利潤和地租**三者相当的），而只得到它的一部分价值。和工資相当的那一部分价值，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在这里表现为絕對的界限^①。这是完全对的。但在我們所关心的問題中这根本没有证明任何东西。

沒有得到自己資本的利潤的資本家不会滿足于这种情况的。他会力求改变它。但是怎样来改变呢？通过消灭資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办法么？完全不是！資本主义企业不賺錢的情况远不足以使資本家变成社会主义者。这在土地占有者也是一样。如果他的地租下落，他就会力求用这些或那些办法提高它，而完全不会在这种情况下拒絕捍卫土地私有制和地租賴以存在的那个社会制度。最后，对于一身兼具工人、資本家和土地占有者身分的“劳动”农民，也必须这样說。如果他受到竞争的压迫，他就会力求这样或那样地削弱这种压迫和建立这样一种生产关系，使得在分配社会收入时他可以得到自己产品的全部价值。

北美合众国就是一个例子。在那里有許多“劳动的”农场主。这些“劳动的”农场主常常忍受着大資本的統治。后面这种情况是不是会在他們心里引起社会主义傾向呢？一点不会！“劳动的”农场主参加了 Greenback Party^②。后来他們参加了 People's Party^③。这两党中每一个党都准备对无产階級作一些重大的让步。因为为了同大資本作斗争，它需要他們的支持。但是这两个党的綱領中并没有談到、也不可能談到社会主义。“劳动的”农场主所需要的本来就不是取消資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只是对它們作一定的改变。

① 《Das Kapital》，p. 340〔參看《資本論》，第三卷，第 1051—1053 頁。——譯者注〕——著者注

② 綠鈔黨。——譯者注

③ 人民黨。——譯者注

誠然，亨利·乔治^①的继承人即土地国有化的拥护者也属于民粹党人^②（即属于“民粹派分子”，属于 People's Party）。但这只是再一次证明，追求土地国有化的意图同純粹資產階級的傾向是十分融洽的。而且請注意，我指出的这两个党派中間每一个党都把許多工人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了。可是这並沒有消除这两个党的資產階級性质。相反，而是参加这两个党的工人本身充滿了資產階級的精神。不过这种說法不是十分确切的。参加这两个党的工人原来就不是社会主义者，換言之，他們以前就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因此，并不是他們参加了这两个党本身使得他們充滿了資產階級的精神，而是这种参加使得把他們从資產階級思想影响下解救出来的过程延緩下来了，即使得提高他們的階級覺悟、使之轉變到社会主义立場上来的过程延緩下来了。因此，工人参加小資產階級政党对于他們本階級的事业是有害的。这是事实。俄国无产者記住这个事实是很有好处的。

在威納尔·桑巴特^③的《美国为什么沒有社会主义》一书中有一章題为：《工人逃向自由》，很值得注意。这一章描述了美国土地关系对美国无产者覺悟的提高所具有的影响。美国西部“自由土地”的存在（在“自由土地”上当时可能产生“劳动”农場，而且也产生了大量这样的农場）曾經使得“劳动”者容忍了用下述思想所掩盖的資本主义：他自己可以不再为企业主劳动而变成独立的生产者。桑巴特說：“美国資本主义由于国内有大面积的 terra libera^④而得到了发展这个事实的意义，完全不是用确定在长时期內为了摆脱資本主义的依附关系而定居在官有土地上的那些人的数目所

① 亨利·乔治（一八三九——一八九七），北美經濟学家和土地改革家，恩格斯說：“这个人在理論方面是非常落后的。”——譯者注

② 民粹党，十九世紀末叶美国的一个农民政党，主张铁路公有，限制土地所有权。——譯者注

③ 威納尔·桑巴特（一八六三——一九四一），德国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学家，激烈的民族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种族論的宣揚者。——譯者注

④ 自由土地。——譯者注

能概括的。这里应当注意，只要認識到他可以永远做自由的农民，就一定会把欧洲工人所沒有的那种坚定的信心和安定的感觉傳染給美国工人。当人想像(im Wähne lebt)他最終可以摆脱依附地位时，任何依附地位就比較容易忍受了！不言自明，无产階級对待未来經濟生活制度的任务的态度因此一定会获得完全特殊的性质。在資本主义和非資本主义（即“劳动的”农場主的地位——格·普·）之間进行选择的可能性把一切正在产生的对現存經濟制度的不滿情緒从积极的因素变成了消极的因素，并且使任何反資本主义宣传失去了尖銳的性质。”^①

工人所以逃跑到自由的地方，用桑巴特的話說，也就是为了要摆脱資本主义依附关系，变成“劳动的”农場主。这种逃跑的可能性在頗大的程度上可以說明——像桑伯特所設想的——这样一个事实：尽管美国資本主义有巨大的发展，在那里，迄今为止还没有过任何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但是，自由土地的面积正在越来越少，安全閥关得越来越紧，因此桑伯特认为，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美国社会主义的广泛发展。

这对俄国是很有教益的。能够使我国工人摆脱資本主义依附关系的那些自由土地的面积，即使把現在属于地主的全部土地都加上去，也会是很小的。因此事实上工人之逃跑到自由的地方去只可能有极小的規模。但是“劳动派”把这种逃跑的可能性說成是大規模的；它变成了“劳动派”用来安慰不觉悟的工人，妨碍他們清楚理解自己的无产階級的地位和任务的催眠曲主题。“劳动派”同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区别也就在这里。一些人的影响延緩着无产階級階級觉悟的提高；另一些人的影响则加速这个提高过程，它向工人证明，革命以后資本主义絕对不会不再是資本主义了，而雇佣工人之逃跑“到自由的地方去”，結果常常只是一种十分荒唐的梦想而已。可是加速同延緩是不相容的：其一排斥其他。因此这两个

① 參看該书的第 140 頁。——著者注

党始終是完全不能“相容”的，除非它們中間有一个放弃自己的观点。指望发生这种事情暂时是沒有任何根据的。

“劳动派”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間的斗争是必不可免的。必須注意的只是不要让斗争妨碍了“一起打”那些他們可以也应该一起打的人。

为了使我們对“劳动派”的綱領的批判不致妨碍我們“一起打”，我們也应该記住，形而上学的思維会导致荒謬的結果。我們中間那些总是按照“是就是是，非就是非，除此以外，尽是鬼話”的公式发議論的人也許会說：“如果光是由于存在着 terra libera 这个事实就会延緩无产階級觉悟的提高，那我們就应当反对建立这种土地。”但是如果他們願意在实践中照着自己的这个結論做去，那么他們就会变成保守分子，而且一定会对着使得农民尊重大土地占有者的权利的哥薩克的皮鞭唱起贊美歌来。不用說，这种变化是完全不合乎願望的。我国的实际情况現在是这样的：农民“对土地的向往”一定会受到觉悟无产階級的代表的支持。但是支持它完全不意味着不加批判地对待“劳动派”先生、“社会革命党人”先生或者“人民社会党”党员先生在这个問題上过去說过的和可能还要說的一切言論。

四

在今年七月十四日《言論报》的附刊上登載了斯塔夫罗波尔省一百五十位农民給“国家杜馬成員們”的一封值得注意的信。信的作者們建議杜馬捍卫下列綱領：

“（一）打破国王和国家杜馬之間的隔閡。让国王和国家杜馬存在吧，可是你們得給我們土地和自由。

（二）取消戒严狀況和已經建立的警卫队。

（三）废除死刑。

（四）要求政府实行全面的大赦。

（五）实现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七日宣言，把第九款規定为不可

动搖的定則，使得任何法律非經国家杜馬同意不能生效，使得人民选举出来的人能保证得到机会有效地参加监督当局对我们采取的行动的合法性。

(六)要求不分信仰和民族一律权利平等。

(七)要求把官有的、皇室的、国家的、閣部的、寺院的、教会的和地主的土地收归国有，以便把这些土地轉交给农民即全体劳动居民使用，因为这些土地不应当交给任何一个自己并不耕种土地的人使用，而亲自动手耕耘的全体劳动人民则应当拥有土地，他們用自己的鮮血获得了这种土地，而且迄今为止人民都保存着这些土地。然而地主通过农奴制从农民那里夺走了許多土地。农民的土地到哪里去了呢？地主們霸占了，他們并且把它說成是他們固有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不，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不是土地，而是各种财产，例如动产、各类商品、牲口和一切錢币，这才是別人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地主們会說，我們占有的土地，是父輩和祖先給我們掙来的。对，老爷們，的确是这样。可是为什么我們的父輩和祖先沒有給我們掙来呢？要知道我們的父輩并不比你們的少流血，即使他們也掙得了，政府也会說：你們沒有权利享有应得的、父輩的徽号，所以也沒有权利享有应得的、父輩的土地。應該出壮丁，應該守卫疆土，可是当你光靠自己过活，而你又有二百到三百俄亩的土地时，你从哪里拿出壮丁来呢？其实应当根据土地的数量出壮丁。”

这个綱領非常清楚地說明了农民群众的情緒。第一，它表明为了某些政治口号(參看綱領第一节)而致力于立刻“积极发动”的“布尔什維克”的策略在何种范围内是适当的。它同样清楚地表明，那些忘記“劳动”农民所特有的生产关系，而忠誠地想要把这种农民同雇佣工人混淆起来的“劳动派”或他們的弟兄——“社会革命党人”和人民社会党党员在何种程度上犯了錯誤。“劳动的”信作者两只脚都站在“劳动派”的立場上：他們要求把官有的、皇室的、国家的、閣部的、寺院的、教会的和地主的土地轉归全体劳动居民

使用，而且“这些土地不应当交给任何一个自己并不耕种土地的人使用，而亲自动手耕耘的全体劳动人民则应当拥有土地，他们用自己的鲜血获得了这种土地，而且迄今为止人民都保存着这些土地。”你们看，“劳动原则”在这里运用得最彻底不过了。甚至**夺取土地**（“劳动人民用自己的鲜血获得了这种土地”）的事实也被算在它的名下，而且光是后面这个情况就应该使我们怀疑这个著名的原则的逻辑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消灭**，而不是导致它的产生。不过它实际上完全不会导致这种关系的消灭。信的作者说：“不，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不是土地，而是各种财产，例如动产、各类商品、牲口和一切钱币，这才是别人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正像我们所看到的，写这封信的俄国“劳动”农民像美国的农场主一样发议论，这些农场主为了反对大资本，提出了**土地国有化**的要求，变成了亨利·乔治的门徒。商品和一切“钱币”在他们的心目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他们拥护商品生产，然而马克思早就指出过，**商品**生产的内在逻辑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而这是容易理解的。如果可以用“劳动原则”说明“劳动人民”**夺取土地**这个事实，那就再没有比依据这个原则替**剥削他人劳动**作辩护更加自然的了。我的劳动所创造的东西归我所有。我用我自己的劳动产品进行交换时所得到的东西例如“钱币”（“别人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也归我所有。但是如果“钱币”归我所有，那么我用我自己的“钱币”进行交换时所得到的那个**商品**（正像我们所知道的，这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也归我所有。如果这是对的，——实际上这毫无疑义是对的，——那就很容易明白，当我用我的“钱币”进行交换时所获得的而且构成我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的商品竟然是**别人的劳动力**时会出现怎样的社会后果：我这个“劳动农民”就会骑在我的兄弟——无产者的脖子上。要知道，实现“劳动派”的纲领完全保证不了市场上不出现劳动力这个商品。因此完全不可思议的是他们怎么能够把“劳动农民”的地位同雇佣工人的地位混为一谈。他们怎么能够忘记商品生产确定不移

的內在邏輯呢？

他們不是忘記它，而是干脆借助……知識界把它撇開。就像我在上面已經說過的，知識界之所以被他們放在同雇傭工人和勞動農民並列的地位，因為他們認為知識界有神通廣大的社會作用，能夠解決經濟生活中最難以解決的矛盾，使得大家都滿意，也符合正義的利益。知識界對“勞動農民”有影響，它用協作精神教育他們，而用這種精神教育起來的“勞動”農民就不會去追求資本主義，而是嚮往社會主義。烏托邦式的空想很容易對付種種經濟困難。只可惜生活本身並不尊重烏托邦式的空想。現在西方農民中間為數頗多的協作自然會導致社會主義，但要預先通過資本主義階段。這一點在西歐社會黨人士中現在就連“馬克思的批評者”，例如上面引證過的艾·王德威爾得也是承認的。

在這裡我還要指出，斯塔夫羅波爾“勞動”農民的信很好地證實着我在另一個地方就現時大俄羅斯農民對土地私有制的觀點的歷史起源問題說過的。話。“老爺們”之所以沒有土地權，因為他們占有土地的面積同他們因此要給國家“出”的那些“壯丁”的數目不一致。這是在商品生產發展的影響下稍微變了一下樣子的莫斯科俄國的觀點。我說得很對：當農民要求從地主那裡奪回土地時，他們 bona fide^① 和不無歷史根據地認為自己不是革命者，而是我國生活方式古老的經濟基礎的保衛者和恢復者。他們也在力求“使歷史車輪倒轉”。^②

現在我國社會生活大大複雜化了，所以如果農民得以實現自己的意圖，他們因此會促使社會生活前進，而不是使它後退。不過這已經是另一個問題，但這個問題的存在，本身就說明現代俄國農民的意圖具有兩重性，而由於這些意圖的兩重性，無產階級不作非常廣泛的保留就不能對他們表示同情。

使得“勞動派”的經濟概念混亂不堪的那些觀念妨礙他們對

① 真誠地。——譯者注

② 參看《論俄國土地問題》，載本書上冊第301—304頁。——譯者注

这些意图进行批判。而这种有害的观念越多，“劳动派”向“劳动”农民和雇佣工人所许诺的最近的未来就会获得更加乐观的形态。凡是愿意从事耕作的人都可以得到一块土地。这很好。但已故的恩格尔哈尔特（他是《祖国纪事》的固定撰稿人，在这家杂志上，民粹派的大“理论家”沃·瓦·先生曾经发表过文章）早就非常公正指出过，土地不能吃，应当耕耘它；为了耕耘土地，必须有经费。正像大家已经知道的，远不是所有愿意“劳动”的人都有经费。这很坏。但是不必因此感到不安：国家会给每一个愿意“定居下来”的人以耕作“劳动”所必需的经费。这又很好。但在这里，人们不由得想起桑乔·邦萨当年向唐·吉珂德提出过的问题：“云游的骑士拿什么钱过生活？”这个散文式的问题大大地难住了富有诗意的骑士：因为他着手制订自己宏伟的计划时并未预见到它。我认为“劳动派”对于下面这个散文式的问题也难以给予周详认真的回答：国家从哪里拿出钱来供应每一个愿意从事耕作“劳动”的人呢？

国家能够给予公民的只是它从公民那里拿去的那些经费，正确些说，只是这些经费的一部分。因此，维持耕作“劳动”所必需的经费必须通过税收才能取得。国家将向谁课征赋税呢？大土地占有者么？但是在实现了“劳动派”的纲领以后，大土地占有者那里只剩下或多或少愉快的回忆。这就是说，必须课征的：**第一**是同一一些“劳动的”农耕者；**第二**是在工商业部门里“劳动”的人。关于前者：他们可能同意的赋税（虽然我不确信会同意）就是从已经从事耕作的人那里征收经费，并把这些经费交给一心打算“逃跑到自由的地方去”的那些人。如果他们同意这种赋税（我再说一遍，这完全是可以怀疑的），那么从这方面说来，事情就会顺利地进行。农业的俄国就会成为像实际的农耕者和可能的农耕者互相保证避免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不利环境的大公司之类的某种东西。而对于从事工业劳动的人又该怎么说呢？是不是为了耕作“劳动”的利益向他们课征赋税呢？如果课征，那么又对谁呢？只是对“劳动的”

企业主^①呢，还是也对“劳动的”工人呢？至于說到资本家，我愿意把他們交出去让“劳动派”随意处理。但是我耽心，你从他們那里拿不出很多东西来，而不得不向雇佣工人征税。这又坏了。为了支持独立的小生产者而向无产者征税，这等于是干一件非正义的（要知道“劳动派”是十分頻繁地和十分乐意地援引正义的！）和 *par excellence*^② 反动的行为。自然，所有觉悟无产阶级的代表一定会最坚决地起来反对这种税收的。

邏輯总归是好的，即使在非正义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如果为了支持独立的小生产者而向无产者征税，那么我就不理解，为什么只应当为了“劳动的”农耕者的利益而向无产者征税，却不可以为了“劳动的”皮鞋匠、“劳动的”成衣匠、“劳动的”面包商、“劳动的”棺材匠等等的利益向无产者征税呢？一句话，为什么不同时为了所有从事工业劳动的小市民的利益向无产者征税呢？为什么不宣布，正义要求为大资产者劳动的无产者也为小资产者劳动呢？

五

“劳动派”是很可爱的人：他們会带着善意的微笑反駁我說：“我們要使无产者完全免除賦稅。”在这里我又不得不喊道：这很好！但是在这种事情上光有善良的心願是不够的。因此我要問一問：先生，您要使无产者免除什么样的賦稅呢？如果是直接稅，这并不多：維特先生自己也不見得能够向真正的无产者征收到直接稅。在资产阶级国家中要使无产者免除間接稅是很困难的，而且我們有充分的权利假定，即使在“劳动”党当政的条件下，它也不能在俄国生产力的这种状况下完全取消間接稅。只要有間接稅存在，无产阶级就会十分认真地注視着国家是不是从他們的口袋里

① “劳动的”一詞有时是很富于伸缩性的。几个月以前一个非常而又非常——像果戈理会說的一样——出色的人在自己的告英勇的俄国贵族代表大会书中曾把这次大会称为“劳动的貴族”代表大会。——著者注

② 特別。——譯者注

拿錢去培植“劳动的”农业小市民。这就是說，实现“劳动派”答应国家将援助所有願意献身耕作“劳动”的人这一条綱領，可能大大有利于“劳动的”农耕者，而这种利益同无产者的利益是直接相反的。无产阶级思想家有义务提醒工人注意这一点。

無論怎样反复观察“劳动派”的（以及“社会革命党人”的，以及人民社会党的）綱領，它的小资产阶级本性都不能不引起每一个按照邏輯进行思考的人的注意，因此我准备就这个問題在俄国著作史領域內作一次小小的便游。

有一个时期斯拉夫派同西欧派在俄国文化发展应该通过什么道路的問題上进行过激烈的爭論。在別林斯基、克·阿克薩柯夫、伊·屠格涅夫、霍米雅柯夫时代，这个爭論具有純粹哲学的、抽象的性质。但是早在伊·阿克薩柯夫那里，斯拉夫主义的抽象原理在頗大的程度上被翻譯成政治經濟学的語言，并且获得了**资产阶级**的色彩。被西方“腐烂的东西”所敗坏了的城市在他那里是同“有工厂和家庭手工业的村鎮”对立的。被同一个伊·阿克薩柯夫非常中肯地称之为不彻底的**斯拉夫派**的民粹派分子，繼續把村鎮同他們认为建立了资本主义文化的城市对立起来，但是他們已經懂得村鎮的工厂也是像城市的工厂一样的资本主义企业。因此他們把农民和一直包括“工长”在內的家庭手工业者美化为“人民的”生产方式的代表。伊·阿克薩柯夫的大资产阶级傾向在民粹派分子那里获得了**小资产阶级**的性质^①。民粹派的理論家大多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現今的“社会革命党人”和“人民社会党”領袖們也是同样的思想家。他們中間的區別只是空想主义成分多少不等的枝节問題。不过在“現時”就連空想主义也要使自己至少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外表。因此借用社会民主党理論家的言論的現象就应运而生。但是在这里事情也不是沒有“困难”的。除了几个不明白地轉述馬克思明白的学說的引文专家以外，在真正的社会民主党理論代表那里很少找得到能充当辯护者的人。因此不得不向社会

^① 我指的是我国合法的民粹派分子沃·瓦·先生之流。——著者注

民主党右翼求教，借用伯恩斯坦、大卫之流的智慧。我国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家都自称是极端的革命者，而在理论上（特别是在土地问题上），他们都抓住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后襟。历史命运多么凶狠地捉弄人啊！

斯拉夫派同西欧派过去的这场大争论就这样结束了。现代的西欧派代表站在工人阶级的观点上，现代的民粹派代表站在小资产阶级的观点上。目前斯拉夫派的倾向是用黑格尔的语言来表达的，在这些倾向中仍然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当它们开始为从大卫和伯恩斯坦那里借用来的理由所充实的时候，它们就变得像镜子一样明亮。不能不对如此巨大的进步感到高兴……

然而我们同乌托邦已经打够交道了！反动分子之所以特别反对我们，因为我们早就厌恶一切种类的反动派。我们将坚决地驳斥由我国小资产阶级政党的纲领集其大成的那整个反动的空洞计划。不过希望他们不要因为我们的批评而产生误解。因此，凡是他们在同官僚制度、封建等级制度的“余孽”以及其他各种黑暗势力作斗争时真正站在前列的地方，我们都会更坚决地支持他们。

同时，为了向他们证明我们的好意，我在结尾的时候向他们的信徒们提出一个友善的忠告：先生们，请记住，“劳动的”农民首先是有经济才干的人。彼特卢凯维奇先生在赫尔辛福斯代表大会上报告说：“在国家印刷厂刊印解散国家杜马的法令的同一天夜里，四十名参加‘劳动派’的农民联合了二十名无党派农民签署了成立特殊的——农民的——集团的会议记录，这个集团按其观点而言与其说接近劳动派，不如说更接近立宪民主党得多。”^①先生们，你们对为什么发生了这种事情是怎样想的呢？显然，农村的“劳动派分子”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劳动”党的“劳动派分子”是不够认真的人。Caveant consules！^②

以后，小资产阶级（无论是在生产过程中实际进行劳动的那个

① 《同志报》，第七十四号。——著者注

② 当心啊！——译者注

小資產階級，或者是主要从事于美化这个后者的那个小資產階級）自然会轉到它希望“攀上亲戚”的那个无产階級方面来，即轉到現在正在彼得堡受审判的那个无产階級方面来。这次审判暴露了一些非常值得注意的事实，并且引起了非常特出的和有征兆性的現象。这些現象再一次表明，觉悟的无产階級代表現在应当、也有可能冲出小組习气的狹隘范围，而投身于群众运动的广闊的海洋。但是——可惜！——并非所有自动担負起代表无产階級利益的責任的人都有很高的觉悟。他們中間有些人現在就写文章反对工人代表大会，这种情况不止一次地使我痛心地说道：哪能有这样的无产階級代表啊？！然而竟然有这样的代表，真是可叹！不过对于这类大作部分地我得在其他地方評述，而部分地也許在这里談談，不过是在另一次。

（譯自《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十五卷第191—217頁）

第二封信

这封信最初发表在一九〇六年第十一期《現代生活》杂志上。普列汉諾夫从当时刚出版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致左尔格等人的书信集中摘引了一段又一段的話（在第三封信和第四封信中繼續引用了同样性质的話），企图证明布尔什維克是宗派主义者，重犯了恩格斯批評过的英美社会党人的錯誤，同时证明孟什維克在国家杜馬、选举協議、临时革命政府、工会运动以及对待黑帮工人的态度等問題上的策略观点是“正統的”。

为了揭露这种恶劣手法，全面闡释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信件的巨大的理論价值和政治意义，“回答敌人”的歪曲，列宁在一九〇七年四月专门写了《〈貝克尔、狄慈根、恩格斯、馬克思等致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譯本序言》。（《列宁全集》第十二卷）

列宁指出，普列汉诺夫这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长舌妇喋喋不休地谈论”恩格斯和马克思如何“坚决号召英美社会党人”“同工人运动打成一片，铲除自己组织中的狭隘的顽固的宗派主义精神”，但是对他们坚决教导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要陷入庸俗观点、‘议会迷’……和市侩知识分子机会主义的泥坑”却“闭口不谈”，他不去分析“英美工人运动的基本特点”，而把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对于英美工人运动的劝告……简单地直接地应用到”历史条件完全不同的俄国来，这不仅是“极其肤浅”的，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侮辱”，“用议会主义观点把工人运动的任务庸俗化和用庸人观点缩小工人运动的规模”。

关于普列汉诺夫对列宁“规定八月中旬或八月底”举行起义的嘲笑，列宁回答说：革命家有时也可能犯错误，“但是一直在努力提高并且已经提高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水平，使他们超出日常细小的任务范围的……伟大的革命思想家所犯过的这种错误，同大叫大嚷，信口开河，妄说革命是无谓忙碌，革命斗争徒劳无益，反革命的‘立宪’幻梦妙不可言的那些官场自由派的拙劣的智慧比较起来，要高尚千倍，伟大千倍，在历史上宝贵千倍，正确千倍”（同上第347、348、356、357、362页）。列宁还在《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同上第十二卷）等著作中批判了普列汉诺夫的这种“迂腐到不可救药的”“庸俗知识分子的观点”。

一年以前我国的“旧制度”亡故了，我国的“宪法”诞生了。死者有一些十分重要的特性，以致连思想保守的人也未能对它的死表示衷心的怜惜；衷心怜惜它的只是它的一些“忠实奴才”，因为它给他们带来了直接的物质利益，在它统治之下目无法纪的行为到

处盛行，他們可以不受懲罰地掠奪“托付給他們的”居民。以公民为主体的俄国居民充滿了喜悅。但是大家知道，他們的喜悅为时并不长久，因为新誕生的“宪法”刚一出世很快就开始暴露了和它的长眠地下的先人曾經充分具有的特性完全一样的重要特性，甚至更加重要得多的特性。这里，所罗門王死后发生的事情又重演了。您記得聖經嗎？“耶罗波安和以色列会众都來見（新王）罗波安，对他說：

“你父亲使我們背負重軛，你要是把你父亲强迫我們作的苦工和他使我們背負的重軛減輕一些，那时我們就会侍奉你。

“于是罗波安對他們說：你們暫且去吧，过三天再來見我。百姓就去了。”

过了三天，罗波安受了年輕的謀士的影响，“用严厉的話回答了百姓”。

“于是他照着年輕人所出的主意对百姓說：我父亲使你們背負重軛，我得使你們背負更重的軛；我父亲用鞭子責打你們，我要用蠟子鞭責打你們。”

这个聖經故事的含义就是：“因为上帝是这样注定的。”^①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誰对我国的“宪法”說过什么“話”。很可能“話”是說过的，例如費多罗夫的儿子德·特列波夫就說过。但是不管怎样，事实总是：我国的“宪法”原来比我国的“旧制度”更加殘暴得多，如果說后者使我們背負重軛，那么前者就使我們背負更重的軛；如果說后者用鞭子責打我們，那么前者就在用蠟子鞭責打我們。

像斯托雷平先生也許要說的那樣，百姓很不喜欢罗波安的自由主义：“于是以色列人都回自己的帳篷去了”，离开了罗波安^②。总之，事情的結果完全不如罗波安的“自由派”謀士們所希望的那樣：他們的划算大錯特錯了。

① 參看《聖經》，《列王紀上》，第十二章第二——十四節。——譯者注

② 同上。——譯者注

俄国的公民們也不喜欢現在我国的“立宪派”部长們用来責打他們的蠍子鞭。他們也会“都回到自己的帳篷去”，并且采取力所能及的种种措施摆脱蠍子鞭。于是整个問題現在就在于他們在自己的“帳篷”里所想出来的那些措施本身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是适当的。

上一次我談到了立宪民主党赫尔幸福斯代表大会上想出来的各种措施。現在我想談一談聚集在无产階級的“帳篷”里的人們本来可能而且應該做的事情。

我想根据他們从我国“旧制度”結束和“立宪”紀元开始以来已經做过的事情來談一談。

他們在这个如此多事之秋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事情做了不少。可惜的是远非所有他們做过的事情，从他們所捍卫的利益观点看来都可以受到称赞。更果断些說，更坦率更尖銳些說：他們做了許多他們本来不該做、而且如果他們善于使自己的手段同自己的目的結合起來的話他們一定不会去做的事情。这是令人痛心的真理，但这是真理，而且为了事业的利益必須把它說出來。

馬克思在自己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书中說道：“无产階級革命經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經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作一遍；它們无情地、确有根据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① 馬克思的这段話是針對无产階級爭取从資本主义关系的压迫下把自己解放出来的最初企图說的。但是这段話，对于他們在不得不——像我們俄国的情况一样——以爭取政治自由的先进战士的面目出現时所作的那些企图，也可以适用。經常严厉地批判自己的行动，无情地嘲笑这些行动的弱点，至少看来是它應該做的事情，对它也許会很有益处。批評自己一般說來是很有

①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125頁。——譯者注

益处的^①。

自我批評对于正在通过自己发展最初阶段的无产阶级說来更加有益。这样的无产阶级沒有为数众多的“知識分子”的效劳是根本不行的。为数众多的“知識分子”在为它效劳时就会对它的一切行动发生决定性的影响。无产阶级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上的策略实质上总是知識分子的策略。然而这种策略远不是始終同真正的工人阶级的任务相适应的。在这方面，法国的历史提供了不少有教益的事例。

到上世紀三十年代末期，法国的革命运动已經几乎是純粹的无产阶级运动了。然而虽然它是无产阶级的运动，运动参加者所采取的手段和策略本身却很少无产阶级的东西。这种策略和这些手段都是陰謀家的策略和手段。它們的特点究竟是什么呢？我在說明这些特点的时候曾經不止一次地引用过恩格斯的权威性的証言。在二月革命直接准备时期他曾經住在法国，并且很好地研究过当时法国陰謀家們的心理。恩格斯說：“不用說，陰謀家并沒有限于組織革命的无产阶级；他們所追求的正是超过革命的发展过程，在其中引起人为的危机，在革命所必需的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制造革命。”既然这些暂时还不存在的条件的形成不以他們为轉移，所以为了加速革命的发展过程他們就把自己的努力用到完全取决于他們的有計劃的影响方面去了。他們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虛构最好的陰謀組織上。恩格斯称他們是革命的炼丹术士，并且补充說，旧日黄金时代的炼丹术士所特有的那种混乱概念和狹隘观点也是他們所固有的。“他們曾經力求发现一些一定会实现革命的奇迹的东西：炸弹、有神奇力量的定时炸弹、起义。他們的合理的論据越少，这些东西所起的作用就一定会更加强大和更加惊人。”

① 馬克思的“批評者”之所以名譽扫地，不是因為他們是批評者，而是因為他們的批評是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最大的倒退現象。这样的批評不是反对学說的弱點，而是反对学說的优点，因此它本身就是一个弱點，而且應該受到无情的嘲笑。——著者注

恩格斯称这一类的阴谋家是**街头起义的军官**。他们也的确是这样的军官。而且——为了他们的荣誉应当这样说——他们在大多数场合表现了真正是英雄的勇敢精神。但是如果说勇敢精神足以制胜敌人，那么完全不可理解的是，为什么通常以无可非议的英勇精神著称的野蛮部落在同文明民族作战时就遭到失败。大家知道，他们失败的秘密在于他们的战斗力比文明民族的武装力量差到不知哪里去了。法国阴谋家的战斗力同他们所反对的政府的武装力量的关系，大致上也是这样。这就说明为什么阴谋家虽然英勇非凡，却预先注定要遭受不断的失败。而且他们的这些失败也就是工人阶级的失败，因为在初期，觉悟的工人——正像我已经说过的一样——是在阴谋家们的领导下进行发动的，而且整个地接受了他们的全部观点和全部习惯。后来，只有在不断失败的影响下，工人阶级中间才开始产生了一种模糊的认识，懂得阴谋家的策略对它是完全不适合的。然而这种认识越是变得明显，阴谋家的影响就越是下降，那些不以直接起义为目的、而以**组织工人阶级的力量和提高它的觉悟为目的**的秘密工人团体的影响就越是增长。而且这一类工人团体的影响越是增长，当时法国政治制度的地位就变得更加不稳固了。勇于牺牲、但不聪明的革命事业的炼丹术士们曾经如此热情如此毫无成效地追求的那个革命就会到来得更加迅速。这些炼丹术士们视为背叛革命的那种斗争手段和那个策略，实际上乃是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

总之，在无产阶级政治发展的最初阶段上，自我批评是无产阶级所必需的，特别从理解知识分子的策略的弱点来看是如此。这种策略的没有根据越是迅速地暴露在它的面前，它就越会接近胜利。

俄国公民获得了他们独特的宪法以后一年来的事变，提供了大量的材料，可以判断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那些人的策略在何种程度上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无产阶级一定要在作这种判断时运用自我批评。

我国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领导人的策略的主要特点是：它远不适应于他们所拥有的力量。它完全是以极端地、难以置信地夸大这些力量为依据的。在上面引证的那本书中，马克思在形容法国民主党时说道：“没有一个政党像民主党这样夸大自己的能力，也没有一个政党像民主党这样轻率地错误估计局势。当一部分军队投票赞成山岳党的时候，山岳党就认为，军队会举行起义来拥护它。”^① 遗憾的是现在不能不说，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没有一个政党像站在工人阶级利益的观点上的那个党这样夸大自己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对待军队的态度上它也尽量地重犯了过去法国民主派那种令人痛心的错误。对于这一点我本来可以举出不少有教益的事例。但我想它们可能是大家都知道的。谁不知道它们，我就介绍他去看《一九〇五年十二月的莫斯科》一书（莫斯科，一九〇六年），这本书可以再好不过地满足他的好奇心。我不打算在这里来研究为什么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至少是通过自己的某一部分——重犯了四十年代末法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错误的問題。这会使我离题太远。我只要说，无论在这里，或者在那里，无论在这个时期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中间，或者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间，居领导地位的都是知识分子，所以应当在这个情况中去寻找为什么发生了看起来似乎完全不应该有的事情，即为什么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部分说来很像法国资产阶级民主党人的问题的答案。不过我在这里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解释这个原因和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我只要弄清我刚才所指出的我国社会民主党知识分子的策略的根本缺点是由什么决定的就达到目的了。所以在这里，我应当回顾一下恩格斯曾经如此中肯地形容过的法国街头起义的军官们的心理。顺便我要提醒一下读者，这主要地也是知识分子的心理，虽说在“军官们”中间有许多工人。

我們已經知道，这些人企图“超过革命的发展过程，在其中引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155页。——译者注

起人为的危机，在革命所必需的条件还不具备的那个时候制造革命。”然而誰企图超过革命的发展过程，他自然就会使自己产生一种情緒，从而失去正确地估价他面前发生的事件的意义的能Ⓔ力。他就会失去政治上的“目测力”，并且把实际上是发展过程的一个中間阶段当作这个过程的終結。而誰失去政治上的目测力，他就会喜欢夸大自己的力量和能Ⓔ力，这也是十分自然的。

过去一年的历史清楚地表明这种情况在现实中是怎样发生的。大家知道，我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間有很多人认为必須“抵制”杜馬。他們是怎样維护自己的观点的呢？为了說明这个问题，我引证一下有一次我不得不加以引证的“布尔什維克”帕·奥尔洛夫斯基的話。

帕·奥尔洛夫斯基在《我們的思想报》上发表了《国家杜馬》一文，尖銳地批評了杜馬据以召集的那个法律。他得出了这样的結論，說只要这个法律是不能令人滿意的，那就不应当参加选举。而且为了說明这个道理，他硬說：人民要求“根据普遍、直接、平等和秘密选举权原則召开立宪會議”，可是人們对它的答复首先是八月六日的法律，而后是很少改变局势的十二月十一日的法律。早在一九〇六年二月我就用下面的話反駁过帕·奥尔洛夫斯基的这个論据。

“要是真正这样，那么我們之参加选举也确实是完全多余的，甚至是很有害的。这时，人民要求立宪會議，他們却参加杜馬选举，这只会使人惊讶。但是事情其实并不如此！帕·奥尔洛夫斯基把自己的願望当作现实。他希望全体人民都要求立宪會議，于是乎他就觉得全体人民当真有这个要求。这是心理上的錯觉。而抵制选举的策略就建立在这么一种心理錯觉的基础上。請你們自己評断評断看，以心理錯觉为依据的政治行动能不能是正确的。

真正說来，远不是全体人民現在都有开立宪會議的要求……我国反动的官僚制度正在不遺余力地迫使人民要求立宪會議。而在人民中間，一种可能使这种要求脫穎而出的情緒正在日益广泛

地弥漫开来。不过目前还只在弥漫。这是整整一个过程，我們还没有到瓜熟蒂落的时候，也許我們甚至还在半腰中間。但是我們可以用自己的行动大大加速这个过程，而参加选举却就有此效能”……①

我現在从自己的論杜馬选举一文中把这段話摘引出来。当这篇文章問世的时候，它在帕·奥尔洛夫斯基的同志們中間以及——这是不言而喻的——在同我有一些很老很老的著作家的我国“社会革命党人”中間引起了一片勃发的憤怒声。“社会革命党”的一个政論家——他还没有养好在关于土地問題的爭論中我曾給他造成的伤疤——挖苦地罵我是立宪民主党式的社会民主党人。本着我素有的謙让精神，我完全没有評論后面这个狂妄行为。我預先就清楚地知道，時間会十分明显地证明我的話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它的确十分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

我且不說今年春天我对待“抵制”的否定看法的正确性已經得到俄国无产阶级政党最高机关的承认。这个机关的判決在帕·奥尔洛夫斯基的同志們看来很少令人信服。在“社会革命党人”先生們看来，不用說，它是更加沒有說服力量的。但是我有另一个、虽然是間接的承认。我面前摆着一本小册子：《杜馬的解散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它出自最“强硬的布尔什維克”的手笔。而且在这本小册子中我很滿意地發現如下一段意味非常深长的話：“人民，即广大的居民群众，到一九〇六年时还没有成长到具有自觉的革命性。大家普遍感觉到对专制制度不能容忍，官僚政府不中用，人民代表机关必須建立。但是，人民还不能意識到和感觉到旧政权同有**权力**的人民代表机关之間是不能調和的。看来，人民在这方面还需要有特別的經驗，立宪民主党杜馬的經驗。”②

总之，“看来”，人民需要立宪民主党杜馬的經驗。然而如果

① 參看本书上册第321—322頁。——譯者注

② 該小册子第2—3頁。（參看《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96—97頁。——譯者注）
——著者注

需要这种經驗，那么无产阶级的代表本来就应当参加到杜馬中去。而如果他們本来应当参加进去，那么他們就不应当“抵制”杜馬。而如果他們不应当“抵制”杜馬，那么建議“抵制”它的帕·奥尔洛夫斯基就是不对的，而发现“抵制”是巨大的政治錯誤的我就是对。最后，如果帕·奥尔洛夫斯基是不对的，而我是对的，那么現在認識到“看来”我們枉然地攻击了普列汉諾夫先生就会是公允的了。但是“看来”我引证的小册子的作者并不願意承认这一点。更有甚者：他不仅对这一点表示了沉默，而且有放肆的本領硬說“布尔什維克”、帕·奥尔洛夫斯基的同志們是对的。他还把我算作“不很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①。我无法确定，这个显然“坚定的”人究竟缺少什么：邏輯还是其他东西。

当我說出抵制杜馬是政治錯誤那个看法时（“看来”这个看法过去是正确的），我主要是依据这样一个理由的：即群众最可靠的教师是他們自己的經驗，这是任何宣言和任何決議絕對代替不了的。我說过，相信經驗对于群众的政治教育事业具有决定意义，本身是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依据的。因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說：不是意識決定存在，而是存在決定意識。我在同帕·奥尔洛夫斯基同志的辯論時曾經不止一次地重复过自己的这个主要理由。而且当我重复它的时候，我知道在这种場合下我仍然是忠实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的。但那时我毕竟沒有明显的证据可以证明我真正是忠实于它的。現在我有这种证据了：

在刚刚出版的、总的說来本身包含着許多非常值得注意的材料的《約·菲·貝克尔、約·狄慈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卡尔·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一书中，可以发现恩格斯的几封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有直接关系的信。而且我怀着滿意的心情看到，恩格斯几乎是用我在同布尔什維克就这个策略进行爭論時曾經用过的同一些話談到这个策略的。例如，恩格斯在一八

^① 參看《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99頁。——譯者注

八七年一月就当时美国无产阶级运动写信给威士涅威茨基夫人说(威士涅威茨基夫人是美国人,嫁给一个俄国流亡者;曾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本名著译成了英文);

“美国的运动,在目前我认为从大洋的这一边看得最清楚^①。在当地,私人之间的纠纷和地方上的争论必然要使运动的伟大意义大大地模糊起来。真正能够使运动的向前发展推迟的唯一东西,就是这些分歧结合^②成一些独立的宗派。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情形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愈少愈好。而德国人^③尤其应当提防这一点。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且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Our theory is a theory of evolution, not a dogma to be learnt by heart and to be repeated mechanically)。愈是不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愈是通过他们自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愈会深入到他们的心坎里面去。当我们在1848年春天回到德国的时候,我们参加了民主政党,因为这是唯一能使工人阶级听到我们的声音的一种手段(as the only possible means of gaining the ear of the working class);我们是该党的最先进的一翼,但毕竟是它的一翼。当马克思创立国际的时候,他草拟的共同规章允许当时工人阶级中的一切社会主义者(all working class socialists)——蒲鲁东分子、比埃尔-勒鲁分子、甚至英国工联中的比较先进的部分参加国际;而只是由于国际所容纳的范围这样广泛,它才成为它当时的那

① 在我国——而且不仅在我国——许多人都认为,政治观点的明白性是随着地理距离的加大而降低的。可以看出,恩格斯是不赞成这个观点的,至少对当时的美国是如此。——著者注

② consolidation(结合。——译者注);信是用英文写的。——著者注

③ Under dem Beistand der Deutschen(在德国人的帮助下。——译者注);这里有几行是用德文写的。恩格斯谈到德国人时指的是流亡在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他们企图在美国进行社会民主主义宣传,但是当时很少取得效果,因为他们对于检验在群众教育事业中的重要意义理解得很坏。恩格斯在自己的信中止一次地用责备的口吻提醒他们注意这种情况。——著者注

个样子，即成为逐步地溶解和吸取除无政府主义者外的各个比較小的宗派的一种工具，原来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在各个国家里的突然出现不过是公社失败以后激烈的资产阶级反动的結果……如果我們在一八六四——一八七三年間坚持只和那些公开承认我們的綱領的人合作，那么我們現在会处于什么境地呢？我认为，我們的全部实践已經证明，可以同各个阶段上的工人阶级的普遍性运动进行合作，而无需放弃或隐瞒我們自己的明确立場甚至組織；我耽心的是，如果美籍德国人选择另一条道路，那他們就会犯重大的錯誤。”^①

恩格斯在同年二月九日的信中对同一个威士涅威茨基夫人說：“您耽心我对美国的运动的想法是过分屈从于爱威琳^②的影响的結果，这种耽心是沒有根据的。只要产生了不以德国人为轉移的美国工人阶级的民族运动，事实就会命令我采取我的观点。这个伟大的民族运动，無論它最初是什么样子，都是美国工人阶级发展的起点；如果德国人参加进去，以便帮助它，或者朝应有的方向加速它的进行，他們是可以做出有益的事情来的，也可以起决定性的作用；假使他們要单干，那他們就会变成教条主义的宗派（a dogmatic sect），并且将像不理解他們自己的原則的人一样（as people, who do not understand their own principles）遭到抛弃。了解自己的父亲是怎样行动的爱威琳夫人^③一开始就清楚地懂得这个道理，要是爱威琳也懂得这点，那就更好了。所以我寄往美国的全部信件：給左尔格的，給您的，給爱威琳的，一开始都一再反复不断地說明了这个观点。”^④

① 該书第248—249頁。（參看《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443—444頁。——譯者注）——著者注

② 指爱德华·爱威琳，他当时刚刚从美国旅行回来，并且坚决地譴責了“美籍德国人”当时的策略。——著者注

③ 指爱德华·爱威琳的妻子，馬克思的幼女爱蓮諾。——著者注

④ 該书第250—251頁。（參看《馬克思恩格斯給美国人的信》，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200頁。——譯者注）——著者注

是年六月，恩格斯在給左尔格的信中写道：«Die Massen lernen aber nur durch die Folgen ihrer eigenen Böcke»（群众只是通过他們自己的錯誤的种种后果进行学习的）^①。

我本可以再引几段类似的話，但是我上面摘录的这些話已經十分清楚地表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多么善于把不是思維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思維这条社会学定理运用来解决策略問題。“群众只是通过他們自己的錯誤的种种后果进行学习的”，这就是运用于策略时的全部馬克思主义。上世紀八十年代“美籍德国人”（用恩格斯的話說）所面临的选择同我国立宪运动初期我国社会民主党人所面临的选择是一模一样的^②；或者他們参加这个运动，以便朝应有的方向加速它的发展，从而做出有益的事情来，并且起决定性的作用；或者他們为了自己的教条主义的“口号”开始单干，并且在变成教条主义的宗派以后将被历史所抛弃，像不理解他們自己的原則的人們一样。“抵制”或者“不抵制”杜馬的爭論的中心內容是这样一個問題：面对着这种选择——即参加人民群众的立宪运动呢，还是对它向之以背，并且像列宁在一九〇六年春天所做的一样，宣布杜馬不是站在我国解放运动的大道上呢——应该怎么办。我国无产阶级思想家們——当时大多数——宁願对人民自己的运动向之以背，并且想使人民相信他們的政治“口号”的优越性。这样他們就可悲地证明他們“不理解他們自己的原則”。他們相信自己的“口号”具有能生奇效的力量，却没有料到，人民群众只有“通过这些錯誤的后果”即通过他們自己的政治經驗才会承认这些“口号”的正确性。

这些思想家在何种程度上重犯了法国资产阶级民主党人的錯誤，換句話說，他們把自己的力量夸大了何种程度，可以从他們中間許多人怎样对待臭名昭彰的“黑帮分子”的态度中清楚地看出

① 該书第272頁。〔參看上书第224頁。——譯者注〕——著者注

② 我没有提到“社会革命党人”；这些人总是胡說八道，——这一定是上帝本来如此安排的，而且伏尔泰主义者徒然对此表示反对。——著者注

来。他們迫不及待地要投入同黑帮分子的战斗，用武力击退他們的暴力。自然，这并没有什么不好。相反，凡是可大规模地坚决反击黑帮的地方，例如在彼得堡就是如此，这种反击都拯救了俄国无产阶级的荣誉。但是在组织反击黑帮的时候，应该问一问自己，他們是由哪些社会分子组成的。只要稍微仔细地对待事实，立即就会明白，他們的成员不仅有物质上关心于保存无权地位的人，而且也有**本性上**按照自己的粗野的“样式”起来反对我国旧制度的人。

这样的人就是不觉悟的工人，特别是黑帮工人。早在我国“立宪”纪元的初期，我就在自己的一篇论文^①中指出过一个十分重要的情况，即某些黑帮分子的传单号召人民“捣毁酒吧间”。这些传单的作者們对于我国居民的落后阶层的心理了解得不坏。可是如果他们这些誓死反对任何民主制度的人发现必须唆使人民捣毁酒吧间，那就表明，跟在他們后面走的人們中間有許多人本身并不厌恶民主主义倾向。这些倾向在这些人那里是用十分荒谬的、凶残的形态表现出来的；但它們无疑是存在的，而且无产阶级的思想家在自己反对黑帮分子腐蚀这些人的斗争中是可以而且应该依靠它們。必须做的事情只是启发有民主主义意图的黑帮分子的**落后意识**，——这些黑帮工人虽然用行动对自己受奴役的处境表示了抗議，却不善于分清誰是他們的敌人和誰是他們的朋友。人們不止一次地试图这样做过。而且几乎每当他們这样做的时候，他們都取得了辉煌的、常常是难以置信的成就。有时真正发生了像福音书上瞎子突然变成了光子^②一样的奇迹。而且正是因为这样的奇迹是可能的，才必须使觉悟的无产阶级经常从思想上影响黑帮分子。无产阶级政党在我国凶残的“旧制度”已经寿终正寝而它的更加凶残的女儿——“宪法”——开始向人民呼吁，号召他們攻击“背叛者”、“犹太佬”、“民主党人”等等时的最重要的一项实际任务

① 指《論黑帮分子》，參看本書上冊第311—317頁。——譯者注

② 參看《聖經》《馬太福音》第九章第二十七—三十節。——譯者注

就在这里。这个极其重要的实际任务可惜没有得到充分全面的解决。而它之所以没有得到解决，因为远不是所有的无产阶级思想家都懂得它的全部重要性。他们夸大了他们所控制的力量，并且认为单是这些力量就足以实现他们的极端的政治“口号”。

在工会方面情形也是一样。组织工会意味着组织无产阶级的力量。这样的组织处处都是必要的。它在俄国特别必要，因为俄国无产阶级肩上挑着解放运动的重担。如果不是全部重担，也是大部分重担。在这个运动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工会组织越是为数众多，无产阶级在摆脱了“旧日黄金时代”的残余的新社会中所占的那个阵地就会变得更加强大。诚然，在建立工会的道路上有许多警方的障碍。但是，无产阶级在同这些障碍发生冲突的过程中会越来越相信必须彻底破坏它们，从而扩大自己的政治视野，加深自己的阶级认识，获得对经济和政治这两者之间的联系的确切观念。毫无疑问，组织工会也是去年十月在无产阶级思想家面前提出的头等重要的实践任务。我并不认为无产阶级的思想家们都忽视了这个任务。不。他们某些人曾经为解决这个任务做过工作。但他们没有做过一般说来为了我国整个解放运动的利益而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利益他们所能做和本来应当做的工作。他们的大多数人都顾不上这样做；他们狂热地急于**超过革命的发展过程**；他们发现必须预先实现自己的政治“口号”。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实现这些口号要以实现一系列的**先决条件为前提**，在这些条件中占首要地位的是**组织无产阶级的力量**和使它的有组织的——因之也就是多少有觉悟的——力量去影响还处于黑帮鼓动家影响下的没有觉悟的无产阶级阶层。在许多人看来，组织工会的工作是写枯燥无味的散文。这在他们可以——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轻而易举地撰写立即彻底地对皮鞭、木棍和……暴行的骑士战而胜之的**诗篇**的时候是不必要的和不适当的。

当我在刊物上指出写工会的散文现在多么重要的时候，我收到了读者不少信件。这些信，用不同的方式和或多或少严厉的口

吻重复了同一个調子：**現在我們顾不上工会**。往后的事变证明了我的这些或多或少有詩意的和严厉的通訊人多么的不正确。我現在在根本无意于从他們的錯誤中撈他們一把。但我认为指出下面一点是有益的：他們的錯誤也是由于想通过极端夸大他們自己的力量来超过革命的发展过程所引起的。

在涉及同旧制度进行**直接**斗争的方式問題的那些場合下，这种意图和这种夸大就采取了更大的規模。工人代表苏維埃一案的被告人之一布伦施坦-托洛茨基在解释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苏維埃會議上通过的武装起义決議的意义时說道：

“这个苏維埃是不是认为准备武装起义就等于預先貯备武器，把一个城市分为若干区，而当他們遇到什么混乱状态的时候就做軍事当局要做的一切呢？”

“——不！”

“准备武装起义，在我們看来，意味着用必定会发生冲突的信念来教育人民群众，使他們認識到只有团结起来的力量才能取得胜利，而当将来必須給旧政府以反击的时候，决定性的时刻就来到了。

“这就是准备武装起义的根本內容。

“革命的观念同街垒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即使是街垒也有純粹精神上的意义。它們的作用在于团结革命的群众，給他們灌輸視死如归的信念，从而保证取得胜利。

“当人民决心为未来的幸福而赴湯蹈火的时候，起义就准备好了。”^①

从理論上說，布伦施坦-托洛茨基的这番話完全沒有說明問題。甚至可以不无根据地断言，它們給問題帶來了某种新的錯誤因素。好像从这里可以得出結論說，只要吹一吹号角就可以使耶利哥的城市塌下来。但是“就現在說”，这个錯誤因素，同像我上面

① 引文根据《同志报》提供的关于訴訟过程的报告。 著者注

提到的法国阴谋家和托洛茨基提到的烧炭党人那样理解起义的那些人的錯誤比較起来，肯定是微不足道的。这些人酷嗜革命的“技术”，并且真正地力求“把一个城市分为若干区”，而当他們遇到某种混乱状态时就去实现軍事当局要实现的一切。这些人才是真正的革命炼丹术士，可惜的是一九〇六年我国有許多这样的人。这些人接受了革命小组习气的蒙昧精神的熏陶，彻头彻尾地充滿着根深蒂固的小集团偏見，完全不懂得他們站在“进化論”的旗帜下是怎么回事，而始終不断地要把这个“进化論”变成背得滚瓜烂熟的教条，所以他們的結局注定是：本来想走进一个房間，結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間。他們中間許多人完全真誠地尽忠于无产階級，但他們本性上不能理解无产階級的整个社会地位决定无产階級采取的那个策略。他們所代表的不是运动的未来，而是运动的过去；他們不是帮助无产階級进行爭取更好的未来的斗争，而是阻碍这个斗争。

而且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人是根本不可救药的。且举一个有趣的典型例子來說明他們的深奥的政治思想。

我想讀者沒有忘記小册子《杜馬的解散和无产階級的任务》的作者所作的供詞。这位作者自己說，“看来”人民还需要立宪民主黨杜馬的經驗。但是这个供詞“絲毫”沒有动摇他相信过去的“布尔什維克”的策略观点是正确的。他現在仍然认为事变可能要求他和他的同志們“規定发动的时间”^①。他輕描淡写地补充說：“如果是这样，那末我們建議把全俄发动、罢工和起义的时间規定在夏末或秋初，即八月中旬或八月底。”^②他的小册子据他自己声明作于七月，即在解散杜馬和斯維阿波尔格起义之間。我这篇文章作于十月。当我重讀規定在八月中旬或八月底举行全俄起义的建議时，我禁不住要发出怜悯的微笑。已故的恩格斯如果看到这个“活得比十二岁长”的人居然提出类似的建議是会很驚訝的。居然提

① 參看《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 111 頁。——譯者注

② 第 15 頁(參看上書第 111 頁。——譯者注)。——著者注

出这种建議的人，尽管他們有一把年紀，仍然是政治上的毛孩子。然而人們过去却在傾听、而且至今仍然不断地傾听这些毛孩子的声音。我国觉悟无产階級中間有不少一部分人正在跟着他們走。这就不是笑話，而是悲哀了！

为什么小册子《杜馬的解散》的作者……七月間认为可能“在八月中旬或八月底”举行发动呢？因为在他看来，“現在，在最愚昧的农民的意識中响着斧背打进去的思想：如果人民沒有政权，杜馬是沒有用的。”^①他确信，“最愚昧的农民”的政治教育工作已經完成了，只要有解散第一届杜馬这个因素就足以把清楚的政治認識灌輸到这种农民的完全不开化的头脑中去。他的惊人的所謂“在八月中旬或八月底”也就是以这个信念为依据的。关键就在这里。如果最愚昧的农民的意識中的确“响起了”小册子作者所听到的声音，那也就的确不需要——因为这就会太晚了——談論杜馬了。那时就应当完全把它当作已經超越了的阶段予以擯弃。然而实际上当然沒有也不可能有这等事情。我們的作者重复着某个时候他的同志帕·奥尔洛夫斯基犯过的同一个錯誤。而且他本人、我們的这位高度輕率的作者“看来”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錯誤。現在，“看来”现实生活已經宣布他那个所謂“在八月中旬或八月底”乃是一个天真可笑的錯誤。可是他当然不会因此感到不安。代替八月，他現在一定提出了其他一个什么月份，并且像啄木鳥一样固执地啄自己的短調的“口号”。这个革命的炼丹术士不能不力求加速社会发展过程：要知道他根本不理解这种进程。

而且請注意，他是怎样奇怪、怎样笨拙地表述那个据以提出“在八月中旬或八月底”这个口号的主要理由的：“現在在最愚昧的农民的意識中响着斧背打进去的思想：杜馬是沒有用的”云云。而斧头打进去的思想显然是牢固的。可是“看来”它还是刚刚才“响起来”，因此也就是說还完全沒有打进去。而如果它还没有打进

^① 第5—6頁。〔參看《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100頁。为下面行文方便起見，改为直譯。——譯者注〕——著者注

去，那就是說人民的教育工作還沒有完成。这样一來，甚至从我們的作者自己的論点来看，“在八月中旬或八月底”这个口号也会使人得出完全荒謬的結論。但是我重說一遍，你并不会因此使他感到不安；他頑固地我行我素，并且本着他“堅定”的性格使天真的人惊叹不止。他的陣地是不变的。他像科茲瑪·普魯特柯夫笔下的封·格林瓦里杜斯男爵一样忠实于自己：

男爵們在战斗，
男爵們在祝酒；
男爵封·格林瓦里杜斯，
这位英武的騎士，
始終留在同一个陣地上，
坐在石头上……^①

就让他独自坐在石头上吧：这对他是最适当的“陣地”，而对他坚定的性格惊叹不止的天真的人却认真地接受他的幼稚的“口号”。誠然，这也还只是半个不幸。对天真的人有什么可指望的呢？不幸在于天真的人对某一部分无产階級有影响。工人一旦屈服于这种人的影响，就会证明，他們还不是觉悟的工人，即他們还没有懂得无产階級解决自己的政治任务必须具备的那些条件。对于今天的俄国工人說来，用嘲笑的态度对待阴謀家的天真行为乃是真正智慧的开始。

一九〇六年期間无产階級的思想家們往往迷恋于进行“发动”，而这种“发动”在当前社会力量对比关系的条件下是不适当的、因此也是有害的。这一点現在大概不需要证明了。因为上述思想家（至少是他們中間某一部分比較聰明的人）現在都普遍相信这一点，以致可以使人耽心的倒是，他們（按照我們向来的习惯）

① 引自科茲瑪·普魯特柯夫的《德意志叙事詩》。詩中刻画了騎士的可笑的形象。騎士的爱情遭到阿瑪莉婭拒絕以后，“坐在阿瑪莉婭的城堡前，微微皺起眉头，默默无言的坐着”。后世常引用上面这几行詩表示对周围现实漠不关心，在发展中停滞不前等。——譯者注

怎么会沒有沉溺于**相反的极端**，换言之，他們怎么会沒有开始把生活的呼声本身所提出的那些政治要求算在阴谋家的幻想的账上。但是奇怪的事情是，尽管有这种自然的反动，甚至思想健全的人在必須用坚决的口气說話的地方至今有时也避免用坚决的口气說話。例如，我們在我上面已經提到过的《一九〇五年十二月的莫斯科》一书的末尾就讀到：

“只得到资产階級居民群众消极同情的十二月无产階級的发动、这种保卫自己的口号的发动，本来不可能得到军队的支持。因此‘把总罢工变为武装起义的意图’也不可能有胜利的結局，而应当承认是一个历史錯誤。同时十二月的那些日子表明，旧制度对人民所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会削弱旧制度的力量和增加反对旧制度的斗士的骨干力量，因此归根到底会导致人民的胜利，使暴力和压迫、貧困和无权的万恶的制度走向灭亡。”

这里是不能自圆其說的。如果去年十二月在莫斯科所犯的“历史錯誤”削弱了旧制度的力量和增加了反对旧制度的斗士的骨干力量，然則这是什么样的錯誤呢？另一方面，同一本书里所收集的丰富的材料最令人信服不过地证明，这的确是一个錯誤。然則怎样弄清楚这里的问题呢？从哪里也弄不清楚这个问题。作者們对此什么話也沒有說。其实事情是明白的。旧制度的**敌人們**所犯的錯誤引起**保卫**这个制度的人們一系列的錯誤。后面这些錯誤由于具有极端殘忍的野蛮性质，几乎引起了普遍的不滿，因此局势才部分地扭轉过来了。但极端殘忍的野蛮人即使在反对旧制度的莫斯科人沒有犯自己的历史錯誤时也一定仍然是极端殘忍的野蛮人。而且自然，极端殘忍的野蛮人就是在这种場合下也会节制不住要**暴露**自己的野蛮性；因为大家知道，节制精神完全不是他們的一种美德。同时他們的野蛮作风会使得輿論更加不滿，这就是說，会按照自己的方式使自由更快地取得胜利。**正数**仍然会是**正数**。而**負数**（任何历史錯誤都是負数）在我所假設的場合下就不会存在了。因此代数总和就会更大。换言之，即旧制度会比現在既犯錯

誤之后更加接近灭亡。我所指出的这本十分值得注意的书里恰恰沒有提到这一点。而这就是“全部哲学的意义”之所在。否則节制自己不犯历史錯誤就不会有任何必要了。那时这些錯誤，正像我上面已經指出过的，其实也就不再是錯誤了，而变成自身的反面。

如果把所有說过的話总结一下，可以这样說：

无产阶级的思想家們在一九〇六年期間犯过的所有那些为数不多然而或多或少无法补救的过失，是由于这些思想家夸大了自己的力量，力求超过革命的发展过程。为了将来避免重犯类似的錯誤，必須消除这个总的原因，必須充滿这样的信念，即确信希望超过历史的发展过程这种想法，除了經常招致惨重的失敗以外，不会带来任何結果。

然而，希望超过历史发展过程这种想法本身又是受知識分子的思維习惯所制約的。目前无产阶级的思想家們还没有突破自己的知識分子小集团的狭窄界限。他們在这种集团的影响下失去了政治上的一切目測力。迄今为止我所指出的錯誤都将是必不可免的，虽然由于生活的严厉的教訓，这些錯誤采取了另一种形态。只有提高无产阶级政治上的**主动精神**才可以使我們完全避免类似的錯誤。發揮无产阶级的主动精神——这就是过去一年的政治遺訓的实质。現在我們的定期刊物越来越經常地談論的工人代表大会，就是發揮这种精神的最重要和最必需的条件之一。工人代表大会是必要的。不管知識分子小集团怎样大喊大叫地反对它，它一定可以开成。命里注定了，絕對逃不掉。

革命的小集团(即“有旧派行为的人”，像尼·尼·茲拉托弗拉茨基会說的一样)，多少是害怕工人代表大会的。至于說到开这种大会的可能性，那么我們只有一点要說明，就是：它有許多障碍；而我們那些知道自己希望什么并善于設法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人所战胜了却不是这样一些障碍。至于代表大会所引起的耽心，我认为，知識分子小集团的这些耽心来得太晚了。这种小集团从来不能理解作为进化論的馬克思学說，而总是把它理解成停滯的教

条。除了背得烂熟并且机械地加以重复的那种教条以外，它从来不善于以任何原理为依据。它的全部思想史就是从一种形态的对现代社会主义的无知不断地过渡到另一种形态的无知。这种只作抽象理解的和低能的小集团，耽心出席代表大会的工人们不善于正确地理解自己的阶级利益。它以为，荣誉使得它有义务继续担任无产阶级家庭女教师的角色。这个不生育的老处女看不到，无产阶级已经长得比它高出整整一头了。它之所以看不到这点，因为它不愿意看，而且也只是因为不愿意看。然而这太刺眼了：无产阶级群众的所作所为表现出他们的政治认识已经十分成熟；知识分子小集团在这些群众中间的所作所为说明，保持自己的“旧习惯”的知识分子小集团落后于事变的进程大概已经有二十年了。

早就该停止“旧派行为”了！而且是永远彻底停止这种行为。在这里任何补救的办法都无济于事。对于“旧派行为”，只有大致地用果戈理笔下的裁缝彼得罗维奇谈到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的旧外套时所说的话那样说道：

“不行，一点办法也没有。东西完全不中用了。您还不如等严冬到来的时候把它改成裹脚布吧，因为袜子不暖和……可是外套，看来您只能做一件新的了。”^①

然而我不可能在这里详细讨论代表大会，因为我得结束了。况且代表大会也不是当前唯一的重要问题。当前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杜马选举。

谁相信“在八月中旬或八月底”，对他说来这些选举就不可能有意义。在这种人的思想中，现在和去年一样正在响起斧背打进去的思想：“杜马是没有用的”云云。如果这种人也发现参加选举是有益的，那么他始终是不善于从“进化论”的观点对待选举的，而一定是从教条的观点看选举，因为他已经把这种理论变成了教条，并且反复地背诵这种教条。但是谁懂得“在八月中旬或八月底”只

^① 参看《果戈理小说戏剧选》《外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245页。——译者注

是中學生假日里“在草地”上冥思遐想出來的古怪念頭，誰認識到要超越歷史的想法是同唯物主義歷史觀不相容的，誰領會了這種歷史觀，並且善於正確地運用它來解決由俄國目前的進化過程提出日程的任務。他就毋需證明，行將到來的選舉具有極大的、決定性的重要意義。他也知道無產階級思想家準備參加選舉的時候，應當堅決地擺脫任何教條主義。如果他們的教條主義竟然給了反動派以哪怕是微小的效勞，他們就會使自己蒙受無法洗刷的奇恥大辱。

這裡首先應當正確地解決下面一些實際問題：上述思想家能不能同其他政黨達成選舉協定呢？對於這個問題，一些人回答說，能，但只是同“勞動派”以及他們的兄弟“社會革命黨人”；另一些人發現完全不應當達成這樣的協議。我個人認為，着手解決這個問題之前，應當回憶一下倍倍爾的規則：“為了事業的利益，我準備同魔鬼本身，甚至同魔鬼的外祖母達成協議”。倍倍爾用這樣寥寥數言出色地表明，他對宗派主義的教條是最反對不過了，他的兩隻腳堅定地站在馬克思的進化論的立場上。

達成選舉協議不但可能，而且應該，如果事業的利益要求這樣做的話。然則現在事業的根本利益是什麼呢？就是使本身正在組織起來，列成隊伍，並且準備進行猛攻的反動派遭受到儘可能慘重的失敗。因此凡是為戰勝反動派所必需的地方，達成選舉協議對無產階級思想家說來就是義不容辭的。只要承認這個結論是正確的，——而不承認它是不可能的，——那麼我就看不出為什麼只應當同“勞動派”和“社會革命黨人”達成協議。在這裡也必須避免一切教條主義，在這裡也應當以合目的性原則為指導。

另一些人說，協議將使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模糊起來。但是第一，在臨來的選舉中反動派的勝利會給無產階級覺悟的提高造成一種想不出比它更大的障礙。第二，難道協議一定會損害無產階級的覺悟麼？我認為這裡一切都取決於賦予協議怎樣的性質和怎樣在選民面前論證協議。只要正確地論證協議，對無產階級說

来它就不会成为偏见的根源，而会成为策略的高等学校。根据这种策略，无产阶级就会得到从我已经多次提到过的“进化论”的观点，而不是从僵化的教条的观点观察事变的本领。谁不能提出这种论证，他尽可以埋怨自己，而不要埋怨协议。这里用得着一句拉丁谚语：Non est culpa vini, sed culpa bibentis^①（罪不在酒，在乎饮者）。

阿姆斯特丹的决议么？艾米尔·王德威尔得不无机智地写道：“我坦率地承认，只要俄国的解放运动取得胜利，即便是违反阿姆斯特丹的决议，我觉得也无所谓。”^②王德威尔得是反对这个决议的。自然，他没有放过机会对它开几句机智的玩笑。实际上决议根本不是指现在我们俄国要讨论的那些协议说的。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最坚决地驳斥了“修正主义者企图朝这样的方向修改我们的久经考验的和卓有成效的策略，以使用向现存的制度让步的政策来代替通过战胜我们的敌人的道路夺取政权”^③。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如果谁抱着向现存制度让步的目的来达成选举协议，他的行为就违反了阿姆斯特丹的决议。然而我们现在所谈论的那些协议并不是要向现存的制度作让步，而是同它进行斗争的一种新的努力。

其次，阿姆斯特丹决议所谓的现存制度是指什么说的呢？这可以从下面一段话中看出来：“这种修正主义策略的后果会把提出尽可能迅速地变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为社会主义社会当作自己的目的党，因此也就是把最好意义上的革命党，变成满足于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改良的党”^④。

其实这是明明白白的！阿姆斯特丹的决议是指资产阶级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说的。然而我们这里难道是讨论这种转变么？不！只有无政府主义者、“最高纲领派”和一些最糊涂的“社会

① 括弧里的话就是译文。——译者注

② 参看外国社会党人的《意见》，《现代生活》，一九〇六年十一月。——译者注

③④ 参看《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第99页。——译者注

革命党人”才会談論这种轉变。由此可以再一次地得出結論說，阿姆斯特丹決議所禁止的并不是現在我們这里有爭論的那些協議。不应当把阿姆斯特丹決議变成宗派主义的教条，它也是以“进化論”为依据的。

可是如果这是对的，然則为什么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某些参加者引证了阿姆斯特丹決議呢？如果这是对的，那末阿姆斯特丹決議一般而言同我們的事情不就没有任何关系了么？

請原諒，有的！

阿姆斯特丹決議說，“社会民主党根据一九〇〇年巴黎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考茨基決議不得企求参加資產階級社会范围内的政府当局。”^①

其次，它否定“为了促进同資產階級政党的合作而掩盖現存的階級矛盾的任何企图”。**整个問題都在这里。**对于我們俄国人說来，*das ist des Pudels Kern.*^②

請記住，参加資產階級社会范围内的政府当局是应当受到指摘的。請記住，当你們幻想参加“临时”……政权时，你們就在思想上犯了反对阿姆斯特丹決議的罪过。

請記住，——而这一点現在對我們說來是特別重要的，——如果你們在希望促使自己同資產階級政党达成选举協議的时候忽然想要掩盖現存的階級矛盾，那么你們就在思想上、言論上和行动上犯了反对阿姆斯特丹決議的罪过。

不要掩盖矛盾，而要用信念的全部热情——在你們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暴露这些矛盾；不过要善于表明，正是为了进一步发展这些按其本质是起进步作用的矛盾，必須击败反动派，但不要放弃达到这个目的所必需的选举協議。如此而已，如此而已。这也就是致胜之道！

但是必須达成的恰恰只是協議，而不是联盟。联盟是一种提

① 參看《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資料(第二国际)》第100頁。——譯者注

② 这就是症結之所在。——譯者注

升到高級階段的協議，它會使你們在更長得多的時間里承擔義務，並且限定你們經常地使你們的活動適應於資產階級政黨的活動。聯盟禁止你們**分開走**，而要求你們只是“**一起打**”，或者更正確些說，**共同打擊**。

然則是怎樣的協議呢？在重新投票的時候么？

從馬爾托夫同《言論報》的辯論中可以明白，我國的法律不允許重新投票。因此必須在**選舉前達成協議**。但既然說的是協議，而不是聯盟，那就不應當提出**任何一個普遍的公式**。我們對這個問題原則是作肯定的答復的，但同時也應當因地制宜地在實踐中實現這個原則。在某些地方，協議大概是完全多餘的。例如在工人選區同立憲民主黨人達成協議不僅不必要，而且簡直是犯罪的^①。（如果結成聯盟，就不可能有這種靈活策略。）但是凡協議有利於事業的地方，都應當“同魔鬼本身、甚至同它的外婆”達成協議，在那里，教條主義就會比背叛更壞！

（譯自《普列漢諾夫全集》第十五卷第 218—240 頁）

第三封信

這封信最初發表在一九〇六年第十二期《現代生活》雜誌上。文章空洞無物、蠻不講理，滿篇都是謾罵、諷刺。它的目的是要證明無產階級政黨應該同立憲民主黨人達成選舉協議。為了證實這個論點，他主要提出了兩條理由。一條理由說：當前運動的“歷史主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一起進行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鬥爭，資產階級還有革命性。一條理由說：有黑幫危險。

列寧曾在許多文章中駁斥過所謂黑幫危險的謬論。例如列寧在《論同立憲民主黨的聯盟》中寫道：“孟什維克

^① 而且在这里，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应当同“社会革命党人”达成协议。——著者注

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黑帮的危险。这个理由的第一个基本的虚伪的地方，就在于黑帮的危险，决不能用立宪民主党的策略和立宪民主党的政策来防止。……这个流行的理由的第二个罪过就在于社会民主党人不声不响地把民主斗争的领导权让给了立宪民主党人。……这个流行的理由的第三个虚伪的地方就在于对杜馬和它的作用作了不正确的估计”等等（《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293—295等页）。

如果您桌上有一块糖，又如果您在这块糖上发现有明显的鼠齿痕迹，那么您就会毫不犹豫地說：“老鼠們咬过了。”然而事实上也許只有一只老鼠咬过它。您是不是有权用**整体代替部分**呢？是的，您有这种权利，因为如果您的糖只有一只老鼠在偶然的情况下咬过，那么在同一些情况下，任何其他的老鼠也完全会这样行动，即会来咬您的糖。然而如果不是所有的老鼠在这种情况下都采取同样的行动，如果比方存在着两类老鼠，一类喜欢糖，另一类则对糖抱有反感，那么把只有**特定一类老鼠**才会干出来的事情推到**一般的老鼠**身上就会是不正确的了。

这种說法对不对呢？我觉得对的。而且我又觉得，凡是沒有失去邏輯思維的禀賦的人，即便他是自由派、立宪民主党员和“馬克思的批評者”，也会同意这种說法。但是有一点令人奇怪：属于自由派、立宪民主党员或“馬克思的批評者”的人宁願承认我在所有其他場合下所叙述的这个真理是无可爭辯的，独不承认談到“各个极端党派”时所說的話。在这里，他总要喜欢把一般說来实际上只是其中一个极端党派所固有的东西硬加在“各个极端党派”的头上。这成了他的“一种病”。而且老实說，这是一种相当讨厌的和难受的病。它会造成很多最有害的概念混乱。

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大家知道，一九〇五年秋天和一九〇六年春天，我国大部分社会民主党人都主张抵制国家杜馬。大家也

同样知道，另一部分——当时的确相当少的——社会民主党人那时即已**反对抵制**。后来这部分相当少的人变成了相当多的人。早在五月初，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就正式承认，不应当抵制国家杜馬。这个情况自然为我們的**左派**（我这样称呼他們是为了区别于**极左派**）及时指出来了。但是我們的左派在指出这种情况时大多止于对这样的題目发一通議論，說什么“生活教导了我国社会民主党人；生活告訴了他們”，如是云云。他們忘記了补充說，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間有一些人并不需要有价值高昂的生活教訓就可以理解抵制策略是完全沒有根据的。結果就成了：糖是老鼠咬过了，可是某一部分老鼠不但沒有咬过它，而且也不会咬它。

有人对我說，这样的区别完全不重要。此說我可不敢苟同。

假使把問題归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中何人而且恰在何时說过：“喂！”^①，那它就会是不重要的。这是一个绝对不重要的問題。然而問題根本不在这里。事情是这样的。

当人們把一只老鼠干过的事算在老鼠們的賬上，那时人們就会采取措施在这个地方歼灭所有一般的鼠类。当人們把只是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犯的錯誤加在所有社会民主党人身上，那时石头就会丢到“正統思想”的菜园里来；說这是所有人的过錯。而这首先就会激怒那些沒有犯过錯誤的“正統派分子”；其次，主要的是这种“策略”会促使虽然向往“正統思想”却不了解什么是正統思想的人坚持自己的錯誤。他們会觉得，承认这种錯誤无异于背叛“正統思想”。于是他們狂热地捍卫着不正确的行动方式，尽管他們内心深处自己或許也感觉到生活的发展并不会像他們期待过的那样。应当帮助这些人走上正确的道路，而不要用妄誕的偏見使他們脱离这条道路。

不久前在第一〇四号《同志报》上，日尔金先生在《生活的一頁》一文中形容我国政治上的春天又将来到时（用他的話說，“俄国

^① 成語。意思是因为微不足道的事而进行爭論。典出果戈理的《欽差大臣》第一幕第三場。——譯者注

的春天往往在秋天”)曾写道：“无怪乎四面八方响起了坚决号召统一起来的战斗的号角。錯誤、失敗比胜利更使人得到深刻的教育。往后还会有許多类似的教訓。高傲的孤立、藐視亲近的同盟者的援助、被生活所粉碎的頑固的书本理論，——这一切都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于是从俄国生活的左翼发出許多清醒的、庄严的呼声：‘統一、統一、普遍地組織起来’。”

毋庸爭論，由适当的条件所建立的和不变成融合的“統一”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而且它无疑可以大大促使“春天”早日到来。但是这同“被生活所粉碎的頑固的书本理論”有什么相干呢？这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大概日尔金先生认为，如果有些人无论如何不願意“統一”，則这里的过錯就在于“頑固的书本理論”，而如果現在“极左派”表現有要求“統一”的意向，那就說明他們已經从“被生活所粉碎的”理論的影响下解脫出来了。不过这只是表明他自己多么“不关心”“书本理論”而已。

再举一个例子。第二〇六号《言論报》上姆·弗里德曼先生发表了一篇評帕尔烏斯《俄国和革命》一书的文章。在这篇評論中，据他自己承认，他“很不客气地”談到“以法国和德国为兰本而描繪下来的、俄国政治关系的苏茲达尔^①社会民主党人的图画。在法德两国，人們的活动（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活动呢？——格·普·）过去和現在都是在很特出的社会經濟条件下进行的。”用姆·弗里德曼的話說，“正是这些偏見蒙住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眼睛，使他們无法理解俄国自由主义和农民运动的真正本性。”讀者可以看得出来，这真是一团糟。但是往下我們的作者稍微冲淡了他所描繪的“图画”的色彩。他說：

“很值得把帕尔烏斯的見解同普列汉諾夫著名的观点和某些有胆量向‘資產階級立宪民主党人’調情的孟什維克現今的言論比

① “苏茲达尔”是个比喻詞，用来象征粗糙、拙笨。这个詞导源于苏茲达尔地方圣象画家的一种古老的手工艺。这种画家中有许多人画法拙劣，但他們所做的圣象價錢便宜，因此有很大的銷路。——譯者注

較一下。不小的轉變！顯然，生活給了很多的教訓。”

總之，“普列漢諾夫著名的觀點”和某些“孟什維克”的議論證明，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隊伍中發生了“不小的轉變”，不過據作者的意見，這轉變還不夠急進。但是試問：到底在什麼時候發生了這種“不小的轉變”呢？據我所知，“普列漢諾夫著名的觀點”很早就形成了，而且無論如何比帕爾烏斯開始從事政論活動時要早得多。而且普列漢諾夫也不是独一无二的人。“大家知道”，贊成他的“著名的觀點”的有巴·波·阿克雪里羅得，有薇·伊·查蘇利奇，有奧爾托多克斯——不久前出版的一本卓越的哲學論文文集的作者，還有某些其他的俄國社會民主黨著名活動家。其次，從姆·弗里德曼先生本人的話中可以看出，這些“著名的觀點”跟“俄國政治關係的蘇茲達爾人的圖畫”很少有共同之處。但如果這一切都是對的，那麼就可以得出結論說，姆·弗里德曼先生把這個圖畫稱為社會民主黨人的圖畫是完全徒勞的。所以，如果這個圖畫的確是社會民主黨人畫的，那也是擁護蘇茲達爾人的美術觀點的特殊一派的社会民主黨人，這種美術觀點同俄國社會民主黨最老的成員的觀點毫無相似之處。由此可以推出，如果要說“不小的轉變”，那就應該按照現實生活中所發生的情況那樣來描繪它。而現實生活中所發生的情況大致是這樣的。

“普列漢諾夫著名的觀點”，以及一般說來作為俄國第一個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體現者的“勞動解放社”的“著名的觀點”，是正確的，至少在策略方面是如此（我是站在这位評論家先生的立場上說這種話的）；在一段時期內，這些觀點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隊伍中被認為是正確的。但是後來，隨着這個隊伍的擴大，人們開始“用批評的眼光”對待它們了。就是姆·弗里德曼先生大概也“知道”的“經濟派”的代表們曾經宣布它們是陳舊過時的。團結在《曙光》雜誌和《火星報》周圍的“政治派”起來保衛了這些所謂陳舊過時的觀點。不過“政治派”對它們也領會得相當糟糕；他們的大作同“勞動解放社”在其存在的整個過程中不斷宣傳過的那種思想常

常发生极大的分歧，特别是在涉及党的策略方面，如果說得更确切一点，則是在党的战略方面。这种情况曾經引起过不少远非都为外人所知的辯論。然而只要讀一讀普列汉諾夫在《曙光》杂志上的政治論文，就足可以看出，在这些論文問世的时候“劳动解放社”的策略观点可以說是在“政治派”的官方观点。但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吸引力起作用的时间愈久，参加到党内来的那些其修养不足以領会正确的策略概念的人就愈多；于是“政治派”主要代表人物中間那些在“劳动解放社”同“經濟派”的斗争中曾經站在前者一边、不过实际上与其說是馬克思主义者不如說是布朗基主义者的分子（“他們中間为头的一个”就是“著名的”尼·列宁）就急忙以这些人作靠山。不用說，列宁的布朗基主义远不是一下子就暴露无遺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內，他曾經有一副馬克思主义相，誠然这是一副既歪且“秃”^①的相，但毕竟有希望在往后的发展中变得像个样儿。

因此在整个这一时期中，看到了他的弱点的人們在道义上当时有义务不同他作斗争，而是要尽可能促进他的这一发展。于是不得已而遵从了諺語“坏的和平胜过好的爭論”。当“坏的和平”会产生良好后果的一切希望均已杜絕，当列宁和他最亲近的同志們原来都是无可救药的阴谋分子，那时“好的爭論”也就势在必行了。可是那时候我們也就懂得了馬克思（如果我沒有記錯）在自己致左尔格的一封信里說过的那条真理：在群众运动的情况下，特定階級的先进代表人物的綱領是由这个階級的状况决定的；凡是运动具有小組性质的地方，总是有可能把一定数量的人糾集在任何一种綱領的周围^②。列宁的这种糾集活动得到了两个很重要的情况的帮助。第一，他擱下綱領問題本身不提，只是在自己的策略理論上

① куцый(秃)，意为：秃尾的、短得难看的、殘缺不全的。——譯者注

② 我只保证意思沒錯，文字可保证不了，因为此刻我手边沒有收載馬克思和左尔格的通信的书。〔可能指一八八〇年十一月五日馬克思致左尔格的信。參看《馬克思恩格斯致美国人的信》第146—147頁。——譯者注〕——著者注

表现出自己的阴谋家的本性^①。他在最严谨的“正统思想”的幌子下偷运进自己的布朗基主义的私货。这就安慰了他的那些拥护者的马克思主义良心，这些人对于马克思主义者的策略究竟应当是什么的问题并没有认识清楚，同时却希望继续忠实于马克思。第二，当时我国社会生活的脉搏跳动得越来越激烈，因此甚至那些比列宁挑选来实行自己的策略的、虽然精力充沛但是很不成熟的、智力平庸的人更有多得无比的聪明才智的人物也开始晕头转向了。姆·弗里德曼先生在自己的评论中引用了帕尔乌斯的一些话，这个帕尔乌斯企图用这些话替自己不久以前的政治错误辩解。帕尔乌斯富有诗意地自封为演奏过革命风暴的竖琴。他说，他和赞成他的幻想的人们受到了蠢蠢欲动的劳苦大众的督促，而且凡是引导群众的人都应当站在群众前面。这自然是一种“说法”。帕尔乌斯这里所说的话的意思，如果把下面这句有名的法国话稍加改变就可以表达出来：ils sont nos chefs, donc ils doivent nous suivre^②（他们是我们的领袖，所以他们应当跟随我们）。帕尔乌斯不愿意«suivre»^③，他自认为有义务走“在前面”。但是不管“在前”还是“在后”，领袖反正得是**被引导者**。然而如果领袖必须是**被引导者**，那么大自然为了节约起见，只要给予他一种**说话**的能力（能够叫喊：“前进啊，弟兄们，乌拉！”等等）就行了，对他说来**思考**的能力是不需要的。我深信，塞瓦斯托波尔士兵之歌所赞美的、“毫无计谋地命令自己的队伍直冲桥头”的列阿得将军庄严地履行了走在自己人的前面的义务，不过从这里毕竟没有得到什么好结果，而且也不可能得到好结果。马克思主义者说：我们的意图是不自觉的发展过程的自觉的表现。而且在他们正确地理解这个不自觉的过程的范围内，这是完全对的。但是为了正确地理解它，走在群众所

① 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改变了，因为列宁的土地纲领，据他自己承认，是适应他的所谓“夺取政权”的阴谋家的幻想的。——著者注

② 下面括弧里的话就是译文。——译者注

③ 跟随。——译者注

有的幻想“前面”是不够的。恰恰相反！必須善于批判这些幻想，而且必須具有公民的勇敢精神不使批評的火炬弃置不用。这就是領袖的头一条义务。我认为，如果帕尔烏斯直率地承认自己的錯誤，他就会做得更好一些。犯錯誤不止他一个人：很多人，几乎是所有的人都犯过錯誤。不过我不想在这里詳細地談論帕尔烏斯。我之所以引证他，唯一是因为举他作例子來說明社会脉搏急剧的跳动甚至可以使很有才能的人弄得懵懵懂懂。因此才能較少的人就更容易犯錯誤了。运动的現有的力量已經扩大到了这样的規模，以致只要一提到明智，就会看成是“落后性”的标志。不用說，有才能的人的这种情緒对于在我国无产階級思想家中間传播列阿得-列宁的观点說来是再有利不过了，后者的全部策略智慧可以无遺漏地概括为一句言簡意賅的口号：“喂，冲啊！”事情弄到了这样的地步，甚至懂得这种策略智慧站不住脚的人們由于害怕被人責备是机会主义，也不是始終敢于起来反对它。不可能比这走得更远了，这已經是我们的“布尔什維主义”发展的頂点了。然而如果根据聖經的見证，耶利哥的城市由于号角的声音而坍塌过，那么推迟俄国解放运动的胜利的种种障碍并没有被辟里拍拉的革命空談所消除。它們很快就显示了自己的威风，并且表明了以列阿德式的“冲啊！”为特色的策略是站不住脚的。甚至“布尔什維克們”也发现自己不得不对这种策略作某些修正，不过这些修正并没有妨碍他們用最滑稽的“坚定性格”重申：“事变证明了我們是对的。”觉醒开始了，而“布尔什維克”之所以变成了 de facto^①“孟什維克”，也就是由这个觉醒运动所造成的。这个过程还远沒有結束。很可能由于某些“新的事实”它会暂时停止下来，或者甚至回到自己的出发点上去。但是这些停頓和复归不应当使任何人感到不安。无可怀疑的是：既然我国社会生活的进程将迫使我国无产階級思想家們掌握政治思維的正确方法——它不可能不这样

① 实际上的。——譯者注

做——，所以革命空談的烏云將被驅散，而“布尔什維克”的希望將“像蠟燭對着火光會融化一樣地”消散。這是像死亡一樣無法避免的。同時現在受到我國的自由派、立憲民主黨人、勞動派分子以及伯恩施坦主義者們歡迎的那些個別的事實只不過是宣告時序遞嬗的一些燕子罷了。可是自由派、立憲民主黨人之流的先生們徒然地認為這些燕子也在宣告他們所敵視的“正統思想”的復滅。完全相反！它們在宣告**正統思想的復興**、“普列漢諾夫著名的觀點”的勝利。這些觀點，早在距今相當遙遠的那個時代就已經形成了並且宣傳過，那時，現在的“布尔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中間許多人的爸爸還只是開始向他們的媽媽獻殷勤。自然，“布尔什維克們”會叫嚷說，這些“著名的觀點”同“正統思想”沒有任何共同之處。但是第一，不過是在出版《曙光》雜誌和“舊”《火星報》時期，這些觀點就曾為列寧“本人”承認是完全“正統的”。第二，請告訴我們，勞動派、伯恩施坦主義者、立憲民主黨人以及諸如此類的先生們，你們在這樣多的方面同“布尔什維克”發生意見分歧，卻在對馬克思主義“正統思想”的看法上持一致的見解，這是什麼緣故呢？為什麼你們認為“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策略會同塞瓦斯托波爾的列阿得將軍的策略相吻合呢？我來告訴你們這個緣故吧：因為你們是通過不可克服的偏見的眼鏡來看這種策略的，正像一般說來你們是通過這樣的眼鏡看待馬克思主義的一樣。因為要正確地理解馬克思主義，你們就必須放棄一系列使得你們參加解放運動而同時保留着資產階級觀點的所謂批判的原理。一句話，因為你們太狹隘了，不能理解馬克思主義，而不是因為——像你們所喜歡斷言的那樣——**馬克思主義太狹隘了**，以致它不能使得有廣大的思想境界的人“感到滿意”。“批評馬克思”在全世界來說，而特別是在我國，都是一種使馬克思的學說便于資產階級中間有頭腦的人們消化的企圖。這種企圖根本沒有帶來過任何好處。結果卻是我國那些有邏輯思考能力的“批評家們”“用愉快的步伐”“從馬克思主義走到了唯心主義”。可是當現在我國資產階級的進步思想家（這意思不

是指“資產者”，先生們，請注意：我不是“罵人”，而是簡單地使用盡量確切的社会学术語），当这个社会階級的进步的思想家現在不得不談到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却一本正經地把它想像成某种极端笨拙、片面和狹隘的东西。而当他从馬克思主义者那里听到一句他觉得好像合理的话时，他就再一次毫不做作地喊道：“早就是时候了！你們自己現在可以看到，你們的理論是同生活矛盾的。”

这是可笑的，如果不是有害的话。而其所以有害，——像我已经說过的一样，——因为它妨碍某些天賦不高或教养根本不足的无产階級思想家理解，要繼續忠实于馬克思和成为干练的无产階級利益的保护者，永远說同資产階級相反的话和做同資产階級相反的事是不够的。假使我国——为了簡明起見比方說——立宪民主党政論家們清楚地考虑过他們丢在“正統思想”菜园里的这些石头所带来的那个**实际上的**損害，他們大概就不会再丢石头了；但是——可惜啊！——这个（我再說一遍）**实际上的**損害完全从他們的精神視野旁边溜走了。在这里，**实际上的**偏見使得他們的明白的**政治**認識变得模糊起来；“**教条**”妨碍着考虑！

我說的是：教条。先生們，請不要以为我使用这个名詞是希望把你們这样喜欢加在我們身上的那許許多多的所謂教条主义的責备还一个給你們。决沒这意思！我之所以使用**教条**一詞，因为它本来的确应当用在这里，这同任何什么論战的考虑毫无干系。

馬克思的学說是一种“不可調和的理論”，这种理論比无论什么其他的理論都更好地、更全面地、更严谨地表达了工人階級利益同資产階級利益的不可調和性。这种情况同样清楚地既說明我国馬克思主义的“沒有到家的才子們”策略上的失策，也說明我国——又是为了簡明起見我們且这样表达——立宪民主党人对“正統思想”的不适宜的越軌行为。

由于馬克思的学說十分明显地揭示出无产階級利益同資产階級利益的不可調和性而感到驚訝的俄国馬克思主义的“沒有到家的才子們”，永远背对着所有身上带有資产階級的印迹的人，甚至

沒有料想到当前我国解放运动的历史主题，不是以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为前提的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以及跟与这个资产阶级社会相适应的政治制度的斗争，而是这个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诸阶级跟生长在完全不同的经济关系基础上的旧制度的各种残余势力的同时的和在颇大程度上共同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局部的真理把发育不全的“马克思主义者”弄得昏头昏脑，妨碍他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辩证的、因之也就是历史的性质。

然则在我們为了简明起见而指出的立宪民主党的政论家们的头脑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在我們所探讨的场合下，他们那里正在发生以下的情况。

不久以前我說到过的、而且由于自己夺目的光辉把某些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沒有到家的才子們”弄得头脑昏花的同一条局部真理，在上述这一流的政论家看来，乃是这样一些理论原理中间的一条原理：它們无情地揭露，凡是在社会战争由于事物确定不移的邏輯而必不可免的地方企图建立“社会和平”都是枉費心机的。既然这一派的政论家不能不向往“社会和平”，所以他們恶意地对待卓越地論证了这条讨厌的局部真理的学說就沒有可以奇怪的了。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对用以粉飾追求“社会和平”的所有那些意識形态上的疣物是很鄙視的。到唯心主义的“圣地”去巡礼在馬克思看来乃是一連串的不可饒恕的邏輯錯誤。这种情况更加助长了立宪民主党政论家对馬克思主义“正統思想”的恶意态度。所以他也像俄国馬克思主义的“沒有到家的才子們”一样犯了心理錯觉的毛病。他失去了任何发展前途。他忘記了現在我們俄国存在的問題并不是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这个阶级——同新兴的其他各阶级一道——进行反对前资产阶级制度的尽量富有成效的斗争；他不可能隱藏住自己对待那认为这种专政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理論的极端不友好的态度；甚至在最不适当的场合下他也要想方設法刺这个理論一下，就連首先是反对它本身的犯罪行為的那些策略錯誤也要算在它的賬上。

一言以蔽之，他对**現在**的判断被他对**未來**所作的預言弄得乱七八糟。階級本能把他的階級理智支使得糊里糊塗。不过应当說句老實話，他的階級本能比列宁一流的沒有到家的社会民主党人的階級本能要强得多多。其实后面这些人对理論是漠不关心的，而一旦他們对理論表现出关心，那也是用惊人的輕浮态度接受哲学中、道德中、美学中以及其他什么中資產階級頹废派文化种种不健康的表現，我国資產階級的进步思想家們善于非常清晰地分辨出哪一种形态的“意識”符合于历史所規定的此种形态的資產階級“存在”，哪一种形态的“意識”則不符合。我国資產階級的进步思想家在理論方面决不是漠不关心的，决不是的！应当大大贊揚一下他的是他在这方面很像从被巴比伦人俘虏后回来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曾經一只手打退了敌人，另一只手建筑了宏大的神殿。这自然也說明他很好地在为他曾經立意要为之服务的那个階級服务。但事实却是：正是对資產階級意識形态的神殿的这种建筑物的迷恋使得他在理解馬克思主义意識形态上产生了大得吓人的混乱，而正确解释馬克思主义意識形态在現在可以說是**政治上的必要步驟**。重复一遍：在对待馬克思主义意識形态的态度上，階級本能的聲音在他那里吞沒了政治理智的聲音。

在我国資產階級进步思想家陣營中，我沒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具有特出的理論才能。不过他們中間无疑有一些聰明的和受过教養的人。他們对社会主义文献的了解比我国那些更多地沾了俄国經濟“閉塞性”的光的民粹派和主观主义者对它們的了解要好得不能相提并論。究竟是什么东西妨碍他們理解“正統的”馬克思主义呢？除了他們的**階級观点**的局限性亦即他們如此經常地責备我們的“狹隘性”以外，我不知道別的障碍。

的确，只要你們認識一下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中的活动，你們就会看出，現代科学社会主义这位伟大的奠基人的策略同我国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的策略是根本沒有任何相同之处的。然而現在居然有这样多的人这样心甘情愿而且这样不公正地把馬克思

主义的“正統思想”挂在后一种策略的名下。請讀一讀不久前公布的恩格斯致左尔格的信吧。那时你們就会再一次看出，我国那些欺世盜名地自封为馬克思主义者的布朗基主义者的策略之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策略，就好比是我国苏茲达尔的“画手們”寒酸的作品之于拉斐尔或辽奥納尔多·达·芬奇亲笔的画幅一样。我不知道，苏茲达尔的“艺术家”观赏了我提到的这两个大师的作品以后会說出什么話儿来。不过我深信，我国的任何一位“布尔什維克”都会宣布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策略是叛徒的策略……自然这得要他有道义上的勇气坦率地这样說。陀思妥也夫斯基曾經通过卡拉瑪卓夫兄弟中的一位兄弟的嘴說过：要是基督再次降临人世，他会再一次被釘死在十字架上，而且这一次是被基督教徒釘死。我以十二分的信心断言：假使馬克思和恩格斯埋名隱姓去出席我国“布尔什維克”使得自己的革命的雄辯口才大放异彩的一次會議，那么人們准会因为他們的“溫和精神”向他們喝倒采，并且宣布他們是“立宪民主党式的馬克思主义者”，而在气忿之下則会干脆宣布他們是“立宪民主党人”。遺憾的是不能对此表示怀疑。不过要知道，这是毫不光彩的、虽然同时也是令人惋惜的幼稚行为。有什么理由把它記在馬克思主义“正統思想”的«debet»^①上呢？常識何在？真理何在？

三十年(挂点零)以前，有人(好像是尼·米海洛夫斯基)写过，如果达尔文說：“生存竞争”，而“小达尔文”听到这話以后就跑到街上掐住不管什么人的喉嚨，那么把这件事怪罪于达尔文就会意味着犯了反对最起碼的公道的过錯。馬克思不也是碰到同样的事情么？如果有誰因为那些輕率地自称为他的学生的人过去和現在所犯的許許多多的策略錯誤——而且不光只是策略錯誤——而責怪他的学說，岂不也是犯了反对最起碼的公道的过錯么？

在俄国，正統的馬克思信徒的策略应当是怎样的呢？“布尔什

① 賬。——譯者注

維克們”滿不在乎地回答說：“跟我們的一個模樣”。而且他們的這個回答被立憲民主黨一派的政論家全盤加以肯定。這些政論家煞有介事地重復說：“對，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策略確實不可能二樣”。不過我要對此提出堅決的抗議，並且除了上面引用過的種種理由以外還要 ad hominem^① 為證。

在一九〇六年十一月號的《現代生活》上發表了保羅·拉法格關於現今俄國工人政黨應當怎樣行動的見解。保羅·拉法格屬於馬克思和恩格斯最“正統的”信徒之列，這是有口皆碑的，就連沒有上過中學的人也都知道。他是怎麼說的呢？他說的話是不是也像我國“布爾什維克們”的叫囂呢（他們正是叫囂，而不是說話）？不像，一點兒也不像！

還有，在十二月號上又發表了茹爾·蓋德對同一問題的見解。蓋德也是每一個人都知道的，甚至沒有上過中學的人都知道他是屈指可數的正統派馬克思主義者。茹爾·蓋德又說些什麼呢？他的言論像不像我國“布爾什維克們”過去和現在的狂呼呢？也不！也是一點兒都不像！

請費心听听。

茹·蓋德寫道：“我感到大失所望的是看到我的同志們起先抵制杜馬，接着又對它表現了漠不關心的態度，借口說它不會通過我們的綱領。然而這是第一個人民代表機關。不管它怎樣殘缺不全，它都會變成革命必要的中心。它可以使一切反政府勢力團結起來反對拒絕退出舞台的‘舊制度’，並且在‘杜馬萬歲！’的口號下對它實行總攻擊。”

你們可以看得出來，這裡所說的乃是同我國“布爾什維克們”視為“正統”的歪論截然相反的某種思想。你們可以看得出來，這些人的策略曾經使正統的蓋德感到“大失所望”。這本來就很不耐煩了。不過請往下聽。

^① 以人。 譯者注

“因此我怀着最大的高兴心情看到我們的朋友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并且立意要参加选举，他們把杜馬看成是将来真正的杜馬的前身；不管它的成分如何，它都是反对旧制度的强大的战斗武器。”

如果把这段話翻譯成我們的特殊語言，可以說，茹·盖德怀着最大的高兴心情看到党拒絕了“布尔什維克”的策略，而接受了“孟什維克”的策略。而既然茹·盖德决心贊成后面这些人的策略，所以他要求它明确和一貫。他不害怕被人怀疑是机会主义，像某些“孟什維克”的外交家怕人怀疑一样。不，他不是这样的人，从喙样的軀壳里是做不出这样的人来的！他补充說：“所以在必須破坏旧制度的某种基础的那些場合下尤其不应当害怕同你們所謂的立宪民主党人达成公开的協議。子弹^①将来不会从我們的枪膛里发射出去，这对我們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它們能击中我們的目标和打伤我們所要打伤的东西就行了！”

那么，究竟应当怎样理解阿姆斯特丹決議呢？要知道它是禁止同非无产階級政党达成協議的啊。

这位著名的法国“正統分子”回答說：“如果你們将坚持这个自然而且必要的策略，則阿姆斯特丹決議就会帮助你們，而不是反对你們，因为它禁止同掌握政权的資產階級进行任何合作，并且把这种合作称为背叛……反之，它要求利用一切手段来消灭一切形式的专制制度，从而建立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工人階級应当而且将会夺得这个政权。”

話就是这样說的！甚至不要因为阿姆斯特丹決議而感到不安！完全是立宪民主党人！不过談到无产階級专政时他就不按照立宪民主党人的方式得出結論了。而且他大概是为了轉移視綫或者由于不良的老习惯才简单地这么提到了一下它。無論他在这里对于这个专政說过些什么話，現在仍然可以看得出来，他已經远远地脫离了真正的“正統思想”。

① 为了安慰《俄国报》訂戶中間神經质的讀者，我赶紧指出，“子弹”一詞当从轉义上去理解。——著者注

是这么回事么？或许现在已经懂得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么？也许懂得了真正的“正统思想”根本不会使用我国列宁之流的假马克思主义者用来叫嚣的那种语言说话么？如果懂得了，那就不要再谴责“正统思想”，把只是对“正统思想”的明显的无知看成是它的过错。早就应该懂得这样一个简单的思想：和全世界一样，我国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当它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行进时才会使自己的政治工作产生最大限度的效果。

我知道，我国立宪民主党的政论家们要领悟这个简单的思想是多么的困难。可是怎么办呢？得习惯一下！

这是我们共同的利益之所在，先生们；这是茹·盖德所谓共同压制我国旧制度的利益之所在。为什么你们要同时去追两只兔子以致冒两头落空的危险呢？为什么你们在你们正确地看出我们的政治错误的地方要把不正确的责备加于正统思想呢？在这里实行一下劳动分工岂不更好么？把批评“正统思想”让给你们理论人物——类如团结在彼·司徒卢威先生的《北极星》周围的人物，这些人在这门事业中无论如何要比你们的平庸的政论家有更高深一点的修养——岂不更好一些么？同时，完全停止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指摘”，而唯一只是根据**政治考虑的具体条件**提出政治问题，对于你们这些平庸的政论家说来，岂不是更好一些么？的确好一些！

“正统派分子”并不害怕理论上的争论，——众所周知，这是一些非常热中于辩论的人，——不过他们很清楚地看到（而且他们感到奇怪的是你们怎么会看不到这点），如果他们同你们的**实际协议**必须视预先的**理论协议**而定，则**实际协议永远**不会成立。然而为了我们共同事业的胜利**实际协议**是必需的。

我写完了上面的话以后，在第二一二号《言论报》上读到了亚·索·伊兹哥也夫的文章：《立宪主义和社会主义》。这篇文章可以作为我关于立宪民主党的政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不适当的“指摘”所说过的话的有力佐证。

伊茲哥也夫先生說：“七十年代末期以前，空想社会主义在‘民粹主义’的旗号下在我們俄国几乎独占了統治地位，这种社会主义自然是否定宪法，否定西欧的生活基础等等的。从八十年代末期起开始出現了科学社会主义，首先在理論中，后来在实践上。但是我国現代的社会主义更多地是在知識界，而不是在工人中間发展起来的，因此它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形式，其中馬克思主义同空想主义、布朗基主义、进化主义、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等等离奇地錯綜着。”

七十年代末期以前在俄国占統治地位的空想社会主义不善于正确地解决政治問題，这是对的。而且越是更多地收集七十年代俄国知識界的思想史材料，下面这个情况就显得更加清楚：当时在我国甚至那些认为政治斗争是解放运动最迫切的任务的人也不善于对付政治問題。这听起来是奇談怪論，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往事》上刊登的一篇尼古拉节論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解放运动的文章就以无法辯駁的說服力证明了这一点。八十年代在我国开始“出現”的科学社会主义^①已經掌握了解决政治問題的一切材料，——伊茲哥也夫先生說：“科学社会主义者深知社会主义沒有議會主义是不行了”，——但是我国社会主义者們“更多地”属于知識界这个情况妨碍了他們正确地理解这种解决办法。在我国現代社会主义中，用伊茲哥也夫先生的話說，馬克思主义同各种形态的空想社会主义离奇地錯綜起来了。可惜这种說法对我国許許多多的“馬克思主义者”也是正确的。但是从这里可以得出什么結論呢？看来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希望科学社会主义尽快地在我国战胜空想社会主义。伊茲哥也夫先生的希望也正是这样。不过在这里他赶紧作一个重要的区别。他宣称，科学社会主义本身就有空想的杂质，这种空想“有时”造成了把立宪主义和議會主义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可能性。在馬克思和他的嫡系信徒們的科学社会主义中“革命

^① 伊茲哥也夫先生把它的“出現”算在八十年代末期，但这是不正确的；早在一八八三年它就开始出現了。——著者注

的因素和进化的因素是彼此紧密地混杂在一起的，它們在共同的体系内不断地处于敌对的状态中”。幸而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学說的进化因素越来越多地分离出来了，这些因素每年都在增加，尽管用詞仍然和以前一样是革命的。倍倍尔在曼海姆代表大会上就总罢工問題所采取的行动只不过是說明这种分离过程的成百次的插曲之一。”

我不打算在这里回过头来評价倍倍尔在曼海姆的行为。我的一篇在曼海姆代表大会的直接印象影响下写成的文章^①曾經詳細地說明过这一点。我只請讀者注意一下，伊茲哥也夫先生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在什么地方。他认为这个特征就是缺乏革命的因素。这不外是古老的、早就陈腐不堪的、因此甚至連无政府主义者也早已抛弃的**革命和进化的对立**。好像进化不排斥革命，而是准备革命的道理不是一目了然的。不过伊茲哥也夫先生不願意懂得这个道理：給他一种完全聞不到革命的“香味”的社会主义吧。只有这样的社会主义他才会同意承认它是科学的。简单些說，科学社会主义，这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而是伯恩施坦先生的社会主义。所以当伊茲哥也夫先生和他的同志們希望科学社会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时，这意思就是說，他們希望伯恩施坦先生的社会主义取得胜利。

自然这是他們的事情。我根本无意于侵犯他們的同情的自由。不过我仍然要对他們說：先生們，这样一来，本能的声音就在你們身上窒息了理智和公道的声音。我們且回顾一些事实。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著名的《宣言》中嘲笑了不恰当地攻击資产階級立宪主义的那些“真正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宣言》的作者們称这些所謂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是旧制度的非自願的保护者。大家知道，《宣言》是一八四八年初写的。后来，在三月事变以后，馬克思和恩格斯回到了德国，参加了**民主党**。經過許多年以后，恩格斯在

① 指《曼海姆》一文，參看本书第102—122頁。——譯者注

致左尔格的一封信^①中指出过这件事，认为是策略上完全正确的步骤。你们对于这点要说什么呢？你们大概会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像真正的进化论者一样行动。但我要回答你们，你们如此心爱的同一个伯恩斯坦先生恰恰认为四十年代是这样一个时期，此时革命因素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观里占了进化因素的上风。可见这种占上风的情况不曾妨碍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者们坚持被你们的语言称为进化论的那种策略。同时，如果一切把革命和进化对立起来的做法都经不起甚至最温和的科学批评，它又怎么能够妨碍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这种策略呢？

存在着革命论的教条主义者。我们的“进化论”策略的宣扬者、那些每时每刻都要刺激“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人，则必须看成是反革命论的教条主义者。

这两种教条主义者中间哪一种更逗人喜欢些呢？这要看对什么人而言。不过有一个事实：在实践上，反革命的教条主义的害处丝毫不比革命的教条主义少些。的确，请拿伊兹哥也夫先生的任何一篇文章来说吧。写文章时的目的大概是很好的，即要向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说明，只有空想社会主义才能敌视立宪主义。而且我是怀着同样值得赞扬的目的（即想要从中汲取一些可以证明“极左派”应该同“左派”达成协议的新论据）才拿起这篇文章来读的。可见我们双方都有最和平的想法，然而事情却以争论结束。这实在不合乎目的。

伊兹哥也夫先生愿意重复伯恩斯坦先生以马克思学说中两个因素为题所发表的陈腐不堪的议论。谁也不会把这一点看成是他的罪过。而另一些人也许会发现，这是“很有独到见解的”。它证明伊兹哥也夫先生本人的世界观中存在着批判因素。但是为什么一家现时有着完全不同的任务的政治报纸要在社论中进行这种“批判的”反芻活动呢？在我们所经历的时期，这家报纸的政论家

^① 按：恩格斯是在一八八七年一月二十七日致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谈到这一点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第199页。——译者注

們本來应当不受反革命的教條主義的誘惑。

應當尊重事實。而事實告訴我們，俄國無產階級的思想家們在所謂批評的社會主義的名義下無論如何不會同“左派”達成任何協議。如果你們希望有這樣的協議，則請證明，這是符合正確理解的“正統思想”的要求的。那時你們才會確信，你們的論據不會消失得無影無蹤。這是壞是好，我這裡不準備詳細考察。但是事實如此。而且對於你們這些“現實的政治家”說來，尊重事實是有益的。

伊茲哥也夫先生發現，“在我們的黨內的社會主義者反對立憲主義民主派的辯論中起主要作用的，不是明白認識到的實在利益，而是小組的爭論、各種著作家集團的野心。這就產生使得我國社會主義政黨分崩離析的種種糾紛，在這些政黨中大概每一個士兵都分得一個將軍。”

這話說得厲害。不過讓伊茲哥也夫先生說說：怎樣說明我國“立憲主義民主派”反對社會主義者的辯論呢？只是因為想告訴社會主義者比較正確的策略觀點么？不，不只是這樣！假使這是對的，那麼立憲主義民主派先生們就不會認為自己的義務是經常“指摘”“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了。那時他們就會很容易懂得，這不僅是不必要的，而且簡直是有害的。

至於“各種著作家集團的野心”有時會引起十分眾多的完全不必要的爭論——這種說法是對的。殷鑒不遠。當《同志報》上出現了普列漢諾夫致覺悟工人的信^①時，庫斯柯娃女士^②對這種情況感到非常高興，因為，用她的話說，“他們”^③（即“我們”）始終宣傳了信里說過的同樣的主張。而且幾乎每當“社會民主黨人”的隊伍中暴露出對自己本身的活動的批判態度時，“他們”都要高呼：“勝利了！勝利了！”可見，策略問題主要是從他們的“著作的”和其他的

① 參看本書第 273—275 頁。——譯者注

② 庫斯柯娃，經濟派綱領 Credo（信條）的起草人之一。——譯者注

③ 指立憲民主黨人等所謂“左派”分子。——譯者注

“野心”的观点看来才引起他们的兴趣。再没有比指明这些野心毫无根据更容易的事了。不过当黑帮分子的粗棒子正举在所有自由的朋友的头上时，这个问题是不值得争论的。现在完全不顾到这件事。现在应当再三再四反复不断地指出：“左派”也好，“极左派”也好，都用不着对这样一些协议有所耽心；在这些协议中双方根本不必作任何原则性的让步，而可以把自己的努力结合起来，只要这样做对双方有利，对整个俄国有利！

这样的协议现在已经是提上日程的问题了。让那些为了这些或那些教条主义的考虑而拒绝达成协议的人倒霉吧。在政治上再没有比教条主义更可痛、同时也是更可耻、更可怜和更可笑的罪过了。这是弱者的罪过！

（译自《普列汉诺夫全集》第十五卷第 241—258 页）

第四封信

这封信以《家里》为题最初发表在一九〇七年第一期《现代生活》杂志上。

文章充满着关于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目的和手段、一致和差别的反芻式的空谈和抽象的說教。它反映了普列汉诺夫的一个基本策略思想，即一切机会主义者所共有的“选择”论：“在目前的祸害和对这种祸害作极微小的纠正之间进行选择”（《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 55 页）。作者不厌其烦地谴责布尔什维克“只知道自己的‘要么要么’，要么一致，要么不同；要么阶级斗争，要么协议”。实际上他自己倒是一个顽固的机会主义的“要么”论者：要么“专制制度”，要么“半自由”；要么黑帮反动，要么协议；要么沙皇，要么立宪民主党人。

这种基本思想使得普列汉诺夫在政治斗争中堕落到什么地步，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看出来。

一九〇六年八月，他在《共同的悲痛》一文中提出了“政治聯盟和戰鬥協議的計劃”：參加爭取召開立憲會議運動的黨派應當達成協議。這時他還算解釋了“立憲民主黨人不信任立憲會議思想的自私的階級特性”。隨着立憲民主黨日益右傾，普列漢諾夫既要維護“半自由勝過專制制度”的荒謬原則，就不得不“改變了協議的路綫”。五個月以後，他便“從實現思想上的聯盟開始鼓吹起選舉聯盟來了”，他“絕口不談召集立憲會議的問題，因為在自由派的前廳裏是禁止談這個問題的”（同上第299頁）。十一月二十四日，他在《同志報》上提出了“全權杜馬”的口號，“這樣，他就把孟什維主義發展到了頂點”（同上第十二卷第2頁）。但是這個“欺騙人民，蒙蔽人民”的口號（同上第十一卷第392頁）却“惹得個四面不討好”的結局。立憲民主黨人嘲笑它，孟什維克也紛紛表示不滿。於是普列漢諾夫陷於孤立。接着他就在《論策略新信》的第三、四、五這三封信中發了一通怨言。除了他自己以外，所有的人都被罵到了。一九〇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他在《俄國生活報》上更進一步把社會民主黨推向立憲民主黨的立場，提出了“責任內閣”的口號。

列寧指出，普列漢諾夫這個“機會主義者的典型特征就是：遷就一時的情緒，不能反對風行一時的东西，政治上目光短淺，毫無氣節。……為了……短暫的、一時的、次要的利益而犧牲黨的長遠的根本的利益”（同上第十一卷第222頁）。

普列漢諾夫在這封信中還拿俄國“生產力不夠發達”作為反對“工農專政”的借口，這說明他真正是一個“連頭也不用剃”的教條主義者。

誰患什麼病，誰就老是談這種病。我們的策略“患了病”；因此

毫不奇怪，我常常要回到策略問題上來。因為這樣多的事情都有待於這些問題的正确解決。如果在“自由的時日”我們有正确的策略概念，我們的處境就會比現在的情況優勝得無法相提並論。然則究竟到何處找策略問題的正确答案呢？顯然這裡應該有某種方法。只要恰當地運用這種方法，我們便可以發現真理。

這是怎樣一種方法呢？

依我看來，這就是**辯證的方法**，一般說來也就是我們用來分析我們世界觀的各個方面的方法。

不過就是辯證的方法也可以作各式各樣的理解，因而可以作各式各樣的運用。柏拉圖或黑格爾的唯心主義辯證法遠不是馬克思的唯物主義辯證法。

馬克思用下面一段話說明了這兩種辯證法的區別：

“在黑格爾看來，在觀念的名稱下被他轉化為獨立的主體的思維過程乃是現實界的造物主，現實只是它的外部表現。在我看來，事情就剛好相反，觀念的東西不過是在人的頭腦中翻譯過來和改造過來的物質的東西。”^①

對於辯證法的這個特征，“馬克思的批評者們”編造了許多胡言亂語。他們中間的一位人物——康拉德·施米特博士——比方就裝作一付深思的正經面孔硬說，凡是認為觀念的東西是物質的東西的改造和翻譯，便等於用“物質和力”來解釋人的精神本性。在另一個地方我反駁過他的這套謬論。我說，如果我把某種俄文著作翻譯成法文，這決不意味着可以用俄文的屬性來解釋法文的屬性^②。不過我完全不需要在這裡進一步對“觀念的東西”同“物質的東西”的關係作哲理性的爭論。我要同站在馬克思的觀點上的讀者交談，這些讀者既不會因為深思的康·施米特博士的影響、

① 《Das Kapital》，Vorwort zur 2. Auflage P. X, XI ——著者注（《資本論》，第二版跋，參看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 XXII 頁。——譯者注）

② 《對我們的批評者的批評》，第 231 頁。——著者注（參看《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二卷第 499 頁。——譯者注）

也不会因为更加深思的波格丹諾夫先生的影响就离开馬克思的观点。我要同沒有經過“批評者”贗造的馬克思主义者談話。这样的馬克思主义者——应当承认这样的人是不多的——自然会尊重自己固有的世界观的正确的基本哲学原理。因此，我們可以在不使这些原理受到修正(«Revision»)的前提下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馬克思在接着談論自己的唯物主义辯证法时所說的那番話上面。

他繼續道：“神秘形态上的辯证法是德国的一种时尚，因为它看起来替現存的事物秩序作了辯护。合理形态上的辯证法則是資產階級和他們的理論家所厌恶的，因为它在說明現存事物的时候也說明它的否定及其必然的消灭过程，因为它在运动的行程中，因之也就是从暂时經過的方面考察每一个特定的形式，因为它不崇拜任何东西，它本质上就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①

乍看起来，对唯物主义辯证法的这种說明同現今激动我們心神的那些策略問題是相去再遙远不过了。不过如果你們更仔細地深入想想这种說明，你們就会看到，这是一个很大的錯誤。

的确，从每一特定形式的暂时經過的方面来考察該形式的唯物主义辯证法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它不仅否定，而且也說明，同时它不仅說明将受到否定的特定形式的存在，而且也說明这一否定本身。在辯证法最高法庭面前不能替自己辯护的否定显然是沒有任何根据的。这一点無論在理論方面或者在实践方面都极其重要。不过这还不是一切。否定在辯证法的法庭面前可以用什么东西来辯护和說明呢？既然我們主张唯物主义辯证法，則显然，不应当到“观念的东西”那里去找說明，因为“观念的东西”是“物质的东西”在人脑中的翻譯和改造，而恰恰應該到这个“物质的东西”中去找說明。在說明对特定社会制度的否定时必須向之求援的那个“物质的东西”叫做社会的經濟。唯物主义历史观就包含在我所引证的唯物主义辯证法的这个特征即这个非常簡明、然而极其确切

^① 馬克思，上引著作，同頁。——著者注(參看《資本論》第一卷第 XXIII 頁。——譯者注)

的公式中。附帶要指出，从这里可以看到，承认唯物主义历史观但是否认唯物主义辯证法的那些人有多么的聪明。

繼續往下說。善于說明現存事物的人也善于确定——至少有最好的方法来确定——这个現存事物在何种程度上已經成熟到以及它在何种程度上还没有成熟到寿終正寢的地步。而这自然不会不影响到他的实践活动；这种人对待还没有成熟到寿終正寢的东西的态度必然——我指的是邏輯的必然，但是只有彻底的人才会服从这种必然——会不同于对待已經成熟到归于死亡的东西的态度。从《反杜林論》的一个地方^①可以看出，恩格斯曾經把每一个特定社会階級的历史道路看成是由两个阶段即由上升阶段和下降阶段組成的曲綫。当这个階級处在其历史的曲綫运动的上升阶段时，它在社会发展中就起着进步的作用，在这个时候，凡是企图这样或那样阻止它力求前进的人，本身就会必然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扮演反动分子的角色。而且这無論是应用于社会經濟，或是应用于政治，都同样正确。事实上也不能不如此。因为根据馬克思的学說，在一方为任何特定社会的生产关系和另一方为它的政治“上层建筑”之間存在着一种密切的因果联系。

試从經濟領域中举一个例子。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辯证唯物主义的立場上。他們同資產階級經濟学家相反，正是“在运动的行程中，因之也就是从暂时經過的方面”研究了資本主义。他們說明了資本主义的存在以后，进而說明了它的否定及其必然崩潰的过程。而且大家知道，他們对資本主义必然崩潰的說明乃是他們对待負担着将来消灭資本主义义务的階級即現代工人階級的运动的态度的依据。不过正是因为他們說明了資本主义的存在，所以他們懂得資本主义在历史上所起的那种进步作用，并且，同空想社会主义者相反，把一切想要阻止或者哪怕只是延緩資本主义发展的企图宣布是反动的。

^① 參看《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 272 頁。——譯者注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布列斯拉夫尔代表大会（一八九五年）上，倍倍尔說过，当他必須考虑某項实际要求时，他首先就反躬自問，实现这項要求是不是会妨碍資本主义的发展，要是他发现这样做的确会妨碍这种发展，他就要出来**反对**这項要求。倍倍尔的这番話表明他是馬克思的忠实学生。

不过对待資本主义的这种态度，只有能够——哪怕只是在这个領域內——提高到辯证法观点的水平的那些人才容易理解。对于坚持被黑格尔、而在黑格尔以后又被恩格斯和馬克思称为**形而上学**思想的那个观点的人說来，事情就各別另样了。形而上学者按照“是就是是，非就是非，除此以外，皆是鬼話”的公式进行推論。这个公式根本不容許考虑地点和時間的条件；它不問差別的不同。資本主义**要么**就好**要么**就坏。假使它好，那就应当千方百計地发展它，因此也就应当去为資本主义方式的剝削者服务。假使它有害，那就应当千方百計地坚决消灭它，甚至包括采取会使前資本主义的旧“基础”永世长存的那些措施。这是老調子了，記得我們同民粹派的爭論的我国讀者对它是非常熟悉的。当我想起已故的謝·尼·克里文科写过的一句話，說在現代农村中彻底的馬克思主义者应当做酒館老板时，我至今都禁不住要发出愉快的笑声。我敢于寬慰自己的是，我的大部分讀者現在都懂得，我刚才提到的这位資本主义的敌人錯得多么厉害。所以我就可以不对这个例子多費笔墨了。

現在且从政治領域中举一个例子。反复申明說資本主义**要么**就好，**要么**就坏，因此**要么**應該发展它，**要么**應該阻碍它发展的形而上学者，当他对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取得胜利表示耽心时，他始終是完全忠实于自己的。因为如果資本主义**要么**就好**要么**就坏，則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也是**要么**就好，**要么**就坏。假使它好，則自己就應該坚持資產階級的政策，假使它坏，那就得不让資產階級的政治产生，即使为此必須使前資本主义形式的旧政治关系永世长存——确切些說：不定期地延續下去——也好。受到《共产党宣

言》嘲笑过的四十年代的“真正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有时就作出过这样的結論。我国瓦·沃·先生这一类型的民粹主义者和尼·米海洛夫斯基这一类型的主观主义者也作出过这样的結論。例如从《往事》上登載的尼古拉节先生的《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解放运动》一文中就可以看出我没有誹謗米海洛夫斯基。这是一篇从一定的观点看来了不起的文章。它表明，一些无疑是誠实的和在某方面聪明的人由于不能提高到用辯证法观点看待社会生活，竟然得出了怎样古怪的結論。

另一方面，在我国八十年代里，有一些人——弗·布尔采夫、依·杜勃罗沃里斯基、弗·德巴哥利-莫克里也維奇——断言资产階級制度的胜利会是俄国向前迈进的巨大步伐，他們从这里做出了这样的結論，說俄国无产階級思想家应当“暂时”和自由派同流合污。这是附加在米海洛夫斯基和我国民粹派分子所犯的那个錯誤之上的又一个錯誤；无论前一些人还是后一些人，即无论是包括米海洛夫斯基在内的民粹派分子还是有自己的志同道合者的弗·布尔采夫先生，都是按照“是就是是，非就是非，除此以外，皆是鬼話”的公式进行推論的。

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者們沒有这样推論过。在政治上，也和在经济上完全一样，他們是从资产階級制度的暂时經過的方面說明这个制度的。他們在說明它的存在时，也进而說明了它的否定、它的必然崩潰过程。但同时他們也說明了它在取代生长在过时的經濟关系的基础上的“旧制度”的过程中曾經起过的——或者像在四十年代的德国一样，只是本来要起的——那种进步作用。这就說明为什么他們在自己的《宣言》中嘲笑了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因为这些社会主义者由于自己的天真无邪竟然认为，如果资产階級的政治制度将来注定要消失，那么它也就用不着出世了。在《宣言》的两位作者看来，这一类的社会主义者都是**反动分子**，而他們的作品都是**有害的、“令人萎靡的作品”**^①。馬克思和恩格斯认

①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 498 頁。——譯者注

为，当资产阶级还采取革命的行动的时候，无产阶级就应当同它一起去反对旧制度。

如果“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按照“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公式进行推论，从而产生这样一种信念，即认为既然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是矛盾的，则这两大阶级即使在由资产阶级以前的政治制度向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过渡的时期也不可能**有共同的政治利益**，那么卡·海因岑和他的朋友们就相反，他们认为在上述历史时期无产阶级根本无需乎形成一个特殊的政党。形成这样的党在他们看来，也正像我国的布尔采夫先生、依·杜勃罗沃里斯基先生等人看来一样，是有害于自由事业的。因此他们激烈地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按照这种方针进行活动。

显然，在这里详细说明这次论战的情况，是完全不适当的。但此处指出马克思曾经究竟怎样衡量卡·海因岑的**逻辑错误**将是有益的。

用马克思的话说，卡·海因岑就是这样一种有“健全理智”的代表人物。他不愿意因为哲学研究和其他学术研究而损坏自己的天赋才能，同时由于自己在逻辑上充分的软弱无力而暴露出自己的庸俗性。在他看出对象间有**差别**的地方就看不见**统一**（即一致），而在看见有**统一**的地方却忽略了**差别**。^①把这个意思用一句著名的俄国俗话表达出来，我们可以说，凡是在这种庸俗的“健全理智”幸而顾到头的地方，它就顾不了尾，反之，顾到了尾，就顾不了头。

可以有根据地把这个（的确不很光荣的）鉴定应用到现在我们祖国许许多多**在无产阶级的策略问题上大发议论的人**身上去。现在在我国也有一类人硬说，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上采取独立于资产阶级的行动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这类人看见了对象间的一致，却没有看见它们的差别。另一些人自封为大大的急进派的。他们不仅主张无产阶级在政治上采取**独立于资产阶级的行动**，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对的；而且还主张，即使为了同“旧制度”作斗争它也不同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332页。——译者注

資產階級發生政治上的往來，在這一點上他們錯了。這些人能夠看出（正確些說，從別人的話里記住了）對象間的差別，但他們的聰明才智卻不足以同時也弄清楚這些對象的狀態中的一致性。一些人顧到了頭，另一些人顧到了尾。誰強些呢？說實話，我不知道。也許兩種人都強。但不管怎樣，無可懷疑的是這兩種人都沒有達到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所以無怪乎（順帶說它一句）當這兩種人研究哲學的時候，他們都同樣地寧願把這種觀點當作“過時的東西”而予以取消，一些人用康德的批判主義代替辯證唯物主義，另一些人則用馬赫派的經驗一元主義等等來代替辯證唯物主義。

為了明顯起見，試從《同志報》（第一三三號）上剪下一個小小的片斷：

“我們從巴黎得到消息說：

“《同志報》上發表了蓋德的信以後（他在信中堅決主張在臨來的選舉中同自由民主主義的反政府派達成協議），一個著名的布爾什維克向蓋德拍去了一封有下列內容的電報：‘您那封同階級鬥爭原則根本不相容的信使我感到驚訝。’這位布爾什維克不相信蓋德的信的真实性，並且請求他用电報證實一下信是他寫的。蓋德回答說：‘社會黨人的義務就是同專制制度作鬥爭。如果不能提出本階級的候選人，就應該採取聯合行動。’”

“還有你，布魯特！”^①

一個或多或少“著名的布爾什維克”給蓋德拍去了一封電報，就蓋德的信向他表示了自己的極端驚訝的心情。這件事我已經從另一處獲悉了，不過我沒有看到這位多少“著名的布爾什維克”的電報原文，所以我不能肯定《同志報》轉載的這段原文是不是完全確切。但是對於我們說來，電報的“文字”在這裡並不重要；我們只

① 語出莎士比亞：《尤利·凱撒》（參看新文藝出版社中譯本第58頁）。被凱撒認為是自己的擁護者的布魯特參加了反對凱撒的陰謀活動。當凱撒臨死前看見攻擊他的布魯特時，就高喊道：“還有你，布魯特！”後世用這句話表示朋友的叛變。——譯者注

要知道它的思想、它的“精神”就行了。而它的思想是正确地传达出来了。所以，站在我們面前的这位打电报的人、即这位或多或少“著名的布尔什維克”，乃是这样一类人物的十分值得注意的标本：他們本性上沒有能力領会下面这个实质上极其简单的思想，即两个特定对象可能同时互有差别又彼此一致，而在我国过渡时期中俄国无产阶级的策略恰好应当始終貫穿着这个思想。这样简单的思想对于这一类人物的“天赋才能”說来仍然是太复杂了。他們只知道自己的“要么要么”：要么一致，要么不同；要么阶级斗争，要么协议；除此以外，皆是鬼話。他們的脑子里根本沒有想到，在过渡时期，为了**进一步发展这种阶级斗争**，协议可能是必要的。我确信，当我们这位多少“著名的布尔什維克”收到茹·盖德向他指出“社会党人”直接的和无可争辩的“义务”的电报时，一定是悲伤地断定說，法国工人党的这位奠基人患了机会主义的病。可怜的“著名的布尔什維克”啊！他的圣洁的天真无邪确实动人心脾！

但是不管这个俄国庸俗的“健全理智”的代表怎样使人感动，仍然应该记住，他对机会主义的概念——这种概念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間传布得实在相当广泛——对于“奥恰柯夫时代，克里木战争时代”^①的社会主义者說来可能是自然的，但在把自己称做馬克思的信徒的人的心目中，却是最无可置疑的违禁品。

从早已过去的时代的社会主义者的观点看来，誰是机会主义者、誰是急进派的问题十分简单地就解决了。如果說“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公式包囊一切邏輯上的可能性，那就很容易看出来，算作急进派的必須是这样一种人，他，比方說，領会了阶级斗争原則以后，坚决地要求这两大阶级甚至在互相間取得协议（为了共同**攻击那妨碍它們各自的自由活动的某个第三者即敌人**）对它們两方或許更有利的場合下也繼續进行斗争。要么是阶级斗争，要么是阶级調和，即背叛斗争的原則。这就說明为什么上面提到的这个

^① 俄国占領奥恰可夫，平定克里木是在十八世紀三十年代。語出格利鮑耶多夫的《聰明誤》（參看人民文学出版社中譯本第54頁）。——譯者注

多少“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按其观点一定认为我和盖德是机会主义者；这就说明为什么他按照自己的观点有充分的权利像法利赛人在耶路撒冷神殿里叫喊一样自负地喊道：“上帝啊，我感谢你，你创造了我，使我不像这些人，而像急进的列宁。”^①这个“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是有自己的逻辑的。但是经过这番说明以后，我们可以明白，他的逻辑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因此很明显，以这个逻辑为依据的判断，不仅不能解决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而且一定会使它更加混乱。

然则从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者的观点看来情形又怎样呢？乍看起来，它在这里好像比较复杂，但实质上光凭科学社会主义的辩证方法可以轻而易举地对付庸俗的“健全理智”无法解决的种种困难来说，它就简单得多。

如果唯物主义辩证法从现象的暂时经过的方面考察一切现象，如果它在说明这些现象的同时也说明它们的否定，如果它不崇拜任何事物，不向任何东西屈服，那么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说，只有完全忠实于它的精神的人才是急进的，换言之，只有本身不向任何陈旧过时的事物屈服的人，只有懂得历史运动的意义并且清楚地看到它的最終目的的人，才是急进的。反之，谁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与过时的东西决裂，或者没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去理解旧事物的确过完了自己的时代，谁就是机会主义者。不言而喻，这样的人对于运动的最終目的将是相当地漠然无动于衷的；有时他会干脆用讨厌的口吻谈到它，因为只要提到最最終目的，他不愿意与之彻底决裂的那个垂死的东西的保护者就感到惊慌万状。机会主义者的心理，这就是爱·伯恩斯坦先生的心理。伯恩斯坦在着手“修正”马克思的理論的同时得出了一个信念，即旧的马克思主义使得资产阶级心惊胆战。爱·伯恩斯坦先生想使这个阶级的至少某些阶层相信，现代的工人运动完全不像他们所以为的那样严重地威胁它

^① 参看《圣经》《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九——十四节。——译者注

們的物质利益和思想利益：“它們的宗教、它們的爱国主义”等等^①。所以愛·伯恩施坦先生着手证明，在現代資本主义社会中私有者的人数不但在相对地增多，而且也绝对地增多；所以他开始譴責任何提到无产階級专政的言論；所以他开始“批評”唯物主义，以及諸如此类。他的整个的这种情緒清楚地表明，現代西欧工人运动的最終目的在他的心目中已經失去了任何价值；他曾經宣称，“运动是一切，最終於是沒有的。”但如果最終於是沒有的，那么**运动**也会失去任何意义，因为它会变成闭着眼睛的运动、乱撞瞎闖的运动、碰运气的运动。当一个人具有这样的情緒时，凡是話里提到不向任何东西屈服的唯物主义辯证法，自然都会使他感到噁心。所以无怪乎愛·伯恩施坦先生着手“修正”馬克思的理論时立即热心地警告自己的讀者預防陷入被他称为**矛盾邏輯**的那个状态的危險。

現在我們知道有一个特征可以說明忠实于唯物辯证法精神的人所具有的思維的性质。这种人一分钟也不忽視运动的最終目的，对于自身活动中的任何一个形式、任何一个事实、任何一个步驟他都是根据最快地达到这个目的的原則来評价：**凡是可以最快地达到目的的东西都是最好的；凡是在达到目的的道路上造成最多的障碍的东西都是最坏的。**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策略原則。

但是請注意，这**只是**一个原則。而且**这一个**原則还远不能規定它的性质。这种性质用这个原則来規定是非常不够的，因为任何一个急进派的空想主义者都会自願地在这样一句話下面签名：**凡是最快地达到目的的东西都是最好的；凡是最严重地妨碍达到目的的东西都是最坏的。**問題在于：**到什么地方去寻找达到最終於目的的保证。**浸透着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抽象真理和正义的力量中寻找这样的保证；站在唯物主义辯证法观点上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者則求諸社会关系的发展。坚信抽象真理

^① 《历史唯物主义》，尔·坎采尔譯，圣彼得堡，一九〇一年，第248—249頁。——著者注

有不可摧毀的力量的空想主义者认为，他所中意的社会制度随便什么时刻都可以实现，只要人们的邪恶意志和愚蠢想法不妨碍这件事就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者懂得，人们的观点和意图取决于他们的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的交替则受生产力的发展所制约（“在我看来，观念的东西乃是在人的头脑中翻译过来和改造过来的物质的东西。”）。因此最符合他所——照涅克拉索夫的说法——渴望的思想的那个制度在他看来绝不是随便什么时刻都可以实现的。在他的心目中一切归根到底都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状况。

马克思说：“如果无产阶级得以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那么它的胜利就会是暂时的，这个胜利本身只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因素，——正像一七九四年的情况一样，——除非历史的进程创造了……使得消灭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因此也就是彻底打倒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成为必要的物质条件。”如果马克思在臭名远扬的“自由时代”向我们进行这种宣传，那么他就会显得像一个“机会主义者”。于是在我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那种认为只有庸俗的社会主义才会去对付生产力的状况、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主要是寄望于……“历史的偶然性”的理论就获得了不小的胜利。我不打算在这里分析，哪一种观点更加可靠，因为我的出发点是这样的假定，即只有马克思的观点才是可靠的。但是我希望，读者自己也可以看出，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看来，——我国社会民主党人照理是希望保护这些原理的，——引证“历史的偶然性”，像我国人士在讨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问题时所作的那种引证一样，乃是一种非常不恰当的作法。为什么许多天性并不愚蠢的人觉得这种引证是令人信服的呢？

这个道理自然很明显。拿破仑说过：“把俄国人剃了头你们就会发现他是鞑靼人。”我说：把我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剃了头，你们就会发现他是——当然并非永远是，但在大多数场合下是——无可救药的空想主义者。原来如此坚信真理和正义的力量的空想主义

者心灵深处却把希望主要寄托在幸运的偶然性上。这就说明为什么——而且只是因此——我国的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在上述时代居然比马克思更加“急进”得无法比拟，不过……这是急进主义吗？

并不是任何自称为马克思的继承者的人都善于正确地利用他的方法。

马克思认为，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只会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因素”，——光是这一个事实就会引起那些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而（像已故的列·吉荷米洛夫所说的一样）张罗奔走的“著名的”和不著名的“布尔什维克”的纷纷议论。这些极端“急进的”先生们的土地纲领恰恰是把希望寄托在这样一种专政上面。

而当有人向他们指出，这种专政在现时无论如何不会是彻底的，当有人问他们，如果跟着来一个必不可免的反动，实现他们的土地纲领的政治后果又会如何时，他们就用谴责问话人缺少信心，有机会主义，削减政治纲领以及其他种种死罪作为答复。

我说过：把我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剃了头，你们常常会发现他是空想主义者。现在我要补充说：“布尔什维克”甚至连头也不用剃，因为他的空想主义就是不剃头对于任何一个稍微懂事的人说来也是清清楚楚的。这是加圈加点的空想主义。

所以，凡是经常考虑“最终目的”的人都是作得很对的，不过这还不济事。那些最初出发参加远征、每见一座新的钟楼就提出“这是不是耶路撒冷？”的问题的十字军骑士也是经常记住了自己的最终目的。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们遭致最悲惨的失败。他们对通达他们的“最终目的”的道路毫无认识。他们甚至也料想不到，他们所拥有的各种手段完全不足以达到这个目的。因此，如果就其经常追求最终目的而言他们也是急进派，那么就其政治价值而言，他们的急进主义是微不足道的。现在，空想主义者的急进主义的政治价值也是同样微不足道的。在实践上，这种所谓的急进主义往往给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害，因此它所起的不是**进步的作用**，而

是反动的作用。

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者，只要他愿意忠实自己，就应当用极大的怀疑态度对待关于这一个或那一个政治派别、这一个或那一个社会活动家、这一种或那一种斗争方式的急进主义的流行见解。并不是所有发光的东西都是金子，也不是所有外表上急进的东西都是急进的。还在不久以前，爱·伯恩斯坦先生断言，德国社会民主党应当把群众性的示威游行算作它现在所要采取的政治活动方式。可是考茨基和倍倍尔反驳了这种意见，他们认为在现今的条件下举行示威游行是不适当的。难道这是意味着考茨基和倍倍尔取代了伯恩斯坦先生的地位么？莫非他们变成机会主义者，而伯恩斯坦又回到了急进主义么？真的这样吗？根本不是！伯恩斯坦虽然提出了政治斗争的急进手段，却一丝儿也没有改变自己的机会主义。同样情形，倍倍尔和考茨基虽然否定了这种急进手段，也是一丝儿都没有改变自己的急进主义。而且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很好地懂得这个道理；可是我国的某些社会民主党人却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让机会主义者伯恩斯坦先生打破了急进主义的纪录而伤心。真天真！

在空想主义者的头脑里，最不可调和的矛盾是和睦相处的。今儿他可以同你们一起说，应该承认比其他一切手段更能迅速地达到目的的那种手段是政治上最急进的手段。明儿他就完全**不从手段是否合乎目的的观点来看手段**；明天他就完全忘记了——好像他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特定手段的意义都是**相对的，本身自在的好、绝对的好**，而不是因为它能迅速地和可靠地达到最终目的才好的那种手段是没有的。所以只是因为空想主义者的思维充满着矛盾，只是因为它没有通过优良的辩证法学校，才可能产生这样一些——在我国几乎每天都重复出现的——事实：某种个别的斗争手段，比方就拿示威游行说吧，被人当作同运动的总进程没有任何联系的东西来了解，并且被认为是比**另一种也是单独拈出的手段**例如暴力行动更急进或更不急进的手段。所以凡是不拒绝在

这种荒謬的評價方法的情况下被认作最急进的那种手段的人都被认为是急进派，而凡是否定它的人都被宣布为溫和派，有时……——这真是天大的笑話！——这种人自己也认为自己是溫和派，并且打从心坎上因为認識到自己的这种“迫乎时势”的溫和精神而苦恼。倘或我来把我国的极左派由于这种根本上錯誤的——形而上学的，像馬克思和恩格斯会說的那样——評價各种斗争手段的方式而犯下的种种錯誤历数一遍，恐怕罄南山之竹也写它不完。这些錯誤多得有如天空的星星，有如海滩的沙粒……

辯证法从事物和現象的相互联系考察事物和現象，而不是孤立地考察它們。当某种斗争手段不是孤立地加以考察，而是从它同其他手段的相互联系以及——这是主要的——从它同目的的一致来考察时，就經常要暴露出，孤立地考察它时似乎是急进的手段損害着事业的利益，延緩着达到目的的时间，所以它一定要被抛弃掉，不过不是因为它似乎是急进的（本身自在的急进或溫和的那种手段是沒有的，也不会有），而是简单地因为它不合理，像一切同目的背道而馳的手段不合理一样。这就是某些人所以极端可笑的緣故。这些人（他們中間有許多非常博学的各門社会科学的教授）活灵活現地叙述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到自己的晚年已經变得比他們政治生涯的初期更加溫和得多了。其实馬克思和恩格斯並沒有改变，改变了的是他們必須在其中进行活动的那些条件，条件的这种变化必然使得斗争手段也发生变化。

科学社会主义的两位奠基人不是平白无故地同空想社会主义进行了斗争（到他們出場的时候空想社会主义已經越来越过完了自己的时代，因而也越来越丧失了自己的长处，和越来越暴露了自己的根本缺点）。他們不是徒劳无功地通过了黑格尔政治哲学优良的学校。他們本性上不能不从自己的斗争手段的相互联系中以及从手段同最終目的的关系中来考察这些手段。

从这个方面說——当然只是从这个方面說——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比我們整个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更好得无比地掌握了科学社

会主义的精神。你們試对任何一个明白道理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說，他的党本来应当举行武装起义；他就会简单地并且完全心安理得地宣布你們是瘋子，甚至对于人們說他是不得已才否弃如此“急进的”手段，也絲毫不会感到內疚。他早已明了而且十分明了：同目的无关而可以說急进或溫和的那种手段是沒有的，从目的的观点看来很有害的手段簡直是愚蠢的，并且只是愚蠢的；建議采取这种手段的人（如果他不是挑撥者的話）要么是瘋子，要么是俗話中呼为笨伯的那樣一种故步自封的人。而整个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我所指的是“布尔什維克”队伍中間的那些沒有完全变得耍野的社会民主党人——虽然也拒絕了上述暴力“发动”的思想，认为是現时沒有根据的思想，但是对于他們这些在邏輯上和情感上都是急进的人之被迫放弃最急进的斗争手段，仍然有某种不快的感觉。他們說，俄国不是那种形势^①（我們这儿的人不知为什么現在都喜欢这个外国字眼）。的确不是那种“形势”。但是要知道，我国的“形势”無論它怎样不同于德国的形势，仍然是这样的：我們現在談論武装起义，无异于瘋人道嚙語。其实，我們这里的人誰也沒有想到过要請有經驗的精神病医生来診斷小册子《杜馬的解散和无产阶级的任务》的作者的健康情况：这位作者居然在去年七月向自己的讀者建議把武装起义規定在八月中旬或八月底。

德国人不信空話，他們根本不认为必須有一种表面上“煞是惊人的”策略。他們所做的工作不是看起来最急进的，而是对进一步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以及对巩固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地位此刻最是必要的。这恐怕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毫不夸大地称它的策略是科学的策略的党派。正是德国工人政党的这种科学的策略使得它变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党。因为采取这种策略时，每一个政治行动在运动的总进程中的意义几乎都是預先以数学的准确性来衡量的。如果有一个党經常不断地和始終不渝地接近自己的“最

① “形势”：ситуация，从法文 situation 一詞借用过来的外来語。——譯者注

終目的”，这就是德国无产阶级的党。不过——我要再说一次——这个党是用完全不同于我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标准来评价自己的“珍品”的。

十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党内所使用的标准同所有明理的、有经验的、诚恳的和没有被知识分子的教条主义弄得进行诡辩的人在自己的事业中必然要坚决采取的那个标准本质上是一致的。请回忆一下列·托尔斯泰伯爵的《袭击》吧。大尉赫洛波夫说：

——这儿也有一个三十二岁的军人，看起来是西班牙人。我们一行行过两次军，他披着蓝色的斗篷，穿着某种……终于打死了一个青年汉子。在这里，老兄，谁都不会使你感到惊奇。

——那么，他勇敢吗？——叙述故事的人问道。

——鬼才知道；不过他老是一马当先，哪里对射，他就在哪里。

——这么说一定是勇敢的了，——那人说。

——不然，不需要他的地方乱插手，这不叫勇敢。

——什么您才叫勇敢呢？

——勇敢？勇敢？——大尉重复说，现出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的神色：——该怎么行动就怎么行动，这才是勇敢，——他思索了一会儿，说道。^①

可以看得出来，高加索的这位老军人也没有从绝对的观点看待军事功勋的习惯。在他的心目中军功只有相对的意义。他从目的的观点来评价军功：该怎么行动就怎样行动，这才是勇敢。如果我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军官们更多地效法赫洛波夫大尉，而不去效法披蓝斗篷的西班牙人，党现在本来会走得多么远啊！

我们的人对待政治斗争手段的教条主义态度即形而上学态度，最明显的恐怕是表现在对选举协议的恐惧上了。选举协议，正像其他任何政治行动一样，可以是必要的，可以是有益的，也可以是有害的。这里一切都取决于时间和地点的情况。因此，要解决

^① 着重字体是原文有的。（参看托尔斯泰：《哥萨克（附袭击）》，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264—265页。——译者注） 著者注

关于協議的問題，正是必須从当前这个时刻的情况的观点出发。但是在我国，大部分参加爭論的人却用形而上学的詞句巧妙地把這個問題粉飾起来了。他們不是爭論从最快地达到目的的意义上来看待选举協議有益还是有害，而是爭論提出这些協議作为建議的那些社会民主党人是机会主义者还是不是机会主义者。无怪乎西欧社会主义最**急进**的代表——請回忆一下茹·盖德的信——在这种場合下**急进地**同我国那些自詡为社会民主主义学說最急进的代表的人发生了意見分歧。西欧社会主义的急进派清楚地知道，他們的急进的策略是在怎样的具体条件下制訂的；他們想不到这种策略可以不顾時間和地点的条件而被认为是急进的。然而我国的“急进派”恰恰就不懂这个道理，因此他們实际上并不是急进派，而只是依照他們自己的想像以及只是由于沒有能力深入地思考才被认为是急进派。

关于选举協議，我在这里不准备进一步詳細說明；我敢于相信，讀者已經充分地知道了我对这些協議的看法，不过我认为指出下面一个极端重要的情况并非沒有益处。

迄今为止，社会民主党人的教条主义都被看成是团結我国旧制度一切敌人的主要障碍。正是因为这一点，許多指摘和譴責紛紛落到了他們的头上。我根本无意于断言，这些指摘和譴責是沒有根据的。相反，我自己刚才就指摘了我国社会民主党人对待策略問題的形而上学态度。我抱着遺憾的心情預見到：他們对待这些問題的这种态度还会使得他們在新杜馬中产生許多錯誤，就像它在第一屆杜馬选举时代和存在时代曾經使得他們产生了許多錯誤一样。但是真理高于一切。無論我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罪过多么巨大，事实是，現在他們大多数人終于表现了达成協議的決心，可是“人民自由党”根本不高兴他們的这个決心。这一点应当記住。“人民自由党”这样做当然有自己的理由。它完全是以一定的政治考虑为指导的。同时它也有充分的权利根据这种考虑行事。不过如果它的考虑沒有如願以償，如果立宪民主党人的执拗性格損害

着自由的事业，那么这个責任正好应当由他們来担負，而不是由任何別人来担負。真理高于一切。

我坦率地承认：当我从《言論报》上看到立宪民主党人的执拗性格走得多么远以及具有怎样一种性质时，我曾对自己說：糟了；甚至先前同意了达成協議的那些社会民主党人現在也許又要失去对協議的任何爱好。我至今都不相信，立宪民主党人的策略沒有发生过（至少是部分地发生）这种作用。然而这里自然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有益的东西。

每一个清醒地看待政治問題的政党，都是从自己本身的任務和自己本身的利益的观点，而不是从它与之訂立某种契約的那个党的高尚情感的观点来考察任何協議的。立宪民主党人現在所采取的策略不会使他們得到很大的光荣，这是明明白白的。对他們說来这可是更糟糕的事情。他們不得不尝到这种策略的苦果的那个時間已經不远了。因此社会民主党人本身既可能、也应当促使这个時間最迅速地到来。最近一次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某些決議指出，“人民自由党”希望在工人中間生根。如果这样，社会民主党人必須給他們迎头痛击。所以在这里真实地指出立宪民主党人策略的性质无疑将会促进俄国工人觉悟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应当使立宪民主党人充分得到他們所应得的一切。不过，第一，此地所需要的不是什么资产階級不中用的歇斯底里的叫嚣，而是十分明确的立宪民主党的作用。第二，如果說在政治上很不妨做到給予每一个人的东西都“以他的事业为根据”，那就自然应当給成这个样子，使那些不应当得到任何东西的人不致因此感到苦恼，反过来，使那些照理应当先于其他一切人感到苦恼的人首先感到苦恼。但是如果社会民主党人現在忽然想把东西給予立宪民主党人，同时在必須于立宪民主党人和反动分子之間作一选择时却拒絕支持他們，那么这就会是反动分子根本不应得到的賞酬，同时也是……无产階級根本不应得到的懲罰；因为很明显，缺乏政治自由正是最沉重地打击着这个階級的利益；因为资产階級要比它更容

易得多地适应专制制度所建立的局面。这一点现在就連小孩子也一定会知道的。然而如果反动分子的胜利会最沉重地打击工人阶级的利益，則这个阶级的思想家們假使被立宪民主党人过分“小器的作风”所激怒而忽然想要懲罰他們，間接地支持——直接支持自然談不上——黑帮分子，他們就会成为对工人阶级最有害的瘋子。半自由胜过专制制度。因为它使人得到很多机会来夺取完全的自由。在政治上只有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才会始終同易卜生的勃朗特一起反复地說：“要么一切，要么沒有。”有时，在很少見的場合下，遵循这种公式是有益的。不过更經常得无比的情况是：对于采取这个公式的那些人說来，它会堵塞通达目的的道路。

当这篇东西問世的时候，选举協議的問題好坏都将被生活本身所解决。因之我也許可以說，現在写文章替協議講話实屬詞費。不过事情完全不是这样。对協議的錯誤观点深深地根源于我們的策略原則。所以依据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考察这个錯誤观点是有好处的。这种考察涉及一系列其他的、可惜我們还远沒有摆脱掉的偏見。

現在許多社会民主党人都在开始常常談論必須“打破无产阶级的消极情緒，并且使无产阶级再次成为全民运动的中心”。这是很值得贊賞的想法。不过要实现这种想法可不那么容易。打破消极情緒比起徒然浪費积极精神来困难得多。我国极大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的惊人的策略概念曾經大大地促使俄国工人阶级徒然地浪費了积极精神。嗚呼！“自由的日子”在这方面也是极度揮霍的日子。

我想，当时的揮霍者中間許多人現在都会同意这个意見。而且我想，他們中間許多人都会衷心地重唱起这样的歌詞：

嘿，要是伏尔加的河水会倒流啊！

老弟，要是往日的生活会回头啊！

但是回头过生活是不可能的。所以唯有让将来生活得理智一些。

从严肃到可笑差无几。关于选举协议的争论有一些含喜剧味道的插曲。现在且从其中挑出下面这个插曲跟读者谈谈。弗·博古查尔斯基先生在《论作为竞选口号的“全权杜马”问题》一文中建议把“民意”党委员会的一封著名的信再读一遍。“多么谦虚的要求啊！——他神色激动地喊道。——然则谁能说信的作者们哪怕有一点点离开了自己党的社会主义纲领呢？不过问题却在于这是些抱有卓越的理想主义观点的人。难怪马克思和恩格斯获悉信的内容以后，曾经称它的作者们是‘有治国之才的人’。深刻而且正确的鉴定！”（《同志报》，第一三五号）。

谦虚——那还用说！——永远是值得大加赞扬的。但是有各式各样的谦虚。且看一看信作者的谦虚达到了何种境界。他们提出了下面两项要求：

“（一）对过去一切政治罪行普遍实行大赦……”

“（二）召集全体俄国人民的代表们来重新审查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种种现存形式，并且根据人民的意愿改造它们”^①。

第二项要求同全权杜马的要求一模一样。可是这项要求不中弗·博古查尔斯基先生的意。我决不因此怪罪于他。相反，我发现在一定的意义上值得对他大加赞扬。可是应该怎样理解“卓越的政治观点”呢？应该怎样理解“治国之才”呢？That is the question！^②

看来《往事报》的一位编者相当充分地忘记了“往事”。真是“怪哉”！可以希望，记忆之神很快又会回到弗·博古查尔斯基先生身边去，不然这可是勉乎其难的！

俄罗斯土地上，别的嘛，缺点什么，长期以来就是不缺怪人。不过“在现时代”长久地同怪人相周旋，那可不必要。我们且请过编者这位怪人而书归正传。

不久前，尤里·拉林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冠以一个意味深长的

① “民意”党文献，第907页。——著者注

② 问题就在这里！——译者注

标题：《广泛的工人政党和工人代表大会》。小册子上按了两句题辞：“（一）实际工人运动的每一步骤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李卜克内西）；（二）勇敢、勇敢、再勇敢（丹东）”。题辞嘛，没有可说的——不耐。虽说“工人运动的实际步骤”这句话不出于李卜克内西，而出于马克思^①，但这是小小问题。重要的是尤·拉林在自己的小册子中提出了一个完全不能接受的实际建议。他是“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健全的现实主义”的拥护者（第十五页）。对此我向他表示衷心的祝贺。不过我希望他更清楚一点地明白这种现实主义究竟是什么意思。

尤·拉林深信，社会民主党人可以同社会革命党人在一个党内工作。他说：“我们可以把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看成是广阔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中土地问题上的机会主义，不过广阔的工人运动按其性质本身来说在我们今天是不能没有机会主义的支流的。它的成就愈广泛，它的作用愈大，它就会愈多地使自己成为所有被损害和被侮辱的人的希望的中心，他们的新的洪流就会愈多地流到工人政党里来……因此在社会主义运动的总洪流中如果缺少机会主义的支流，在我们今天就只会证明运动的相对软弱性。而就俄国经济结构的一切条件来看，我国的机会主义自然应当采取土地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的形式，正像它在急进的法国成了内阁主义的机会主义一样，或者像在崇拜法律的英国它成了费边主义的机会主义一样”（第四十六页）。

假定这一切都是对的，虽然在这里并非一切都如此。但是我们的作者是不是知道黑格尔所谓量的差别经过逐渐积累以后会变成质的差别的那条著名原理呢？无可争论，西方各党中马克思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之间的意见分歧有时会达到很大的规模。然而这些党派中间任何一个党从来没有过这样大的分歧意见，像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两方之间的分歧一样。让尤·拉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二卷第14页。——译者注

林向我指出任何一个西欧的机会主义者在原則上会反对自己国家的政治发展吧。我不知道有这样的人。可是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过去是、而且看起来至今仍然是原則上反对資本主义的人。所以从这方面說，他們并不是机会主义者，而簡直是**經濟領域内的反动分子**。这就恰恰是量由以轉变到质的那个限度；同机会主义者可以在一个党内和睦相处，同經濟領域内的反动分子則决不可以，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以及打着什么幌子。要知道在同有这种思想方式的人参加一个党的时候，不应当抱着“欺騙”自己未来的同志們的目的参加党，而应当抱着誠实地履行落在自己身上的义务的坚决打算参加党。（自然，尤·拉林也不会会在参加时有另外的想法。）可是在这种場台下必然会落到自己身上的那些义务——这是不言而喻的——就包括服从多数人的决定的义务。現在我們假定，經濟領域内的反动分子占了多数，并且决定，工人政党应当采取一切力所能及的措施，以便阻止俄国資本主义的发展。尤·拉林将何以自处呢？（我假定他是最初同經濟領域内的反动分子参加一个党的人。）至于我，即使受到火星上所有居民支持的全体地球上的居民都拥护这个决定，我也不会服从它。然而假若我不服从这种决定，可見我就用不着同可以接受它的那些人发生义务关系了。

尤·拉林反駁我說，对資本主义的否定态度无非是我国社会革命党人的一种**意見**。一般說来，他不认为各种意見中的差別有很大的意义。

他說：“不管社会革命党人对历史唯物主义和利用合作社經過俄国公社来培植社会主义持怎样的**見解**，实际上他們同样站在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立場上，不过也有一些动搖，像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一样。試回顾一下关于抵制选举以及关于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盟的意見。我們看不出这实际上会比任何社会革命的恐怖主义好在哪里。其次，我們看不出波格丹諾夫先生对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修正’或者涅日丹諾夫先生对馬克思的經濟学說基础——**剩余价值論**——的‘修正’会比切尔諾夫同志(?)对考茨基关于合作社

的意义的农业观点的‘修正’好在哪儿。可以做一个像切尔诺夫、波格丹诺夫和涅日丹诺夫等同志一样的不完全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同时在实际上为了事业的利益参加广泛的阶级政党的队伍”（第四十七页）。

我完全没有恭维波格丹诺夫先生的意思，而且一般说来无论是对他的哲学才能，或者特别是对他“修正”马克思的言论，我都是给以极低的评价；不过当我看到尤·拉林拿他同切尔诺夫先生等量齐观的时候，我就禁不住要发出激烈的抗议声。切尔诺夫先生是不完全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嘿，原来尤·拉林还是一个爱逗趣的人！

必须对任何一种“意见”压根儿失去任何兴趣的人，才会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给切尔诺夫先生起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外号，虽然也说是个不彻底的吧。我倒耽心尤·拉林躲开了雨淋，逃不掉水浸；他讨厌学理主义，因此他对一切学理都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但是对学理发生兴趣，乃至醉心于学理，完全不等于学理主义。莫非尤·拉林不知道——例如在我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学理主义几乎总是同对学理的不关心态度携手并进的么？尤·拉林想以毒攻毒。可这毫不济事。我国无产阶级的思想家们之所以至今没有走上正路，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不可能清算掉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最有害的习惯。而这个习惯在他们身上反过来也受到对“意见”的漠不关心态度的支持。可以想像得到，如果他们相信了尤·拉林的说法，认为切尔诺夫先生毕竟是一个不过仅仅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脑袋里该有怎样一块黑暗的王国啊。^①在这里我也不打算深入讨论抵制杜马和恐怖行动孰优孰劣的题目。我只要问尤·拉林一句，他是不是以为可能把恐怖主义同广泛的工人政党结合起来呢？依我的看法，这两者是互相排斥的。

① 我没有谈到涅日丹诺夫，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怎样“修正”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涅日丹诺夫是个好人，不过他……你看怪不怪！……不能“不如此”；有时候又想出个“修正”！这是他的一种可以称之为批评狂的病。……著者注

俄国工人运动的河道一定要加宽，这一点现在大概无需乎证明了；我国所有明白事理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都认识到这点：工人代表大会将大大地促进加宽河道的过程——这一点也应该认为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不应当为了宽度而弄得界限模糊。这就会是一个巨大的错误。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犯过这种错误。当他们着手帮助加宽工人运动的河道时，他们善于避开斯基拉和哈里布达^①。尤·拉林引证国际工人协会的话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第一，因为直到六十年代初期，西方的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学派，或者任何一个工人组织，都没有幻想过要去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二，还因为这个国际协会是工人的协会，而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不但希望依靠工人，而且希望依靠“劳动”农民，即赋予运动崭新的性质。

在这封信里^②，我已经引用过恩格斯在一八八七年一月写给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一封值得注意的信。现在我再把它引证一下，并且建议尤·拉林认真地对它加以注意。

恩格斯写道：“我认为，我们的一切实践活动证明，我们能够在一般工人阶级运动的每个阶段和这个运动一起走，同时不放弃我们特殊的立场，不破坏我们的组织，也不把它隐藏起来。所以我耽心，我国在美国的同志们不走这条路，他们就会犯重大的错误。”^③

尤·拉林如果不走这条路，也会犯重大的错误，不过他的错误同恩格斯耽心过的错误截然相反罢了。

（译自《普列汉诺夫全集》第十五卷第 259—280 页）

第五封信

这封信最初发表在一九〇七年二——三月出版的第二期《现代生活》杂志上。

① 参看本书第 133 页。——译者注

② 应为：“在上一封信里”。——译者注

③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第 199 页。——译者注

文章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前一部分，普列汉诺夫对于他那所谓的“代数符号”（即作为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的“共同纲领”的“全权杜马”口号）受到四面八方的攻击很是愤愤不平，无可奈何之余，说了一通自我解嘲的话。他的这些长篇大论只不过进一步暴露他根本不了解俄国革命的特点，暴露他在思想方法上完全是形而上学的。列宁指出，俄国革命中右派和左派的分水岭，不像普列汉诺夫经常错误地设想的那样，在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之间（他被“立宪民主”这几个字眼迷惑住了，因而用党派名称的分析代替了阶级分析），而是在立宪民主党人和劳动派之间（《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226页）。这就是他的“代数符号”所以彻底破产的根本原因。

后一部分是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考茨基〈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一书的俄译本序言》的答辨。他硬说考茨基在“资产阶级不是俄国革命的动力”问题上是同他的看法一致的，同时硬说考茨基“夸大了我国农民发展的速度”。对于列宁指责他不了解农民资产阶级革命和非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表示了极大的愤怒。他的这些软弱无力的论据受到了列宁严厉的驳斥。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中指出：“普列汉诺夫根本弄不清楚，在只有作为农民革命才能获得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中，社会民主党总的策略基础究竟是什么”（同上第331页）

全信都充满着尾巴主义气味。普列汉诺夫断言，在“暴风雨时代，向人民群众提出的每一个进步思想”都必须“是这些群众已经体验到了的政治经验的概括”。这个公式完全是经济主义的“过程策略”的翻版。

此刻，当我拿起笔来写这篇文字时，我国报刊上还没有停止关

于各党在选举前的協議的討論。但是当这本小册子問世的时候，这些討論，由于失去任何实际意义这样一个简单的原因而自行停止了。不管生活怎样回答关于協議的問題，在这个問題上发議論終于是太迟了。所以我也认为在这里发議論是多余的。不过我发现有必要把报刊上对它已經說过的某些議論作一番总结。把这些議論当作闡明策略任务的材料来看是有价值的。

不过首先我认为自己必須对我向我国拥护自由的人提出的某种“代数符号”受到了怎样的待遇說几句话。它的命运我觉得是頗有教益的。

据我所知，我的“符号”从哪一方面都沒有得到支持和贊同，即便只是柏拉图式的贊同也好。可怜的“代数符号”啊！可是为什么它落得个四面不討好呢？請讀者分析分析。

古代拉丁哲言云：两个人說的話一样，意思并不一样。这条古老的真理在反对“代数符号”的进軍史上得到了新的证实。“左派”政論家們（我暫且不去說极左派的政論家）众口一詞地对它表示异議。不过这并不是一个意思。正像在埃及廷臣著名的梦境中肥壮的母牛跟干瘦的母牛同时出現一样^①，在反对“代数符号”的进軍中，天真的政論家也是和深知（用德国人著名的說法）鞋子哪儿夹他們的脚^②的政論家一块出場的。

在天真的政論家中間最杰出的人物我觉得是《世界通报》最可敬的一位政論家 Solus^③ 先生。他在該杂志的十二月号上写道：

“我們在从本质上分析了格·瓦·普列汉諾夫的意见以后，不能不表示惊讶，像普列汉諾夫这样有經驗的政論家，这样有远見的和观察敏銳的人，居然犯下了每一个有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一直反对的錯誤——即泛泛的空談和模糊的公式的錯誤。各党各派滿

① 參看《聖經》《創世記》第四十一章第一至三节。“廷臣”一詞的原文为 царедворец，似乎應該是“法老”（古埃及王）。——譯者注

② 意为：知道毛病在哪里或者缺点在哪里。——譯者注

③ 拉丁文，原來的意思是“唯一的”。——譯者注

足于自己綱領中漂亮而无內容、复杂而难理解的空談的那个美妙时代已經过去了，老早就完結了。美德、自由、秩序、普遍的幸福、平等、国家的兴盛、民族的利益、国旗的光荣——这一切都是华而不实的小玩意儿。它們已經不再滿足居民的需要了。这些居民早就表現了巨大的求知精神和在說得天花乱墜的空談后面寻找比較現實的內容、或如普列汉諾夫所說的比較确定的算术值的热心。因此社会民主党的巨大功績就是：它教会了清晰地思考，按照重要的属性分析各种概念，揭露它們的階級內容和它們的真正內涵。正是由于自己习惯于清晰而且具体地思考，由于自己善于說明每一种綱領、每一个有党性的提法的階級基础，社会民主党才养成分析各党綱領的习惯。我們在互相了解和清晰思考时的主要障碍恰恰也就在于：对于每一个階級、每一种职业、甚至个别的人說来，**語詞始終是包含有不同的算术內容的代数公式。**”

这段摘录稍嫌长了些，不过內容倒滿丰富。的确，請看一看我們这位可敬的作者說到哪里去了！語詞是对每一个个別的階級，甚至对每一个个别的人都具有不同內容的代数符号，而且这就是“我們的主要障碍”。好得很！那末應該怎样理解呢？怎样消除障碍呢？看将起来除了拒絕“語詞”，即一般地拒絕分节語之外，別无办法达到这个目的。不过我們的作者自己也未必会贊成如此急进地消除“我們的主要障碍”。他会對我們說：“保存分节語吧，但要拒絕代数，而一劳永逸地代之以算术。”不过我們觉得这种区别不够明确：因为“**語詞始終是代数公式**”，故而要避免使用代数符号唯有**完全拒絕使用語詞一途**。再問一句：到底應該怎样理解？用什么办法摆脱窘境呢？Solus 先生，請說一說吧！

我不知道我的这位可敬的論敌是否嘗試过不用“語詞”向他人进行解释。不过我对此是非常怀疑的。如果他真的試着去做这件事，那么他就会看到，“我們在互相理解时的主要障碍”虽然消除了，却給“理解”制造了一系列还更“主要的”障碍。那时可以想像得到，他就会得出这样一个信念：無論在思維活动中，或者在实际

生活中，甚至对于“沒有上过中学”的人，沒有代数是根本不行的。Solus 先生警告我不要犯“泛泛的空談的錯誤”。我很感謝他的这个警告。不过我还是得問他一句：他是不是认为代数符号始終等于泛泛的空談呢？看来他正是这样认为的。他引用了长长一列他觉得沒有任何确定內容的名詞：如民族的利益、国旗的光荣、普遍的幸福、平等、自由、秩序等等。但是第一，我的代数符号具有确定得多的內容。第二，甚至就是在 Solus 先生的这一长列名詞中間也可以发现这样一些代数符号，它們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絲毫不用改变自己的形式而从生活中获得了十分具体的內容。一八四八年六月的日子以后，代表法国統治階級利益的各政党都聚集在秩序的“符号”下。那时只有对这个国家的內部关系茫无所知的人才会把这个符号看成是“泛泛的空談”。而且請注意，这个“符号”絲毫不曾妨碍上述党派中每一个党派各自力求正是实现自己的要求，即不曾妨碍它們各自力求正是用自己的算术值来代替一般“符号”中那些代数学上通用的字母。現在，当德国宰相在选举时期建議保守派分子在同社会民主党作斗争的共同“符号”下跟民族自由党人联合起来时，Solus 先生是否认为毕洛夫^①犯了“泛泛的空談和模糊的公式的錯誤”呢？恐怕不是这样吧！德国宰相本人也好，保守派分子也好，民族自由党人也好，社会民主党人也好，大家都清楚地知道，德国宰相所提出的代数符号有着十分具体的意义。誠然，保守派分子嘴里的这个意义会不同于民族自由党人所作的解释。这两个党派中間每一个党派都会力图把自己本身的算术內容放进一般的代数公式中去。但是这个在各党派实行联合时完全不可避免的情况不曾妨碍这个公式成为对工人决不“模糊的”威胁。Solus 先生不喜欢泛泛的空談，可是他說的却是一种巴札洛夫所謂的相反的泛泛的空談。他对居民“現在表现出巨大的求知精神”感到高兴，而他自己的求知精神却可惜沒有發揮到問一問自己：成功的分析

^① 毕洛夫(Bernhard Bülow 一八四九——一九二九)，德国反动政客，一九〇〇——一九〇九年任德国宰相。——譯者注

能不能不运用綜合？他提醒我注意（怀着令我反省的可嘉的目的），社会民主党的功績就在于比較确切地分析政治概念。但是难道“代数学”会妨碍清晰地思維嗎？难道它会妨碍我們确定某种真正的內涵嗎？难道它会对理解各个社会階級的政治意图的階級內容造成困难嗎？决无此事！只有自己不习惯于作“清晰思維”、又不善于确定他說話的“真正內涵”的人才能作此武断。政治代数学不唯不会給确切地規定各个政党的那些用一定的代数公式表示其一般內容的要求造成困难，反而要以此为**先决条件**。而且作出这样的規定完全不如 Solus 先生所想象的那样困难。这是司空見慣的事儿。

Solus 先生想要知道我提出的代数符号的“階級基础”。我情願帮他一下忙。

事情是这样的。就对我国旧有的前資本主义制度——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亞細亞式的制度——而言，無論資產階級或者无产階級都是**新兴的階級**，这两个階級**只有在过时的制度的一切殘余全部被消灭以后才能充分发展起来**。从这个方面說来，两大階級的利益并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彼此一致的。不过这种**一致性**决不会达到**同一性**^①的地步：資產階級要同旧制度的各种殘余势力和睦相处比起无产階級来容易得不能相提并論。德国資產階級即为一例。另一个而且更接近我們的例子是我們俄国的大工商业資產階級。它完全沒有表现出要同我国旧制度作坚决斗争的願望。它本身是新制度的代表。它通过自己的活动破坏着旧制度的經濟基础。但是它善于討价还价。而且不无根据地考虑到，不声不响地同旧事物的保卫者妥协“互相諒解”比起同狂热的和不安分的革新者（无产階級已經开始表现出自己是这样的革新者）作某种政治交易来对它要更有利些。但是大工商业資產階級只是資產階級的一个——有錢有勢、然而人数較少的——阶层而已。在同一个社会

① 普列汉諾夫在这里用的是 тождество 一詞。——譯者注

等級內和它并存的還有**其他的**階層：中等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這兩個階層的成分是五花八門的。然而事實上，對於這些階層的大部分人說來，同舊制度的各種殘余勢力和睦相處要困難得多，而且他們的地位（即他們的利益，Solus 先生！）促使他們為新制度的勝利而進行比較堅決的鬥爭。他們會朝這個方向**前進多遠**，這得依歷史所確定的條件為轉移。不過**只要他們在前進**，他們就是無產階級的同路人，他們的**政治要求**就可以同無產階級的要求統一在一個公式中。普遍的選舉權（依據四項公式的；我趕緊補充這一句，免得斯捷潘諾夫譴責我叛變），言論、出版等等的自由；人民的主權，民主，等等，等等，——這些公式中間每一個公式都**可能**成為把有覺悟的無產階級的要求和某一部分資產階級的要求統一起來的“代數符號”。我強調**可能**一詞，因為從可能變成現實要依環境為轉移；在一國以及在某些歷史條件下行得通的，在他國以及在其他條件下就行不通。不過無論在哪裡，轉變的可能性本身都說明，表現一些十分確定的階級或階層的十分確定的要求的那種“代數符號”是可能有的。全部問題在於這些要求在特定的——例如我提出的——“代數符號”中**是不是正確地**表現出來了。不過這是一個只有憑經驗才能解決的問題。

總之，我的“代數符號”（如果它被接受了的話）的基本內容就是無產階級某些一般的要求以及資產階級某些階層的某些一般要求。這就是階級基礎，Solus 先生！我的“代數符號”既沒有為左派所接受，也沒有為極左派所接受。對於這種情況我甚表遺憾。不過我絕對不能把它看作反對“代數符號”的理由。

Solus 先生喜歡把這些“符號”看成是“華而不實的小玩意兒”。因此，當我告訴他說，左派分子因為完全相反的屬性即因為他們認為我的“符號”是過於確定的、但為他們所討厭的要求而否定了這個符號，這時他大概會覺得很驚訝。為什麼極左派不喜歡我的符號呢？這一點我們下面要談到，然而左派之所以拋棄了它完全不是因為他們覺得它是不夠確定的，這一點不能有絲毫的懷疑。他

們否定它，其原因在於他們認為它是一個十分具體、但為他們所討厭的要求的“別名”，所以換句話說，其原因只是在於這個要求的確定性具有他們所討厭的色彩。

然則為什麼他們要討厭它的這個色彩呢？要說明這個道理也不難：因為我提出的符號所表示的思想威脅着立憲民主黨中間某一部分人的經濟利益。

怪不得霍布士把人民稱為 *puer robustus, sed malitiosus*^①。自然，人民對公正還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但是他們的公正在某些方面同立憲民主黨人的公正是大相徑庭的。試拿土地問題來說。立憲民主黨人承認了強迫讓渡的原則。這是很好的，而且當反动派因為這件事猛烈地攻擊他們的時候，人民理當向他們表示自己的同情。但是有各式各樣的讓渡。地主的土地照理應該根據什麼條件實行讓渡呢？立憲民主黨人說：根據公正的貨幣補償辦法。然而 *puer robustus, sed malitiosus* 反駁說：“我認為對原來屬於我的那個東西支出錢來是不公正的。”這正是立憲民主黨人對公正的看法跟人民對同一事物的看法發生最大分歧的地方。要是 *puer robustus, sed malitiosus* 在政治上有可能實現自己對公正的看法，那將產生什麼結果呢？那就是說，立憲民主黨人對公正的看法始終是得不到實現的。如果翻譯成政治經濟學的話，這就意味着：參加立憲民主黨的土地占有者的經濟利益將遭到破壞。這是這些占有者決不會同意的。不特此也。他們總是要抱着忧心忡忡的情緒，甚至抱着不懷善意的態度對待向他們——而主要是向人民——暗示可能產生這種破壞他們的經濟利益的行動的一切要求。他們總是要反對本身包含類似的“算術值”的一切要求的。同時——和天真的政論家先生們在這個問題上所想像的情形相反——這些要求所包含的“算術”內容越是表現得明確，他們就越會要堅決地反對這些要求。正是因為這樣，參加了立憲民主黨的土

① 強壯然而凶狠的孩子。——譯者注

地占有者也就**一定要**否定我的“符号”。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自由党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或者**接受“符号”，而不顾自己党内土地占有者的不满，于是这些土地占有者可能退出人民自由党，转而参加和平复兴党；**或者**宣布“符号”是乌托邦式的幻想的产物，从而再一次向自己的成员——土地占有者表明，他们的经济利益不会因为这个幻想的胜利而受到损害。人民自由党选择了后面一条道路。对于这一点可以遗憾，也可以高兴。但无论是对此表示遗憾的人，或者是对此感到高兴的人，都应当懂得：立宪民主党之所以摈弃了“乌托邦式的”符号，完全不是因为它具有“模糊的性质”。然而这个道理却是 Solus 先生 à la^①的某些天真的政论家所不能懂得的。

自然，有人要问我：您干吗当时提出最有影响的左派政党所不能接受的“符号”呢？

我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就像我上文已经说过的那样，只有凭借经验才能解决特定时期的中间居民阶层在其争取新制度的斗争中前进到多远的问题。不错，有时可以**预见**到经验的种种结果，所以我完全不想断言，在这个引起我们注意的场合下我没有**预见**过它们。但是我的**预见**在**选民群众**的心目中不可能具有**论据**的意义。选民们有充分的权利不信任这个或那个人的远见。^②

现在他们所看到的已经**不是假设，而是事实**。每一个人都会承认，事实比假设更有说服力得多。这就是说，我提供的经验促进选民们提高了政治认识，即促进他们提高了真正的政治分析能力，而天真的 Solus 先生对这种能力的命运表示过耽心。

我认为这种经验是有益的，特别是在我捍卫那些选举协议的思想的时候。我们反复地说：“分开走，一起打”。对此选民可能

① 之流。——译者注

② 况且对于一个局外人来说，也不可能预见，立宪民主党的哪一派在协议问题上将取得胜利。它的左翼——即立宪民主党的“孟什维克”——自然不会同意**按照我的解释**来接受我的“符号”，但是这个“符号”在他们那里毕竟不会像在列宁先生（对不起）那里，在巴·米留可夫先生及其最亲近的同志们那里一样引起这样多的忿恨。——著者注

問，而且大概不止一次地問過自己和其他的人：“到底為什麼要一起打？為什麼又要分開走呢？”對於這個問題人們往往回答他說，一起打事實上會有利得多，可是，不知什麼原因希望分開走的某些狹隘的教條主義者却妨礙這樣做。選民往往也對這種答复感到滿意，並且開始用懷疑的眼光看待“狹隘的教條主義者”。然而現在的情況剛好相反。

現在的情況證明，“狹隘的教條主義者”完全不是“有罪的”：他們向立憲民主黨人提出過一起走一段政治道路的建議，但立憲民主黨人不願意。為什麼他們沒有願意呢？因為一定的經濟利益使得他們忌諱某種政治權利。這就是說，問題恰恰在於他們的這種經濟利益以及和這種利益類似的其他利益。只要弄清楚這個道理，那時選民（他們沒有理由去捍衛上述經濟利益或者同情捍衛它的人）就會主動地拋棄由於一些完全沒有“廣泛”性的考慮而拋棄人民權利的人。從這裡誰有所得呢？誰有所失呢？不難揣想。

人民自由黨那些一点也不天真的領袖們立即想到了這一點。他們懂得，“符號”所經歷的遭遇會推動選民的同情向左轉。這首先就說明這樣一個事實：他們滿腔氣憤地抨擊了“符號”。其次，它說明這樣一個情況：他們曾經認為，必須表明自己在關於這個實質上始終根本不合乎他們心意的協議的問題上是比較好商量的。他們開始耽心，現在切莫輪到他們被人責備為思想狹隘和落得個處境孤立的下場。只是“布爾什維克”先生們驚人的政治上的幼稚作風才使他們擺脫了窘境，讓他們有機會像以前一樣把過錯都推到社會民主黨人的“不妥協態度”上。而且立憲民主黨人很巧妙地利用了這種機會。他們大肆宣揚社會民主黨人的“不妥協態度”，仿佛這個黨僅僅是由一些“布爾什維克”組成的似的，仿佛這個黨的中央委員會以及它的許多地方組織都沒有發表過贊成協議的言論似的。^①

^① 應當補充一句，我的“符號”不僅引起了立憲民主黨人的非難。我剛剛讀完第十號《言論報》上一篇關於馬·馬·科瓦列夫斯基在律師協會所作的題為《全

选民既沒有漠不关心地对待協議問題，也沒有漠不关心地对待什么东西在妨碍協議的問題。这一点比方从第一六一号《同志报》上登載的一篇关于一月七日在涅麦梯剧院举行的竞选大会的綜合报道中可以明白地看出来。巴·米留可夫先生演說以后，大厅的四面八方都向他提出了一个問題：“您为什么沒有談到協議？”大会結束时“听众长久不散，个别的几批人围着立宪民主主义者，激动地要說服他們簽訂協議。人群中有人跑上舞台，高呼：‘協議，協議，協議！’”莫斯科的选民对協議問題也不是漠然无动于衷的。《世紀报》进行的調查就說明了这一点。某些选民在回答協議的問題时还附帶提出了一些十分确定的見解：“人民的利益所要求的不是各自为政的斗争和互相敌視，而是要形成一支反对敌人的共同力量。”“我认为可以把一切反政府党充分地联合起来，这是一个决定选举命运（因此也就是决定整个解放运动的命运）的迫切必要的問題。所以我只会心甘情愿地投票拥护联盟”……“为了不使投票分散，把立宪民主党人也归并进来是必要的”。不过选民开始——也許是第一次——明白了：最不坚定的人事实上正是立宪民主党人，他們許多人都习惯于把政治概念的任何狹隘性都看成是异己的。因此一个选民力图說服他們：“立宪民主党人的让步是对祖国有利的”。另一个选民則不去說服，而是激烈地指責道：“立宪民主党人，不要反对俄国！”等等。

看来，哈尔科夫的一位选民发现不仅說服沒有用处，甚至指摘

权和自由》的报告的综合报道。报道中说，这位博学的教授把我的符号称为科学上的恶魔，“因为議會完全不排斥监督、君主、貴族院、或参政院”。奇怪的論据啊！要知道上議院本身就是議會的一部分。但整个看来，这篇綜合报道写得极不成功。因此我不认为可以根据它来反駁馬·馬·科瓦列夫斯基。我只想指出一点，即他选择了一个很难讲好的題目。全面分析这个題目以后可能得出的結論不是全权同自由不一致，而是在政治上由某几个党派所代表、在科学上由当代許多学者所代表的一个階級的自由，同人民的全权不能相容，因此也就是同人民充分的自由不能相容。Class against mass！（階級反对群众）。再說一遍，这个題目是很难讲好的，您选择这个題目是徒劳的，馬·科瓦列夫斯基先生。哎呀，格里秋，你別去参加晚会吧！——著者注

也沒有用處。他干脆轉到極左派方面去了，至少《同志報》是這樣報道的。下面就是我在該報第一六二號上所遇到的有關這事的消息：

“在哈爾科夫，關於協議的問題原則上早已肯定地解決了。但實際上這個問題卻碰到立憲民主黨人的反對。為了解決候選人的問題由社會民主黨人、崩得分子、社會革命黨人、立憲民主黨人、猶太選民團以及店員工會、印刷工人工會、鐵路員工工會、農民協會和‘社會活動家’協會的代表們組成了情報局。所有這些組織和團體，除了立憲民主黨人以外，都決定支持市內有聲望的社會民主黨人作候選人。立憲民主黨人提出了自己的候選人。但是店員們堅決反對他，因為在店員和顧主發生衝突的時期他這個調解人曾經明顯地站在顧主一邊。工人們也聲明，他們不會支持這樣的人。

“社會民主黨人建議，代表問題由復選人自己來解決，但是立憲民主黨人知道，復選人將比他們更左傾，因此他們拒絕了這個建議。

“立憲民主黨人雖然已經宣布了拒絕協議，但是他們不得不讓步，因為社會民主黨人已經順利地把社會上所有的民主派分子團結在自己的周圍。”

那麼結果如何呢？結果似乎完全不是“布爾什維克”先生們所耽心的那種情況；協議不但沒有模糊選民的政治認識，反而促使它繼續發展。不過我完全不敢擔保《同志報》上登載的這篇來自哈爾科夫的報道沒有錯誤。這裡也和任何地方一樣，事實性的錯誤是可能的。往後的事變也許會表明，哈爾科夫選民們的政治認識並不是像報道者所敘述的那麼強烈地向左轉。但關鍵不在這裡。關鍵在於，今年一月中旬（當我寫這幾行文字時）我們所提出的那個具體的協議問題在我國已經具有這樣一種性質，即它不可爭辯地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促進了選民的政治認識朝上述方面發展。這種情況清楚地表明，那些希望選民在自己的政治發展中繼續前進的人應該採取怎樣的策略。

几年以前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文献中发挥了这样一个思想：即我国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应当属于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党。后来这样一个时期来到了，这时候，似乎出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把这一思想真正付诸实现。但是这个思想却是以十分奇怪的方式实现的。赞同这个思想、而且自己也坚持领导权思想的那些人，采取了完全和格·伊·乌斯宾斯基的商人（《一个机械的一些小缺点》）一样的行动。这位英勇地为“商业资本”服务的人，和那些把他拖到一块地方的打扫院子的人和木匠打起架来以后，就感到他的“拳头来了一股蛮劲”，并且开始如此拼命地横冲直撞“乱打一气”，以致过了不大一会儿他周围的“空间扩大了”，而他本人也就“像米宁-波查尔斯基一样”独自站在广场上了^①。我国的领导权论者也很快地“扩大了自己周围的空间”，而且也像“米宁-波查尔斯基”一样，结果得到的不是领导权，而是类似张伯伦的 splendid isolation^②（壮丽的孤立）的某种东西。我不准备在这里重申，这种 splendid isolation 除了一般地给解放运动的敌人，特别是给无产阶级的敌人带来好处之外，没有给任何人带来好处，——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过这个真理了。在这里我只指出，协议的策略在我国产生了完全相反的结果：不是最进步的政党周围的“空间”扩大了，而是对这个党以及对整个解放运动极端有利的同情气氛扩大了。而且这个极端有利的结果的取得完全不是因为这个进步的党派仿佛“把自己的原则藏到口袋里去了”，而是因为它讲究策略地公开提出了这些原则，从而暴露了自己的对手的不一贯性和不彻底性，同时它采取了这样的做法，即通过争取选民的同情使得比它落后的对手自动地被迫向左转。结果所得到的就不是 splendid isolation，而是——正确些说：如果彻底地和广泛地运用这种策略，就会

① 参看《乌斯宾斯基全集》，莫斯科一九五六年俄文版第五卷第311页。米宁和波查尔斯基都是十七世纪初期俄国政治活动家和军事组织家，莫斯科红场上有两人的铜像。——译者注

② 译文在下面的括弧里。——译者注

是——真正的領導權；而反对旧事物残余势力的力量的总和就不会减少，这是有害于事业的，而会增加，这是有益的和取得胜利所絕對必需的。这一切加起来就成了我們对合理的策略应当提出的要求。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說，选举協議的經驗——即使它远沒有以应有的規模提供出来也罢——已經給我們上了一堂很好的策略課①。

我说过，先进的政党在公开提出自己的原則时一定要讲究策略。也許可以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发表这种見解的人也无需預先加以說明吧。但可惜，事实上并不如此。某些所謂极端分子非常习惯于不策略的作风，以致认为这种作风似乎就是急进的思想方式必要的組成部分。他們喊道：“啊哈！他讲究起策略来了。这是他的机会主义的最好证明！”而且这样的叫喊也許会把那些按照一切神的法則和人的法則本来應該支持我的观点的人中間某个什么人弄糊塗，像已經不止一次地发生过的情况一样。因此我且作一番解释。

我这里所謂讲究策略是指謹慎而言，确切些說，是指有条不紊地、或者也可以說是合乎教育原理地向修养差的听众叙述如果杂乱地、唐突地加以叙述就可能引起他們的反感的某些思想。十八世紀末期法国最先进的社会活动家們深刻地懂得这种合乎教育原理的叙述方法的必要性。他們严厉地譴責过宣传鼓动工作中的唐突行为。而对吉伦特党人的最强有力的一个指摘正是唐突行为。

① 当我在第六十九号《同志报》上讀到唐恩先生下面这段話时，这几行文字已經写好了：“如果左派是友好的，他們是可以迫使立宪民主党人让出一半陣地的，但是左派分裂成了几个部分，并且互相爭吵，于是立宪民主党人不时地搓搓手，带着純真的微笑問道：‘我們究竟該把位置让給誰呢？’立宪民主党人就有这样的运气：給他們帮助（从右边和从左边）特别多的恰恰是自以为是他們最不可調和的敌人的那些人。右派的錯誤自然不会使我伤心。然而說到左派，那么我不能不指出，立宪民主党人先生們在很大的程度上应当把自己的举足輕重的地位（因為他們可以爬上馱車，像阿列克謝也夫先生會說的一樣）归功于他們的錯誤。如果不是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在彼得堡拒絕达成協議一事就不会白白地繞过他們……愚蠢比惡意还坏！”——著者注

按照我所說的這些人的意見，這種行為吓退了人民群眾，並且把他們推到反动派的懷抱裡去了。某些歷史學家說，這是不公道的指摘。但是不管怎麼樣，無可爭論的事實是，吉倫特黨人的論敵們曾經認為宣傳鼓動工作中的唐突行為是反對自由事業的嚴重罪行。他們希望，在那個暴風雨時代，向人民群眾提出的每一個進步思想都是這些群眾已經體驗到了的政治經驗的概括。他們認為，如果不具備這個條件，如果先進的思想不是表現人民已經體驗到了的政治經驗，則這種思想就會起稻草人的作用，因此它不僅不會加速人民認識的發展，反而要延緩這種發展。所以他們關心的事情主要還不是盡量迅速地、大聲地和全面地向群眾反復說明自己的政治信條，而是促進群眾通過他們本身的行動去獲得必要的政治經驗。也正是因为這個緣故，他們才能够極其迅速地教育了群眾。也正是因为這個緣故，當代先進的人物應該向他們學習政治方面的教育學。無怪乎莫里斯稱他們的策略是社會風暴時代所有後一代先進的革新者的視線必須繫注的一座燈塔。

吉倫特黨人的論敵們都是講求實際的人，而不是空談者。但是這並沒有妨礙他們中間某些人具有卓越的雄辯才能。也不難設想，這些干大事業的大人物會用怎樣的蔑視態度看待我國那些以為急進主義就是要從頭到尾又從尾到頭不斷地溫習已知的教義問答的“布爾什維克”。他們會把這些“布爾什維克”當作借尸還魂的brissotins^①，正確些說，簡直會當作能言鸚鵡。只有那些具有這些倒霉的“布爾什維克”的或者——在這種場合下反正一樣——Solus先生的天真作風的人才能認為，在傳播政治思想時不必使用“代數符號”。事實上，向群眾提出某個代數符號，以便讓他們自己根據本身的經驗用確定的算術值代替代數字母，有時往往是十分有益的。誰否定這點，誰就不懂得群眾心理學。這種心理學乃是剛剛

① 布里索的信徒、吉倫特黨人。——著者注〔布里索（一七五四——一七九三）在法國大革命前是溫和的平等派思想的傳播者，革命時期是吉倫特黨著名的活動家。——譯者注〕

才完成自己的教育过程、刚刚成熟到领悟某些思想的人们的心理学。在成熟的人看来十分明确的思想，在这些人看来则常常是不清楚的。反之，由于本身不明确而被成熟的人认为是不能满意的思想，对于还需要教育的头脑来说，却是比较感到满意的。因此在宣传鼓动工作中，代数和算术哪个更好的问题远不是像 Solus 先生以为的那么简单解决的。有时对于“灰色的”听众说来“代数符号”比确定的算术值要有用得不能相提并论。而且这并不奇怪，因为在政治上，我们的“算术值”经常要比“代数符号”抽象得多。

我肯定地认为，我国的人民群众还远没有达到已经不需要“代数学”的那种政治发展水平。因此我才不忌讳代数。应当利用代数符号，而不用耽心这个或者那个拥护“布尔什维克派”（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策略的人对这件事会说什么话。

我愿意建议费·伊·唐恩和尼·伊·约——斯基^①注意一下上面这段话。约——斯基不久前在《现代世界》上替我的“符号”说了几句话。对此我向他表示感谢。不过他说话的目的在于急忙用某种（具有稳定的声誉的）算术值来代替我的符号。依我看来，这是白费气力的。我模仿十八世纪末期法国活动家的榜样，主张运用代数学。所以只有用这样一个办法才能够（如果一般而言能够的话）替我说话：即指出“代数学”实际上正是更迅速地到达“算术学”的王国所必需的。不过我以为，尼·伊·约——斯基本人暂时还有些害怕这个思想，并且发现它是不无危险的策略邪说。

看起来费·伊·唐恩也认为它是这样的邪说。他正确地规定了第二届杜马的任务。糟糕的只是：他显然不认为有必要运用“代数符号”。这是误会。没有“代数”暂时还行不通。和学校里的情况相反，人民的思想正是从代数开始的。所以在某个时期内，算术学仍然是一些集团或者——这自然也是最好的场合——某些最先进的居民阶层的所有物。我国的人民群众（就他们的整体来考察，

^① 尼·约——斯基，即尼·伊·约尔丹斯基（一八七六——一九二八），孟什维克。——译者注

而伟大历史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是以这个整体为转移的)还没有从算术学的阶级转变为代数学的阶级。必须认识并且记住这个真理。因为正确的策略只能建立在这个真理的基础上。不过请费·伊·唐恩原谅我：我觉得他至今没有摆脱掉害怕“布尔什维克派”的瑪莉婭·阿列克謝也芙娜会说什么話^①的心理。其实用輕蔑的态度对待这位很喜欢大吹大擂、可是一肚子草包的女士的評論乃是一切策略智慧的根本。

如果費·伊·唐恩和他的同志們少考虑一些瑪莉婭·阿列克謝也芙娜对他們的評論，則他們的策略（不过它現在已經比“布尔什维克”先生們的策略要合理得无法估量）就会彻底地成为严肃的工人政党所应有的策略。但是哪一天会有这种情况，我不知道。这个合乎願望的时刻目前还没有到来。现在，費·伊·唐恩的同志們正在不断地丧失許多許多东西。因为他們不願意做一貫的人。因为他們繼續地同时为上帝和財神服务，为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性和无政府社会主义的愚蠢服务。

我可以认为，恰恰只是因为这种值得惋惜的两重性，他們才不願意坚决地拥护我的“代数符号”……

至于說到“布尔什维克”先生們，那么可以简单地說他們：不知道自己在作什么。同他們談“代数”等于白白地浪費時間。要同他們讲得来，必須变成一架玩具风琴，永远弹奏一連串短調的“积极的发动”。我对这种把戏可沒有任何嗜好。我甘願讓他們封我做机会主义者，或者甚而至于是反动分子。法国人說：On est toujours le réactionnaire de quelqu'un.^②（你对某个人說来永远是反动分子。）一般而言，这是对的。但在每一个特定的場合，必須問問自己：这个quelqu'un^③是誰——是明白事理的人呢，还是碰了三道

① 瑪莉婭·阿列克謝也芙娜是格利鮑耶陀夫的劇本《聰明誤》中的人物，后世以其名指称大人先生。參看中譯本第160頁。——譯者注

② 括弧里的話就是譯文。——譯者注

③ 某人。——譯者注

牆就迷了路的波舍洪尼亞人^①呢？

“布尔什維克派”的波舍洪尼亞人本着自己的全部不严肃性很喜欢引证仿佛贊成他們的波舍洪尼亞式的“策略”的严肃的人的話。他們最近就抓住了考茨基的后襟。好像这位考茨基通过自己的論我国解放运动的前途的几篇文章指出了我的策略观点是沒有根据的。虽然我已經永远放弃了开导“布尔什維克”先生們的任何希望，但是我仍然不得不談一談他們的論据，以便在讀者面前揭示出这种論据真正“极端的”軟弱性。

在考茨基一书俄譯本序言^②中，他們的一位政論家称我向西方工人运动領袖們請教的关于俄国目前形势的那些問題是“不聰明的”^③。这位匿名的政論家写道：“其实，考茨基回答普列汉諾夫的問題时，**抛弃了**普列汉諾夫对問題（一些問題吧？——格·普·）的提法；考茨基回答普列汉諾夫时，**糾正了**普列汉諾夫对問題的提法（但是，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抛弃了”还是仅仅“糾正了”？——格·普·）。并且考茨基对普列汉諾夫的問題提法所作的批判，由于他越是婉轉越是小心翼翼地糾正提出問題的人的錯誤，就越能击中要害。”^④接着引证了考茨基的一句話：“如果我們深刻地認識到，我們面臨的是任何旧公式都套不上去的完全新的形势和問題，那末我們就能很好地采取行动”^⑤，——于是序言的作者幸灾乐禍地喊道：“这正打中普列汉諾夫提出的問題的要害：就一般性质（1）說来，我国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呢，还是社会主义革命？考茨基說，这是老一套的說法。不能这样提問題，这是非馬克思主义的。”^⑥我的論敌們就是这样叙述考茨基的。他們很坏地叙

① “波舍洪尼亞”是謝德林一篇諷刺小說中假托的一个愚昧无知的偏僻地方。“碰着三道牆就迷了路”意指极簡單的問題都弄不明白。——譯者注

② 指列宁，《卡·考茨基〈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一书的俄譯本序言》。載《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393—399頁。——譯者注

③ 或譯“很笨的”，參看上书第393頁。——譯者注

④⑤⑥ 同上，第395頁。——譯者注

述了他的意思。不过假定他們叙述得正确，我們来看一看会有什么結果。

总之，考茨基正打中我的問題提法的要害。这种說法真使得你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到底是誰的要害遭了殃：我的要害，还是“我的”問題提法的要害？然而問題在于仿佛考茨基“打中”其“要害”的問題提法**完全不是我的提法**。这是无政府主义者、吉荷米洛夫派的民意党人、社会革命党人、近来又有社会革命党人养出来的最高綱領派早就用以糾纏我們的提法。他們責备过我們，說我們同我們期待于我国解放运动的那些結果的資產階級性质和睦相处。他們断言过，俄国經濟制度的特点使得有可能向社会主义跳跃，或者——像他們中間最懂事的人所以为的那樣——有可能向离社会主义不远的地方跳跃。因此我們才管他們叫空想主义者。为了不扯远了，我且随便提一提“布尔什維克”先生們所謂的旧《火星报》过去是怎样回答这个仿佛是我的問題提法的。旧《火星报》坚决地肯定說：“俄国正經歷着**資產階級性的变革**”。現在我要問一問序言的作者：到底應該怎样理解旧《火星报》的这个意見呢？——大家知道，列宁“同志”曾經积极地参加过旧《火星报》的工作。认为还是不认为这个意見是**老一套**呢？不記得年庚生月的序言作者早就所謂不要命地叫喊过：“这是老一套的說法”。但是他之所以这样叫喊，显然只是因为他的响亮的叫喊“正打中”也包括布尔什維主义者“自己”在內的人对**无政府主义的“問題提法”**所作的那个答复的“要害”。也許我們的作者現在稍微清醒了一些……

总之，“問題的提法”不是我的，而是**无政府主义的**。我之所以重复这个提法（很抱歉），因为我早就預見到了它将引起的那些答复的**一般意义**。我預先就知道答复将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所以当 I 讀到一些答复时，我看到，回答者对有人向他們提出这类問題感到驚訝，——有时，例如艾·王德尔威尔得，甚至好像不无某种气忿的情緒，——当我发现我的預見得到了光輝的证实时，我感到很

高兴。自然，人們可能对我說，答复的作者們一方面否定了无政府主义者过高的希望，同时也不贊成旧《火星报》对引起我們注意的社会运动的**资产階級**性质的观点。**饒勒斯主义者**艾·米利奥和**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的信在对待这个观点的否定态度上仿佛是一致的。而且**饒勒斯主义者**和**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意見一致仿佛使得对旧《火星报》的观点的否定具有特別的价值。但是应当懂得他們是在**怎样的意义下**否定我坚持过的（順便指出，早从一八八三年起就坚持过的）这个观点的。从这方面說，米利奥的信是很重要的，考茨基的文章也是同样重要的。

問題究竟在哪里呢？考茨基在怎样的意义下认为說我們現在正經歷着**资产階級**的危机的那个意見是老一套呢？对于這個問題，我所分析的序言本身继考茨基之后向我們作了答复：“因为，（序言中說道）”“**资产階級**不是俄国目前革命运动的动力”^①。考茨基本人也解释說：“在俄国，无产階級不是**资产階級**的比較簡單的附属品和工具，像**资产階級**革命时代的情况那样，而是具有独立的革命目的的独立的階級”（第二十九頁）。就是这么回事！考茨基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认为关于我們所經歷的危机的**资产階級**性质的意見是“老一套”的。但是这同所謂我的、而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的“問題提法”，即关于我們能不能把社会主义的胜利当作目前我国解放运动的直接結果而寄予希望的“問題提法”沒有絲毫关系。考茨基“打中”這個問題提法时說道，目前的危机“在农村中只能导致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造成一个强固的农民階級，从而在无产階級和富裕的农业居民之間挖开像已經在西欧存在的那樣一道鴻沟。”接着他从这里得出結論說，指望农村会从目前的运动中得到社会主义的結果是不可能的^②。至于城市，即工业，那自然是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395頁。——譯者注

② 我要指出一点：土地私有化会大大地阻碍我国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产生强固的农民階級，——虽然不会使它不可能产生。但是这自然不会停止农村中資本主义的发展，所以总的結論仍然沒有变。——著者注

没有什么可說的了：很清楚，在那里最近的将来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而且在这方面，我也没有丝毫理由同考茨基发生意见分歧：这一切早在《我们的意见分歧》中我就说过了。可是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多少受他们的思想方式影响的那些“社会主义者”却因此攻击过我。但从这里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就是：“老一套”是老一套，然而我们所经历的危机**毕竟是资产阶级的**，所以“布尔什维克”先生们徒然伸长了自己的鹅颈拼命叫喊。一窍不通的论敌们高兴什么呢？一定是**无论谁的“问题提法”**他们都丝毫没有弄懂。

这些人可爱的天真精神达到了什么地步，从他们把考茨基关于目前我国运动的主角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那个见解拿来开导我这件事中可以看出。面对着这一幕戏，我只有建议他们注意我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写成的一些著作；——他们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在怎样的时期以及在怎样的情况下我发表了这个思想，这个思想曾经被我国粹派和主观派的一些旧教徒看成是类似疯言呓语的什么东西。

我的论敌们硬说我有这样的议论：如果俄国所经历的危机具有资产阶级的性质，那就应当支持资产阶级。他们就用这种议论来说明我的（早就被无政府主义者发现过和咒骂过的）“机会主义”。他们并且拿考茨基关于老一套的见解跟这种议论对立起来。但这个议论（这个议论很容易使人想起已故的塞·尼·克里文科的逻辑，他发现我和我的同志应当去做酒馆里的老板）完全是他们、即我的有才能的论敌们杜撰出来的。我根本不是这样议论的。我根本不会说，工人阶级应当**支持**某个什么人。或者为了表达得更加精确一些，我说，工人阶级可以支持而且应当支持的只是其活动正在以某种方式推进它自己的事业的那些阶级和政党。它不是附属品（我早在二十四年前就证明了这个原理），而是**目的本身**。所以它应当把其他阶级和政党当作手段来利用。在这个意义上我不久前曾经写道，如果它不愿意利用立宪民主党追求半自由的意向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①，那就会是它的一个錯誤：它不应当为別人效劳，它应当利用別人。如果效劳和利用这两者是一回事，那么資本家就是工人的忠实仆人，因为他们忠心实意地利用工人創造剩余价值。但这个道理对我的論敌們說来是太复杂了。他們不会去分析这样一些細致的思想。在他們看来，如果是資產階級政党，就不要去利用它：要离恶行善^②。无政府主义者一直就是这样議論的。

他們把事情說成这个样子，好像他們終於找到了一个权威作家在協議問題上同我有意見分歧。但是我們且看一看考茨基对这个問題到底是怎么說的。

我們在他的文章的俄譯本的第三十一頁上讀到：“同自由派采取一致行动只有在这样做不会妨碍同农民采取一致行动的那种形式下和那些地方才是可以允許的。”这是正确的。但是难道我提出过可能妨碍这种共同行动的協議嗎？在哪里？什么时候？

再問一句：我的論敌們到底高兴什么？現在我似乎开始猜到問題在什么地方了。請听。按照这些先生們的意見，当我们讀到考茨基下面这段話时，我的“方法”和“考茨基的方法”之間的根本区别就表现得特別突出：“如果认为所有爭取政治自由的階級和政党，都应当完全采取一致行动，才能获得胜利，这就意味着只注意到事件发展的政治上的表面現象。”^③但是这段仿佛暴露我們的两种“方法”的区别的話只能使我高兴：要知道我老早就证明了这样一些階級根本不可能“完全采取一致行动”；要知道我始終坚持了“分开走，一起打”的原則。我是本着这个原則，根据这个原則，在这个原則的範圍內提出选举協議的建議的。所以如果这个建議表現出“投奔”到自由派方面去的願望，那么根据同样的邏輯，拒絕協

① 它的目的达到了，同时也就有利于广大的居民群众。不过这里沒有必要詳細說明这个道理。——著者注

② 語出《聖經》《詩篇》第三十四章第四十节。——譯者注

③ 參看《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397頁。——譯者注

議就应当表現出投奔到十月黨人，甚或投奔到黑幫分子那里去的願望。

但是考茨基自然是同这种邏輯毫不相干的；無論是在这种場合下，或者是在另一种場合下，我們已經知道，他都不反对同自由派采取一致行动，只要这种行动保持在一定的範圍內。

再看：“考茨基指出，在革命的进程中，胜利一定属于社会民主党，因此这个政党应当使自己的支持者具有胜利信心……普列汉諾夫竭力掙扎，企图‘寻找根据’把‘阿姆斯特丹決議’看作我国革命的任务，把这种可笑的掙扎同考茨基所提出的‘如果在斗争以前就抛弃胜利的信念，斗争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一简单明了的論点相比，这种掙扎就显得特别可笑了”（第五頁）。①

慢点着，可爱的先生！在这里您又乱来了。而且在这里您所造成的混乱表现得“特别突出”。

为什么我談到了阿姆斯特丹決議呢？因为也許可能有人把这个決議說成是譴責我提出的选举協議的。我恰恰认为不可能“寻找根据”，（像我的論敌們所說的一样，不过不知为什么加了个括号），說这个決議适用于目前俄国的社会政治关系。同时当我提醒我以問題相质詢的那些人注意这決議时，我——再一次抱歉！——曾經指望他們回答說：“別那么想吧！要知道阿姆斯特丹決議是針對和你們的条件完全不一样的条件說的。”老实說，他們也就是这样回答我的，并且現在大概也要被布尔什維克先生們視为“倒戈分子”的那个茹尔·盖德就比所有其他的人更尖銳更明确地回答了這個問題。可爱的先生，您到底从哪儿看出了我的“掙扎”？

如果真的有“掙扎”，而且如果它們是“可笑的”，那就除非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下：我在自己的某些論文中证明了并不需要证明的东西，即再一次证明了，阿姆斯特丹決議譴責在同我們俄国的条件完全不一样的条件下产生的協議。

① 參看《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 397 頁。——譯者注

其次，我在证明“寻找根据”云云之不可能时也曾写道，从阿姆斯特丹決議的观点看来，本来只可以討論工人階級的代表参加**資產階級政府**或**小資產階級政府**的問題。同时我説过，阿姆斯特丹的決議是用否定的态度解决这个问题的，不过这样的问题恰恰只有在我国目前的关系被清除出历史舞台以后才能产生；現在阿姆斯特丹決議指示我們的乃是某种完全不同的任务。我关于参加**資產階級政府**的評論是附带写下来的，所以如果“布尔什維克”先生們认为这就是我的“掙扎”的主要內容，那我就有理由設想，我的“可笑的”掙扎主要的并不是使他們“发笑”，而是使他們不安。这个建議，順便説説，清楚地説明我的論敌們为什么会如此（可以說是）慌忙地竭力抓住考茨基的后襟。

至于考茨基关于为了斗争必須有胜利的信心的意見，那么我自然不会——而且实际上誰也不会——予以否认。全部問題在于不要强迫进行斗争的人相信按照地点和时间的条件説来不可能成功的那种胜利。此外还必须闡清楚什么才可以算得上胜利。依我看来，布尔什維克先生們所幻想的那种夺取政权只是表面上看来算作**胜利**，而其实会是惨重的**失败**的开始。同时我对問題的这种态度是和恩格斯的下面这个看法完全一致的：恩格斯认为，如果一个階級的胜利所必需的經濟条件沒有成熟以前政权就落到了它的手上，那么这个階級的处境就会是十分不利的。当存在着这个否定性的条件时，对这个階級説来仍然处于**反对派地位**是比較有利的。继恩格斯之后，我現在的看法也是这样^①。我不认为我的朋友考茨基在这个場合同我有很远的距离；在这些值得我們注意的文章中他的見解表达得很不肯定，好象不能对它形成一个确切的概念。但是如果——再説一遍，我觉得这是不大可能的——他同意“布尔什維克”先生們的看法，那么我也就不会同意他的意見了，正像一九〇〇年在米勒兰的問題上不同意他的意見一样。这会使

^① 我指的是他給菲力浦·屠拉梯的信〔參看《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519—523頁。——譯者注〕。我曾經不得不多次地引証这封信。——著者注

我感到难过，不过我认为，事变会证明我是正确的，正像事变已经证明我对考茨基的巴黎決議的批評是正确的一样。

誠然，在我国暂时还没有理由設想，会解决这一爭論的那些事变能够很快出現。事变自然是“可能的，但只是在多少遙远的未来”。在这个場合，我觉得考茨基沒有完全正确地确定目前我国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他正确地指出我国农民的政治发展正在朝什么方向进行。但是他夸大了这个发展的速度。而由于夸大了它的速度，在它对其他政党的影响上他就必然会产生不完全确切的認識。考茨基著作的外国讀者也許可能設想，立宪民主党人已經变成了保守党。其实，目前认为他們是——像我曾經称呼他們的那样——人民半自由党則比較正确些。不过在一个地方考茨基本人似乎也說到立宪民主党人之拒絕同我国旧制度的殘余势力作斗争只是未来农民觉悟提高的結果。如果正是应当把这个地方看成是正确地表达了他的思想，則就实质說我同他的意見是一致的，因此我們之間的分歧可能只是程度上的差別，不过这种可能性，依我看来，只是取决于这样一点，即：我在分析俄国农民觉悟的发展过程时常常記起了俄国的一句俗話：“說来容易做起来难”。

不过这一切都是細节。主要的問題是，如果在后面两点上考茨基本来就接近于“布尔什維克”先生們，則必須記住，两点还不表示全体，“布尔什維克”先生們揪住考茨基的后襟仍然是完全白費气力的。他們最好是去同无政府社会主义者爱尔威“认亲戚”。这个爱尔威不久以前就用一系列地道的“布尔什維克式的”指摘猛烈抨击考茨基所属的党是“机会主义”。好像这个党在自己的选举宣言中表現了“机会主义”似的。怪不得在布尔什維克先生們的队伍里，对无政府社会主义的工团主义的同情正在增长和巩固。如果天假以年，我想我們很快就会看到我国某些所謂馬克思主义正統派分子变成名副其实的无政府社会主义正統派分子的十分有趣的現象。

在結論中我要指出一点。考茨基說，在我国农村居民的一部

分有財產的人和工人階級之間將來會出現他們之間現在在西方所存在的同一條鴻溝。這是很正確的。不過考茨基忘記了補充說，俄國農民（請注意：所謂**勞動農民**）的經濟利益**現在已經**同無產階級的利益在許多方面發生了分歧。而這種情況在解決上面提到的那個政治問題時（在這個問題上也許我和考茨基之間存在着某種意見分歧吧）是必須予以考慮的。

舉一個明顯的例子。一月九日法令無疑是同“勞動”農民當前的利益背道而馳的。即便不是處處這樣，也是在我國很多的地方如此。所以“勞動”農民不能不希望無條件地廢除這項法令。然則在現在這個極其重要的問題上無產階級的立場會是怎樣的呢？為了判斷這個立場，我建議您考慮一下下列事實。

《唐波夫報》報道了最初實際推行村社新法律的一個情況。

在唐波夫縣波克羅夫斯基鄉波金那村的村民大會上，就一個村社業主社員提出的關於指定若干地段固定為私有財產的聲明這個問題的實質進行了討論。

大會堅決地拒絕了滿足這個要求。為此制訂了一項決議。決議提出拒絕的簡單理由是不願意屈服於希望從村社中分離出去的業主社員的要求。決議認為滿足這個要求會使村社感到不方便，因為希望從村社中分離出去的人可以找到很多，這主要是那些貧窮的業主以及不從事農耕和不住在村社的人。然而“最好是保存村社地產：（一）以便阻礙份地的讓渡，（二）為了在休閒地和當年收過黑麥的土地上放牧牲口的方便，以及（三）因為把土地劃分為一些個別的地段不可能是平均的，原因是土地各有不同，而且許多土地都完全不便耕種，而耕地交錯現象由於按新的人口重新分配的制度而被認為是不能實現的。”

您可以看得出來，最初實行新法令的一個情況暴露了怎樣的“內幕”：波金那村村民大會認為，農村貧民的利益同“勞動”業主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我確信，這是我國那些不用說是完全不關心貧民的官僚主義者們所沒有料到的。但是——只要注意傾聽一下我

国各派进步报刊的声音，就多少可以判断出来——这也是我国反对官僚主义者的人所沒有料到的。由于后面这些人把分离出去的农民的利益同村社的利益对立起来，所以他們总是告訴讀者們說，分离可能只是最不能使得我国民主派同情自己的那一部分农村居民所希望的和只对他們有利的^①。土地問題的优秀专家彼·馬斯洛夫也发表了这样的意見（《現代世界》，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号，論文：《村社的破坏》），——然而馬斯洛夫在自己的論土地問題一书中本来可以找到对波金那村的情况所提示的那种利益的結合的可能性的很清楚的說明。我們在那里讀到：

“从富裕的农民集团的利益观点看来，农民村社占有土地，即某些人所謂的‘土地社会化’，是有利得多的。在沒有現在加在村社身上的那些行政束縛的村社占有制度下，在农民經濟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下，土地从一些人的手里向另一些人轉移就大为容易了，因为它不需要把資本花費在购买土地上。但是从农村居民最貧困的集团的利益观点看来，事态是絲毫也不比較合乎願望的；无庸置疑，乡村无产階級分子将从‘自由’村社中被排挤出来而毫无所获，因為他們沒有自己的产业。”^② 这位严肃而且謙虛的人有一个毛病，——您看怪不怪！——就是在自己关于土地問題的著作中郑重宣布說，在他以前，所有的研究者都站在抽象的观点上，可是他、彼·馬斯洛夫，却改正了这一切。尽管彼·馬斯洛夫对彼·馬斯洛夫的著作有如此夸大的贊誉^③，彼·馬斯洛夫在自己的书里居然还是采取了相当抽象的观点。只要指出这样一点就够了：他在自己的书里曾經把我国农民的土地占有形式的演化过程当作不依

① 看来，外国的无产階級思想家們也是这样看的，參看列昂·勒米在第一〇一九号《人道报》上的一篇文章。——著者注

② [原文此处缺下双引号。——譯者注]《俄国土地問題》，第三版，第456—457頁。我在《我們的意見分歧》中就已經证明过这样的时刻到来的可能性；那时村社的消灭正是对“农村貧民”來說将是有利的。——著者注

③ 我說夸大的贊誉，因为彼·馬斯洛夫在此处的过错恰恰只是夸大。而他的著作是值得称道的，这一点我本人一直是这样认为的。——著者注

賴于对这个过程有巨大的和在科学中得到了很好說明的影响的我国国营經濟发展的东西来考察。在《村社的破产》一文中，彼·馬斯洛夫議論的抽象性质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这是很令人遺憾的，因为他的見解可能使得許多人犯錯誤。只有洛西茨基关于一月九日法令的議論似乎比較具体一点，不过很遺憾，我手边沒有他的全部文章，所以我不完全清楚他的結論。但是不管結論如何，支持“劳动农民”进行反对“貧困的业主”的斗争总是我們不宜做的事情。自然，我不是說，我們应当鼓掌欢迎破坏村社的法律。这个法律是坐在办公室里搞出来的，这首先就說明它根本不行。涉及人民迫切利益的問題应当由人民代表机关来解决。但是在“人民”这个概念中包括有很不相同的階級和利益远不一致的居民阶层。

掩盖这一点是荒謬的。忽視“貧困业主”这些农村无产者的利益是有罪的。必須采取一切措施，使得他們大声地宣布自己的要求。只有依据**这些**要求，才能确立对一月九日法律的正确态度，所以应当赶紧說明——我的意思是說：有組織地、系統地和全面地說明——这些要求；因为時間不会等待^①。

（譯自《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十五卷第 281—304 頁）

① 这篇文章写完以后，我讀到了下面一則消息：

“农民的決議。《处女地》报道說，科斯特罗姆斯基省加里茨基县科斯达馬村的农民在村民大会上决定要剝夺所有不住在农村以及本人不耕种土地的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大会在考察消灭村社的新法律时承认，这是奴役农民并在他們中間引起敌对情緒的新的根由。決議交給了地方自治局的首长。”（《言論报》，第十六号）

其实，这个決議跟波金那通过的那个決議是一个意思。它也是同无产者农民的利益背道而馳的。——著者注

第六封信

(向我們的社会民主党議員們進一言)

这封信最初以《关于新杜馬》为題发表在一九〇七年二月二十三日第四十六号《俄国生活报》上。

这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是“叛徒”企图“中止革命”的宣言。普列汉諾夫在这里“想迫使党接受早在第一届杜馬时期为党所摺弃的支持‘責任內閣’的口号”（《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162頁）。

文章发表后，列宁立即写了《論机会主义的策略》、《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綱領》和《不应当怎样写決議》（同上第十二卷）三篇重要文章詳加痛斥。列宁在这三篇文章以及这个时期的其他一些文章中分析了这个机会主义口号的实质和阶级意义，指出了它的危害作用，逐点批駁了普列汉諾夫提出的种种所謂論据，并且說明了改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两面性，闡述了党在反动时期的革命策略原則。

在我們这里，談論“我国革命”已經成了习惯。不过，像“我国革命”这样的說法只能用在一定的意义上。**我国革命还没有实现。**下面的事实就是这一点的最好证明：迄今为止政权仍然掌握在斯托雷平、考尔巴尔斯、連宁坎普夫先生以及其他的的确的……“真正的俄国人”手里。我們还远沒有经历过我們的八月十日^①。而在一九〇五年十月夺下的我国巴士底獄又重新囚滿为患。我国革命还没有实现。**它只是在实现中。**更正确些說，**它只是在酝酿中。**像革命酝酿时期常有的情况一样，旧制度的朋友們的力量一

^① 指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这是法国人民起义推翻君主政体的日子。——譯者注

天天在减退，它的敌人們的力量則一天天在增加。誠然，随着临来的俄国革命暴露出自己深刻的內容，以前同情它、甚至积极参加过解放斗争的某些分子正在或者将会相继地掉轉头来反对它。这是必不可免的。但是不要因此感到不安。革命抛弃了**某些人**，却吸引了許多人。它失去了上层阶级各个阶层的**支持**，却把**人民群众**吸引到运动中来了。它的收入大于它的支出。就是因为这个道理，旧制度的敌人們的力量正在与日俱增。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它的**朋友們**的力量正在“像蜡烛对着火光逐渐融化一样”与日俱减。要不然，如果支出大于收入，那时就不能說我国的**革命**在酝酿中，那时就應該說我国的**复辟**在酝酿中，即完全恢复旧制度，恢复到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七日以前的那个样子。那时无論我国立宪派“现实政治家們”怎样引证十月十七日宣言，无論他們怎样援引行为合法，都停止不了恢复旧制度的这一过程。

一旦开始了倒退的社会运动，那就只有到互相进行斗争的社会力量达到或多或少稳定的平衡状态时才会停止下来。

我国的革命还没有实现。它只是在酝酿中。

革命力量的增长同广大群众之卷入运动成正比例。当它的力量超过反动派的力量时，革命就会实现。这将在什么时候呢？我們不知道。但是我們可以看出，而且应当經常記住以下一点。現時政府的抵抗力量——甚至这个由于“居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态度而經常大大削弱了的警察国家的抵抗力量——同过去比較起来，例如同法国大革命时代比較起来，要大得不能相提并論。

因此，为了克服政府的抵抗力量，同过去所需要的比較起来，現在必須有更多得多、更有觉悟得多和組織得更好得多的群众登上历史舞台。然而为了使群众积极地自觉地参加运动，为了使他們組織起来参加运动；必須使他們認識到运动是他們自己切身利益的表现，必須使他們把运动的胜利看成是他們本身生存的必要条件。但是这个运动越是更好地表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运动就越是**民主的**。

所以，光是因为政府的反抗力量极度增大这个事实，就必须使反对旧制度的解放斗争日益具有更多的**民主主义**性质。这一点再次证明旧的——本质上过去始终是寡头政治的——自由主义已经过完了自己的时代。我们只有在民主的旗帜下才能同旧制度进行胜利的斗争。

这就说明为什么尽管我国立宪民主党人十分厌恶空想主义，他们自己仍然是政治上的空想主义者。

他们害怕人民过分坚决地走上政治舞台，因此他们在建立和巩固我国的议会制度时力求利用根本不足以达到这个目的的那些力量。他们充满着空想主义的希望，以为只要拼命地**开始谈论**旧的“压迫”他们就会成功。而且他们不仅自己充满着这种空想主义的希望。他们还想要人民相信，这种希望中根本没有任何实现不了的东西。立宪民主党的主要过错就在这里，而不是在任何别的地方。于是随着俄国公民越来越认识到它的这种过错，立宪民主党人将退居次要地位，而把荣誉和位置让给“比较左倾的”派别。他们这些现在采取反政府立场的人变成采取反革命立场的人的那个日子也许已经为期不远了。

也许这个日子不远。

但是暂时它毕竟还没有到来，因此再没有比我们的“布尔什维克”所犯的那个错误更可笑更粗鲁的错误了；他们以为只要通过自己的必须“积极发动”的叫喊就可以促进这个日子的到来。恰恰完全相反！

“布尔什维克”的没有道理的叫喊和没有道理的发动使得许多新鲜的血液都流到立宪民主党的血管里去了。只有天生的瞎子才看不到这一点。

就拿臭名昭彰的抵制第一届杜马来说吧。立宪民主党人现在自己承认，抵制增加了他们党的力量 and 影响。（例如请参看第三十五号《言论报》社论）

这就是说，“布尔什维克”本来想走进一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

另一个房間。他們由于不善于根据正确评价社会力量对比关系来论证自己的策略，結果就像所有的空想主义者一样常常通过自己的活动达到同他們所追求的目的直接对立的目的。

抵制坏在哪里呢？它的拥护者們的主要过错在什么地方呢？他們曾經把暂时还只是**正在成熟的**而且也只有参加选举才可能和一定会促进其成熟的那个形势假定为**已經成熟的形势**。我一开始就这样說过。現在，就是过去拥护抵制的人本身大概也不会怀疑这点。正像我上面已經指出过的，小册子《杜馬的解散和无产阶级的任务》的作者写道：

“人民，即广大的居民群众，到一九〇六年时大多数还没有成长到具有自觉的革命性……大家普遍感觉到对专制制度不能容忍，人民代表机关不中用^①。但是人民还不能意識到和感觉到旧政权同**有权力的**人民代表机关是不能調和的。看来，人民在这方面还需要特别的經驗，立宪民主党杜馬的經驗。我們的口号……是正确的，但是，实际生活走向这个口号所經過的路程比我們过去所能預見的要长一些，曲折一些。”^②

这是很能說明問題的自供。它表明，我引用的这本小册子的作者——作为一个著名的“布尔什維克”——多么不善于从自己本身的前提中作出必要的結論。他不理解——或者不願意理解——“口号”首先具有策略意义，建立在**对人民群众觉悟程度的錯誤認識的基础上的策略首先就是錯誤的策略**。我們的作者甚至想把对自己的**錯誤之認識**变成自我夸耀。正是由于对待自己的**錯誤的这种不真誠态度**，这些人从**錯誤中**什么也沒有学会，而且像以前一样“不能預見”他們的事业要获得胜利所必需的那些条件。如果小册子的作者今天認識到不得不用自己的奇怪的語言承认**广大的群众大多数还没有成长到具有必要的觉悟程度可以引导他們进行坚决**

① 看来作者的意思是說，現時**没有权力的**代表机关不中用。（引文与《列宁全集》稍有出入。——譯者注）——著者注

② 參看《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96—97頁。——譯者注

的战斗，那么，这丝毫也不会改正他的根深蒂固的思想习惯，他明天又会用响亮的声音高呼：“喂，冲啊！”他的读者们和追随者们也同样很少从自己的旧错误中学到什么东西。例如不久以前彼得·阿列……先生——参看《论文初集》^①中的论文《新杜马前夕》——就发表过如下的见解：“所以自由资产阶级的制度不能实现革命的基本要求。这些要求中间最大的要求是自由主义制度力所不及的：资产阶级从来不会决心坚持和实行像无偿地把一切土地转交给农民、废除间接税、不偿还债务、取消常备军等这样一些措施。

由此可见，如果在革命过程中自由派不知不觉地得到政权，则革命是不会满意的，那时只会暴露出自由主义政治上的破产”（第二十九——三十页）。

彼得·阿列……先生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敌人。因此看来，他一定会希望他们尽可能迅速地不知不觉地得到政权，从而“暴露出”他们的破产。但彼得·阿列……先生却不这样议论。他说：“因此，社会民主党和革命无产阶级没有任何必要去帮助自由派尽快地取代斯托雷平和古尔柯的黑帮集团在内阁中的席位”（第三十页）。这种议论只有在我们的作者不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敌人，而是他们的朋友，无论如何竭力想要推迟他们的破产的那个场合下，才会是合乎逻辑的。但是逻辑规律不是为我们的作者这样的人准备的。因此彼得·阿列……先生在建议无产阶级对待立宪民主党人的态度方面采取会推迟他们的破产的那种策略时，自以为是社会民主党中极端的急进派，并且向我党在杜马中的代表们提出了这样的劝告：

“如果杜马的多数再度由自由派组成，而且他们再度提出任命责任内阁的要求，那么社会民主党自然不会反对实现这个要求（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凭着这种“反对”一定会荣获不对人民负责的

^① 《论文初集》是布尔什维克所编的总结第一届杜马和分析第二届杜马的前途的文集，一九〇七年由《新杜马》出版社出版。文集中收有列宁和阿列克辛斯基等人所写的文章。——译者注

政府的勳章！——格·普·），——它只是力求利用这个事实为无产阶级和革命謀利益！”（第三十頁）。怎样“利用”，这一点可惜彼得·阿列……先生什么也沒有說。但是接着他建議“像以前一样提出由杜馬中同各地革命組織有联系的左派組成革命的執行委員會的思想以与責任內閣的要求对抗(sic! ①)”（同上頁）。

如果社会民主党議員們提出了和責任內閣的要求相“对抗”的任何一种要求，那么他們的行动就会和自己作为人民代表的直接义务“相对抗”。不負責任的內閣乃是对人民代表机关的嘲弄，所以社会民主党議員們至少有义务像属于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議員們那样坚决地对这种嘲弄表示抗議。他們不应当努力去寻找和这个要求相对抗的什么东西，而应当努力地用他們所代表的階級的巨大威望来支持它。

不这样做就意味着抛弃人民群众的同情，并且使这些同情轉到资产阶级反政府派方面去，換言之，就是再一次为彼得·阿列……先生希望加以消灭的那个立宪民主党效劳。真所謂弄巧成拙！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迅速增长的革命力量現在已經超过政府力量，那么，責任內閣的要求便能够而且应该成为与反动派决战的信号。或者革命力量还未超过政府的反抗力量，那么进行决战还不合适；不过即使如此，这个要求仍然应该加以支持，因为它是提高人民的政治認識、使人民为未来的胜利战斗作准备的最好的教育工具。

因而無論在那一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的議員們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革命的利益，不能不把上述的要求变成自己的要求。

但是从社会民主党議員方面說来，在現時社会力量对比关系問題上的任何自我欺騙都是犯罪的，因为它同时就会是对无产阶级的欺騙、对居民中所有那些——像最近的几次选举所表明的一

① 原文如此！——譯者注

样——越来越密集地团结在无产阶级旗帜周围的分子的欺骗。我国的革命还只是在酝酿。它的力量正在迅速地增长；反动派的力量正在迅速地减退。革命胜过反革命的那个时刻注定就要到来。那时，决战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会成为所有真心反对旧制度的人道义上必需的。这个我们大家所希望的时刻注定要到来。但是它的到来可能要推迟，而且要推迟很久的时间。这只是因为革命者们缺乏理智，他们像我们的“布尔什维克”一样，希望在反动势力还胜过革命势力的时候就投入战斗，而这种战斗只会给政府带来胜利。

如果抵制策略有利于立宪民主党人，那么现在彼得·阿列……先生向我们的杜马党团推荐的策略就会有利于“真正的俄国人”。

彼得·阿列……先生和他的同志们再一次本来想走进一个房间，结果差一点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又是弄巧成拙！

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事：不理智的热心比无动于衷更坏，比叛变更坏。不善于控制自己的革命者是价值不高的。

曾经征服整个文明世界的罗马国家的一个历史学家用同情的笔调形容过一位罗马统帅的做法。这位统帅因为自己的儿子过早地同敌人交战而处死了他。性情急躁的青年人击溃了他所攻击的敌人的队伍，但是他的冒失行为使得整个罗马军队有遭到惨败的危险，所以老于战阵的军人严厉地谴责了他。

然则这位军人会怎样对付我们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呢？虽然在他们的眼下暂时只有失败，但是他们却根本不去“预见”胜利所必需的条件，而是始终不变地高喊：“喂，冲啊！”

要理解现在进行决战对我们不利难道那么困难吗？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才可以避免决战，而让敌人把自己最后的力量消耗在用一次坚决的努力改善自己的地位的徒劳无益的、损害自己的名声的企图中呢？我们必须继续在全民鼓动的文火上把我国的官僚制度妈妈烤熟——像我在自己的《论策略和不策略》的几封信中已

經写过的^①——，这难道說得不对么？至于反动分子，看来他們很好地懂得这种看法多么正确，所以如果我們的杜馬党团遵循彼得·阿列……先生英明的劝告，在对革命十分不利的那些条件下让他们有可能攻击革命，那么他們对它就要感謝不尽了。在最近几次选举的影响下，孟舍維柯夫先生在《新时报》上写道：

“以前我说过，政府无疑比造反者强大，但是如果让最近的事件发展下去，如果等到宣传工作深入军队和农村群众，那时力量对比就会改变。我预言过，关系的这种变化可能在两三年以后发生。从那时以来已經过了一年，宣传工作已經有了长足的进展，像选举所证明的一样。

“不过政府現在还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击潰任何起义，但它也許已經处在这样一天的前夕，那时要击潰起义就困难了。像草原失火一样，每过一小时以后，要扑灭革命，任务就越来越困难了。”

从孟舍維柯夫先生这里所說的話中应当得出什么結論呢？他本人从这里得出結論說，在决定不顾一切地冲上去以前，政府应当深刻地想一想。不过我不知道他这番話是否忠誠，我也不知道說这些話的唯一目的是不是为了掩盖正是現在必須“不顾一切地”冲上去、否則就迟了的思想。無論如何在我国“上层社会”里可以找到不少的人无需孟舍維柯夫先生的帮助也会得出这种思想来。对于他們說来，只要他正确地向他們指出实际情况就够了。

革命的力量一天天增加；反革命的力量一天天減退。因此“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暫時只有利于反动分子。

革命者应当尽其所能地使政府在竟敢“不顾一切地”冲上去的时候甚至沒有外表上的合法性，使它不能对国家說：“极左派迫使我这样做！”不，如果它真的“不顾一切地”冲上去，那就应当使所有的人都看到，它之所以这样行动唯一是因为仅仅为了复辟的利益而不尊重人民的权利。只有那时，它搬起这种政策的石头就会打

^① 參看本书第26頁。——譯者注

在自己的脚上。让社会民主党的議員們記住：不要采取任何不謹慎的步驟來損害革命的事業。

Caveant!①……

（譯自《普列漢諾夫全集》第十五卷第305—312頁）

第七封信

這封信最初以《如果驅散，怎麼辦？》為題發表在一九〇七年四月彼得堡出版的孟什維克派的論文集《回聲》上。

從一九〇七年二月以來，報紙上充滿了關於第二屆國家杜馬即將驅散的傳聞和猜測。

如果驅散，怎麼辦？作者用諷刺的口吻批評了伊茲哥也夫這個“六神無主、擦鼻涕抹眼淚的軟弱庸人的典型”（《列寧全集》第十二卷第174頁）。但是他自己也並沒有找到“出路”。“人民武裝起義么？”——“目前一定要堅決拒絕起義的思想”。“總罷工么？”——“用不着開始總罷工”。“恐怖”？——“我們不是恐怖主義者”。那麼“用什麼回答政變”呢？普列漢諾夫說：教育，即提高人民的覺悟。或者具體地說，向人民宣傳杜馬是什麼以及它應當是什麼等等等等。一旦人民有了覺悟，政府就不敢驅散了！

跟普列漢諾夫相反，列寧在《杜馬即將驅散與策略問題》（二月）和《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綱領》（三月）等文章中着重說明了，當時的政治危機不是立憲危機而是革命危機，這一危機正在變成無產階級群眾和農民群眾直接反對專制制度的鬥爭，只能把它當做人民爭取政權的革

① 當心啊！——譯者注

命斗争中的一个辅助环节而加以利用，因此不能抛弃革命斗争的思想，而停留在宣传教育的宪制斗争上面，等等（同上第203—205页）。

外国报刊上很明确地纷纷传说“上层社会”打算解散杜马。同时命运显然不利于杜马：时而杜马会场起火，时而天花板坍塌。这是坏兆头。因此自然产生一个问题：如果解散，怎么办？为了不再让事件使得那些骄傲地称自己的活动是不自觉的历史过程的自觉表现的人措手不及，现在就该研究这个问题。有觉悟的人一定会这样……

或许有人对我说，在选举前的鼓动时期已经在各种会议上和报刊上研究过这个问题了。对于这一点我的答复是：虽然那时的确研究过这个问题，但对它所作的解答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当时人们在会议上和报刊上所说的大致也就是斯·恩·尤林写过的和——大概是——说过的话。尤林说：“如果第二届杜马依靠有组织的人民，人们就不会像过去解散第一届杜马那样解散它。”（《时务报》第二号，小品文）我要问，为什么在这种场合下不会解散呢？我没有在斯·恩·尤林的小品文中找到回答。我引用的这句话在原文中用了着重字体。这句话前面，斯·恩·尤林提出了如下的见解：

“让杜马中的每一个人民议员都感觉到，杜马外的有组织的人民力量站在他一边。让他走上杜马讲坛的时候不是叙述自己的猜想和愿望，而是由几千份人民会议和农民集会的委托书和决议所表达的、无可怀疑的人民意志。那时不实现杜马的要求就等于拒绝人民。”

这个见解只有在我们以为我国政府不希望“拒绝人民”的场合下才会是令人信服的。但我们是不是有什么根据可以这样以为呢？显然，我们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根据这样想。相反，我们有充分的根据以为，每当我国政府能够“拒绝人民”而不致造成

对自己过分不利的后果时，它都会毫无拘束地这样做。

因此全部問題都在这里：**如果政府看到驅散新杜馬会造成对它不利的后果，它就不会像驅散第一届杜馬那样驅散第二届杜馬。**

很可能尤林本来的意思正是如此。而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是对的。但是要使得他的这个思想被承认是对于“如果解散，又怎么办？”这个问题的令人满意的答复，必須把它同一系列其他的思想联系起来。

我們說：如果政府看到驅散杜馬对它不利，它就不会这样做。但在这里又产生两个新問題：第一，所謂不利是什么意思呢？第二，假使它看不到或不懂得再次驅散杜馬会使它处于何种不利的地位，又怎么样呢？

不难看出，这两个問題是彼此不断地联系着的。实际上，如果政府不懂得再次驅散杜馬会使它处于何种不利的地位，那它就会沒有拘束地“拒絕人民”，即驅散他們的代表。而这个錯誤一定会招致对它不利的后果。究竟将是怎样的后果呢？它們可能是怎样的呢？

这是每一个对我国解放运动的命运表示关注的人都应当深思的。

人民武装起义么？在驅散第一届杜馬以后一个政治上幼稚的人立即——在上面所引用的小册子《杜馬的解散和无产阶级的任务》中——主张規定在七月初或八月底举行武装起义。很可能他又要表現这样的坚决态度，又要規定武装起义的一定期限。这个幼稚的人也許觉得提出在再次驅散杜馬的場合下怎么办的問題是不适当的。但是在过了儿童年龄的人中間是找不到很多人会认为“目前”可能举行胜利的人民起义的。任何起义的企图都会以失敗告終。而任何失敗都一定会使政府因再次驅散杜馬而使自己陷入的那种不利地位得到改善。

“目前”一定要坚决拒絕起义的思想。

总罢工么？我不知道无产阶级会不会在值得我們注意的場合

下发动总罢工。然而如果会发动，那就必須記住，总罢工也可能以失敗告終。我这句话的意思是說，如果开始总罢工，则这还不意味着它一定会使得政府投降。也許会，也許又不会。

如果总罢工以失敗告終，或者如果在驅散新杜馬的时刻无产阶级对自己和其他阶级說：胜利的总罢工現在不可能，而失败的总罢工又只会对政府有利，因此用不着开始总罢工，——那又将怎样呢？

很可能政府在驅散杜馬以后修改选举法，从而最終保证自己在新的选举中获胜。

我們用什么来回答它的 *coup d'état*^① 呢？恐怖主义者說：恐怖。但我們不是恐怖主义者。

再問一次：究竟怎么办？如果什么也不做，然則再次驅散杜馬給政府所造成的那些有害后果又在哪里呢？难道政府只要敢于发动 *coup d'état*，就足以阻止解放运动的洪流么？

啊，不，*ce serait trop beau*^②，像法国人所說的。

可以給解放运动的洪流制造各种障碍，但是不可能阻止它。原因很简单，因为解放运动的存在是由于有許多最迫切的社会需要。只要这些需要还存在，解放运动的洪流就不会停止。而这些需要只有在制造 *coup d'état* 的反动派企图捍卫的制度消失以后才会不再存在。

因此，即使在我们不能用任何一种成功的“积极发动”来回答 *coup d'état* 时我們也用不着絕望。生活会发生作用。

怎么办呢？对我们說来，現在整个問題的症結都在这里。只要我們弄清楚使生活的急切要求得到满足的那个过程，我們因之也就会懂得在驅散杜馬时人民的力量还不足抵抗 *coup d'état* 的場合下我們该怎么办？

然則生活会怎样来满足自己的迫切要求呢？

① 政变。——譯者注

② 这就会太好了。——譯者注

显然，它只有通过增加**人民的力量**才能做到这一步。

然而人民的力量在哪里呢？就在他們的**觉悟性和組織性**。

这就是說，应当在这里来寻找对反动派所有一般的阴谋而特别是对 coup d'état 的答复。

如果在 coup d'état 的时刻不可能有认真的“积极发动”，則我們毕竟还有最重要的手段：即可以促使現在实行驅散的那些組織終将被驅散的那个时刻尽快地到来。

所以我們越是更好地利用这种可能性，我們对 coup d'état 的回答就越是致命的。

假使有組織的人民力量站在杜馬一边，那自然是很好的事。但是第一，这样的力量还不存在。第二，只有在人民善于从正确的观点来看杜馬的时候**它才会出現**。暂时人民还不善于做到这点，所以期望他們支持杜馬是徒劳的。

問題是这样的。历史使我国人民群众养成了政治上**消极的态度**。我国人民群众习惯于期待上面的帮助；时而是天上的沙皇，时而是地上当权的上层社会。这个习惯甚至反映到群众对待我国社会生活的某些新現象的态度上来了。而这些現象看来最需要同情它們的那些人的**主动精神**。在一九〇二年著名的罗斯托夫（頓河上的）罢工时期，人們开始向当地社会民主党委员会——它立即变成有名的了——递交了**各种呈文**。仿佛它代表了一种什么新“机关”。这个机关跟旧机关不同之处在于其中有**善良的**首长們。人們也向工人代表苏維埃递交过类似的呈文。最后，人民群众向第一届杜馬递交的那些声明中很多也具有向新的善良的首长們提交的这些呈文的性质。人民欢迎杜馬，他們希望在反对自己世代代的苦难的斗争中**它会成为他們的力量源泉**。他們中間暂时还有非常众多的沒有觉悟的阶层不懂得**他們自己才是杜馬力量的源泉**。因此当杜馬被驅散的时候，他們一动也沒有动。立宪民主党人指出过这种情况，把它看成是证明自己的策略正确的又一个理由。他們在不久以前选举前夕的各种會議上以应当得到更好的用

場的热情質問我們的發言人時喊道：“在驅散第一屆杜馬的時候你們的人民在哪儿呢？”實際上，這種情況當然根本一點也說明不了立憲民主黨人是正確的。人民沒有出來擁護杜馬是因為他們不懂得他們應當對杜馬採取什麼態度。由此應當得出必須向他們說明這種態度的結論，而完全不應當得出結論說，一定要根據立憲民主黨式的害怕人民政權的心理進行說明。讀者還沒有忘記，“人民自由黨”怎樣堅決地反對過唯一能夠保證人民自由的全權的人民代表機關。立憲民主黨的主要特點完全不在於它認為革命在此刻是不可能的，——此刻革命的確是不可能的，——而在於它一般地力求避免革命，所以也就否定全權的人民代表機關的革命思想。因此，經常不斷地在群眾中間傳播全權的人民代表機關的思想乃是跟“立憲民主黨式的”危險作鬥爭的唯一的——而且是唯一切實可行的——方式，這同時也會是跟來自我國黑幫派的官僚制度的危險作鬥爭的最自然和最切實有效的方式。在這種場合下我們就會很容易揭露立憲民主黨人的詭辯。

例如在第十八號《言論報》上阿·伊茲哥也夫先生說道：“應當公開承認，杜馬的命運現時在內閣的掌握之中，它的存在也以內閣的意旨為轉移。三四個月以後，當杜馬通過自己的立法活動獲得了在國內的權威時，情況就會另一樣了。但是這三四個月是否將由它支配呢？一條沒有出路的死胡同。出路不在街頭，——‘有組織的’也好，‘無組織的’也好，——如果充滿真正的愛國主義精神、具有政治智慧、能夠展望到幾年以內的情況的人士當政的話，就會有出路。”這就是說，我國的時局只有在本着愛國主義精神準備把政權移交到立憲民主黨人手中的“人士當政”的那個場合下才不再是沒有出路的了。指出這樣的出路無異於根本沒有指出任何出路。伊茲哥也夫先生本人也感覺到這點；他繼續道：“可能再一次關閉塔夫利達宮的大門，布置好崗哨，並且把白黨的通告貼在牆上。但是往後將怎樣呢？這些統治方法維持得多久呢？英國人和美國人不會打五年的賭”……但是為什麼不會呢？莫非是因為五

年内当政的人士准备专为立宪民主党开开眼界而放弃政权么？好像不是这样^①。那时将发生某种**其他的事情**，而且那些希望揭露和善于揭露立宪民主党人的不彻底性格的人一定会把自己的种种力量用到这个**其他的事情**方面去。然而把自己的力量用到这个**其他的事情**方面去意味着首先向人民说明，第一，他们目前的代表机关是什么，以及第二，它**应该是什么**。要说明这一点可以不通过“群众大会的方式”，可以不在杜馬中或集会上通过“非常惊人的”决议，而是通过唤醒人民的觉悟的经常工作，这种工作会得到**杜馬中或与杜馬有关的方面**正在发生或将发生的一切事情的极大的帮助。

什么时候这种工作会带来圆满的结果呢？——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为了使我国有一个**真正的人民代表机关**，这种工作是绝对必要的。

所以应当尽可能迅速地开始这个工作。时间是不等人的。一旦在相当大的规模上开始了这个工作，任何从右边来的意外事件、任何 coup d'état 都不会使我们感到措手不及。

对于 coup d'état 我们或者用“积极的发动”来回答，或者不用“积极的发动”来回答。这是枝节问题，视发生 coup d'état 时的情况而定。重要的是无论我们采取怎样的决定，我们在采取决定的时候都要考虑到这个无论如何绝对必要的工作的进程。积极的发动只有在它们将有助于这个工作取得成功的那个情形下才是合乎愿望的，因为我们对于 coup d'état 的主要的和绝对必要的回答正是应当在这里。

coup d'état 对政府不利的后果主要将在于，如果再次驱散杜馬，这就会明显地证明我们将向人民说明的关于人民的代表机关目前的处境很可怜的那些话是正确的。而人民越是相信这些话的正确性，我们的思想的胜利就越会临近。

^① 稍微往下一点伊兹哥也夫先生自己就说：“要求官僚制度有爱国主义精神恐怕不机智。”对的就是对的！而伊兹哥也夫先生的这句话是谴责自己党的基本策略思想的。奇怪的是他完全没有看出这点。——著者注

只有蠢人或者挑撥者才会号召人民在他們沒有作好战斗准备的时候投入战斗。

只有庸人或者**有理由害怕人民取得胜利**的那些人才会从原則上否定任何思想，說一切无需战斗“就会成立”。

革命者应当經常培养人民去进行胜利的战斗。

然而为了作好战斗的准备，人民——再說一遍——应当知道：
(一)他們现在的代表机关是什么；(二)它应当是什么。

«Aussprechen, was ist»^①，——告訴人民实际情况，——用明白的語言對他們闡明人民政权的思想，——这就是現在革命者头等的和主要的責任。

但是应当这样來說明这一点，使得人民听得懂革命者的話。为此就必须避免革命的空談和假革命的性急态度。最简单最明显的策略見解表明，一定会着手說明实际情况的**并不是杜馬議員**^②，而是人民中間那些有觉悟的分子，他們一定会喚醒不觉悟的人，向他們說明杜馬中正在进行的事件的意义，并且邀請正在恢复視力的人們睜开眼睛去看清实际情况；虽然他們现在还看不清，但是既然俄国人民的解放已經注定了，他們就能够看清，也不定会看清的。

社会民主党在这里是大有用武之地的。但是为了取得胜利，必須理解**群众**的历史意义和放弃阴謀家的幻想。

* * *

附記 我們这里的人們都用公式进行思考，因此喜欢“具体的說明”。我就来作这样的說明。我們現在都在談論出版供农民閱讀的政治性的报纸。如果这份报纸力求用朴质的語言向朴质的讀者**說明实际情况**，并且向他說明以下的問題，那是很合乎理想的：

(一)杜馬現在是什么机关。

① 是什么就說什么。——譯者注

② 对于沒有完全失去分寸感的人們說来，这是不言自明的，所以当我在第六封信，《关于新杜馬》的末尾說过那番話以后，我就看不出有必要詳細說明這個問題。——著者注

(二)它应当是什么机关。

(三)什么东西阻碍它成为这样的机关,以及

(四)怎样消除这种障碍。

这样的报纸会成为同任何“危险”作斗争的强大武器。但是不难明白,这只是武器之一;除它以外同时还应当使用其他许多武器。在这里也会用得着群众大会,只要把它们成功地组织起来。不过考虑到我所指出的任务,在群众大会上就不要像现在大部分的人那样讲话;但这是枝节问题,我将另文说明。

(译自《普列汉诺夫全集》第十五卷第313—320页)

关于非常代表大会

(致同志们的公开信)

这封公开信发表在一九〇六年九月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八期上。

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以后,由于一些民族的社会民主党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的力量大大增长了,布尔什维克组织壮大得更加迅速。同时孟什维克在策略上越来越显著地右倾,它所控制的中央机构越来越妨碍全党去迎接新的战斗任务。正是党的成分和策略这两个“非常清楚而简单的基本事实”向党提出了召开紧急代表大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248—250页、第十二卷第428—429页)。

这篇“反对召开非常代表大会的文章……写得那样的激动和恶毒,有那样多的恼恨、刺激、个人暗喻和猜疑,以致立刻又恢复了侨居国外者无谓争吵的不幸时代的气氛”。列宁写道,普列汉诺夫的态度“不仅是直接破坏党的民主组织的全部精神和意义,而且对无产阶级最近要进行的杜马斗争和总的革命斗争说来,也是最危险的障碍”(同上)。

“普列汉诺夫则在一边粗俗地诽谤争取召开党代表大会的理由,同时又粗俗地赞扬阿克雪里罗得提出的‘尽快’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妙主意’”(同上第217页)。这个“妙主意”实际上是“小的机会主义的冒险”(同上第339页)。它“模糊了无产者和小业主的观点的差别”(同上第

340—341 頁)。列宁強調指出，普列汉諾夫主張“同立宪民主党結成联盟，召开非党工人代表大会——这不过是一八九九年的《Credo》在一九〇六——一九〇七年的再版而已”(同上第 407 頁)，不过是“革命政党中間日益抬头的一股庸俗习气的洪流”(同上第 233 頁)。

我要在这封信里向参加我們党組織的觉悟工人呼吁，我要向那些真正站在工人階級观点上的党员“知識分子”呼吁。我希望，我的这些(唯一的、真正的)同志們会理解我的动机，会承认我的理由正当。

在英国，从一八六七年起，职工大会(即工联)的代表每年秋天举行一次代表大会。这个代表大会要开一周。所以，有組織的英国工人把这一周称做**代表大会周**(congress week)。德国社会民主党也是一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而且它的代表大会也**不超过一周**。法国社会党人和法国“工团主义者”一年一度的代表大会几天就开完了。奥地利人的代表大会大約也是开这样长的時間，等等。

我們党的代表大会(根据現行党章它应当是一年一度的)要开**三星期到一个月之久**。

这就是說，**我党代表大会所占的时间至少比任何西方党代会多两倍**。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在我国政治条件下，我們必然要拿出比各自由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相对而言大得多的經費用來組織自己的代表大会。

总之，我們要把絕對多于我們所有西欧同志們的时间和相对多于他們的經費用在自己的党代会上^①。

由于花在代表大会上的时间和經費，因此，同西方的党和工会比較起来，我們就只有絕對少的时间和相对少的經費可以用来在

^① 不过，并不只是西欧如此。我关于西欧所說的話也适用于北美和澳大利亚。——著者注

群众中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了。

这说明我们党的工作效力比西方党低得多。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保尔·金格尔在布鲁塞尔同我见面时问我：“这次代表大会开了多久？”——将近一月，——我回答说。活泼敏感的金格尔哈哈大笑。“这么说你们一定都吵架了”，他说。——为什么呢？——“简单，因为神经过度疲劳”。应当指出，金格尔当时还根本不知道这次代表大会上发生的分裂。

在时间和经费方面，我们本来应该比西方的党和工会更加节约。因为我们必须在更加困难得多的条件下进行工作。因为可以说刚刚从许多世纪的睡梦中苏醒过来的我国群众对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提出了相对说来更大的——大得多的、大得无比的——要求。

可我们党的某些党员还嫌我们花在代表大会上的时间和经费不够。

从上届代表大会到现在才不过几个月，他们又要求召开新的非常代表大会。好像除了去开代表大会以外，我们就没有别的事做一样！何况现在这个时候，我国的政治形势十分严重，而且由于我们犯了許多策略上的错误，我们党（应当有勇气公开承认这一点）完全担当不起它本来应该、也本来能够为无产阶级和整个俄国担当起来的伟大任务！不用说，我们的代表大会迷出了个好主意！

只要我们党对它在无产阶级和整个国家面前的义务还有认识（它应当为这个国家铺平通向政治自由的道路），它的绝大多数成员就会摈弃这个召开非常代表大会的不合理的建议。

拥护这个不合理的建议的人反驳我说：“但是我们希望召开非常代表大会，正是因为这符合党的利益，正是因为这样做会帮助党实现它在无产阶级和整个国家面前的义务。”

对于这种说法我的回答是：只有那些生性就很天真或者根本不了解我党“内幕”的人才会觉得这种反驳似乎有说服力。

这些“内幕”完全不是令人愉快的。我们党内两派的斗争已经

进行有年了。起初（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期）两派之間还只在某些組織問題上有分歧。現在却存在着深得像鴻沟一样的、最严重的策略分歧，甚至是綱領分歧。我不打算在这里討論互相斗争的两派誰是誰非的問題，我已經不止一次地就這個問題明确表示过意見。在这里我只要指出：当意見分歧最深刻的两派还在进行这种斗争的时候，頻繁的党代会就根本不会使我們得到任何一小点利益。如果党内实现和平，党代会是可以带来利益的。可惜現在党内和平仍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至少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命运还操纵在“知識分子”手里的时候是这样。

公开这样說是可耻的，然而不把这一点告訴工人却是罪过。“知識分子”中間有很多很多人埋头于派別糾紛。这种人只考虑如何使自己一派得胜，如何使它的“口号”变成党的正式口号。就是这样一些人要求現在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

大家知道，在我党上届代表大会上，过去的“布尔什維克”成了“少数派”。他們不喜欢这种局面。于是竭力要召开新的代表大会。指望在大会上說不定也許能把多数票爭取到他們这边来。假使指望落空，他們一无所失。一旦成功，那他們就得益了：他們就会“当权”。他們就是这样推論的。

当然，一切現代的政党内，任何少数派只要不否定党綱和服从党章，都有无庸置辯的充分权利，可以力求使自己这一派的观点取得胜利。但是它不应当濫用这个无可怀疑的充分权利。如果它把更多的精力用来同党内的多数派作斗争，而不是用在爭取达到全党目标的斗争上，它就是濫用这个权利。如果真这样倒行逆施，那时党的力量就会被內部斗争所抵銷，那时对党說来甚至分裂也比付出过分珍貴的代价的統一有利得多，因为这样可以把以前用在內部斗争上的那部分党的力量解放出来，使党有可能把这部分力量用来进行积极的工作。

我們党内的状况离开这种局面很不远了。內部斗争抵銷着党的力量。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它才不再抵銷这种力量。我們过去的

“布尔什維克”提出召开新的代表大会的要求，这只是許許多多明显的证据之一，它证明这些同志立意要使全党的利益牺牲于自己派别的利益。

不过应当說得更加确切些。这些同志因为醉心于党内斗争，甚至认为党最迫切的利益似乎在于战胜过去的“孟什維克”。因此他们就竭力追求这个目标，而没有問一問自己：即使他們可能胜利，这胜利要花費党多少代价。我記得有一次，在我們党正式分裂的时期，列宁曾經硬要我相信，他本人是全心全意希望同“孟什維克”統一的。我曾經回答他說：“我相信。可您是这样力求同他們統一的，像餓汉力求同一块面包統一那样：您希望吃掉他們。”过去这是千真万确的。至今这仍然是千真万确的。列宁和他的同志們希望倒是希望同过去的“孟什維克”讲和平，不过和平得要个条件，就是这个派别不再作为派别存在。如果这目的还没达到（它绝对达不到），“爱好和平的”列宁就仍然是极端好战的，他就决心要月月召开非常代表大会，直到终于得到著名的“指揮棒”时为止。

我們至今还没有上届代表大会的會議记录，所以党不能好好地了解为什么这届代表大会正是通过了这些決議，而不是通过那些決議。看来应该得让党有一段时间可以用来获得这种必要的知識。然而当問題一涉及“指揮棒”，列宁就很沒有耐心。在这样的条件下召开的代表大会和严肃的事业又有什么共同点呢？

然而党应该致力于严肃的事业。所以，如果它不了解为什么列宁和他的同志們現在要求召开新的代表大会，那就是它的奇耻大辱。我說奇耻大辱是因为由我們支配的經費可以說不只是属于我們。实际上，要知道我們几乎每个月都要大声地向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呼吁：“給我們物质援助吧！”而世界无产阶级也在尽量給我們这种援助，它也在为我们收集自己的“血汗錢”。可是我們呢？我們將接受手上生茧的、正直的人繁重的劳动所挣得的这些錢，并且……并且將把它們耗費在組織那些只有爭夺“指揮棒”的斗争才需要的代表大会上？！这是十足的耻辱。

不行，同志們，光凭下面这一点就不应当这样可耻地浪費我們的經費：这种行为是对我們西方兄弟的嘲弄，而且几乎是对他們的犯罪行为。西方兄弟支持我們完全不是为了讓我們把時間花在派別糾紛上。我們面前摆着一大堆最重大最迫切的具体工作。我們應該全神貫注在这些工作上。我們旧日那些由环境造成、然而到底极端有害的小組习气使我們养成了习惯的那些“知識分子”淘气行为該停止了，早就該停止了。

我們应当越来越堅决地走上广泛的群众运动的道路。为了这个运动的利益，我們現在就不要考虑召开代表大会，重新恢复爭夺“指揮棒”的辯論^①。开这样的大会比讲白公牛的故事^②更坏，更令人厭膩，更沒有內容。只有能够使无产阶级的运动具有新規模的代表大会才是我們所需要的。我們首先應該努力尽快召开“工人代表大会”，实现巴·波·阿克雪里罗得出的这个妙主意。这是最重要的一项实际任务。觉悟工人和真正站在工人阶级立場上的“知識分子”現在都应当致力于解决这项任务。

一切都是你們的格·普列汉諾夫

附言 当我把这封信讀給一位同志听时，他向我指出，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也支持召开非常代表大会的建議。对此我认为必須在这里直接說明，我毫不怀疑我們的新同志——即波兰人——支持这个建議是出于严肃的动机。但是我以为这些同志在这种場合只是从自己的地方观点看問題。如果他們知道非常代表大会会給我們“俄罗斯人”造成怎樣的損害，他們首先就会堅决反对召开这样的大會。所以我很希望我們的波兰同志仔細想想我这封信。

格·普·

（譯自《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十五卷第 323—328 頁）

① 真的，是歌頌这根“指揮棒”的时候了，就像歌頌詩句中和歌曲中著名的“短樵子”一样。——著者注

② 意指說了又說的話。——譯者注

《同志报》上的文章

給觉悟工人的一封信

这封信发表在一九〇六年十月三十一日第一〇一号《同志报》上。在这封短信中，普列汉諾夫提出了同立宪民主党人建立选举联盟的主张。他“像一个党外社会主义者在党外‘社会主义’机关报中提出党外的、非社会主义的、甚至是反社会主义的建議”（《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408頁）。文章发表以后，“馬尔托夫和所有的孟什維克轉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弯，都轉到普列汉諾夫方面去了”（同上第十二卷第2頁），并且引起了数不清的背叛言論。

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和选举运动〉一文的附言》中斥責普列汉諾夫这封信“彻底破坏了国际的革命民主党的原則和党的統一代表大会的決議”，即“正式禁止同資产階級政党結成任何联盟”，认为这是“背叛无产阶级事业”。列宁強調指出，普列汉諾夫在选举策略这个当前对党十分重要的問題上“用他固有的‘快速度、冲击和目測力’奔向我党右翼中的最右翼”（同上第十一卷第255—257頁）。

列宁还在以后一系列的文章中反复地詳細地批判过普列汉諾夫这种荒謬的主张。

同志們！第二届杜馬快要进行选举了。俄国政治自由的事业在很大的程度上将由这次选举的結局来决定。假如政府能够把大

多数自己的人选进新杜馬，或者至少能够把准备为着不大的让步而同政府妥协的那些人选进新杜馬，那时很多人就会說，政府同第一届杜馬作斗争这一着做对了，那时很多人就会相信俄国人民不想要政治自由的胡謔。尤其是那时政府就会有更加强大得多的新手段同我国的解放运动作斗争。

政府懂得这一点，所以它把全部力量都用在选举斗争上。同时应当看到，还在不久以前曾经根本不信任政府的那些居民阶层现在却准备支持它。这些阶层就是被无产阶级“过分的”要求吓倒的大资产阶级和被农民的土地运动吓倒的或大或小的土地占有者。从这方面說，政治自由的事业同一年前比較起来，现在的情况要坏一些。但是另一方面，毫无疑问，政府的反动政策甚至越来越使人民群众中最落后的阶层睜开了眼睛。不过人民沒有組織起来，而政府是有組織的。因此，政府的地位比人民的地位要有利得多。

同有組織的敌人进行斗争，沒有組織是不行的。因此，把我們的力量組織起来乃是我們的第一項任务。但这还不够。打仗必須灵活。我們应该在能够給敌人造成最大創伤的場合下才把自己的力量投下去。为了使我們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我們应当記住，在俄国，除了我們的党——即无产阶级政党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党派准备为政治自由而斗争。这些党派并不会像无产阶级政党一样向前走得那么远，但它們仍然在向前走，所以当它們在向前走时，我們应该为了自身的利益支持它們，因为我們支持它們，也就是扩大我們自己的影响。这一点随时随地都应当記住。

在新杜馬选举的时候特別需要記住这一点。如果我們对待一切非无产阶级党派像对待其胜利对无产阶级說来同样有害的那些党派一样，我們就会犯无法补救的策略錯誤。我們就会使可能支持我們的那些人遭致失敗，而使除了皮鞭和木棒以外我們根本不能期待他們会用什么別的东西对付我們的那些人取得胜利。假使我們这么做，就无异于自己損害自己，背叛自己固有的事业。

选举时我們的行动应当极其謹慎。凡是我們毫无疑问能够通

过自己的候选人的地方，我們可以、也应当同其他党派分开而采取独立行动。凡是我們沒有把握使我們的候选人获胜的地方，我們就應該跟其他願意同我国旧制度作斗争的党派达成协议。要是我們不达成这样的协议，就会发生最有害的混乱现象：例如立宪民主党人在选举中垮台；又如“十月党人”当选，甚至是黑帮分子当选。这是政府求之不得的。它对我們的錯誤将衷心感到高兴。而我們則不止損害自己的事业而已；我們在俄国和国外一切有思想的正直人士的眼里还会使自己蒙受耻辱。

同志們！重要的、决定性的时刻快要来到了。政府的胜败决定于我們的策略。我們要力求使它变得尽可能更明智。而政治上的明智要求我們：凡是为战胜反动派所必需的场合都要同非无产阶级政党达成协议。

我們沒有权利不这样做。如果誰根据誤解了的“不妥协精神”而不願在上述場合同反政府的非无产阶级政党达成协议，他实际上就是支持政府，也就是說他在向自由的敌人看齐。

我认为值此选举临近之际向你們說明这一切乃是自己的公民义务。

格·普列汉諾夫

（譯自《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十五卷第 331—332 頁）

給《同志报》一位讀者的公开答复

这篇“赫罗斯特拉特式的”（《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 362 頁）短文发表在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第一二二号《同志报》上。普列汉諾夫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全权杜馬”的口号，从而把“孟什維主义发展到了頂点”（《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 2 頁）。

和上一篇文章一样，这篇“准拉薩尔式”的論文也引起了布尔什維克的严重抗議。列宁在《孟什維主义的危

机》、《关于崩得机关报上的一篇文章》、《威·李卜克内西一书序言》、《普列汉诺夫和瓦西里也夫》等文章中都严厉地批驳了普列汉诺夫的谬论。特别在《参政院的新解释》（均载《列宁全集》第十一卷）中，列宁更是全面地分析了普列汉诺夫的论点和论据。列宁指出，“全权杜马”口号的“实际政治内容”是“为了模糊人民的思想”，“为了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表面上的统一欺骗工人和全体人民”，“为了背着人民玩弄标榜种种好处的议会把戏”。列宁在批判作者的“代数式”时揭露了他的“诡辩术”。通过同普列汉诺夫的长期的政治斗争，列宁越来越认清了他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典型人物”（同上第394页）。后来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对他的孟什维主义政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作了深刻的批判。

《同志报》一位自称民主派、但是“既非资产者亦非社会民主党人”的读者，用书面向我提出了下面两个问题。

（一）在我看来，应当在哪一个阶段上成立选举协定？

（二）在我看来，左翼政党和极左翼政党的共同选举纲领可能是怎样的？

我倒愿意写一封公开信予以答复。

第一点。既然我国不进行重新投票，那就应该在第一阶段上达成协议；否则协议就是马后炮。

第二点。对于第二个问题，除了四个字以外，没有别的答复，也不可能有的答复。这四个字就是：

全权杜马！

这是一般公式。每个党派都将用它所中意的确定的算术值来取代公式中的代数符号。立宪民主党人不可能像社会民主党人那样设想全权杜马。不过无论这个党或者那个党都需要它。因此，它们必须共同为它而斗争。

請注意，正是因为这个一般公式用代数形式十分确切地表現着現時最迫切的（無論对于“左派”或者“极左派”）政治任务，它才使这两派有可能**完全**保留自己其余一切社会政治要求。拥护这个公式完全不需要預先“削減”这些其余的要求。其所以不需要，因为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本身就是**实现一切先进党派其余一切社会政治要求的**先决条件**。**沒有这个条件**，任何一个要求都实现不了。**只有有了这个条件**，把确定的算术值代入一般代数式中去的斗争才会开始，那时左翼政党才会站到反对极左翼政党的战斗行列中来。然而現時我国暂时只有全权的斯托雷平先生，而沒有全权杜馬。因此現在無論左翼政党或者极左翼政党**必須一致行动**，以反对不願意要拥有全权的、或許还是随便什么样式的人民代表机关的那些党派。这是像二二得四一样昭然若揭的。

我希望，我的这位可敬的通信人会发现我的答复是十分明确的。

現在我想对我们社会民主党員同志們說两句話。

同志們！在某些地区，我們的人至今还显然在犹豫。我們某些人好像都对选举协定有所耽心，然而現在值得耽心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极端党派的教条主义会帮助反动分子把自己的刀子刺进我們不幸的祖国的心臟中去**。对极端党派說来，这将是真正可怕的錯誤。

因此我要在这里重申我在另一个地方說过的話。^①

在政治上再沒有比教条主义更可痛、同时也是更可笑、更可怜的罪过了。**这是弱者的罪过**。

格·普列汉諾夫

（譯自《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十五卷第 333—334 頁）

① 參看本书第 197 頁。——譯者注

是解释的时候了

(給編輯部的信)

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的第一三九号《同志报》上。在上面那篇提出“全权杜馬”口号的“公开答复”发表以后，立宪民主党人“滿意地讀过了”普列汉諾夫写給他們的“情书”，但是还是不允许他“越过前厅一步”（《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298頁）。普列汉諾夫在这篇文章中对《言論报》的“誤解”悻悻然地发了一通怨言，說什么“瞧，多懶的人；比特維尔远一点都拉他不去！”他所謂可以同立宪民主党人坐一节車厢到特維尔去而互不妨碍的說法，实质上就是否定階級斗争。列宁在《普列汉諾夫和瓦西里也夫》一文中指出，“正是这种思想成为同立宪民主党結成联盟，支持任命杜馬內閣的要求，以及大家一起到特維尔去等等的基础”（同上第410頁）。

立宪民主党的主要机关报《言論报》不喜欢我的文章——即一封討論选举綱領的信^①；这个綱領使我們可以用一个共同的代数式（“全权杜馬”）来表达我国左的和极左的党派当前的政治意图。不用說，我对此很感遺憾。

然而《言論报》的不滿究竟在哪里呢？

它认为，选举时不能利用本身包含着“两个互相排斥的算术值”的代数符号。它是这样說明它的这个看法的：

早就有人使用过“全权杜馬”这个名詞，而且是从党派性观点上使用的，这个观点违反人民自由党对杜馬任务的理解。其次，正是宣传“全权杜馬”的思想成了使驅散杜馬具有某种合法性的假象

^① 指上面这篇《給〈同志报〉一位讀者的公开答复》。——譯者注

的一个借口。因此，从人民自由党的观点看来，如果有哪一种口号不仅应该当作模棱两可的东西并且应该当作极端危险的东西而避免使用，这正是“全权杜馬”口号。

“真的，人民自由党从来也不使用这个口号。它对于杜馬能够运用它能够取得的那种权力的方式的理解，是大家都很清楚的。人民自由党没有要求过由变成临时政府的杜馬來行使权力，而是要求由以絕大多数人民代表的信任为依据的杜馬內閣来行使权力。这种提法不仅本身没有包含任何虚幻的东西，而且有个时候差一点就真正实行了。”

試問：为什么立宪民主党的主要机关报认为我所提出的“代数符号”本身所包含的那些算术值不仅彼此排斥、而且互相彼此排斥。（想必这种說法更有力些，不过我觉得好像彼此排斥不能不是相互的。）

坦白地說：我根本不懂这里的道理。

两个人一道沿尼古拉也夫綫从莫斯科出发。一人在特維尔^①下車，另一人則繼續旅行到彼得堡。由于某个原因两人都到北方的巴利米拉^②去或許对他們会更有利一些。

到彼得堡去的那个人也許将爭取自己过去的旅伴跟着他去：“瞧，多懶的人；比特維尔远一点都拉他不去！”但是这里的意思不是說他們的旅途干脆彼此排斥，甚至“互相”彼此排斥？看来不是。看来沒这意思。旅途相同：就是尼古拉也夫綫。不过一人的“最終目的”比另一人近得多而已。不过如此而已。这里談不上什么互相排斥。

杜馬也是一样。人民自由党要求“由以絕大多数人民代表的信任为依据的杜馬內閣来行使权力”。《言論报》认为这办法挺好。我认为：这办法同我觉得是好办法的关系，恰似莫斯科到特維尔同

① “特維尔”是彼得堡涅瓦关的一个茶厅名字。——譯者注

② 巴利米拉是古代叙利亞的名城。“北方的巴利米拉”在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品中指圣彼得堡。——譯者注

莫斯科到彼得堡这两段距离之間的关系。“这一点可以爭論”，——像当年一位同我打笔墨官司的人^①所爱說的那样。但是“互相彼此排斥”看来沒有根据：要知道有我这样的思想方式的人不会反对“杜馬內閣”；要知道他們的政治意图中就包括“杜馬內閣”，像整体中包括部分一样；难道《言論报》不懂得这个道理？如果懂，“为什么乱嚷嚷”呢？

到特維尔去的人**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有理由竭力避开坚决要到彼得堡本城去的人：即如果他耽心后者会这样或那样妨碍他迅速而且平安地到达特維尔。看来我們当前的情况恰好如此。

《言論报》向来不喜欢人民用一定的方式建立和掌握“全部充分的权力”这个思想。^②因此它并不希望杜馬**单独**掌权，而希望杜馬**只有一半**权力。它也不乐意同坚持人民全权思想的人达成甚至最短时间的協議；它怕这样的協議（即便時間很短）可能扩大它认为危險的思想的力量。而且它十分害怕那些本来就非常害怕左派同极左派任何联盟的反动报刊会責备立宪民主党同“爆炸分子”或“革命分子”等等結盟。所以立宪民主党人的主要机关报不仅急忙“弃絕撒旦”，不仅急忙“向它吹胡子和啐口沫”，而且装出一付“严肃的”面孔邀請“撒旦”弃絕自己的事业，向自己啐口沫和吹胡子。它这样做自然不是指望“撒旦”接受它的提議。它只是要安慰某些人，打消他們提出新責备的理由。坐在《言論报》編輯部的是一些“尖”的政治家！

但是不管《言論报》的政策多么“尖”，无可怀疑的是立宪民主党同极左的党派的協議将被它弄得十分困难了。而且如果自由事业因此受害（“哪里尖，那里就被突破”^③），如果那些希望統治俄国、窒息（用涅克拉索夫的说法）“奴隶們的呻吟于阿諛和皮鞭呼嘯声

① 指米海洛夫斯基。——譯者注

② 參看我这里所引用的第二二六号的社論第二版第二栏。——著者注

③ 这句諺語指最脆弱的地方最易摧折。“尖”这个词的原文是 тонко，作“尖細”；“精明”；“薄弱”讲。普列汉諾夫利用这个双关的意思批評立宪民主党人的“现实主义政策”。——譯者注

中”的人会从这里得到便宜，那么要对这件事負責的将不是极左派的教条主义，而只是左派的“清醒的头脑”。

俄国民主派应当懂得这个道理；整个文明世界的民主派应当懂得这个道理。

《言論报》硬說所有信奉杜馬单独掌权論的人都想“搞垮”那个即将选出代表的杜馬。它根据什么理由这样說——我完全不知道。我无条件地拥护全权杜馬。但我认为搞垮我国現时的人民代表机关是**犯罪的**。我认为希望“搞垮”未来杜馬的是黑帮分子，我們“不在其数”。

誠然，毋須隱瞞，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間有些人是从相当“古怪的”观点来看待我們之参加当前选举的。但是誰不知道現在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根本不贊成例如像某个斯捷潘諾夫之流的人的策略观点呢？为什么《言論报》把所有拥护全权杜馬的人都收在一个口袋里呢？

它的意思好像认为真正的、“地道的”社会民主党人在政治上根本不能超过斯捷潘諾夫。但这只說明它对待事物的态度是偏頗的。

《言論报》說，像我們已經看到的，它对問題的提法“有个时候差一点就真正实行了”。翻譯成比較明白的話，这就是說，主张杜馬掌握一半权力的党有个时候差一点就有了**全部权力**。我們情願相信这个話。但是，第一，这根本不是反对我的綱領的理由。第二，我可以老老实实說，《言論报》提到的这件事对它的著作手法可惜并非沒有影响；它有时竟使用起《政府通报》的腔調。而这是完全不能同意的。因为無論如何，主张杜馬有一半权力的党暂时仍然处在——我承认，只是暂时——“到莫斯科还差五俄里”的那种人的地位。无庸爭辯，旅行者同首先成为国都的城市^①之間的距离是很小的。但要知道他毕竟还不是莫斯科人……

① 即莫斯科。——譯者注

《言論報》认为必須提醒我注意，我违反了“一九〇四年十一月著名的(?)巴黎協議”。不瞞你說，有这么回事。《言論報》认为我这样做有原則根据。对的嘛就是对。我当时(向来都这样)是本着**合目的性原則**的。“著名的”巴黎協議在我看来不合目的。而且由于許多原因我至今都认为它是不合目的的。“这一点可以爭論”，像当年一位同我打笔墨官司的人(現在已經死了)所說的那樣。但是这怎么会改变此刻值得我們注意的这个協議問題的地位呢？我又不懂！

現在我想提醒我們的工人同志們注意下面的意見。

如此坚决地維護杜馬有**一半权力**的思想的党，本来應該如实地称自己是**人民半自由党**，这是明明白白的。而同样明白的是这样的党不可能成为无产階級利益的表达者。因此当这个党想要同社会民主党进行爭夺对工人階級的影响的斗争时，你們就有义务无情地暴露它的不彻底性。但是請別忘記，有觉悟的工人同志們，履行这个义务时不要妨碍你們履行你們的**另一个**同样无可怀疑的义务：**即有义务利用立宪民主党爭取人民半自由的努力作为达到人民自由的一种手段**。由于后一种义务，凡是同反动派的斗争要求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选举協議的地方，和凡是即使你們直接地和公开地声明自己是**全权杜馬**的拥护者他們也不怕同你們成立这样的協議的地方，你們都应当达成協議。任何别的策略都会是有害的和反革命的。我知道，宁願要黑帮杜馬、而不要立宪民主党杜馬的同志們(遺憾的是我們中間还有这样的……怪人)具有善良的願望。但是常人說，**整个地獄是由最好的願望鋪成的**。尽管《聖經》中对于这一点沒有作过任何說明，我却十分願意认为这是真理。

(譯自《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十五卷第 335—339 頁)

旧調新唱

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九〇七年七月二十五日的第三二七号《同志報》上。作者从孟什維主义的观点出发批評了

阿維洛夫抵制第三屆杜馬的主張，同時又繼續攻擊列寧的文章，指摘阿維洛夫重彈“所謂‘布爾什維克’派”的“舊調”。

在第三百一十六號《同志報》上，波·阿維洛夫先生登了一篇文章，題目是：“論第三屆杜馬選舉”。

文章反對爾·馬爾托夫發表的下面這個意見：“左派政黨”應該參加這次選舉。雖說波·阿維洛夫先生的論據很軟弱，但這些論據**本身**很有特色。一個關心“左派政黨”的人不應該對它們不加注意。

阿維洛夫先生在反駁爾·馬爾托夫時還表現出一種愉快的信念。他確信人民對選舉漠不關心不是由於感到疲倦，而是……“由於對可能產生新的高漲的一種絕望情緒”。但是這種愉快的信念究竟有什麼根據呢？

可惜，這仍然是波·阿維洛夫先生的秘密！因為他對這一點半句話也沒有說。他在敘述，而不是證明。我們且試着把他的論據中的這個空白填補起來。

讀者，您記得我們的抵制主義者在第一屆杜馬選舉時說過的話嗎？我清楚地記得。他們說：人民對杜馬不抱任何“立憲幻想”，人民要求建立性質完全不同的代表機關，因此參加選舉不僅多餘，而且是有害的行動，某些人甚至說是**背叛**行為。

請問，抵制主義者的這種信念有沒有被往後的事變所證實呢？沒有，完全沒有。

往後的事變清楚表明：恰恰相反，人民對第一屆杜馬有**很多的**“立憲幻想”。

這一點，在這屆杜馬驅散以後甚至許多抵制主義者也承認了。在小冊子《杜馬的解散和無產階級的任务》^①中，我國所謂“布

① 參看《列寧全集》第十卷第94—113頁。——譯者注

尔什維克”派的一位最“著名的”政論家写道：“人民，即广大的居民群众到一九〇六年时（！）大多数（sic！^①）还没有成长”^②到具有抵制主义者硬加在他们身上的那些思想；“看来，人民……还需要有……立宪民主党杜馬的經驗”^③。换言之，这就是說，抵制第一届杜馬的人們完全不正确地設想了人民的心理。

就是根据这一点他們愉快地相信，一种会扫除杜馬并且用另一种代表會議来代替杜馬的“高涨”即将到来。因此在这里，全部問題在于有一种把希望当成了和宣布是现实的心理錯觉。

这是不小的錯誤。但是对这种錯誤的認識并没有使他們——至少没有使他們中間最“强硬的人”——变得謹慎些。上述小册子的作者刚一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就急忙使讀者相信，在解散第一届杜馬以后，“现在，甚至最愚昧的农民也深深地体会到：任何杜馬都是沒有用的，如果”云云云云^④。作者就根据这一点把和竞选的宣传工作毫无共同点的某种“发动”規定在“八月中旬或八月底”^⑤。希望再一次被当成了现实。这样一来，对政局的整个前景仍然是建立在这种心理錯觉的基础上。

我不知道我引证的这位作者从第二届杜馬的經驗中是否学会了什么东西，如果学会了，那又是学的什么。现在他也許已經进步了很多，所以他也会觉得波·阿維洛夫先生的論据是軟弱的。

可是阿維洛夫先生本人却仍然完全忠实于把希望冒充是现实的那个方法。正是这个方法使他产生了愉快的信念，确信我国相当大一部分居民对待当前的第三届杜馬选举的漠不关心态度意味着有可能发生新的“高涨”。

不过，平心而論我得承认，这个我們早就熟識的旧方法在波·阿維洛夫先生那里多少有一点新鮮的东西。

① 原文如此！——譯者注

②③ 參看《列宁全集》第十卷第96頁。——譯者注

④ 同上，第100頁。——譯者注

⑤ 同上，第111頁。——譯者注

以前的抵制主义者爭辯說，人民有高昂的情緒，他們的政治覺悟高。

現在波·阿維洛夫先生援引……人民的絕望。這至少出人意外。所以我稱它是新唱，雖然彈的是舊調，因為他把自己的願望當作了現實，並且鄙視所有那些不伙同他一起犯這種錯誤的人。但是，假定波·阿維洛夫先生是對的，假定人民現在的確沒有厭倦政治的表示，而是對政治絕望。從這裡，即從存在着絕望情緒中，是否可以得出結論，說有可能“產生”新的高漲呢？

整個問題都在這裡。

而這個問題的解決遠不像波·阿維洛夫先生以為的那么简单。

有各式各樣的“絕望”。請問，如果居民不僅對杜馬“絕望”，而且對人民代表制度也一概“絕望”呢？要知道，那時，由於近五年的事變而大大動搖的那種對舊日神靈的信仰就會活躍起來。看來波·阿維洛夫先生根本沒有作過這種考慮。然而考慮這一點並不是毫無根據的，因為許許多多俄國居民都有一些天真的幻想，這些幻想同他們頭腦中的杜馬觀念是相關聯的。這些居民（主要是農民，不過不只是農民）都把杜馬看成是像新來的“老爺”那樣的東西，它一來到就立刻“評判”一切。

他們在政治上十分落后。他們完全不懂得，議會並不是人民力量的泉源。反之，人民才是議會力量的泉源。現在，當他們發現新來的“老爺”暫時還沒有能力“評判”任何事情的時候，他們就對議會嗤之以鼻，再不過問它將來的命運如何了。

這種“絕望”只會有利於黑幫分子。看來在一定的程度上黑幫分子正是把實現自己政治計劃的希望寄托在它身上。

自然，我國社會政治生活的矛盾遲早一定會把甚至最落后的那部分人民從對人民代表制度的思想抱“絕望”態度的死胡同里引出來。但是什麼時候引得出來呢？我們必須使這種情況不是“遲”發生，而是“早”發生，儘可能的早。而且正因為這樣，我們應當做

我們所能做的一切，以便重新使人民對杜馬的興趣活躍起來，鼓舞他們積極參加選舉。參加選舉對他們說來就像新的學校、新的經驗一樣必不可少，因為這種經驗比任何時候都更清楚地向他們說明當前我國的“經濟”同當前我國的“政治”的聯繫。

波·阿維洛夫先生很可能要對我說：我不了解現時人民的情緒；現時人民的“絕望情緒”正在被政治覺悟的光芒所驅散。但是他這種說法只不過再一次證明他仍然孜孜不倦地，仍然始終不渝地決心重犯抵制主義者把希望當作現實的舊錯誤。

也許他還會責備我缺乏信心。我們這裡早就有這樣一種風尚：一個人越是輕信地和輕率地下判斷，人們就越願意把他當作一般“勞動人民”的利益、特別是無產階級的利益的“極端的”和最可靠的保衛者。但是我個人從來不把政治上的輕率看成是政治上的功績。過去我同我們的“布爾什維克”之所以發生意見分歧，恰好是因為我一貫認為必須把希望同現實分開。如果波·阿維洛夫先生用譏笑的口吻問道：“教育者”先生們對群眾的教育程度豈不是估計過低了些麼？那我就要用另一個問題答复他：抵制派先生們對這種教育程度豈不過於誇大了麼？對於這個問題，前幾年的經驗，正如我們已經看到了的，根本不容有任何懷疑：抵制派先生們迄今為止經常都是用最幼稚的方式誇大了這種教育程度。這就是他們的根本錯誤，這種錯誤使得他們的全部策略具有一種特殊的色彩。

請讓我指出一點：自然，我也不想去懷疑我國的某一部分居民已經從最初兩屆杜馬時期所發生的事件中作出了必要的政治結論。我不怕別人責備我偏愛奇談怪論，我甚至要說，如果看來我國的某一部分居民對於驅散第二屆杜馬仍然表示漠不關心，那麼這種情況之所以發生，唯一是因為他們十分清楚地理解了當前我國的政治形勢和當前我國政治力量的對比情況。但是部分不是全體。而且我所指的部分並不是大到足以決定整體的命運。這就是問題的關鍵！但是這個部分可以影響全體，提高全體的政治覺悟，

从而縮短它同全体的距离。

从这个意义上說，参加选举不但有益，而且簡直必需。假使我們不这样做，我們就沒有履行自己直接的公民义务。我們早就該懂得抵制思想(像培根所說的一样，不过他談的是另一个問題^①)乃是把自己献身給上帝的不生育的处女。

(譯自《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十五卷第 340—343 頁)

沒有根据的担忧

一九〇七年七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會議”(“第二次全国代表會議”)通过了一項“关于参加第三屆国家杜馬选举問題的決議”(參看《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 44—45 頁)。

普列汉諾夫这篇发表在一九〇七年九月十二日第三六九号《同志报》上的文章就是为了攻击党的決議而写的。他称決議是一个“没写好”、也“没想好”的“选举綱領”，因为它“会削弱自由資產階級在反对旧制度的斗争中的陣地”。普列汉諾夫甚至号召党员不执行決議，而立宪民主党人大送秋波。他断言，党不会接受这项決議，“基捷韦帖尔先生的担心……是沒有根据的”。

不久以前，基捷韦帖尔先生責备我們社会民主党，說甚至当現在反动派要根除任何解放傾向的时候，它不是把反对这个肆无忌惮的反动派的斗争，而是把同立宪民主党人的斗争当作自己的目的。基捷韦帖尔先生举出社会民主党的选举綱領来证明他这个責备有道理。而且他向有自由思想的俄国“居民”暗示說，如果在选举时支持一个不認識自己对国家的首要义务的政党，那是不合

^① 指經院哲学。參看培根：《新工具》。——譯者注

算的。

我毫无替我們的选举綱領辯白的意思。我看这綱領沒有写好。說得重一点、清楚一点：我认为它不但沒写好，也沒想好（这当然是主要的）。同时我十分清楚，我这样說決不是對我們党的恭維：沒有想好也沒有写好的选举綱領是一种錯失，它证明我們党内并非百事如意。然而虽說我絲毫不願意对这些消极現象默不作声，但是我认为事情远不是这么坏，像另一个“居民”在讀了基捷韦帖尔先生的文章并且了解到我們的选举綱領的缺点以后可能以为的那样。

我們这里并非只有这种不好的选举綱領，此外再沒有別的了。我們有国际无产阶级的传统；我們有我們天才导师的榜样。我认为这个榜样對我們所有的人說来都会是同样——或者几乎同样——有說服力的。

我曾經不得不为了答复另一个問題引证这个榜样。現在，我认为再一次引证一下是不会有碍的。

当年卡尔·海因岑向德国共产主义者提出了一个和基捷韦帖尔先生現在向我們党提出的責备相像的責备。他說，德国共产主义者与其說在同封建反动派作斗争，不如說在同自由资产阶级作斗争。这是一八四七年的事，那时旧的、多头的德国专制制度还没有受到挫折。对于海因岑先生的責备，馬克思曾經回答过如下一段极有教益的話：

“德国工人不仅非常清楚，资产阶级必将比君主专制對他們作出更大的让步，而且非常清楚，为了自己的工商业的利益，它会违背自己的意旨为工人阶级創造团结的条件，工人的团结就是工人胜利的首要条件。”^①

不言而喻，当馬克思說“德国工人非常清楚”的时候，他本来的意思是想說：有觉悟的、先进的德国工人。在今天的俄国，这些工

^①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346頁。——譯者注

人的数目同全体无产阶级群众的比例并不会低于、而无疑是高于四十年代末期德国的比例。同时我要問一問这些先进的俄国工人：**他們**現在是不是知道六十年以前——用馬克思的話說——**德国工人**非常清楚的道理呢？他們是不是知道他們根本沒有任何理由认为旧制度粗暴的压迫胜过资产阶级的直接統治呢？他們是不是知道资产阶级违背自己的意旨为无产阶级創造团结的条件以及它不得不要比君主专制对他們作出更大的让步呢？簡言之，他們是不是知道自由资产阶级对旧制度的胜利会加速他們自己对自由资产阶级的胜利呢？如果这一切都是他們所知道的，（我认为这不可能始終是他們所不知道的），那么他們在选举时期的策略就自然而然出来了：他們应当像避免可怕的錯誤和最大的耻辱一样避免任何一种会削弱自由资产阶级在反对旧制度的斗争中的陣地的步驟……

誰認識了这个简单的、明白的和无可爭辯的真理，誰就不会被甚至最不好的选举綱領支使得糊里糊涂：无论是这綱領的种种邏輯上的疏忽，或者是它的笨拙的、教条主义的空談，都不会妨碍他繼續忠实于現代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和国际无产阶级的传统。

这个无可爭辯的真理简单明了。因此人們可以希望，在必要的时刻它会用自己鮮艳的光芒照亮甚至最頑固地坚持笨拙的教条主义思想的头脑；当事情已經不能限于派别的爭执和“阴谋”，而必須完成生动的事业和使自己承担巨大的政治責任时，甚至这样的头脑也会变得比較容易了解正确的观点。我們中間誰不会一想到他可能給黑帮分子效劳就不寒而栗呢？但是如果这样的希望并没有得到证实，如果教条主义者原来是不可救药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毕竟还不能认为正确策略的事业沒有指望了。不錯，能够理解上面这个简单明了的真理的人在我們的队伍中要比不可救药的教条主义者少得多。但在沒有沾上派别狂的工人中間这样的人却特別多。他們会不理睬教条主义者而把局面挽回过来。对于他們說来，**我們学說的精神**将比某項決議或一般說来党的某个文件的

文字具有更强大的影响。所以我毫不諱言我們的选举綱領的缺点。我认为我有权把基捷韦帖尔先生的担心称为沒有根据的。俄国无产阶级的党不会忘記自己的义务。無論它的某些党员是怎样的，它不可能是、而且自然也不是黑帮分子的帮凶。

(譯自《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十五卷第 346—348 頁)

关于我同基捷韦帖尔先生的一致

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九〇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第三七九号《同志报》上。普列汉諾夫在这篇文章中为他的反对党代表會議決議的“叛党”(《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 117 頁)言論进行辯护。

第二百一十六号《言論报》的社論对我的文章《沒有根据的担忧》(第三百六十九号《同志报》)說了一些話,这使我拿起笔来作下列声明。

《言論报》叙述了我的文章的**某一部分**内容以后,在結語中喊道:

“好一幅图画啊! 一个党的領袖公开反对党的綱領,同意政敌的意見,說照这个綱領进行选举有危險”。(《言論报》,第二百一十六号社論)

图画的确妙。只可惜画家太脫离了他想要(或者假装想要)描繪的那个现实。

我认为我們的选举綱領不但沒写好(这还不糟糕,因为scripto-*toves nascuntur!* ①),也沒想好,甚至更糟得多。我曾經认为,不把自己的意見告訴关心我党事务的讀者,这既不允許,也不應該。我又认为,出現坏的选举綱領这个事实說明我們党内并非事事順遂。

① 画家是天生的! ——譯者注

大家自然也都知道，我以前不止一次地指出过党内这种不順遂的現象。但是基捷韦帖尔先生說，根据我們的綱領进行选举会有危險，或者确切些說，要是选举人投我們党的票，他就犯了錯誤，这就完全不同意了。恰好相反！基捷韦帖尔先生曾經根据我們最近的选举綱領的某些可惜是无可怀疑的缺点对选民說：“支持社会民主党人是危險的”。于是我也当着选民的面反駁他說：“沒有危險，基捷韦帖尔先生的担忧沒有根据。我們党同反动派作斗争时一貫履行自己的直接义务。这有国际无产阶级的全部传统作保证。这有我党学說的整个精神作保证。一旦有事这种精神肯定要比某个党的文件的文字更有力量。”如若基捷韦帖尔先生現在发现我說得对，我是很高兴的。但那时就得把图画画成另外的意思。就得說：瞧，基捷韦帖尔先生担过忧，普列汉諾夫先生的文章消除了他的担忧，他現在认为，选民完全可以放心投社会民主党人的票。这样的图画就有意思了。可惜的是我很担心，这位现实主义画家（且不說那些想入非非的画家）暂时还根本不想画这样的画。我觉得，好像我同基捷韦帖尔先生之間現在和以前一样看法并不一致。

我认为必須指出这一点。因为某些政治上不成熟的人讀了《言論报》的文章以后或許会感到不安。我很遺憾；只是現在，只是本来可以收到这篇文章以后几天才收到它。在我們俄国，可不能同政治上沒有成熟的人开玩笑。因为他們在我国时常創造历史，不过得清楚，他們把历史創造得一团糟。

（譯自《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十五卷第 354—355 頁）

这 可 能 嗎？

普列汉諾夫在这篇发表于一九〇七年九月二十六日第三八一号《同志报》上的文章中攻击了列宁的著名小册子《两个策略》和莫斯科布尔什維克关于合作社組織的決議。

列宁写道：普列汉诺夫“利用糾正譯文的手段来抹煞有两种策略存在这一问题的本质，这就是害怕涉及爭論的实质”，他“抹煞一八四八年德国的工人运动中有两种趋向存在的问题，一种是波尔恩（我們的經濟派的亲属）的趋向，另一种是馬克思主义的趋向。”（《列宁全集》第九卷第125頁注1）

第二百二十五号《基輔思想报》“党的生活”栏从《露西报》上轉載了下面这样一段話：“正在举行的莫斯科社会民主党組織全区布尔什維克大会提出的第一个議题是党对合作社运动的态度問題。經過長時間的討論，大会議決：宣布抵制所有的合作社組織，并且在工人中間进行反对这些組織的宣传工作。”

讀了这一段的确惊人的話以后，我就留心，看是不是能在报刊的什么地方找得到反駁它們的話。但我一直沒有遇到任何反駁。这不由得使我产生一种想法：《露西报》报道的消息是真实的。可是这消息太……不可思議了，要相信它到底很勉强，所以我要在刊物上提出一个問題：

这可能嗎？

我当然很清楚，我們的“布尔什維克們”远不是出色的策略家。我当然知道，他們在对待“非党”工人組織的态度方面有許多严重的过失。比方我知道他們过去就一直不承认工会的重要性，連他們現在这样多的承认也沒有。我清楚地記得十分“著名的”布尔什維克尼·列宁的小册子《两个策略》。在这本书的尾巴上有一段关于所謂拉攏落后群众的孟什維克的“經濟主义”^①以及关于他們同一八四八年相当著名的德国活动家斯蒂凡·波尔恩的所謂一致^②的十分可笑的議論。这个斯蒂凡·波尔恩的真姓名是布特米尔赫。我們这位可敬的作者由于不可原諒的无知天真地把它翻譯成**酸牛**

① 參看《列宁全集》第九卷第125頁。——譯者注

② 參看上书第123—125頁。——譯者注

奶。^①自然，我也沒有忘記過“布尔什維克”對待工人代表大會思想的極端否定的態度。但是竟然要宣布“‘抵制’所有的合作社組織，並且在工人中間進行反對他們的宣傳工作”，這甚至對“布尔什維克”，無論你們怎樣說，也太過分了。所以我建議他們的莫斯科的代表們或者駁斥《露西報》報道的消息，或者公開說明他們這個不可思議的決議是由于什麼以及怎麼樣產生的。這個決議倒使人想起昏憤剛復的大官烏格留姆·布尔車也夫攔截河流的令人啼笑皆非的努力。

現時國際無產階級對待合作社組織的態度——其實也就是對待上面引證的這段《露西報》的報道中大概也談到了的那些消費合作社的態度——已經弄得十分明白了，看來在我們俄國不應當對這個問題再有任何重大的誤解了。合作社當然解決不了“社會問題”。但是它們能夠成為，也應該成為幫助無產階級達到它的偉大歷史目的的運動的一個因素。光憑這一點，有覺悟的無產者代表就沒有權利“抵制”這些合作社。如果有人工人在工人中間傳播對於合作社在無產階級解放運動中可能起的作用的不正確的、夸大的看法，如果（例如）合作社思想的鼓吹者硬說，“消費組織”（像當年德國無政府社會主義者所說的那樣）是一種使僱傭勞動從資本的枷鎖下解放出來的最可靠的手段，那就必須同這種謬論作堅決的鬥爭。全部問題在於怎樣進行鬥爭。對自己的論敵嗤之以鼻決不等於駁倒了他。而“抵制”現在在我們無產階級中間傳播得如此迅速的合作社，恰好就意味着對那些希望在工人中間傳播關於合作社問題的不正確看法的人嗤之以鼻。採取這種“急進的”抵制政策，結果就出現了一種情況：對組織起消費合作社的工人影響最大的恰好就是那些通過自己的宣傳模糊工人的覺悟而非提高這覺悟的人。“布尔什維克們”再一次同自己的目的發生了矛盾。他們再一次本來要走進一間房子，結果按照他們那個令人遺憾的習慣，卻走進了

^① 關於這一點，參看一〇八號《火星報》的短文，《列寧怎樣加深了恩格斯》。——著者注〔參看《列寧全集》第九卷第125頁注1。——譯者注〕

另一間房子。干嗎要这样做呢？

最后，**抵制消費合作社**，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他們不买任何东西么？經常只同敌視这些合作社的小店鋪主人打交道么？如果这样（請注意，我是說**如果**这样；我并不作肯定，我是問如果这样），那可真是駭人听闻！一个自认为要提高“工人觉悟”的人是根本不应当采取这种所謂策略的。这种“策略”同德国人称之为工賊的那些不幸的、十分落后的或者被貧困弄得道德淪喪的人們的策略有着令人十分失望的一致性。“布尔什維克”啊，布尔什維克！

誠然，为了使消費合作社繁荣起来，必須有一定的政治条件。这些条件暂时在俄国还不存在。但是要知道，正是暂时在我国还不存在的条件也是工会的繁荣所必需的，而工会**無論如何**毕竟已經变成了我国工人階級发展的巨大因素。这是值得考虑的。

既然类似《露西报》加在莫斯科“布尔什維克”身上的这种錯誤不光只損害了“布尔什維克”，而是損害了整个工人运动，所以我們中間任何人都不能用漠不关心的态度对待关于他們这种新的策略錯誤的消息。因此，很希望莫斯科的“布尔什維克”在刊物上公开答复我：这个不可思議的消息是真实的么？

这可能嗎？

（譯自《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十五卷第 356—358 頁）

“孟什維克”講話！

（致我的党内同志們的公开信）

普列汉諾夫在这篇发表于一九〇七年十月六日第三九〇号《同志报》上的文章中繼續为他的《沒有根据的担忧》辯护，大肆攻击党代表會議的決議，同时对于孟什維克沒有出来公开支持他的反党言論表示不滿。

我不得不向你們提出一个并非对我个人而是对我们大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问题。

这个问题同我们的敌人根据中央委员会内的“布尔什维克”就我的《没有根据的担忧》一文投票通过不表赞同的决议这个事实所作出的那种结论有关系。

我请你们注意，我想同你们谈的正是这些结论，而不是那决议。

那决议不会使得我拿起笔来。像我们的“布尔什维克”所通过的一切决议一样，它自然不但写得不好，也想得不好！但是人人都有权写不好的决议，想不好的决议。只要不滥用这种权利就成了。我看*резолюция en question*^①中就没有什么滥用权利的地方。

它宣布我的文章对党有害。假使发表这种意见的人自己的著作和活动我觉得是有益的，这种意见就会使我感到很伤心。但是我认为，“布尔什维克们”的著作和活动，由于其中表现出种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特点，对我国的工人运动是极有害的。因此，我就用不着为决议中所发表的意见感到伤心了。况且我向来都公开地对“布尔什维克们”的淘气行为表示自己的看法。我又为什么要对“布尔什维克们”认为无需隐瞒他们对我的行为的意见感到伤心呢？应当公平。^②

但是“布尔什维克们”所通过的决议给了我们党的敌人一个把柄，他们得出结论说，我在这篇不得“布尔什维克们”赏识的文章里所发表的意见，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发表这种意见好像就使我处于近似贝壳流放^③的地位。正是这个结论迫得我向你们写一封

① 这个成问题的决议。——译者注

② 某些人大概以为《关于我同基捷韦帖尔先生的一致》这篇短评是对“布尔什维克”的决议的答复。我是在短评寄往《同志报》编辑部之次日才知道这决议的。——著者注

③ 贝壳流放——在古代希腊，放逐危害国家的公民时要举行秘密投票，投票是用写上被放逐者的名字的贝壳来进行的。——译者注

公开信。也正是这个結論迫得我大声疾呼：“孟什維克講話”！

表面上这个結論挑不出邏輯錯誤。你們在沉默。因此，可能以为你們贊成“布尔什維克們”对我的文章所发表的意見。如果你們也同意它，那我的确是孤单的，虽說沒有到貝壳流放的地步（离这种地步自然还很远），但在某种意义上毕竟是孤单的。

政治上孤单的人处境是难堪的。可也只有刚落到这境地的人才会有难堪的感觉。我已經习惯了；我已經学会如何忍受这处境了。我也决不会用抱怨自己政治上处境孤单，用言詞去打扰广大的讀者。A quoi bon?①

問題不在我，而在党。你們的沉默不是損害我，而是損害党。

說它損害党，是因为它使得我們的敌人对“普列汉諾夫事件”所做的結論外表上看来似乎是正确的。

我在自己的文章中說过，我們每个人一想到他的某个錯誤可能使黑帮分子取得胜利都会不寒而栗。

我也說过，选民們沒有理由担心我們會犯这种錯誤，因为我們不只有不好的选举綱領，此外就沒有別的了，因为尽管这綱領有缺点，我們党还是善于履行自己的伟大的政治义务。我曾經对选民說：在决定关头党会按照我們全部学說的精神行动，而不是按照党的某个文件的文字行动②。

“布尔什維克們”憤怒了。他們从自己方面說也是对的。从他們的观点看来，在我們学說的精神和我們最近的綱領的文字之間沒有任何矛盾。从他們的观点看来必定觉得，綱領完全說明了只有政治上的睿智才能說明的我們这个选举策略問題。从他們的观点看来，除了綱領所推荐的策略以外，不能贊成任何別的选举策略。对这个策略的任何修正（很抱歉，我正是暗示必須用行动对它作某些修正），从这个观点看来，都不能不认为是多余的、有害的、应受斥責的。

① 何苦来？——譯者注

② 参看本书第 289—290 頁。——譯者注

Wer A sagt, muss auch B sagen.①

“布尔什维克”从自己方面說是对的。然而从你們方面說又怎么样呢？“布尔什维克”对不对呢？

要是對，那我的确是孤单的。那时，我不发表自己这篇在此种場合下注定要成为荒漠呼声的文章，的确是好一些。

但在這種場合下，再說一遍：糟糕并不在于我竟然是孤单的，也不在于我的文章竟然是无益的，而在于选民們（說得更确切些，某一部分选民）就会不再理睬我們党了，因为他们們认为它的政治观点不符合当前绝对必要的和刻不容緩的任务。

即便这样其实也还不糟。这还只是一半糟。真正糟糕的是长期来党一直脱离了許多它可能使之也应当使之同情自己的人。

自然，如果你們也认为“布尔什维克”是对的，如果你們忘記了还在不那么久以前比方就我們的党团在第二届杜馬中的活动而同他們进行的那些热烈的爭論，那么你們是不能不沉默的，虽然你們的沉默使我們的党失去了某些可說构成它的历史财富的同情。

但是，如果你們不贊成“布尔什维克”的意見，如果你們沒有忘記我們同他們的爭論，如果你們像我一样认为这些爭論还远远沒有結束，认为必須用行动對我們的选举綱領作一定的修正（請注意，我指的是例如尔·馬尔托夫曾經論及过的某些同黑帮分子作斗争时所必需的选举協議），那时你們的沉默就不但有害，而且根本不可理解。

或許你們认为，最好不在选举时期暴露你們和“布尔什维克”之間存在的意見分歧么？或許你們想做外交家么？这样的外交家可是很糟糕的啊！

要使选民对待我們党在为俄国的发展服务的事业中所提出的那个观点能够采取自觉的态度，必須把我們的思想的全部内容都告訴他們，而不是只把某些内容告訴他們。只有这样，选民和我們

① 誰說到一，就要說二。——譯者注

才会有合理的和牢固的关系。只有这样，我們将来才能指望他們自觉地支持我們。最后，只有这样，你們“孟什維克”才可以期望你們的策略观点会获得胜利。假使你們当真是出于外交考虑才表示沉默，你們的外交就会成为某种外交上的自杀行为。

但是你們不应当有自杀的任何念头。你們必須生活、行动、呐喊、抗議、批評、斗争。真理在你們这边；胜利也将属于你們。

打破你們这种奇怪的和不适当的沉默吧。讲吧！給那个不是我的古怪念头而是生活本身向你們提出的“棘手的問題”一个“直率的答复”吧！

“孟什維克”讲话！

对你們忠心耿耿的、但完全不是“耍外交手段的”

格·普列汉諾夫

（譯自《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十五卷第 359—362 頁）

好的就是好的

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九〇七年七月二十日第四〇二号《同志报》上。

一九〇六年七月底以来，普列汉諾夫成了《同志报》經常的撰稿人。《同志报》形式上不屬於任何政党，实际上是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同年十月，列宁曾經明确指出，“無論从理論上考虑，还是从政治上是否得体或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实践来考虑”都不能允許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报纸的工作（《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 245—247 頁）。因此，布尔什維克一直严厉地譴責普列汉諾夫在《同志报》上发表的恶毒的反党言論。彼得堡委员会还通过了一项譴責普列汉諾夫的行为的決議。这篇文章就是对彼得堡委员会的反噬。普列汉諾夫“造謠”

說，《同志報》是左派聯盟的機關報。他用“庸俗的無政府主義”態度“嘲諷工人黨的紀律”以“博取自由主義者更大的歡心”，借口不能背叛原則來“掩飾自己的叛黨”。同時，儘管他在努力製造分裂，但是他却最怕直言不諱。（參看上書第十三卷第116—117頁）

一個公正的人最高興的事莫過於有機會對自己的論敵說公道話。我就是這樣的人。所以我懷着最滿意的心情拿起筆來對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彼得堡委員會不久前所通過的一項決議表示我感到愉快的驚訝。

決議說：

“彼得堡委員會歡迎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訓誡格·瓦·普列漢諾夫的決議，因為他變成了資產階級報紙的固定撰稿人，並且竟敢在他最近的文章中公開地從這家報紙的版面上號召破壞黨在選舉運動中的紀律。彼得堡委員會認為，普列漢諾夫同志的這種作法，和他在資產階級報刊上所有的反黨言論一樣，應當受到黨員們最嚴厲的斥責。”

我簡直沒法形容這個決議在我心裡引起了多麼愉快的感受。它的矛頭固然對着我。但是第一，公正高於一切。第二，就拿這決議的矛頭對准我來說，其中根本沒有什麼新貨色。我很知道，在布爾什維克看來，我的《沒有根據的擔憂》一文應當受到嚴厲的斥責。

其實這篇文章不也一樣麼？我和“布爾什維克”之間的意見分歧非常大，所以我的一舉一動他們都必定覺得有害。反過來，我對“布爾什維克”的活動，就其中表現出“布爾什維主義”的特點而言，也是大搖其頭的。所以，如果他們忽然想贊成我的意見，我就像福基昂^①那樣問他們：“難道我說過什麼荒唐話嗎？”但如果這是對的（實際上也的確是對的），那就很明顯，彼得堡委員會對我提出的

^① 福基昂（約生於公元前四〇二年，死於三一八年），古代雅典的名將、統帥和國務活動家。——譯者注

斥責只會使我更相信自己有理。因此，對於決議的這一方面用不着多費唇舌。

但是這裡也有我覺得非常愉快的另一方面，即決議的作者們認為：破壞黨的紀律是不好的，特別是在競選運動時期。這是完全正確的和很好的思想；自然，就其內容說，它不過是政治上的老生常談，不過是大家都知道的陳舊真理，即法國人所謂的 *les vérités à la Palisse*^①。但是世間一切都是相對的。一個人早已知道的道理另一個人可能覺得新鮮。自然，任何一個真正的政治活動家都不會覺得不應該破壞黨的紀律這個思想是新思想。可是還在很不久以前彼得堡委員會並不知道這個思想。還在很不久以前，這個可敬的機構曾經號召工人不執行黨中央委員會的決定。我記得不過在第二屆杜馬選舉時期它就在这方面犯了錯誤。我還沒有忘記反對我們的資產階級根據彼得堡委員會破壞黨紀這個事實作出的那些對黨不利的結論。現在，這個委員會看來已經認識到自己的行為不對，而談論起紀律的必要性來了。這對彼得堡委員會說來是一個大進步。再說一遍：世間一切都是相對的。所以我由衷地歡迎它走上這條雖然進步很小的道路。好的就是好的。

說了這些稱贊彼得堡委員會的話以後，我應當承認，我的某些朋友不僅不支持我這種高興的心情，甚至提出極端懷疑主義的見解來打消它。他們中間有一位同我一起讀了這項使我高興的決議以後對我說過：

“有人問一個野蠻人，什麼是善，什麼是惡。野蠻人回答說：惡就是人家吃掉我的老婆，善就是我把人家的老婆。你記得這個故事嗎？這個野蠻人的心理也就是彼得堡委員會的心理。過去，當黨中央委員會主要由‘孟什維克’組成的時候，他們主張不服從它。現在，當它的組成改變得對‘布爾什維克’有利的时候，他們就要求服從它。由此可見，他們的決議中完全沒有什麼可高興的東

① 意即：老調，明顯的、早已知道的真理。——譯者注

西，只是由于你那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才会发现这样的东西。”

我这位有怀疑主义精神的朋友这样说。但我不相信他。我以为，彼得堡委员会的心理和野蛮人的心理毫不相同^①。我确信，彼得堡委员会现在之所以要求服从中央委员会，完全不是因为现在“布尔什维克”在中央委员会内占了优势。一句话，我没有接受任何怀疑彼得堡“委员会委员们”口是心非的想法，而是欢迎他们改正错误。迟改比永远不改好。

我只打算向这个使我非常高兴的彼得堡委员会指出一点。他们和所有的新教徒一样喜欢夸张。他们好像要求绝对服从中央委员会。但是只有奴颜婢膝的人才会绝对服从。自觉地履行本身义务的自由人都知道，只应该服从“主管机关”（«Компетентных учреждений»）正确的指示，而不应该执行它们不正确的指示。要懂得这个道理，并不需要什么“超人的”头脑。所有立宪国家中的每一个官吏都知道这个道理。我们的全体同志也应该知道它。假使党的什么“主管”机关发出什么不正确的命令，那么由于这种不正确的命令，它就会变成不是主管的，也就应当“绝对真诚地”不服从它。因此，（而且仅仅因此）我在《没有根据的担忧》一文中认为自己有权对读者和选民说：不要担心！有一些行为无论我们的‘主管机关’作出什么错误的决定我们都不会去干。用行动支持或者仅仅是不适当地放弃行动而支持黑帮分子，就属于这样的行为。如果我们的那些“主管机关”没有弄清我们的策略任务，忽然要求我们去做这样的行为，我们都要通过自己的行动来改正它们的错误。

当我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我也许的确把事情看得太乐观了。我那时还不认为可能发生巴库那样的（如果相信报纸消息的话）事件：巴库的黑帮分子之所以在第二次选举时获胜，唯一是因为社会民主党人弃了权。看来甚至对我们的“布尔什维克”我过去也太

① 顺便指出，我这位有怀疑主义精神的朋友拿来同彼得堡“委员会委员们”作比较的那个野蛮人未必实际存在过；他倒更像半文明的——即半野蛮的——诡辩论者，但这自然一点也不会改变比较的性质。——著者注

估計高了。不过 C'est un détail^①，像法国人所說的。原則上我过去一直是对的，而且現在也仍然是对的；如果我們的“主管机关”要求我們支持黑帮分子，即要求我們**背叛我們的原则**，我們就不能服从，也不应当服从。可以另举一个例子來說明这个思想。假設我們中間某些人受到理解得很坏的“革命主义”的迷惑，忽然想要进行“剝夺”。我們會怎样对待这些好汉呢？自然，我們一定会不再把他們看成是自己的同志；我們一定会采取力所能及的一切措施从我們的队伍中把他們清除出去。我們这里是沒有“剝夺者”的地位的。如果我們的某个什么“主管机关”硬要我們改变我們对待这些剝夺者的态度，还說这是有“自由”的（我有一次亲耳听到对这些“剝夺者”持同情态度的人援引自由），換言之，如果“主管机关”硬要我們繼續认为由于主张“剝夺”而弄得声名狼籍的人是自己的同志，我們有沒有**权利服从**呢？沒有。那时我們有**义务拒絕服从**。这一切都是由于上面已經指出过的那个原因：即“主管机关”要求于我們的乃是它**无权要求**的东西——即**背叛我們的原则**。

这一点，值得彼得堡委员会好好想想。而現在它将用心思考，对于自从我党中央委员会成員改变以来它在理解紀律方面所取得的这一巨大进步，我再一次向它表示贊許。好的就是好的。

还有一点。彼得堡委员会称我是資產階級報紙的固定撰稿人。这使我大吃一惊。我現在常常給《同志报》写些东西。大家知道，《同志报》在第二届杜馬选举时期是左派集团的机关报，“布尔什維克”也参加进去了。莫非这个集团是資產階級集团么？真可怕！往后你去相信左派集团吧！但是假使这样，那么，在無产階級正統思想方面大家知道是如此“內行的”^②阿列克辛斯基又观望什么呢？

（譯自《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十五卷第 363—366 頁）

① 这不重要。——譯者注

② компетентный, 双关詞；主管的；內行的。——譯者注

它到底在动!

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九〇七年十月二十五日第四〇六号《同志报》上。作者以伽利略自况。这一方面表明他的“政治才略”如何不得人心，陷于破产；另一方面也表明他的顽固到底的决心。

也許讀者還記得，不久以前的“普列汉諾夫事件”是怎样引起的。基捷韦帖尔先生曾經用我們的选举綱領恐吓选民。我不能不看到，这个綱領不但写得不好，而且也想得不好。虽然如此，我还是觉得基捷韦帖尔先生的担忧是沒有根据的。我相信我国先进工人的政治觉悟。我说过，在决定性的时刻，这些工人为了我們学說的精神会牺牲党的文件的文字，他們会履行自己作为先进战士反对黑帮反动派的义务。我这个信念在中央委员会的“布尔什維克派”委員們看来是不合意的。因此他們通过了一項決議，這項決議使我想起来克拉索夫的詩篇《法庭》。您自然知道（俄国人不能不知道这些事）詩中的主人公从有关的“上层社会”那里得到的公文的内容。

公文中說道：

您的书里，
有些放肆的地方，
使某人荣誉受玷辱，
使某人美色失光芒。
因此啊，
上司将您交付法堂，
书籍也要抄没入档。

不过，和报纸上某些关于我受审的消息相反，人們并没有将我交付法堂，也没有将我的文章《沒有根据的担忧》抄没入档，至少沒

有因为这篇文章使起草我党选举綱領的人的荣誉受到了玷辱，使他們的美色失去了光芒而加以沒收。在这种情况下，看来人們打算提出另一个口实，即借口“給资产阶級报刊撰稿”。不过这一手还是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現在案子还没有交到法堂那里去。而且我們这里的法堂并不可怕。請看列宁吧。在第二届杜馬选举时期，由于绝对无疑的誹謗三十一个孟什維克的行为，人們的确把他交付法堂了。結果呢？他是否因此感到痛苦呢？那才不哩！他压根儿沒有感到过痛苦。甚至相反，現在他看起来比过去沒有受审时更加愉快得多健康得多。他指望着中央委员会的善良意願。真的哩，如果我們的中央委员会是善良的，即便器量小点，我又丧什么气呢。

总之，事情暂时并没有弄到把我交付法堂的地步，而且即使到了这个地步，我也不害怕。但是器量小的选举綱領的起草人仍然认为他們的荣誉受到了我的短文的玷辱，他們的美色也因而失去了光芒，他們在著名的決議中說明了这一点。如果这项決議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便是：如果文字来自“主管机关”，文字就胜过精神。可是莫斯科的“布尔什維克派”工人却宁願要精神，而不要文字。《基輔思想报》(第二百六十三号)关于克留登涅尔-司徒卢威男爵的当选是这样报道的。

“莫斯科十月十五日訊：由于情况稍微特殊，克留登涅尔-司徒卢威男爵当选了。他比十月党人左傾些。他的当选只是在第十二次投票以后。由于有极端反动分子烏瓦罗夫当选的危險，所有的反政府派都以克留登涅尔为中心团結起来了。甚至‘布尔什維克派’工人的所有九名复选人都投票贊成他。”

莫斯科的“布尔什維克派”工人在这种場合下是按照我的文章提出的凡是有黑帮危險的地方我国觉悟工人应该怎样行动的建議行动的。莫斯科的“布尔什維克派”工人表現了我在证明基捷韦帖尔先生的担忧沒有根据时向选民担保的那种政治觉悟。至于孟什維克和崩得分子那就不用說了；他們(參看哈尔科夫的孟什維克在

《同志报》上給我的公开信和《Die Hoffnung》^①上的文章)直接声称,虽然他們沉默过,但是他們决定正是像我所建議的那样行动,而不是用另一种方式行动。这对中央委员会的“布尔什維克派”委員是一次很好的教訓。这种教訓表明,这些……“內行的”人犯了一个可笑的大錯誤:他們为了自己的被我弄得失去了光芒的美色制造了轰动一时的、然而可笑的风潮。

但是这些事实,对于那些不免幸灾乐禍地預言我在我所采取的政治立場方面陷于完全孤立的立宪民主党政論家說来,可能是一次不坏的教訓;現在,他們原来是假預言家。根据迄今为止报刊上出現的消息可以推断說,立宪民主党的預言仅仅在巴庫和科斯特羅馬得到了证实。在那里,看来在第二次选举中我們学說的生动精神是作了我們某些想得不好的、党的文件的僵死文字的牺牲品。这就是說,我們的党实际上沒有忘記自己对国家的神圣义务。这就是說,我对它的希望完全不是沒有充分根据的。我认为沒有必要隱瞞:这使我十分高兴。而且——由于十分明显的原因!——使我特别高兴的事实是:甚至在首先成为国都的城市^②里工人也記住了自己对俄罗斯的神圣义务。大家知道,在这个城市里,“布尔什維克”为了模糊他們的政治意識,曾經作过这样多的努力,进行过这样多的工作。結果,无产階級健全的本能还是战胜了同工人階級真正的思想体系(也許只有術語除外)毫无共同之点的知識分子荒謬的教条。我衷心祝賀这些莫斯科的无产者!

E pur si muove!^③

(譯自《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十五卷第367—369頁)

① 《希望报》。——譯者注

② 即莫斯科。——譯者注

③ 它到底在动!伽利略因信仰哥白尼的地动說而受宗教裁判所审判。他被迫下跪宣誓放弃这种“异端的”信仰。传说他宣誓后起立时說过上面这句意义双关的話。后来文件证明并无其事。然而这句传说却变成了表示信仰坚定的成語。——譯者注

在一九〇七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伦敦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一九〇七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伦敦代表大会会议记录)

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以后，孟什维克控制了中央机关。它采取的机会主义的、无原则的、动摇不定的妥协立场，使革命遭到了失败。绝大多数地方组织越来越对孟什维克的中央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策表示愤慨和不满，纷纷要求举行新的非常代表大会。

一九〇七年四月三十日至五月十九日，经过布尔什维克的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在伦敦召开了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由于波兰和拉脱维亚的代表都站到布尔什维克一边，会议在一切主要问题上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代表大会是以‘布尔什维克主义’对‘孟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以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派对……党内机会主义派的胜利而结束的”（《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第49页）。

普列汉诺夫以梯弗里斯的代表身份参加了代表大会。他在会上致了开幕词，但是由于生病，没有代表孟什维克作报告。这里译载的是他在大会上的五篇讲话。

在“开幕词”中，普列汉诺夫“毫无根据地”硬说党内几乎完全没有修正主义者（《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434页）。

在“讨论议程时的发言”中，他“像阴影不敢和太阳见面一样”“非常激烈地反对布尔什维克把对时局的估计问

題和无产階級在我国革命中的階級任务問題列入議程的提議”(《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第55頁)。

在关于杜馬党团的工作报告的长篇发言中，他为党团的活动进行辯护，硬說他的选举綱領、“全权杜馬”和“責任內閣”等主张和口号是完全正确的，这实质上是宣揚“地道的資产階級議會主义”(《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435頁)。

对待資产階級的态度問題是伦敦代表大会的中心問題。普列汉諾夫关于这个問題的发言，表明他一貫坚持資产階級是俄国革命的动力的孟什維主义观点。

在第三十一次會議上，普列汉諾夫发言維護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主张，为阿克雪里罗得的这个机会主义的取消党的主张捧場。

总之，在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这个根本問題上，普列汉諾夫的发言完全表达了孟什維主义的立場。

列宁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对資产階級政党的态度》(《列宁全集》第十二卷)，斯大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会伦敦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二卷)中，批判了普列汉諾夫的謬論。

开 幕 詞

同志們！我們党中央委員會委托我宣布本屆代表大会、即第一屆全俄代表大会開幕。我怀着滿意的心情执行这个使我感到极其荣幸的委托。首先我要感謝你們向我表示的善意。这些表示特別使我感动。因为我觉得，有些向我表示善意的人最近一年来曾經在策略問題上不只一次地同我打过官司。所以我有理由认为，我們对于我們彼此的关系終於有了切实的認識，即認識到我們都站在一个旗帜下，站在无产階級的紅旗下。我們之間存在着很大的

意見分歧，這是無可爭論的。但是我們畢竟應當努力取得一致的意見。而要取得一致意見，我們就必須冷靜地考察各種有爭論的問題，sine ira et studio^①。我們黨內幾乎完全沒有修正主義者；這個情況，也會有助於我們進行考察。俄國無產階級身受着專制制度和資本主義剝削這樣雙重的壓迫。這個真理，我想我們每一個人都同樣清楚地認識到了。但是光只認識到這個真理並不足以清楚地了解我們的任務。早在一八八九年巴黎國際社會黨人代表大會上我就說過，我國的解放運動將作為無產階級運動而獲得勝利，否則就根本不會勝利^②。事變證實了我的話。不過光只有無產階級的力量還不足以使我們所面臨的資產階級革命取得徹底的勝利。無產階級必須有同盟者。**同盟者是誰？**我現在不想來解決這個問題。這由大會來解決。不過同盟者是必需的。這一點，大家都認識到了。這對我們之間取得一致的意見，已經是很大的進步了。我們將心平氣和地進行討論，使我們黨在代表大會以後變得比大會以前更加團結。我向第一次以有表決權的身分參加我們代表大會的各民族組織的代表們表示歡迎，並且邀請你們，同志們，開始進行工作。

俄國無產階級萬歲！國際無產階級萬歲！社會主義革命萬歲！
(鼓掌)

(譯自《普列漢諾夫全集》第十五卷第 377 頁)

在討論議程時的發言

同志們！我們的論敵們硬說，如果我們拒絕在這裡、在代表大會上制訂他們所謂的理論原理，那就是因為我們害怕在理論領域內同他們見面。我認為我們相互關係的歷史應該會告訴我們的論敵：我們不是膽小的人，我們沒有理由在他們面前感到恐懼。

① 不生氣也不偏袒。語出羅馬史家塔西陀。——譯者注

② 參看本書上冊第 242 頁注。——譯者注

有一次俾斯麦在德国国会同李卜克内西爭論时說过：“我們德国人除了上帝誰也不怕！”李卜克内西回答他說：“我們社会民主党人連上帝也不怕！”我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維克还更要勇敢些：我們不但不怕上帝，甚至也不怕比上帝更可怕的布尔什維克同志們（掌声）。至于我們的論敌也談到的鄙人，尽管我身体不好，我还是到代表大会来了，这不是因为我避免同布尔什維克同志們見面，而是因为我喜欢同自己的論敌碰碰头。再說一遍：我們一点也不怕你們，同志們，虽然你們想吓唬我們，叫嚷什么如果不制訂出合乎你們願望的理論指示，无产階級就有权責备我們叛变。話說得有力，但是很沒有根据，所以不必去管它。如果我們想避免討論指導原則，如果我們想向你們退却，那么退到抽象議論的不毛之地對我們就最有利了。但是我們不想淪落在这块荒地上，因此我們對你們說：在討論每一个个别問題时請你們提到你們所達到的全部理論高度，但是不要醉心于抽象議論。要知道正是这些抽象議論、这些抽象的爭論使我們爭吵，因此我們就沒有實現派遣我們的人的意志，像过去的一位演說家所說的。正是由于抽象議論而造成的糾紛才会是对派遣你們到这里来的人的背叛，布尔什維克同志們：（右边的喊声：不是“人”，是“同志”！）对——同志！但要知道同志也是人。

你們所謂的制訂理論倒使我們想起了起草和以多数票通过英国 prayer book 即祈禱书的十七世紀英国議會。政党不能干这样的事。

有人譴責我們是修正主义。但是修正主义者断言，引证馬克思的理論是沒有益处的；我們則力求用馬克思理論的全付武装来分析一切具体政治問題。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很大的区别。

这里有人說，爭論国家杜馬等于爭論“虛数”。国家杜馬是虛数？！但是要知道，杜馬席上有阿列克辛斯基同志。难道他也是虛数？（笑声）我們选举运动呢？难道这也是虛数？不，同志們！杜馬成了我們不能不考虑的事实。自然，杜馬的权利，例如它的預算

权，可以称为虚数。但要知道，这一点尤其应该告诉人民，而把这一点告诉人民只能通过经验，为此我们必须要在杜马同政府发生冲突时支持杜马。

可能很快就会驱散杜马这个“虚数”，那时它就会变成零。但我们不能对这一点漠然无动于衷。我们必须确定我们怎样对待驱散杜马，我们怎样回答它的驱散。列宁同志说过：“如果我们西方的同志们听到说我们在着手制订理论原理，他们是会对我们充满很大的敬意的。”完全相反：西方同志会惊讶地耸耸肩，并且说：“这些俄国人真奇怪！他们要做的事多得无数，可他们却像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一样，把时间浪费在无益的争论上，说一个针尖能住几个天使。”这倒不是因为我们的西欧同志们对理论争论采取否定的态度。决不是这样！他们某些人争论时比我们的许许多多同志都提到更高得多的高度。但他们同时善于从具体问题出发进行争论。然而如果我们接受了你们的建议，我们恰好就做不到这一点。

顺便谈谈列宁。他硬说我是这样推论的：既然我国现在是实现资产阶级革命，我们就应该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我宣布代表大会开幕的时候不是这样说的。我是说：要最后战胜反动派，光凭无产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它必需有同盟者。因此我们的代表大会应当决定，他们必须到哪里去找同盟者。我断然宣布，在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把我对这个问题的观点说出来我认为为时过早。可见列宁同志完全歪曲了我说过的话的意思。至于我们为什么必须在这里谈到同盟者，这一点你们大家都知道，而且在这里我是绝对正确的。（掌声）

（译自《普列汉诺夫全集》第十五卷第378—380页）

关于杜马党团的工作报告的发言

同志们！我已经对你们说过，我是抱病参加大会的。在其他情况下我根本不会准备讲话；但是两个原因使我不得不讲。第一，

发言批評杜馬党团的人也对我提出了一些責难。我应当反駁它們。但是請不要担心，我不会涉及个人的事情；我始終站在原則立場上。第二，——这也是主要的，——今天我們在开具有历史意义的會議，即使我奄奄一息，我也会认为自己有义务說話，警告你們不要犯你們某些人打算在这里犯的可怕的錯誤。

我已經說过，我将坚持原則立場。但是在沒有从原則的观点考察引起我們的注意和同情的問題以前，我要提出几点局部性的意見。

关于人民民主党的問題，像庫雅夫斯基同志在这里公正地指出过的，不是原則問題。如果我們的波兰同志們在这个問題上及时地同我們的党团接过头，那么党团自然会願意接受他們的指示。但他們沒有这样做，所以因为这个来責备我們的党团不見得有道理。

人民民主党在波兰无产階級中間組織了內战，它使波兰无产者流过血，这是我們大家不分派別都知道的，同时不分派別我們大家都同样对此感到憤慨。因此，在这个問題上我們不会同你們爭論；在这种情况下，我們同意，我們的党团也許最好是拒絕在議會里同人民民主党往来。但是，我要重申，庫雅夫斯基同志公正地指出过，這個問題只有次等的、或者甚至是更次等的重要性。

李伯尔同志在这里提出的那個問題也沒有原則意义。我承认，我也觉得可惜，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而是民族主义分子提出关于騎兵暴行的质詢。在这个問題上，我們的党团也許有某种疏忽。但是疏忽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国大俄罗斯人兄弟懂得其他压迫，但沒有體驗过**民族**压迫。可能有人(假定这样)不无某种理由地怀疑他們对表现出民族压迫的那些場合不够注意。但是我們的党团不仅是由大俄罗斯人組成的；其中有格魯吉亚人、阿尔明尼亚人、拉脫維亞人和犹太人。而在經常同我們的党团接触的中央委员会內有崩得的代表。我认为不能怀疑**这些**同志中間有誰对待他們的民族所受的压迫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即使我們的党团沒有看到

这点，仍然放过了对骑兵暴行提出质询的机会，那也显然不能谴责它是什么漠不关心。这里也只有某种疏忽，可以同志式地提醒他们注意这一点，而没有理由因此就激动起来。不要让这样一些问题引起我们争论；不要让这样一些问题使我们分离。我们的同志们完全可以像李伯尔同志所希望的那样行动，这丝毫不会放弃自己的策略观点。我想，这一点谁也不怀疑。其实主要问题在于发言攻击我们党团同志们的那些人不喜欢他们的策略观点。因此，这才是我们争论的真正要点。

有人把我们的同志们的策略观点称为机会主义的。这对不对呢？根本不对！它们没有一点机会主义的影子。

我完全同意这些观点，所以在这里我认为必须对梯什科同志提两点意见。

梯什科同志不满意地说，我们奢望成为党内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根本没有这类的奢望。但不言而喻，当我们遇到所谓马克思批评家们时，我们是不能把他们算进马克思主义者阵营的。要知道连梯什科同志也不敢把例如经验一元论者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左边座位上的笑声。）

梯什科同志在发言中谈及我的时候提到我过去同饶勒斯主义作斗争和反对米勒兰的事。他大大称赞了我当时写的一些文章。我感谢他的恭维。但是如果可以用这种恭维掩盖巧妙的暗示，说我现在**放弃**了我当时的观点，那梯什科同志就很错误了。我现在所采取的立场还是我和饶勒斯主义作斗争时的那个立场。有人认为这种说法是奇怪的，有人认为只有饶勒斯主义者才会在我们对待杜马和资产阶级政党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这个问题上接受我的观点，我请这种人注意一下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领袖茹勒·盖德。在巴黎国际代表大会上我同他一起进行了反对饶勒斯主义的斗争。同一个茹勒·盖德现在完全同意我的策略观点。如何？我的论敌们是不是要说茹勒·盖德也变成饶勒斯主义者了呢？

有一位同志在这里指出：“现在的普列汉诺夫不是从前的那个

人了。”我也知道，今天与会的許多人都同意这个看法；我深信他們中間許多人也准备对我說：“是一匹馬，但是騎久了就坏了。”在某个方面說我的确騎坏了。过去我身体健康，現在嘛很糟糕。不过說到我的政治观点，自从我的社会民主主义信念形成以来，我就始終一貫，当然是始終一貫。这一点你們可以确信。但是，——怪事！——大約从我的社会民主主义信念形成的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听到我的某些同志責备我没有忠实于它們；大概从那时以后，我周圍的人就发出嘖嘖的怨言：“普列汉諾夫已經不是那个人了。普列汉諾夫变了。”举一个最有趣的例子。一八九一年的飢餓时期我写了一篇論文^①，文章說，我們社会民主党人應該向国家提出慷慨援助农村飢民的要求。这伤感了当时我国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他們担心，要是飢餓的农民得到救济，我国資本主义的发展就会停頓，于是他們严厉地譴責我没有远見，并且宣判“我已經不是那个人了”，过去是那个。（笑声）以后出来了“經濟主义者”。这些人也发现我落后于运动了，他們抓着我對政治斗争的观点作证据，指責我希望所謂“在烏拉声中拿下专制制度”。現在誰会认为这个指責有根据呢？可是現在对我的譴責恰恰相反：現在一部分同志之所以生我的气，因为攻击专制制度时我的“烏拉！”喊得不够响亮。但是这个指責也是完全不值一提的。我根本不反对喊“烏拉！”但我认为也应该喊得恰当，即喊得适时。不适时地乱喊“烏拉！”，結果就会很坏。記記阿·托尔斯泰歌頌过的列阿得將軍吧：

列阿得毫无計謀，
領我們直冲桥头，
啊，烏拉！ 烏拉！

你們知道，結果却是

烏拉喊得急，
后备来不及。

^① 指《論社会主义者在和俄国飢荒斗争中的任务》，載《普列汉諾夫全集》第三卷。——譯者注

我认为“布尔什维克”同志们采取了列阿得将军的策略观点。我的确拒绝遵照他们的建议“急”着喊乌拉。但是这完全不等于说我“已经不是那个人了”；我向来从不赞成列阿得将军的策略观点。某些“布尔什维克”把我算作“立宪民主党式的妥协分子”。他们指的是怎样的妥协呢？显然是同专制制度妥协。但要知道这是十足的谬论！难道我，难道我的孟什维克同志们什么时候提到过这类妥协么？（右边的喊声：“有过！”）同志们！你们喊道：“有过！”我相信你们这样喊是完全真诚的。但是要知道，把一捆木柴放进烧死胡斯的火堆的那个老太婆也是完全真诚的。于是我只能像胡斯一样喊道——“多么天真啊！”没有这种天真的特点的人都懂得，在我国，谈不到同沙皇制度妥协，我国的问题是如何同它进行最有效的斗争。

关于我已经说得够了。有人在这里用刺耳的话谴责丹尼洛夫同志，说他喝了立宪民主党人的茶。策烈铁里同志和查帕里泽同志也受到了同样的谴责。这自然是一行大罪，于是我遵照 *amicus Plato, sed magis amica veritas*^① 的规则赶紧问他们：“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做呢？”然而查帕里泽同志反驳我说，每一杯不幸的茶他们都交了五个戈比。考虑到现代社会中有意义的与其说是商品的物质，不如说是它的交换价值，所以他们好像喝的是自己的茶。但是我比阿列克辛斯基同志还要不妥协。我对他们说：“假定茶的确是你们自己的。但要知道，你们是从立宪民主党人的杯子里喝的。难道这是可以容许的吗？如果你们想保持对原则的忠诚，你们就应该像分裂派教徒一样到处带着自己的饮具走。”我想右边的同志们都同意我的看法。（右边的喊声：“这不严肃！”）这不严肃吗？的确不严肃！但是我沒有过错：茶——这个令人惬意的饮料——使你们得到了攻击我们党团的借口，在你们看来，这些攻击显然是十分严肃的。我真的好笑，不过我所以要笑，是因为你们的所谓批评并不

① 直译是：柏拉图是朋友，但真理是更亲爱的朋友。语出柏拉图的《菲多篇》和马丁·路德的《论受奴役的意志》一文。——译者注

是批評，而是德國人所謂的 Nörgelei^①。

同志們！當前發生了有巨大歷史意義的事件。俄國無產階級通過社會民主黨議員第一次公開地走上了議會鬥爭的舞台。我很难形容我讀策烈鐵里同志的演說時的那種愉快的激動心情。有誰知道呢？也許你們、現在坐在右邊的同志們中間的許多人都體驗過類似的激動心情。但是當社會民主黨黨團向你們匯報自己的活動時，你們忘記了它的巨大功績，而只是報以吹毛求疵的指責！你們一本正經地引用阿列克辛斯基同志提出來反對它的種種理由。這裡發生的事情使人想起莎士比亞的馬克·安東尼的一番話。尤里亞·凱撒做過什麼事情，他是偉大的人，“但是布魯特說：他是愛虛榮的，而布魯特，大家知道，是正直的！”^②我們這裡的情況也是這樣。我們的黨團已經有許多功績；但是阿列克辛斯基同志却說，它充滿着機會主義精神，而阿列克辛斯基同志，大家知道，是極端的革命者；他在這些問題上是一個好法官。所以你們得聽阿列克辛斯基同志的話，你們得嚴肅地問一問自己：我們能不能在不背叛革命社會民主黨的原則下贊同我們黨團的活動呢？這真是不可思議！

黨團的所謂過錯是什麼呢？

據說，它沒有在杜馬中敘述我們的綱領。但是我們的代表已經在第一屆杜馬中敘述過我們的綱領；在第二屆杜馬中敘述它就無異於陷入不必要的、因此也是枯燥的重複。這種重複之所以不适宜，因為首先應該給舊制度的代表以應有的反擊。在回答斯托雷平的演說時應當說的不是無產階級對待資產階級的態度，不是我們的最終目的，而是覺悟的無產階級在自己對待舊制度的態度上採取不妥協的立場，現在和將來都同它進行殊死的鬥爭。策烈鐵里同志就是這樣行事的，而且他無疑是作得很好的。

① 吹毛求疵。——譯者注

② 參看莎士比亞：《尤利斯·該撒》，新文藝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72頁。——譯者注

其次，人們譴責我們的同志們，說他們在杜馬中喜歡採取合法的立場；但是當問題在於揭露斯托雷平偽善的愛好法律時，你們叫他們採取什麼立場呢？我們的“布爾什維克”用無政府主義者的眼光來看法律。他們害怕“法律”這個字眼。我們不怕它。我們知道，任何法律，只要對無產階級有一點好處，都是通過殘酷的鬥爭取得的成果，所以我們認為，輕視這種成果是荒謬的。

在這個場合下“布爾什維克”同志們同我們有怎樣的分歧，可以從下面的情況看出來。在莫斯科——大家知道是布爾什維克派的——專區委員會就國家杜馬問題通過的決議中說道：“我們認為杜馬中的任何合法的活動都只有在為反動派服務的範圍內才能實現，因此我們把在國家杜馬條例範圍內進行工作的任何企圖都看成是反對人民和革命的陰謀。”（**右邊大聲地和持續地喊道：“這不對！”**科斯特羅夫：“請念簽名！”右邊的聲音：“這是丹尼洛夫寫的！”“這決議是您自己寫的！通過這決議是針對布里根杜馬的！”**主席竭力恢復安靜，但是無效。發言者轉身對主席說：“讓他們說完；他們完了，我再繼續講”。**）你們說，這個決議是我自己寫的。（**拿出決議給與會者看**）看吧，這就是決議。再說我不僅寫了決議，而且膠印出來了吧。連你們自己也不相信你們所說的話。至於叫嚷“該委員會通過這個決議是針對布里根杜馬的”，那麼要知道，這根本反駁不了我。決議肯定地說，杜馬中的任何合法的活動都是反對人民和革命的陰謀。而這是最純粹的無政府主義，不管這個決議是什麼時候通過的。也就是這個無政府主義在這裡表現為譴責策烈鐵里和我們在杜馬中的其他同志太喜歡採取合法的立場。其次，有人硬說，我們的黨團在要求進行議會調查時本來應當敘述促使它提出這種要求的那些策略見解。但這是無關緊要的事。懂得為什麼正是我們要在杜馬中提出這個或那個要求，這對我們自己來說當然很重要。但是沒有任何必要對其他黨派的議員說：我們要求這一點是因為我們策略的性質如此。其他黨派的議員同這個“因為”根本不相干。看來你們希望我們的杜馬發言人講話時模仿某個糟

糕的悲劇演員，他本來應當大聲說：

不要恃勇，不要近前，

不然啊，這一劍叫你命歸九泉！

但是他背熟了印在括弧里供他自己參考的字句，結果把這些括弧里的字“做科”即舉劍也一起大聲說出來了。我不賞識這樣的藝術！

李伯爾同志說得對，他說，阿列克辛斯基同志在批評黨團活動的時候雷聲大、雨点小。我聽完了阿列克辛斯基同志的發言以後也有同感。不知怎的我想起了奧斯特羅夫斯基的那個商人婦，她對她的女仆說：“你總這樣；起初把人家吓得半死，後來就胡言亂語。”布爾什維克同志們繼續譴責我們，說我們離開了關於目前形勢的討論。我們的确是這樣做的。我已經向你們說明過一次為什麼我們這樣做。我已經說過，這絕不是因為害怕在理論陣地上同布爾什維克見面。現在我重複這句話。你們想利用多數票迫使代表大會接受你們革命的教義問答，好像十七世紀英國議會凭借多數票制訂了英國的 prayer book 即祈禱書一樣。我們不想按照你們的方式祈禱。我們所以不想這樣做，因為從本質上來說你們的革命觀點很不穩定。（右邊的喊聲：“啊啣！”）對，很不穩定！下面就是一個十分明顯的證據。

現在你們譴責我們，說我們好像背叛了斯德哥爾摩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這可真是班門弄斧。斯德哥爾摩的各項決議是我們孟什維克起草的，當我們在斯德哥爾摩提出它們的時候，布爾什維克曾經稱它們是機會主義的。而現在他們發現這是好決議，並且堅定地要求我們忠於它們。怎麼回事？要知道，如果這些決議從你們的觀點看來是好的，那麼從同一個觀點看來就不能把提出它們的人稱為機會主義者。不過問題也就在於：自從斯德哥爾摩代表大會那時以來你們變了。

我們在斯德哥爾摩反對抵制派時說過，為了對人民進行政治教育，社會民主黨應當“有計劃地利用政府和杜馬之間以及杜馬內

部发生的一切冲突，以便扩大和加深革命运动”^①。我們說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党应当加剧和扩大这些冲突，力求在每一个特定的場合下把运动的政治任务同工农群众的社会經济要求結合起来。当时布尔什維克們猛烈地抨击根据这种精神起草的关于对待国家杜馬的态度的決議，說它同革命无产階級是不相宜的。現在他們发现它对同一个无产階級相宜；显然，布尔什維克已經“不是那个人”了，他們放弃了自己当时的某些偏見。至于所謂我們离开了这个決議，那純粹是胡謔。

我在斯德哥尔摩是这样說明我的看法的：“罗将科同志說过，他曾經在委员会中这样概述了我們的爭論：‘我們应当确定，杜馬是不是站在革命的大道上’，而列宁同志对这个問題答复說，不是。情况的确是这样。这就清楚地說明我們观点的區別。在我們看来，杜馬站在革命的大道上。不应当繞过它。列宁說：‘杜馬中有許多天真的农民，他們除了最幼稚的要求以外还提出关于土地的急进的要求。’这是对的。但是我們怎样对待这些农民呢？讓他們仍然牺牲在自己的政治偏見、牺牲在自己的政治天真性下面呢，还是努力在斗争过程中破坏这些偏見呢？而对杜馬嗤之以鼻是不能努力这样做的。报纸上报道了一些关于农民的消息，說农民对自己的議員讲过：‘你上杜馬去，为我們的事业死在那里，要是背叛我們，就別回来，回来我們就宰了你。’难道你們不懂得我們必須紧紧地靠攏这些人，我們必須参加他們行将經历的所有那些冲突，并利用这些冲突来提高他們的政治觉悟？当这些人放弃自己的政治天真性的时候，——而他們是在斗争过程中和由于斗争才放弃它的，——杜馬就会寿終正寢。那时，召开立宪會議的钟声就会响起来。”^②

我現在还是严格地坚持这个观点。而且如果你們向策烈铁里、查帕里泽和其他的“孟什維克”議員同志，他們是不是同意对国家

① 参看本书上册第 343 頁。——譯者注

② 参看本书上册第 341 頁。——譯者注

杜馬的这种观点，把它看成是对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武器，那么他们会毫不怀疑地说：完全同意。我们仍然和斯德哥尔摩时候一样，可是阿列克辛斯基同志却大大地变卦了：在斯德哥尔摩他是很热烈的抵制派分子，而现在，他看来完全丢开了抵制思想。历史会甄别出谁是谁非。但是应当弄清楚谁说过什么话：应当把属于每个人的东西归给他^①。

正是因为我继续坚持我在斯德哥尔摩发表的观点，我才提出了“全权杜馬”这个选举纲领的建议。布尔什维克认为我的建议是我的机会主义的新证据。阿列克辛斯基同志则在这里说，自由派资产阶级以轻蔑的态度摒弃了我的纲领。是这样吗，阿列克辛斯基同志？的确是用轻蔑的态度吗？为什么自由资产阶级摒弃了我的纲领呢？因为他们认为，像他们的一位政论家所说的那样，这是“立宪会议的代名词”。而自由资产阶级是怎样对待立宪会议的呢：轻蔑呢还是恐惧呢？看来正是恐惧。可见资产阶级是抱着恐惧的心情、而不是用轻蔑的态度摒弃了我的（不过是用代名词掩盖的）要求立宪会议的纲领。如果我国资产阶级害怕立宪会议，那么对它说来情况就更坏。我们有义务向人民说明为什么他们害怕立宪会议。而且只要我们向人民说明这个道理，只要我们推动人民的觉悟向前发展，那我们就等于是按照斯德哥尔摩决议的精神行动。但要知道，这就意味着：我提出“全权杜馬”的口号以后就使我们的实际工作者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论据按照上述决议的精神来影响人民。我的机会主义在哪里呢？

这里也十分明显地表现了阿克雪里罗得提出的见解的正确性，他说：当我们诅咒立宪民主党人的时候，我们的诅咒在群众的心目中并不会有限制力。布尔什维克虽说从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以来有变化，但还是远没有掌握正确的策略观点，他们在政策上犯了逻辑上称为 *petitio principii*^② 的同一个错误；大家知道，这个

① 拉丁成語，羅馬法中的一條規定，聖經中也有類似的話。——譯者注

② 預期理由。——譯者注

邏輯錯誤就是：人們把尚待證明的命題當成已經證明的東西作為依據。

完全和這一樣，**布爾什維克**的策略假定人民的政治覺悟已經到了我們還需要通過自己的宣傳鼓動才會提高到的那個水平。俄國農民……（**布爾什維克**座位上的喊聲：“您沒有看見過農民！”）聽我說甚么呀。俄國農民不知道什麼是立憲會議，原因很簡單，就是他們沒有研究過法國大革命。還應當引導他們接受立憲會議的思想；應當使他們覺得這個思想是顯而易見的、或者說是必然的。但是對於不知道什麼是立憲會議的農民說來，却容易懂得什麼是全權杜馬。當他們開始為這樣的杜馬而鬥爭時，他們就會成熟到領會立憲會議的思想。因為要知道，事實上這種杜馬如果具有**全權**，擁有立憲會議的權力，**它就會是立憲會議**。我們應當記住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不是意識決定存在，而是存在決定意識。推動人民群眾走上通向立憲會議的那條道路吧。這樣，他們就會逐步了解立憲會議的思想。

不要說革命的空話，努力使群眾處於可以把他們的政治意識革命化的那種政治環境中吧。成功的全部秘訣就在這裡。

馬克思在某個地方說，法國國民公會的策略是一切時代和民族的革命者在革命風暴時期應當注視的燈塔。他所指的自然是山岳黨人的策略。然而山岳黨人善於接近群眾。據說，大概在占領推勒宮的前夕，有人問羅伯斯庇爾，他是不是共和政體的擁護者。羅伯斯庇爾不願意吓退自己的、還沒有徹底擺脫掉保皇派偏見的聽眾，他謹慎地回答說：我擁護人民的專制。（**維雅切斯拉夫**：“不對，這不是在國民公會時期！”）關於這個事實，就事實而論，在這裡進行爭論是不恰當的。因此我且放下這個事實，也放下羅伯斯庇爾本人，我來引證一個比山岳黨人更接近我們得多的人，即我們的導師恩格斯。（**阿列克辛斯基**：“你別胡亂搬弄你的上帝的名字！”）可是這個上帝不久以前竟變成你們的了。（**阿列克辛斯基**：“這是從出生證上找的論據！”）不是生理上的出生證而是思想上的出生證！

恩格斯在一八八七年六月写信給左尔格說：“群众只是通过自己的錯誤的种种后果。”^①在另一个地方（一八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致左尔格的信），他說道：“群众需要有时间和机会来发展自己，而且，只要他們有了自己的运动，他們就会有这种机会，因为在这种运动中，他們将通过自己的錯誤和損失向前推进和从經驗中变得聪明起来。”^②

应用于国家杜馬，这就是說，只有經驗——而且正是这届杜馬的經驗——才会使群众“变得聪明起来”和使得他們接受我們的政治观点。必須使人民从杜馬的政治活动中认清杜馬，必須使人民經歷杜馬同政府的冲突。只有那时，人民才会从經驗中变得足够“聪明”；只有那时他們才会放弃他們思想上的那些同我国現时的宪法相联系的幻想。群众只是通过他們自己的錯誤的种种后果，只是通过經驗而取得教訓的。你們布尔什維克却想用革命的空談、急进的決議来代替为群众所必需的这种經驗。你們忘記了同一个恩格斯說过的話，他說：在革命的空談方面，无政府主义者已經打破了人类最高紀錄，在这方面我們无法同他們竞争。（鼓掌）

我們的策略很使你們生气，但它是一貫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人民进行革命教育。我在斯德哥尔摩說过，国家杜馬应当成为教育人民的武器，成为向人民說明他們所必需的宪法本来应当如何的工具^③。文特尔同志和奥尔洛夫斯基同志反駁了我。他們說，对人民进行革命教育已經完成了，武装起义是我国革命运动已經达到了的阶段（这是文特尔同志原来的說法），而且起义只是几个月的事情。这几个月早就过去了，然而武装起义連风声都沒有。究竟誰对了呢？我还是文特尔同志和奥尔洛夫斯基同志？杜馬驅散以后，列宁同志写道，人民、即广大群众，大多数（这位同志是这样說的）还没有成熟到在一九〇六年进行自觉的革命活动，

①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給美國人的信》第 224 頁。——譯者注

②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 437 頁。……譯者注

③ 參看本书上册第 341 頁。……譯者注

人民还需要立宪民主党杜馬的經驗。^①再問一次：在斯德哥尔摩究竟誰對了呢？但是接着同一个列宁写道，人民已經接受了立宪會議的思想，因此可以把武装起义規定在八月中旬或八月底^②。这又显著地表明列宁同志对当时人民的情緒懂得多么少。全部問題在于革命的教育当时还远沒有完成，必須繼續进行这种教育，而且仍然是通过新杜馬來进行。列宁同志其实是同文特尔同志和奥尔洛夫斯基同志相仿佛的冒牌預言家。可惜我們这里有人喜欢預言，即使后来的事变表明他們的預言是假的，作預言的同志們也絲毫不害臊。他們不像聖經上的先知約拿，約拿在对待尼尼微的命运上做了一次冒牌預言家以后，自己就觉得——正像你們所知道的——太太太太难为情了。^③

布尔什維克正在沿着革命冒险主义的道路前进。他們这样对待我們，就像当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內部維利希-沙佩尔派对待馬克思派的态度一样。維利希和沙佩尔要求立即“发动”；他們——按照馬克思的話——說过：“我們必須馬上夺取政权，否則我們就不会有什么事可做了”^④，但是馬克思向他們指出，德国无产阶级不够成熟，并且譴責了他們，說他們像民主派一样用革命的空話代替革命的发展。^⑤

布尔什維克在用自己的策略为无政府社会主义鋪平道路，不过他們自己却沒有看出这一点。如果他們的队伍中間出現工团主义者，我是絲毫不感到惊奇的。（右边的喊声：“可是你們已經有了赫魯斯塔廖夫！”）

假使我們接受了“武装起义”的口号，我国人民就不会跟着我們走，而同时你們的策略只有在武装起义的确是运动已經达到了

① 參看《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96—97頁。——譯者注

② 參看上書第98、111頁。——譯者注

③ 參看《聖經》《約拿書》第三、四章。——譯者注

④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637頁。——譯者注

⑤ 同上。——譯者注

的阶段的那个場合下才会具有某种意义。举一个明显的例子。第二届杜馬开幕以前不久，一位布尔什維克、正是彼得·阿列……同志^①，在《論文初集》中写道，如果杜馬大多数成員又是由自由派組成，如果他們又提出責任內閣的要求，那么我們自然不会反对实现这个要求，而是与此相反，本来就应当提出由我們的党团組成革命执行委员会的思想（阿列克辛斯基：“不对，由杜馬左派！”发言人沒有听清楚这个意見就作回答）。他沒有写过这个嗎？好吧，那么我提議您在刊物上同我就这一点展开爭論，不过現在我要說，这也是立即号召举行起义的冒险主义策略。主张作这些号召的人們也在引证馬克思；但馬克思根本沒有說过这种話；他說的是：起先要教育群众，而后再号召他們进行发动。这就是那些不成熟的、混乱的思想。有人就以这些思想为名建議你們譴責我們党团在杜馬中的活动，即建議你們去犯最大的政治錯誤！我不知道代表大会的多数派同意不同意这一点。但如果同意，那就讓他們記住，这将对反动派和他們希望与之战斗的那个資產階級的一次大帮忙。

作为守紀律的人，我們自然服从代表大会的決議。但是代表大会决不能用这个決議使我們相信它的正确性。我們將繼續认为大会的这个決議是最大的錯誤。而且在这方面整个工人国际都同意我們的看法。除了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以外，任何人都絕不会贊成你們！（孟什維克和崩得分子鼓掌）

（譯自《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十五卷第 380—391 頁）

关于对待資產階級政党的态度的发言

同志們！我首先要就名詞問題說一点个人的意見。

列宁同志攻击“普列汉諾夫的《現代生活》”^②，說它好像常常談到政治现实主义。实际上这是不正确的。我任何时候也沒有談

^① 指阿列克辛斯基。——譯者注

^② 參看《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 449 頁。——譯者注

到过政治现实主义。而且假使列宁同志不是完全不关心哲学的話，他就会知道，我决不会使用“现实主义”一詞。这个名詞在哲学中濫用得很厉害，而我們唯物主义者，——因为正如你們所知道的，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对它是很不相信的。列宁的攻击就是这样有根据！不过，如果像李伯尔同志刚才那样来理解现实主义这个名詞，我当然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李伯尔說：“我們的策略应当以现实的社会力量对比为依据，而不应该以我們的主观願望为依据。”这是无可爭論的。但是要知道这也就是馬克思主义者的策略；而馬克思主义者的策略是**現代唯物主义者的策略**。这种策略，我們始終坚持。正因为如此，才引起了我們的論敌的不滿。的确，人們現在責备我們不是为了保卫馬克思主义，而是借馬克思主义的名义来責备我們。罗莎·卢森堡同志硬說，我們根据馬克思在一八四七到一八四八年的行动給自己編造了一个著名的公式，而我們現在又根本不願意离开这个公式。因此，用她的話說，我們本身就变成某种化石——**可敬的化石**：难为罗莎·卢森堡同志这样恭維我們——但化石毕竟是化石。这是令人惋惜的，但是这对么？我們且看罗莎·卢森堡同志說的是怎样的公式。这个公式可以用下面几个字規定：无产阶级为了革命的利益支持革命的资产阶级。罗莎·卢森堡則宣布这个公式是錯誤的。

馬克思在一八四七到一八四八年认为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因此——也仅仅因此——曾經劝告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反对旧制度的斗争中同它一道走。但是馬克思**錯了**。德国资产阶级不革命。現在我們认为俄国资产阶级是革命的，我們更錯。人們这样對我們說。罗莎·卢森堡同志也这样說。不过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誤解。馬克思在四十年代已經不把德国资产阶级看成是**革命的阶级**。請看证明。他在同卡·海因岑辯論时写道：

“正如我已在《德法年鉴》上证明的，德国染上了基督教德意志的特殊病症。它的资产阶级出現太晚了，当它开始同君主专制进行斗争而力图夺取政权的时候，一切发达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已經

在同工人階級進行殘酷的鬥爭了，它的政治幻想在歐洲人的意識中早已過時。在我們國家里一方面還沒有消滅君主專制及其半封建的和等級的關系的附屬物的政治腐敗，同時又局部地存在着由於工業的發展和德意志對世界市場的依附而在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引起的現代矛盾以及由此產生的鬥爭；西里西亞和波希米亞的工人起義就是證明。因此，德國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尚未形成為階級之前就同無產階級處於對抗地位。‘臣民’之間的戰爭不顧一切漢巴赫之歌而在君主和貴族被趕出國土之前就爆發了。海因岑先生對這種充滿矛盾的事態（這當然會在德國文學上有所反應）做不出任何別的更好的解釋，只有把它的責任推給自己的敵人，把它說成是共產主義者的反革命活動的後果。可是德國工人非常清楚，君主專制在為了討好資產階級而向無產階級敬以皮鞭和霰彈的時候是毫不猶豫的，而且也不能猶豫。他們為什麼還寧肯受專制政府及其半封建侍從的粗暴壓迫而不願受資產階級的直接統治呢？工人非常清楚：資產階級不僅必將比君主專制對他們作出更大的讓步，而且為了自己的工商業的利益它還會違反自己的意旨為工人階級創造團結的條件；而工人的團結是他們勝利的首要前提。工人知道，要消滅資產階級的財產關係不能通過保存封建的財產關係來達到。他們知道，資產階級反對封建等級和反對君主專制的革命運動只能使他們自己的革命運動加速進展。他們知道，他們自己同資產階級的鬥爭只有在資產階級勝利之日才能開始。儘管如此，他們對海因岑先生的資產階級幻想也是不會同意的。他們能夠和應當承認資產階級革命是工人革命的必要條件。但是他們一刻也不能把資產階級革命當做自己的最終目的。”^①

馬克思對德國資產階級的看法同我們對俄國資產階級的看法完全一樣。他看到了它的不徹底性，但仍然認為即使在它同舊制度進行不徹底的鬥爭時也必須給它以支持。有人對我們說：當時

①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 346—347 頁。——譯者注

德国工人运动还处在萌芽时期。好吧。但是大家知道，这并没有妨碍马克思期望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仅仅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奏。你们看，仅仅是前奏，而且仍然应当支持资产阶级。所谓公式也者，就是这么回事。这完全不是公式，而是方法——我们的、运用于政治的唯物主义方法。而且马克思不但用之于德国。请看他关于英国所说的话，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在他看来自然已经不是革命的了。他在同卡·海因岑争论时继续道：“工人正是这样看的，在不久以前反谷物法的运动中，英国宪章派就光辉地证明了这一点。他们一刻也没有相信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的捏造和幻想，他们一刻也没有放弃过自己同他们的斗争；而且他们充分自觉地帮助自己的敌人战胜了托利党人；但是当谷物法废除后的另一天在战场上互相对抗的已不是托利党人和自由贸易派，而是自由贸易派和宪章派了。宪章派就是因为同资产阶级民主派作斗争才在议会中争得了席位。”①

这就是马克思的方法，再说一遍，是方法，而不是公式。我们忠于它。罗莎·卢森堡同志背叛它。这很可惜。阿布拉莫维奇同志称她是布朗基主义者。这不确切。她的观点还是马克思主义，——布朗基主义应当全部留给布尔什维克同志们。不过这不是“石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在革命空谈的高温中气化的、挥发掉的马克思主义。

李伯尔同志问罗莎·卢森堡同志，她坐在哪把椅子上。问得天真！罗莎·卢森堡同志什么椅子也不坐。她像拉斐尔的圣母一样飘飞在……愉快的幻想的云端。（掌声）

有人对我们说：你们在把无产阶级变成资产阶级的工具。这根本不对。我们在把资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的工具。过去有一个时期无产阶级做了资产阶级的工具。但那个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无产阶级是我国革命现实的创造者。现在它是主力。这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347页。……译者注

使它具有特殊的权利，也使它承担着特殊的义务。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中说，作为伟大历史观念体现者的民族，可以把其他所有民族看成是实现它的伟大目的的工具；它可以用脚踏踏它们，也可以作为工具使用它们。我们不主张民族观点，而主张阶级观点。但是我们以为，无产阶级、这个当代伟大观念的体现者，可以用脚踏踏一切过时的东西，也可以利用一切现存的东西来达到自己伟大的目的。它可以这样做，也应当这样做，因为它过去是、现在是、而且将来也是当代革命的主要动力！（掌声）

（译自《普列汉诺夫全集》第十五卷第392—395页）

关于工人代表大会的发言

同志们！我们今天要审理一桩真正新奇的“复杂”案件。我们面前的被告是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而法官则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这是政治上的奇谈，这奇谈的由来本是很值得详细说说。可惜我没有时间这样做。我只得限于考察一下各方面加在我们这位可尊敬的被告身上的几点责难。谴责它的人们说：它是在革命运动低潮时期出生的。人们对他们说，你们力图在这里采取合法的立场。好一个责难！我在前面的一次发言中已经指出过，只有无政府主义者才能责备我们有这种以法律为依据的企图^①。从我们的观点看来，对工人阶级的运动帮助不多的法律，乃是这个阶级珍贵的胜利成果，我们不能、也没有权利轻视这种成果。阿克雪里罗得已经在这里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重视为工人运动寻找法律依据的机会的。但是我们的同志们很少回想马克思和恩格斯，而当他们想起这两个人时，却又并不总是成功的，罗莎·卢森堡同志的例子就证明这一点。我要引证一位在时间上离我们更近的作家即考茨基的话。他曾经就合法组织的意义向我党

^① 参看本书第316页。——译者注

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写道：

“现代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我以为同三十年前摆在我們奥地利社会党人面前的那些任务有某种相似性。自然，除了相似性的特点以外，在形势方面也存在着一一些差别。我觉得相似的情况是：在三十年前的奥地利，政府使得无产阶级不可能成立任何政治組織，而同时无产阶级对这样的組織的需要是极端迫切的。秘密組織不可能普及到群众，合法組織又不可能有。怎么办呢？”

“我們把秘密組織同合法組織結合起来了。同志們完全合法地建立了工会和患病职工补助会。但是他們力求在这些組織的成員中培养社会民主主义精神。后来这些組織的特派員开始秘密地集会，于是在每一个地方都形成了一个把所有的合法組織变成采取一致的和有计划的行动、具有統一的政治机体的机构的秘密团体。

“各地区之間的联系，有时是通过秘密的代表大会来維持的，而經常不断的联系則通过政治性的周报来維持。这种报纸不仅是宣传机关，而且也是进行組織的工具。在每一个有党組織的地方，編輯部都有自己的通訊員，他是由当地的同志們授以全权的代理人充当的。于是中央机关报編輯部就变成了把所有組織的一切紐帶都会集在一起的中心点；編輯部变成了党的真正的领导者。它知道所有各地的党内生活，它从各地得到情报和消息，向他們发出指示。这种不需要特殊的秘密的章程、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的政治机体，本身原来是堅固不拔和无法破坏的，同时它强大到足以在全国建立統一的党的政策。

“把群众組織起来的党的机体就是这样不顾政治組織的被禁止而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合法报刊和合法經濟組織补充了秘密机关，并因此被利用来成立党。”

总之，如果工人代表大会是工人运动合法化道路上新的步驟，那么害怕这个大会就意味着陷入无政府主义。

其次，有人向我們喊道：“你們的思想是空想的。你們召开工

人代表大会是为了让它来帮助你们根除你们的派别争论。”这是李伯尔同志说过的话。李伯尔同志今天的发言可惜远不是他的最好的发言。如果或多或少有充分权利代表无产阶级中间比较觉悟的阶层的人们走到觉悟较低的阶层身边去，并且对他们说：“我们和解吧！停止我们的争论吧！”，那自然是可笑的和荒谬的。但事情完全不是这样：我们不是为着这个原因才希望召集工人代表大会。在我们看来，它将只是无产阶级**主动精神**的一种表现。现在，当世世代代加在俄罗斯帝国居民身上的锁链被打断的时候，一切都蠢蠢欲动，一切都动起来了。贵族在召集代表大会，工商业资产阶级在召集代表大会。为什么无产阶级不召集呢？而且为什么我们不让无产阶级讨论拉萨尔曾经称之为工人等级的思想的问题呢？同志们，请确信，如果在工人代表大会上提出这个思想，那么他们会用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来解决的。而这就向前迈进了很大一步。对于这样的步骤，马克思说过，其中每一步都比一打纲领重要。然而这好像是在恐吓你们。你们认为工人代表大会是破坏我们党的一种企图。党有过许多错误，但它的功勋更多得多，而且为了无产阶级进一步发展的利益，它应当存在下去。但是它不应当妨碍无产阶级主动精神的生长，你们对工人代表大会的反对立场恰恰会妨碍这种发展。你们的决议说，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可以在党的报刊上讨论，但不能把它拿到广大群众中去进行鼓动。我非常清楚，所谓危险的思想正是当它们在广大群众中传播的时候才是“危险的”。但是社会民主党不应当害怕广大群众。《共产党宣言》说，无产阶级如果不摧毁压在自己头上的全部社会上层建筑，就不能挺起腰来，就不能动弹。^①难道一旦我国的无产阶级动了起来，一旦它动弹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就会大受惊吓，陷入混乱状态么？！

这未免太可悲了！……（掌声）

（译自《普列汉诺夫全集》第十五卷第395—397页）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477页。——译者注

在施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人 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在政党和工会相互关系問題委员会上的发言^①)

这是普列汉諾夫在一九〇七年八月施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关于工会中立的言論。

第一种异文

关于党和工会之間的相互关系問題，也和其他許多問題一样，俄国代表們的观点并不是統一的。我們在西欧至少有十五个党派，其中十一个在某些地区正在互相竞赛。^②

如果我們要工会紧密地向各个党靠攏，我們就会把俄国工会組織打碎成十五个軟弱无力的破片。为了貫徹执行国际的決議而不危及工人組織，我們应当等待政治統一。我們俄国的工会运动还处在萌芽时期，而且考虑到我刚才指出的种种情况，我认为俄国的工会組織应当是中立的。如果工会有政治傾向，那么它們也就应当照样进行一次政治划分。当然，我們的工会从资产階級看来并不是中立的：这些組織的絕大多数成員在革命运动中起了自己的作用；我們希望实现工会的統一，这个統一将对实现政治統一发生有益的影响。可以想象得到，二十五万三千名有組織的俄国工人不会因为他們属于不同党派而各行其是。根据这些理由，我

① 根据法文版會議記錄。——《全集》編者注

② 参看第二种异文的这个地方。——《全集》編者注

想在奥地利—比利时人的決議案第三节結尾补充以下的文字：“不得損害工会运动的必要的統一”。

第二种异文^①

在关于党和工会的相互关系問題上，正如在其他各問題上一样，俄国人的观点彼此有分歧。提出来的一些決議西欧可能接受，而俄国則不能。俄国存在着十一个革命組織；試問，我們的各个工会应当同它們中間的哪一个发生組織关系呢？可以想象得到，工会运动的統一会给政治运动的团结作好准备。在俄国，大約有二十四万三千名参加工会組織的工人。在他們中間传布政治上的意見分歧，会对工会运动的发展产生不良的反响。

一位比利时代表質問应当怎样理解貝尔決議中党和工会之間的紧密联系，对此，經過普遍同意后解释为：不应当把这些話理解为参加工会組織的工人有参加社会民主党的义务。

（譯自《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十五卷第 467—468 頁）

① 根据德文原本。——《全集》編者注

小册子《我們和他們》序言

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后，普列汉諾夫把他在大会上的发言以及某些布尔什維克的发言集录成一本小册子，题为《我們和他們》，并且写了这篇长序。

在这篇序言中，普列汉諾夫詳細闡述了他在大会发言中提出的观点，保卫了孟什維克在第三届杜馬竞选时期同自由資產階級結成联盟的策略方針，对布尔什維克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策略，特别是对布尔什維克对待自由資產階級的不妥协态度，进行了不遺余力的攻击。

列宁在批判普列汉諾夫的工会中立論思想时曾經写道：“自由派十分敬仰的前革命家普列汉諾夫，是社会民主党內的一个放蕩不羈的典型人物。他在《我們和他們》这本小册子的序言中用无与伦比的自負神情說道：施图加特的決議（关于工会）一經我修改以后，就使伦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的決議失去了作用。”（《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147—148頁）

我把我在我們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发言公布出来的目的是想提供一个材料，便于讀者了解以所謂布尔什維克为一方的观点和以所謂孟什維克为另一方的观点之間的區別，我觉得这本小册子的标题把这个目的十分明确地表示出来了。这个區別对于引起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之間的种种爭論的那些原則分歧說來只有間接的关系。我們的“孟什維克”（一些不够深思的或者不完全公平的作者有时把他們比作“修正主义者”）实际上是用比

“布尔什维克”更充分得多的否定态度对待“修正主义”的。甚至可以毫不违背真理地说，“布尔什维克”中间比“孟什维克”中间有更多得多的人这样或那样地倾向于“修正主义”。举一个显著的例子。只要“布尔什维克”阵营中的作者涉及到哲学的题目，他们就全都是科学社会主义奠基者们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反对者。这些作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持否定态度的时候，是同——例如——我当年在《新时代》的版面上与之进行过哲学论战的“修正主义者”康拉特·施米特完全一致的。的确，他们不赞成康拉特·施米特的康德主义观点。但是第一，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正”（Revision）不会因为不以康德的名义而以马赫和阿万那留斯的名义进行修正就不再是“修正”了。第二，马赫或阿万那留斯的理论完全不是那么和康德主义不调和的，像不熟悉哲学思想史的人们可能以为的那样。因此我们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家们在哲学方面都是最不容怀疑的修正主义者^①。可是还是必须承认，我们跟他们进行争论的领域同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各国的修正主义者之间过去和现在进行争论的领域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的“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观点——而我们主要是在策略方面跟他们进行争论——既不和西方修正主义者的观点一样，也不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一样。它们倒是像布朗基或者巴枯宁及其最亲近的信徒的观点。我知道，这样的类比在“布尔什维克”看来几乎是有意地不公正；但我是抱着最严肃的信念作这个类比的，同时丝毫不醉心于论战的热情。我们的“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实际上甚至跟“修正过了的”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任何共同点，所以当人们向他们指出这种

^① “布尔什维克”世界观中的这个特点，人们通常根本没有加以注意；据说，实际活动家们有怎样的哲学观点不是反正一样么？这往往也的确是反正一样。许多人都很不讲究逻辑，以致他们的哲学观点的性质同他们的实际活动的性质没有任何共同点。但是事实并不会因为不讲逻辑就不再是事实；现今哲学上反对唯物主义的倒退现象毕竟不过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向进行斗争的一种理论反映。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有一页很有意思的文字。——著者注

情况时，他們徒然地觉得冤枉。《欽差大臣》曾經在某界人士中引起了不滿，对于这种情緒，果戈理当时提醒自己的論敌記住一句民間俗語：臉丑別怨鏡子。我也可以提醒“布尔什維克”陣营中間反对我的人記住这句俗語。

我們的“布尔什維克”的策略跟布朗基、巴枯宁以及其他的空想主义革命家的策略手段之間的相同点是什么呢？这就是下面所說的。

正像我在代表大会第十六次會議上所作的发言中說过的一样，我們的布尔什維克在策略上犯了跟邏輯上所謂 *petitio principii*^① 的錯誤同一性质的錯誤。他們认为人民还应当借助于他們本身的政治經驗来**提高到的那个革命觉悟水平是人民已經达到了的**〔參看上面第三一九——三二〇頁〕。但是这恰恰是一切空想主义革命者在自己的策略考虑中时常犯的那个錯誤，也是現时的空想主义頹废派即**无政府主义者**至今不断重复的那个錯誤。

卡尔·李卜克内西同志在他的一本值得注意的著作《Militarismus und Antimilitarismus》^② 中公正地談到“无政府主义的发动”，他說：“自然，在階級斗争的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无政府主义者所建議的行动方式是可行的和正确的时候。但无政府主义的錯誤不在于它所宣传的行动方式絕對不适用，而在于相对的不适用。这种相对的不适用則是由于忽視一定社会力量对比关系，同时这种忽視本身又是由于对历史生活和社会生活缺乏了解所致。如果无政府主义的計劃在更往后的发展阶段将是**可以实行的和正确的**，則无政府主义的策略完全不会因此证明是正确的，恰恰相反，倒会受到譴責。”（第十二頁）^③ 这对于我們的“布尔什維克”來說真是一針見血。将来，当我国人民的政治教育**完成了**的时候，他們

① 預期理由。——譯者注

② 《軍国主义和反軍国主义》。——譯者注

③ 參看卡尔·李卜克内西：《軍国主义和反軍国主义》，三联书店一九六二年版第173—174頁。……譯者注

的策略也許可能是适用的和有效的。但这并不证明这个策略是正确的，倒恰恰是对它的譴責；如果它**只有在**人民的政治教育已經完成的时候才能是好的，那就很明显，它不会促进这种教育；而我們时代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就在于进行这种教育。卡尔·李卜克内西接着补充說，至少应当承认无政府主义者的策略有**首倡的功績**。我很怀疑这一点：这种策略太不合理了。但是無論如何早已完全不容置疑的是：我們的“布尔什維克”的策略**恰好就坏在首倡方面**。应当从考虑時間和地点的情况的角度来判断这类功績。德国的这些情况和俄国完全不同。也許在无政府主义从来不是占統治地位的流派的德国，无政府主义者的策略有时的确能够使某个社会民主党人想到采取由新的生活条件所引起的那些新的斗争手段。我国却不然。我們的“布尔什維克”的策略，就其整个精神說，乃是回复到不久前还在我国革命界独占統治而且至今还在“社会革命党人”中間占优势的那些政治思想习惯。它**不会产生出任何新东西**——也許无政府工团主义除外，而只会**复活完全过时的旧东西**，我国革命者为了自己事业的利益早就該拒絕这种东西。

这就說明，为什么支持“布尔什維克”的策略損害“孟什維克”的策略意味着支持空想主义損害馬克思主义。

就拿彼得·阿列……同志在《論文初集》中宣布我們的杜馬左派是执行委员会的“思想”來說吧。我在代表大会第十六次會議上宣称这个思想是“布尔什維克”不了解情况的一个最显著的典型例子。〔參看上面第三二三頁〕

在保卫彼得·阿列……同志的时候，彼·阿一斯基^①同志向我喊道（我后来从馬尔托夫同志那里才弄清楚），我引证錯了。从形式方面看，这也許是对的。我凭記憶作引证时是有一些不确切的。彼得·阿列……指的是（像刚才我在上面几行中所写的一样）**整个我們的杜馬左派**，而我发言时却說，上述思想是他向我們的社会民

① 也是指彼得·阿列克辛斯基。——譯者注

主党党团本身提出来的。但是要知道，这个失言什么也没有改变，根本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因为不管彼得·阿列……同志向谁推荐这个思想；只向我们的党团呢，还是向整个杜馬左派，他的思想始终是荒谬的。它之所以应当视为荒谬，正是因为它（像卡尔·李卜克内西关于无政府主义策略所说的一样）忽视了特定的社会力量对比关系，因为它证明了对我国目前形势最充分的、最惊人的无知。同时请注意：彼得·阿列……的“思想”的荒谬性——在无政府主义者那里，情况也是一样——不在于它绝对不适用，而在于它相对不适用。将来可能有一个时候，类似彼得·阿列……同志在一九〇七年初提请杜馬左派注意的那个办法的“发动”是可行的、有益的和必要的。^①但这只是在将来罢了。而且正因为如此，所有那些希望通过自己的政治活动促使这个将来最快到来的人现在都应该坚决地谴责彼得·阿列……同志的“策略”：即把尚待完成的事情假定为已经完成的事情。

现在，只有用非常乐观、不过很少根据的态度相信俄国人民已经作好了进行最极端的“发动”的充分准备的人才能对彼得·阿列……同志的“策略”表示同情。然而，当我国革命运动在布朗基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那个时候，这些人在我国是特别多的。

我在一八八九年巴黎国际代表大会发言以后，威廉·李卜克内西老人走到我身边，同情地握住我的手，说道：“听了您的讲话我很满意。您是第一个不企图使我们西方人相信俄国为革命作好了一切准备的俄国人。从巴枯宁时代起，我不断地听到人家说，那里‘一切都准备好了’，然而奇怪的只是革命仍然不得不长期地等待。”“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它在受到彼得·阿列……同志赞许的“思想”中得到了这样明白的表现）只会使我们回复到巴枯宁式的“发泄活动”。就回复到这种策略来说，它的确有首倡的功绩，因为我

^① 我之所以说“类似”什么云云，因为我始终完全不明白这里同“执行委员会”有什么关系。大概作为革命者的彼得·阿列……简单地希望“不尊重”民意党，因为据他说，我们这里也将有执行委员会！——著者注

国全部社会民主主义文献，从“劳动解放社”最初的出版物到《曙光》杂志和“旧”《火星报》都包括在内，曾经宣传了完全不同的策略观点。但是要知道，这纯粹是具有否定意义的功绩。

正像我在代表大会上曾经说过的以及我在这里重述过的，“布尔什维克”全部策略的基础是从空想主义出发，相信人民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政治发展水平，实际上这种水平只有在多少临近的未来才能达到。换言之，“布尔什维克”认定，应该用我们的政治艺术来解决的那个政治任务已经得到了解决。这个看法正确到什么程度，读者可以从不久以前“布尔什维克”引用来反对（这不是笔误；我写出来的字正是我想写的字，即是反对）抵制第三届杜马的那些理由中看出来。他们说，现在抵制是多余的，因为现在人民的立宪幻想已经被破坏了。我且把抵制第一届杜马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有助于这种破坏的问题放开不谈，而只请读者注意一下在这个反对抵制的论据中所暴露出来的那种心理。我们在那里所看到的只是空想主义旧信念的新的说法，即相信应当解决的任务已经解决了：“立宪幻想”已经破坏了，因此在俄国又是“一切都准备好了”，所以只剩下考虑“坚决的发动”了。在“布尔什维克”中间，就连反对抵制的人，即哪怕只是偶然地采取正确步骤的人，也暴露出这种空想主义。至于抵制主义者更不用说了；他们的心理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心理根本没有任何不同。

既然把应当解决的任务看成是已经解决了的任务，所以对于“布尔什维克”说来，除了“坚决的发动”以外，自然就想不出任何别的办法。“布尔什维克派”策略的全部内容就在于“坚决的发动”。此外他们根本看不见任何东西。

在代表大会的第十六次会议上，紧跟着我后面发言的梅施科夫斯基同志带着挖苦人的微笑说道，跟我的武断相反，“布尔什维克”现在一点也没有谈到武装起义。

梅施科夫斯基同志天真地以为，抬出这个理由，他就破坏了我的全部论据。而且所有其他的“布尔什维克”看来也是这样以为

的。但是第一，梅施科夫斯基同志的論点是不完全切合事实的。莫斯科的一位“布尔什維克”断然宣称，——如果我沒有記錯，是在我們就議程进行爭論的多次會議中的一次會議上——，既然人民运动現在已經达到了人民被迫采取武装起义的那个阶段，那么我們就有义务帮助人民去干这番事业。如果这不是文特尔同志和奥尔洛夫斯基同志在斯德哥尔摩如此坚定地向我們推荐过的那个著名的“从技术上准备武装起义”，又是什么呢？

其次，我請梅施科夫斯基同志考虑一点。在任何行动方式中以及在任何思想方式中都應該有自己的邏輯；如果“布尔什維克”的策略完全用来进行坚决的“发动”，如果这种“发动”由于这个或那个原因現在連“布尔什維克”也承认是不可能的，那就很明显，整个这一策略都應該承认是不符合当前形势的。引证連这个策略的拥护者本人現在也不敢談論“坚决的发动”（武装起义），即不敢談論构成它的灵魂和唯一使它具有某种意义的那个东西，亲保卫这个策略，那无异于犯了反对邏輯的死罪和陷入沒有出路的矛盾中。

梅施科夫斯基同志的同道們在伦敦代表大会上就陷入了这样的矛盾。举一个显著的例子。他們不仅譴責了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而且一般地暴露了对无产階級运动的极端不信任态度。在自己的关于工人代表大会的決議草案初稿中，他們承认我党黨員参加广泛的非党工人組織是“可以允許的”。不是必要的和合乎願望的，而只是可以允許的！如果我們不知道关于工人代表大会的決議草案是由这样一些人起草的，他們的全部意图在最近两三年来都集中在“坚决的发动”上，那么从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他們始終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广泛的群众运动上）看来，可能觉得这是完全不可思議的和完全不可原諒的。正如我們所知道的，坚决发动的前提条件是人民的革命意識已經达到了很高的阶段；然而如果已經达到了这样的阶段，那么人民运动的領導者們就不必用参加非党工人組織来轉移自己的注意和破坏自己的努力。

自然，在一定的情况下，这种参加仍然可能是有益的；因此，应

当允許它。但这并没有迫切的必要性，因此可以也应当只限于承认它是可以允許的。正像我們所看到的，这里的确有自己的邏輯。一个錯誤邏輯地引起另一个錯誤：那些认为不过是應該加以解决的任务已經得到解决的人，不可能不輕視应当同影响群众的其他手段一起用来解决这个任务的那个手段。德国有一句俗語，誰說到“一”，他也就应当說“二”。

如果有什么人认为不应当說“一”，那么他也就用不着說“二”。“布尔什維克”（如果相信梅施科夫斯基同志）現在不认为必須說“一”，而且当人們提醒他們注意这个字时，他們甚至感到驚訝。但如果是这样，那就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他們在关于工人代表大會的決議中說了“二”，他們为什么对广大的工人組織采取这样的态度，要知道这种态度只有深信“坚决发动”的时刻已經到来的陰謀家看来才可以理解。^①

要說明“布尔什維克”所有其余的策略錯誤都是从我上面指出的这个根本錯誤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并不困难。但这就得写一整本著作。在这篇序言里，我不可能着手这样做。我只談一談“布尔什維克”对待資產階級政党和对待“責任內閣”的态度。

如果假定所有那些妨碍人民打碎束縛他們的奴隶制枷鎖的偏見都已經从他們身上消失了，如果他們深信“无产階級和农民”专政的时代已經逼近，那就很明显，社会民主党只有用否定的态度对待“人民自由党”，除此以外，沒有别的办法，因为那时立宪民主党人由于他們所代表的階級的自卫本能必然会归附于“反动的群众”，并且将用一切力量支持政府。因此，为了充分地 and 自觉地贊成我們最近一次代表大會上就对待資產階級政党的态度問題所通过的決議，只要假定任务已經得到解决就足够了。但是懂得任务沒有解决而只是尚待我們去解决的人，應該怎样看待这个決議呢？

^① 在代表大會上，关于工人代表大會的決議草案例如就作了这样一項修改：用合乎願望的一詞代替了可以允許的。不用說，这是根据“孟什維克”的坚决要求而作的。——著者注

如果这个人能够合乎邏輯地进行思考，那他就会說，我国社会生活发展的进程还没有把我国自由派归于反动分子一类，在这两者之間斗争还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政党为了自身事业的利益**有义务**利用这个不可避免的斗争。这就是“孟什維克”所說的話，而且正是因为他们这样說，他們才譴責关于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伦敦決議，认为它是**不适时的，因此也是站不住脚的**。

在不久前的施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上，我曾經同一位支持“布尔什維克派”的思想方式的俄国工人代表談过話。他对我說：“我不懂，社会民主党人怎么能够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協議；在我們的城市里許多企业主都属于立宪民主党，要知道企业主的利益同工人的利益是对立的。”我回答說：“你們有两个敌人。明智的策略要求你們起先集中自己的力量反对其中的一个，在打倒这个敌人以后再对付另一个。解决策略任务的大师拿破侖一世总是这样办的。你們首先应当攻击誰呢？显然是政府。集中自己的力量去反对政府吧。然而政府——这个你們首先应当打倒的敌人，現在遇到了，而且在未到相当时期以前仍将遇到立宪民主党人的反抗。这就意味着，你們的两个敌人暂时是互相反目的。明智的策略要求你們在集中自己的力量反对政府的时候，为了**革命**的利益利用暂时还对政府持**反对派立場**的那个‘人民自由党’。然而你們害怕这就是叛变；你們不顾健全的思想，力求使你們那两个暂时还互相反目的敌人互相和解，因此你們虽然自以为是革命原則忠实的保卫者，其实在使革命遭到严重的損失。”同我談話的人对于这种說法沒有向我提出任何反駁意見。但是我觉得，当他听說居然有一种观点可以使人看到“布尔什維主义”的直綫邏輯根本看不到的問題的新方面而同时仍然絕對是革命的时，他并非沒有驚訝的表情。

當我們談到我們党(比方)同立宪民主党人的協議时，人們就常常这样了解我們，說我們想用无产阶级的力量为资产阶级服务。这純粹是胡說八道。它說明我們的批評者多么不了解我們和俄国当前的整个形势。实际上恰恰相反，問題只能是迫使资产阶级反

政府派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目的服务。

工人阶级的暂时的同盟者应当成为工人阶级用来破坏旧制度的工具。只能从工具符合目的的观点来看工具。但是我们的人偏不从合目的性的观点来考察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通常都是在义愤的幌子下把问题归结为：资产者不是无产者，立宪民主党人不是革命者。

在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上不仅我们同“布尔什维克”有意见分歧，而且同（例如）帕尔乌斯或罗莎·卢森堡也有意见分歧。像帕尔乌斯或卢森堡这样的人，是不能不算作当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但他们还是同也是站在马克思主义观点上的我们有分歧。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这些争论有时也引起怀疑主义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窃笑。但是这类的窃笑并没有任何严肃的根据。马克思主义是绝对正确的研究社会现象的方法。但利用这个方法的是人，而人本身是会犯错误的。罗莎·卢森堡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谈到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时所说的话就是错误地运用绝对正确的方法的一个显著的和富有教益的典型例子。于是而已，于是而已。^①

我在论述这个题目的简短的发言^②中所作的大段引证〔参看上面第三二四——三二六页〕，彻底地解决了马克思本人会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问题。马克思曾经相信，在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当时他几乎像不久前我们的帕尔乌

① 不过关于罗莎·卢森堡应该指出，她在自己的判断中之所以犯错误，有时不是因为她不会利用马克思的方法，而是因为她有时完全拒绝作方法论的思惟，而在自己的判断中以简单的激情为指导。在德国党的曼海姆代表大会上她曾宣布无政府社会主义者是左翼反对派。既然如此，她认为“布尔什维克”的立场比我们更左倾，就不会使我们感到奇怪了。这类的见解同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逻辑关系。大家知道，研究第一国际的资产阶级史学家们至今都认为巴枯宁的策略比马克思的策略更左倾。——著者注

② 健康情况不佳，一次也不允许我在这届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我只能参加讨论，同时我的时间每一次都限制为十五分钟。仅仅在第十六次会议上我才说了一个多小时，因为代表大会例外客气地一连三次“延长”我的时间。——著者注

斯看待俄国的未来一样地看待德国的未来。但是他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观点同帕尔烏斯的观点相差得很远。在对待这些政党的态度問題上，馬克思原来是一个 *avant le mot*^① 純粹的“孟什維克”。那些喜欢怀疑“孟什維克”是修正主义的人記住这一点是有益的。

大家知道，巴枯宁是用否定的态度对待改良的要求的，他耽心改良会妨碍革命。在代表大会上，我們的“布尔什維克”表现了完全相同的、空想主义的耽心。为什么他們不肯把責任內閣的要求作为自己的要求呢？因为他們耽心，这个十分重要的改良不要阻碍了革命的进程。他們就是这样說的。如果这种謬論又不是由于我已經多次指出过他們的根本錯誤才变成容易明白的，这又会是完全不可了解的謬論。如果应当解决的任务已經得到解决，如果对于革命說来一切都“准备好了”，那么致力于改良就不合目的了，因为改良会削弱直接临近的革命爆发的力量。但是梅施科夫斯基同志硬要我們相信，“布尔什維克”現在根本沒有談到直接临近的爆发，即根本沒有談到武装起义。其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显然只是因为还不是一切都“准备好了”。如果对于革命說来还不是一切都“准备好了”，然則改良又有什么妨碍呢？去試試理解一下吧！真正为不負責任的斯托雷平效劳的对待責任內閣的否定态度，乃是使“布尔什維克”陷入束手无策的困难境地的那些矛盾中的一个矛盾。

我是在乡間写这篇序言的，所以我沒法找出材料來說明我在第十六次會議上提到过而“布尔什維克們”曾予以否认的关于罗伯斯庇尔生活中的那个事实是否可靠。然而問題自然不在于个别事实，而在于这位著名的法国革命家活动的一般性质。至于說到这种活动的一般性质，凡是了解它的人都会表示承认罗伯斯庇尔是有才干的政治家之一，这种政治家通过自己的全部生活懂得，不是

^① 无其名而已有其实的。字面的意思是：在有“孟什維克”这个字以前的純粹的“孟什維克”。——譯者注

意識決定存在，而是存在決定意識〔參看上面第三二〇頁〕。得到羅伯斯庇爾贊同的“口號”永遠是從人民所體驗的革命經驗中得出來的邏輯結論。正像一切真正的革命者一樣，羅伯斯庇爾重視事實勝過言詞^①。而我們的死硬派則首先重視言詞，據我看，他們在這方面很像“古代篤信宗教”的热心的分裂派教徒。我在倫敦代表大會上同一位來自烏拉爾的布尔什維克派代表談話時曾經問過他：“請說說，難道烏拉爾工廠的居民真的要求立憲會議嗎？”他回答我說：“不要求立憲會議，而是要求這樣一種杜馬，這種杜馬誰也不敢驅散，而且它能夠做它所想做的一切。”很容易相信這是真的。但是要知道，這種杜馬也就是我作為選舉綱領提出來的全權杜馬。“布尔什維克”拒絕“全權杜馬”唯一是因為他們在鼓動問題上首先看到的是言詞，而且可惜只是言詞。他們忘記了——而羅伯斯庇爾從來沒有忘記過這一點——：

事業在先！^②

我想對倫敦代表大會上通過的、關於黨和工會的關係的決議說幾句热情的話。可是篇幅不允許。況且由於不久以前在施圖加特經過我修正後所通過的決議，就使這項決議失去了任何實際意義。

附言 在附錄中我刊載了第十六次會議引起了這樣多騷亂的莫斯科專區委員會的決議。讀者會看出能不能把它應用於布里根杜馬。“布尔什維克”是沒有自知之明的。這是十分坏的徵兆！

再者 無需乎補充說，“布尔什維克”在第十六次會議上指責赫魯斯塔廖夫同志有工團主義是完全沒有根據的，這些“布尔什維克”因為我指出他們的觀點同工團主義者的觀點有血緣關係而感到受了委屈。〔參看上面第三二二頁〕在赫魯斯塔廖夫同志的活動中根本沒有和工團主義相像的東西。倒是在“布尔什維主義”和

① 羅蘭夫人在自己的見聞錄中責備他對共和國思想持懷疑主義態度。應當認為，羅伯斯庇爾根本不願意過早地說出“共和國”一詞。——著者注

② 語出歌德的《浮士德》。——譯者注

工团主义或无政府社会主义之間有許多共同之点，这可以拿現在时常发生的“布尔什維克”轉到无政府主义者队伍中去的情况来作证明。

(譯自《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十五卷第 401—412 頁)

对工团主义的理論和 实践的批判

(摘 譯)

普列汉諾夫在一九〇七到一九〇八年間写了一連串反对工团主义的文章。这些文章的观点大体上是正确的，在当时也起过很好的作用。但普列汉諾夫是“用学究观点来駁倒引起无数混乱思想（这种思想对俄国特別危險）的工团主义”的。他不“善于从工团主义中吸取一切有生气的东西来歼灭俄国的工团主义和机会主义”，因为他自己一直就是患着“議會迷”的“机会主义”者（《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第376頁），因为他在国家問題上背弃了馬克思主义（同上第二十五卷第383—388、390、393、401—404、409、414—416、423、425、442—443、463、471等頁）。同时普列汉諾夫也在这些文章中宣揚了工会中立的錯誤思想（同上第十三卷第437—447頁等）。

这里我們摘譯了他在国家問題以及党和工会的关系問題上的机会主义言論。这两篇文章是他批判工团主义的主要論著。第一篇最初发表在一九〇七年第十一——十二期《現代世界》杂志上，第二篇最初发表在一九〇八年第二——四期《現代世界》上。

第一篇文章

亞瑟·拉布里奧拉

.....

馬克思說，任何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這句話的意思不是說，工人階級一切形態的鬥爭都是政治鬥爭，而是說這種鬥爭的最高形態是政治鬥爭，是以“意識形態的普遍性”為基礎的政治鬥爭，即以對運動的最終目的的相同觀點為基礎的政治鬥爭。

馬克思主義者之所以應該重視“意識形態的純潔性”，他們之所以不能不是“不容異見的”，乃是因為在他們看來，存在決定意識，同時反過來，意識又是存在進一步發展所必需的，——總之，因為他們不是折衷主義者，不是“主觀主義者”，不是修正主義者，也不是工團主義者。

而盧那察爾斯基先生所鄙視的“意識形態的純潔性”證明（大家知道，盧那察爾斯基先生在意識形態方面遠不是“純潔的”），要使無產階級能夠把自己的“經濟前提”同其他階級的“經濟前提”劃清界限，正確地理解“經濟地位”是絕對必要的。但是**只能對黨要求“意識形態的純潔性”**；**工會則一定要接受各種工人參加，即使他們還沒有提高到無產階級的思想水平，即使他們還不明白無產階級運動的最終目的，而且暫時還只是進行改善出賣勞動力條件的鬥爭。**不這樣做就不合理，因為那就會分散無產階級的力量，從而削弱他們反資本的障地。無怪乎施圖加特國際代表大會在一項關於黨和工會的關係的決議中指出，（根據我的建議）絕對不應當忽視工會活動的統一性。

正是因為捍衛“意識形態的純潔性”（亦即確定運動的最終目的）是黨的使命，而不是工會的使命，所以運動的領導者不應當是工會，也不應當是工會聯盟，而應當是黨。

但是我知道，人們可能把我這句話的意思了解得完全相反，甚

至簡直會按照烏格留姆-布尔切也夫斯基的方式來了解，就像我國布尔什維克習慣於了解這類問題一樣。

可以有各式各樣的領導。正像我們已經知道的，不以“意識形態的純潔性”為“根據”、而以“經濟前提”為“根據”的盧那察爾斯基先生也希望“社會黨善於培植而且成功地培植了工團主義的運動……並且向它闡明道路”（第 257 頁）。不過我不像他那樣來了解這件事情。

使他痛心的事實是倍倍爾主張工會中立；在他看來，中立意味著“削弱工會內部的社會主義宣傳”（第 251 頁）。但這是一個錯誤。宣傳是黨的事情，而工會中立絲毫不會妨礙黨以其所能有的全部力量進行這種宣傳。

盧那察爾斯基先生指出，德國的“修正主義者”也堅持工會中立。這是完全正確的；可惜它所證明的根本不是盧那察爾斯基先生想要證明的東西。

修正主義者捍衛工會中立，其目的在於使工會變成反對重視他們所討厭的“意識形態的純潔性”的黨的堡壘。修正主義者說“工會應當中立”，意思是說“應當利用工會同正統的馬克思主義進行鬥爭”。所以，這裡的爭論實際上就在盧那察爾斯基先生所——用法國人著名的說法——“鄙棄”的那個“意識形態的純潔性”。所以，為了同修正主義者進行鬥爭必須緊緊依靠“意識形態的純潔性”。取消工會中立在這裡是無濟於事的。即使我們使工會在形式上緊緊地從屬於黨，可是黨內修正主義者的“意識形態”占了上風，那麼，取消工會中立就只會是“馬克思的批評家”的一個新的勝利。

（十一）

為了開導讀者，安·盧那察爾斯基先生從埃克（即耶克）^①引

^① 見《國際》一書。——著者注

用的馬克思致国际各支部的函件中摘录了两段話。他认为这两段引文十分重要，它們实际上也是十分重要的。而广大的讀者却很少知道这个包括两段引文的函件。因此我把卢那察尔斯基先生从这个函件中摘下来的两段引文完整地抄录如下。

第一段引文：“工会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工人階級組織的中心（一八六六年写的），像中世紀的城市公社过去是資產階級組織的中心一样。如果工会在資本和劳动之間日常的游击戰爭中是消灭工人互相竞争的絕對必要的手段，那么更加重要的是工会的第二个属性——即工会是能够消灭雇佣劳动和資本統治这个制度本身的一种組織力量。”

第二段引文：“工会过分专门地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反对資本的直接斗争上，它們还不完全了解自己的活动在反对現代生产方式的斗争中的意义；它們对一般的社会政治运动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但是近来它們开始懂得了自己的伟大历史任务。”馬克思号召工团主义者“学会作为自己階級的組織中心而自觉地进行活动，支持一切能够实现自己階級的目的的社会政治运动，并且把自己看成是工人階級积极的先进的战士。这样他們就可以使得一切劳动居民阶层都注意他們的策略，并且可以說服最落后的工人相信他們的目的絕不包含任何狹隘自私的东西，而是相反，他們的目的在于解放一切受压迫的群众。”（埃克：《国际》，《知識》出版社第59和60頁）

我觉得好像卢那察尔斯基先生之所以引用这两段极其重要的話，多多少少是由于想給工团主义者以友好的帮助这样一个对他說来十分自然的願望。当然，工团主义者在同不大內行的人打交道的时候，很容易利用这两段引文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过在这个場合下，甚至馬克思关于工团主义者能够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所說的这些話也不会把內行人弄糊涂。

自然能够！当然不会！但是怎么样呢？整个問題都在这里。而对这个问题馬克思早在《国际》的第一篇宣言中就已經回答过

了。他在那里說道，有組織的工人的伟大責任“在于夺取政权”^①。換句話說，組織為工会的工人应当去建立**政党**，这个政党要完成的任务同工团主义者推荐工人去做的工作是截然相反的，就是說，提到首位的并不是“**破坏国家**”，因之也不是破坏国家政权，而将是夺取这个政权。光是这一点就已經包括了对工团主义的全部理論和实践的譴責。

不过这是題外的話；主要的是我想把卢那察尔斯基先生引证的两段話拿来同下面**第三段**也是从馬克思那里引来的話作一番比較：

“如果工会想完成自己的任务，它們無論如何不应当同政治团体联在一起或依附于政治团体。如果不这样做，那就是說，它将受到致命的打击。工会是社会主义的学校。通过工会，工人会变成社会主义者，因为他們每天都在同資本进行斗争。所有的政党，不问派別如何，都只是在短期內鼓舞工人群众；反之，工会則牢固地和长期地同工人群众联系着。只有工会才能造成真正的工人党，也才能使工人的力量同資本的威力对抗。絕大多数的工人不分党派都认为物质状况一定要改善。只要工人的物质状况得到改善，他就更有可能致力于教育自己的子女；他的妻子和儿女就不必到工厂去找事做，他本人就有更多的可能努力使自己在精神上 and 身体方面得到发展。那时他就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虽然他沒有意識到这一点。”

这段話是从馬克思同德国工会运动的一位活动家的談話中摘录下来的。这篇談話登載在一八六九年社会民主党的《人民国家报》上。可見，它同卢那察尔斯基先生据以引用上面这两段話的那个函件恰恰是属于一个时期。密切注意《人民国家报》的馬克思对该报复述自己的这些話並沒有做任何修正。这证明他认为他的談話是传达得正确的。他这篇談話的中心内容是什么呢？

①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361頁。——譯者注

首先就是工会应当中立。

有人反駁我說^①：西欧当时的形势和現在的形势不一样。这是对的。但是差別在哪里呢？最主要的差別是現在已經不能說：一切政党都只在短期內鼓舞着工人；反之，工会則牢固地和长期地联系着他們。現在有一个牢固地和长期地鼓舞着觉悟工人的政党。不过現在（而且現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是如此），甚至許多按其觉悟还不能参加党的工人也认为一定要改善工人的物质状况。工会必然要比党“更加广泛”：它应当把工人提高到党的水平。既然工会應該比党“更加广泛”（就我所指出的意义而言），那么使它从属于党是有害的。

因此有理由认为，馬克思要是还在的話，也会主张德国工会中立。自然，他所說的中立是倍倍尔所說的中立，而不是修正主义者所說的中立。至于俄国，那么他大概会重复說，在这里，“如果工会想完成自己的任务，它就不应当同政治团体发生联系或者依附于政治团体”。原因很明显：在俄国，“政治团体”太多了，俄国还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党，而如果各个工会都想使自己依附于俄国为数众多的“政治团体”的話，那么它們就不得不分裂成許多部分，像我們在西疆地区所看到的情况一样，这对工会的事业是最大的危害。

但是，这自然完全不是意味着党本身在对工会的关系上应当守中立。不，它不应当始終守中立；它應該采取一切措施在組織为工会的工人中間传播自己的思想。只有在这个条件下它才会有能力履行自己的責任：在組織为工会的工人追求最終目的的运动中成为他們的領袖，而同时又不强制、不破坏、不損伤、不分裂他們的这些工会。

我不得不說出很多使亚·拉布里奧拉先生不愉快的話。临別之前我願意称赞他一句。在他的书的第106頁的注释中，他說道：“革命主义和选举的不可容許性之間的联系，如果不是无聊的把

^① 今年八月当我在施图加特把这篇談話的情况告訴考茨基的时候，他就这样反駁过。——著者注

戏,就是純粹的虛构。”这句话很聪明,所以我很願意向“布尔什維克們”和安·卢那察尔斯基先生介紹这句聪明的話。一般說来,学习是有益的;向你自然而然产生同情的那些人学习此外还是愉快的。

(譯自《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十六卷第 57—62 頁)

第二篇文章

恩利科·列昂奈和伊万諾埃·波諾米

.....

(十六)

現代“曼彻斯特派”所宣布的“永恒真理”像聖經中著名的母牛一样干瘦^①。利用这些“真理”是不能說明任何历史現象的。既然列昂奈先生至少在着重談到現代工人运动的进程和任务的地方仍然得研究这类現象,所以他认为自己必須再三向馬克思求援和再次用各种办法来肢解他的学說,使之适应于自己的、“李伯尔主义者”的观点。

例如,恩·列昂奈在談到无产阶级的**經濟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时,硬說馬克思认为任何**經濟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第132頁)。然而馬克思說过,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②。但这完全是另一个意思。这完全不等于說,**政治斗争**的概念永远可以代替**經濟斗争**的概念,**相反**,而是說,当**經濟斗争**逐渐扩大和深入,终于达到整个阶级反对奴役自己的生产关系的运动的規模的时候,它就**一定会变成政治斗争**,即变成**爭取掌握政权的斗争**。只要政权还处在同保存資本主义所固有的生产关系休戚相关的那个阶级手中,就不可能根本改变現时的生产方式和消灭这些生产关系。因此,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曾經向无产阶级指出,夺取政权是“工人阶级

① 參看本书上册第 71 頁注 2。——譯者注

②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 475 頁。——譯者注

的伟大使命”^①。但是不言而喻，当恩·列昂奈用“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理解马克思的时候，他是不能承认这个思想的真正的和直接的意义。他使这个思想受到逻辑的拷问，以求从它那里得到“李伯尔主义”式的口供。

他说：“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第一条就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科学的工团主义大大地加深了‘夺取’一词的意义，给这个名词作了最正确的、其实也是符合它的本义的解释。社会主义政党在进行片面的选举活动中，由于混淆了权力和资产阶级立宪国家，即由于把权力同利用资产阶级各种国家机器(механизм)混为一谈，而歪曲了夺取权力原则的最初的、实际的意义”(第135—136页)。

我们的作者希望用“混淆了权力和资产阶级立宪国家”这些话表示什么意思呢？这里什么地方有“混淆”呢？错误何在呢？是不是在于“立宪国家”被认为是统治阶级权力的“机器”呢？但这不过是简单地承认事实罢了，因为要知道国家的确是这样的机器，其实列昂奈先生本人在往下几行也引证了恩格斯的一句话，承认了这一点：“国家——这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整个保存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一般条件而采取^②的一种组织”^③。或者列昂奈先生认为这里的错误也许在于他所讨厌的党认为可以“利用”由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而建立的国家机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需对这个机器作任何改变么？如果是这样，那么列昂奈先生又是在说“莫须有的事情”，因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在评巴黎公社的宣言^④中断然说出过这样的思想：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代的国家机器和运用它来作为改造社会的工具，但工人阶级必须根据自己的目的改造这个政治工具本身^⑤。自从这篇宣言问世以来(大家知道，它是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第13页。——译者注

② 供基尔德措夫先生参考的注释。“采取”一词在这里完全不得当，您不妨说“建立”。——著者注

③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二卷第148页。——译者注

④ 这篇宣言的作者是同一个马克思。——著者注

⑤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355页。——译者注

一八七一年写的), 社会主义者中间除了某些“馬克思的批評者”以外, 大概沒有誰怀疑过这一点。

任何工具都必須符合它所服务的那个目的。这是十分容易了解的; 而同样容易了解的是, 如果不把一件工具夺到手, 不掌握它, 不能任意支配它, 那就不可能改造它。而这个“永恒真理”又使我們碰到夺取政权的问题。为了对付这个糾纏不清的“棘手的問題”, 列昂奈先生終於对它作了下面的回答:

“不是任何人数多少可观的社会主义派別, 不是某个多少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 可以夺取和利用国家机器, 以便让它来控制生产力。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权力, 或者确切些說, 获得国家权力, 就是在革命时期, 在从現在向未来过渡的时期, 直接提升为生产的领导者。因此社会主义革命意味着把社会的軸心从对国家的政治管理轉移到无产阶级的中央权力, 即轉移到这样一种无产阶级的权力: 它像内部机器(внутренний механизм) 一样是从这机器的所有自然器官——工团的自发联合中产生的”(第 136 頁)。

但是这是答案么, 充分么? ……^① 把社会的軸心从对国家的政治管理轉移到无产阶级的中央权力: 这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这里有什么思想, 那也是用笨拙、平庸、假博学的空談包裹得使人很难弄明白的思想。社会的軸心“轉移”到无产阶级的中央权力。就算是这样。可是这么一来, 我們“在从現在向未来过渡的时期”将有**权力**, 而且有中央的权力。这个权力同国际成立宣言說到要夺取的那个权力有什么不同呢? 可以看得出来, 它将沒有**政治性质**; 否則“把社会的軸心从**政治管理**”云云这些話就沒有意义了。但是如果无产阶级的中央权力沒有**政治性**, 然則我們應該怎样理解它的属性呢? 恩·列昂奈援引无产阶级“直接提升为生产的领导者”来搪塞。可是这里的**直接**一詞是什么意思呢? 它显然只能有一个意思: 无产阶级在**不掌握**国家权力的情况下“提升”云云; 无产阶级

^① 删节号是原有的。——譯者注

在力求成为生产的领导者的时候**避开、绕过**这个权力。但要知道，**說避开、绕过**国家权力，这是容易的。如果国家权力**妨碍**这种迂迴活动，怎么办？要知道，很可能（說得确切些，最确实的是）它希望，而且也不能不希望妨碍这种活动。其实我們和列昂奈先生都十分清楚，現在国家权力之所以存在正是为了保存資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就是說，冲突是必不可免的。既然冲突不可免，那么我們就只有：或者用无政府主义的方式来了解冲突，即把冲突了解为**破坏国家**，或者像《成立宣言》的作者那样来了解它，即了解为无产階級**夺取政权**，并且运用它“**作为手段**”来达到无产階級的“**最終**”**經濟目的**。沒有、也不可能**有**第三条出路。如果列昂奈先生还要去找这样的出路，如果他还要利用他那笨拙难懂的、假博学的空談^①来发现它，那么这只是表明他完全沒有清楚思考的能力。

其次，不妨問問：无产階級的“中央权力”是否会有**强迫性**呢？如果**不会**，那么这和根本沒有“中央权力”的情况有什么两样呢？而且我国工团主义者的“概念”同古老的、陈腐的无政府主义“概念”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会**，那么新权力恰恰是我們同列昂奈先生討論要“取得”的那个**政权**。誠然，迂迴的和极端冒险的避开現政权的道路会使我們产生这种权力的“概念”；但“概念”将来还是存在，而且它的存在再一次告訴我們，甚至科学的工团主义者也不能想出一种根除資本主义的办法，可以使无产階級“取得”政权变成多余的。換句話說，在这种場合，即在承认我們所研究的权力的强迫性的場合，我們就得出国际工人协会的奠基人老早就得出了的結論，不过我們要通过曼彻斯特派的国家不干涉原則的泥潭和无政府主义否定“政治”的荒漠。这自然无助于弄清我們的概念。

然而的确如此。列昂奈先生就这个题目對我們說的許多話，有一个有益的思想为基础，不过这个思想表达得很糟，大概是因为思考得太糟的緣故。随着資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消灭，社会分为阶

① 普希金早就正确地說过：“空話难懂”。——著者注

級的现象也会消失，而随着这种现象的消失，任何一个希望继续存在下去的社会都不可能放弃、也决不会放弃的那个有强制性的权力就会逐渐改变性质。这个权力的职能越来越缩小为**简单的生产管理**，因此这个权力越来越不像阶级社会里的国家权力，而越来越变成“社会理性”的表现。人类政治发展的“最终目的”不是**无政府**（анархия），而是**泛政府**（панархия）。可是这种发展的必要的先决条件就是具有不同的、新的生产关系的新社会的存在。而如果无产阶级不获得政权，新社会便产生不了。所以，开始就“破坏国家”是可笑的和荒谬的，而开始就**忽视它**，那便更加可笑和更加荒谬了。

.....

（译自《普列汉诺夫全集》第十六卷第 107—111 页）

政論家短評

這篇文章发表在一九〇八年第一、二号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上。文章討論的对象是农民对革命的态度和党的策略問題。普列汉諾夫在这里大量引用了馬斯洛夫的著作，并且据以发挥了大家早就知道的普通的孟什維克观点。他不得不承认：在土地問題上，“右派”农民在第三届杜馬中的表现比立宪民主党人左些；这个事实所证明的不是什么偶然性，而是俄国革命的本性。但是他对这种本性作了完全錯誤的解释。他没有认真研究过俄国土地問題的首要任务。因此他“根本不了解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經濟基础”，不了解革命中土地綱領的两条路綫，“不善于分析这种在民粹派学說的掩飾下反对整个現代地主土地占有制的革命斗争的现实意义”。

普列汉諾夫的言論表明他是最坏的教条主义者，表明他对馬克思主义辯证法的盲目无知是何等惊人（参看《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217、222、436頁、第十五卷第10、24、26、104、313、375頁）。

列宁在一系列分析土地問題的著作中（均載十三、十五两卷）批判了普列汉諾夫的机会主义观点。

大家知道，“溫和的右派”农民議員起草了并向国家杜馬主席提出了他們的土地改革草案。其中最值得注意的首先是下面一段話：

“甲、土地立法应当力求使俄罗斯帝国每一个公民，凡是通过

本人的劳动、而不是通过雇佣劳动耕耘土地或希望耕耘土地的，都可以得到能满足他的家庭消费需要的份地，办法是：按照法定程序无偿地交出国家、皇室、閣部和寺院的土地，以及按照公平的估价交出私人占有的、租佃给农民村社和个别人的、或者为了一部分收成而耕耘的土地。”

把空气从門口赶出去，它又从窗口飞进来！第一届杜馬之所以被驅散是因为它要求一定要让渡私人占有的土地。但那是“叛乱的”、反政府的杜馬。六三政变使政府终于有可能为自己保证一个唯命是听的、几乎是奴顏婢膝的杜馬多数，终于使它找到了自己的《Chambre introuvable》^①。可是，当“秩序”得意揚揚，而“叛乱”越来越被赶入“地下”的时候，从“温和的右派”議員那里，即从那些除了滿意以外政府不能从他們身上期待任何东西的議員那里传出了农民的声音：“我們要求强迫的让渡。”結果，無論你誘使农民参加怎样的“保守”党，他都像大家知道的諺語所說的“仍然往森林里看”的狼^②一样仍然想到土地。显然，至少在現時，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对这一点是毫无办法的。把空气从門里赶出去，它又从窗口飞进来！

誠然，突然破坏了“胜利者的得意心情”的农民的声音，力求使人听起来尽可能的柔和。“温和的右派”农民提出强迫让渡要求的时候，显然完全不想“无謂地恐吓老爷們”：这就是他們之所以为“温和的右派”。但是第一，問題不在于要求的形式，而在于它的內容。第二，甚至在形式方面，从“温和而且道地的右派”土地占有者的观点看来，“温和的右派”农民仍然提出了許多要求。在有农民非党集团参加下組成的土地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当“右派”农民卢布錯夫发言反对强迫让渡，說这个要求可能引起再次驅散杜馬时，温和的右派农民阿莫謝諾克反駁說：“我們不想掠夺，也不想搶劫；我們只希望让农民有权按照公平的議价购买土地，而由杜馬

① “难得的議院”。——譯者注

② 俄国有句諺語：無論怎样喂狼，它仍然往森林里看。——譯者注

强迫地主出卖土地。”这和立宪民主党人的論据是一模一样的。但这还不是一切。自然，从同一个地主的观点看来，最糟糕的是温和的右派农民議員的土地草案将证明这样一句德国諺語的正确性：«Wer A sagt, muss auch B sagen»（誰說到一，誰也就应当說二）。例如其中就对强迫让渡的要求提出了如下的补充要求：

“丁，为了准备进行土地改革，必須頒布法令，根据对一切等級和階級都平等的选举权利选举各村、乡、县和省的地方會議，这些會議应当：

一、在全体居民的参加下对土地改革的一般原則和所有細節組織自由的和广泛的討論。”

試想一想吧：对一切等級和階級都平等的选举权利！广泛的和自由的討論！假定这两者暂时都只是“为了准备进行土地改革”，但無論如何事实总归是：强迫让渡的要求同样会使、也不能不使“温和的右派”农民走上政治要求的道路。現在这些要求暂时还是狹隘的和天真的：提出这些要求的人还不理解，如果不整个地取得言論和出版自由，就不可能得到討論土地改革的自由；他們还料想不到，不可能替将实现这种改革的會議要求普遍的选举权，而同时又隶属于贊成六三 coup d'état^①的党；最后，他們也不懂得，向大多数議員都是由“死硬派”或者他們的奴仆組成的那个杜馬提出强迫让渡的要求是可笑的。但是万事起头难。“温和的右派”农民已經走上了起初导致反政府立場、接着就会导致革命的行動方式的道路。

不容置疑，首先反映和捍衛地主利益的政府会尽其所能地不让农民走上这条道路，不使他們的政治覺悟得到提高。但是令人遺憾的是，不可能完全相信，革命党本身会在這種場合下給予他們必要的帮助。

在这里我們又面对着关于我們的策略和不策略的虽老犹新的問題。前几年的經驗表明：革命党还不善于获得它們本来能够获

① 政变。——譯者注

得也应当获得的、对农民群众(我說的正是农民群众,而不是某些农民阶层)的那全部影响。为什么它們不善于获得这种影响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說:主要因为由**革命知識分子**領头的那些政党,在一切斗争方式上,在一切言論和声明上大多(如果不是唯一的話)是考虑**革命知識分子的心理**。群众的心理,特别是**农民的心理**,它們是了解得很差的,因此也就很少顾及到。

我說这种話的时候清楚地知道,我又会有受到我党政論家攻击的危險,这些政論家永远力图使自己和別人相信,在我們中間一切都是如意的。但是我从来不怕这些“无端的”攻击。因此我重申:革命政党对人民群众的影响比它現時本来能够有的影响微弱得多,而这主要是因为它們几乎唯一只考虑革命知識分子的心理,而不考虑这些群众的心理。

为了不把例子举远了,我且指出这些政党对待第一届杜馬的态度。为什么它們曾經抵制杜馬选举呢?因为在革命政党中占統治地位的知識分子們硬說人民具有他們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政治情緒。不用說,他們的錯誤最明显表現在他們那些最不聰明的代表人物的发言和文章中。例如帕·奥尔洛夫斯基在证明抵制第一届杜馬的必要性时,硬說人民要求召开**立宪會議**,而政府用杜馬“回答了”他們的这个要求。但这是巨大的錯誤:人民沒有要求立宪會議。自然,帕·奥尔洛夫斯基的大錯誤是**无意的錯誤**。但这沒有降低它給革命事业造成的損失。那时在我国知識分子中,重复——不过也許不是用这样鮮明的形式——帕·奥尔洛夫斯基的錯誤的政論家和鼓动家有的是。

如果我現在想起了这种情况,那完全不是要用我国革命知識分子犯过的旧錯誤来嘲諷他們,而是为了使他們尽可能預防新錯誤。現在我們比任何时候都更必須弄清楚人民群众的政治情緒,以便在我們企图从政治上影响他們时顾及到这种情緒。

在召开第一届杜馬前夕,我国农民并未要求**立宪會議**,但也不反对召开**立宪會議**:它对这种會議根本沒有絲毫概念,原因很簡

单，因为他们没有研究过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一般而言他们当时很少想到**政治**；他们的全部注意都集中在**土地问题**上了。自由经济协会的普斯可夫通讯记者写道，十月十七日宣言在农村中引起了失望的情感：“所有关于什么自由的论调，无异于要使犹太佬或者鞑靼人能够自由地祈祷。嘿，见他妈鬼！值得为此写一篇宣言。我们以为会给我们增加一些土地，增加了个屁！老爷们还为这件事高兴——那是头脑发昏了。自由！我们本来就不是农奴！”后来，在几次群众大会（你们想想是谁组织的？——已故的葛伊甸伯爵）的影响下，人民开始“渐渐地振作起来”。但是人民虽然已经“振作起来”，在政治问题上仍然继续是盲目的。他们的视野像以前一样局限于**纯粹的**经济问题，于是“一开头”，他们就决定“罢森林的工”。①

有人对我说，葛伊甸伯爵所组织的那些群众大会并不可能促进农民政治观点的广泛发展。但问题也就在于，一般而言群众大会**创造**不出情绪，而只是**形成**情绪，使它变得更清楚；当演说者在群众大会上的发言不符合听众的情绪时，如果发生类似尼热戈罗得县基利里村所发生的场面，即握紧拳头的农民缠住社会民主党的演说者问道：“你说，需要沙皇不？”②——那是毫不奇怪的。这种场面那时不仅在基利里村，也不仅在尼热戈罗得县可能发生和已经发生了。当开始捣坏地主的庄园，焚毁古老的、舒适的“贵族之家”时，我国的革命知识分子曾经以为，他们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农民的情绪终于同他们本身的情绪合流了。然而实际上离开他们盼望已久的时刻还很遥远。例如唐波夫省有人说：“沙皇早就命令过地主把土地交给农民，但是地主全都拖拖拉拉，所以沙皇现在下了密令，要农民自动地夺取地主的土地。”③许多地方

① 参看《马斯洛夫著作集》第二卷，《土地问题》，第237页。这一卷中关于这里引起我注意的这个题目收集了许多极其珍贵的材料。——著者注

② 参看《马斯洛夫著作集》第二卷，《土地问题》，第240页。——著者注

③ 同上，第250页。——著者注

的农民根据这个說法都不承认沙皇的士兵会向他們开枪。在当局用士兵的子弹威胁他們的时候，他們曾經回答說：“你撒謊！”“你不敢开枪”，“沙皇沒有命令！”等等^①。在**这种**政治情緒中絲毫沒有与革命知識分子的情緒相同的地方。但革命知識分子并不理解这一点，而且他們的不理解乃是他們全部策略謬論的主要根源，也是他們的基本政治錯誤，而他們的全部次要的和更次要的政治錯誤就是从这个錯誤中产生出来的，正像树枝出自树干一样。

如果他們看到人民的情緒比他們自己的情緒落后十万八千里的話，那么他們就会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以便尽可能更多和尽可能更快地向农民說明，在他們的經濟要求（一方）和革命政党的政治要求（另一方）之間存在着怎样密切的联系。但是他們以为农民已經弄清楚了这种联系，因此革命者只要向人民提出自己的政治“口号”和“行动綱領”。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說的革命者实际上就是这样做的。我已經說过，有些地方农民准备用拳头来捍卫他們自己的旧政治信仰。但是这里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即革命的演說者和他們的听众是互不了解的。更糟糕得更多的是有些地方的农民虽然接受了最极端的“口号”和“行动綱領”，却根本沒有或者几乎根本沒有弄清楚它們的意义。我之所以說**更糟糕得多**，因为正是这些情况維持了我国知識分子本来就很同情的关于农民政治思想的那种錯誤見解：我国知識分子把实际上只表示农民**不理解他們的政治要求的意义**当成是农民同情这些要求。

我記不得我曾在我国的哪一位历史学家那里（大概是在索洛維也夫那里）讀到：当所謂混乱时代^②开始发生現在同米宁的名字相联系的运动时，喀山的韃靼人为了同邻近城市的居民进行交往，曾經大声宣布說，他們也打算保卫俄罗斯的土地和“家里的圣母

① 參看《馬斯洛夫著作集》，第二卷，第110、111、113、114頁。有趣的是在某些場合下农民中的**預备兵**也支持这种信念。——著者注

② 指俄国历史上十六世紀末到十七世紀初期长年战争变乱迭起的时期。——譯者注

像”。不用說，这些韃靼人并没有改信基督教，也没有打算改信基督教。为什么他们答应保卫基督教的圣母呢？这很简单：正像和他们毗邻的俄罗斯居民一样，韃靼人也为当时的混乱状态所苦，因为（按照阿·托尔斯泰伯爵的编年史编纂者的说法）波兰人和哥萨克人、哥萨克人和波兰人轮流地打击过我们。所以为了结束这些状态，韃靼人准备同自己的俄罗斯邻居一起反击“波兰人和哥萨克人、哥萨克人和波兰人”。他们需要的是不受袭击和掠夺，至于“家里的圣母像”跟他们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而如果他们把它放进自己的“证书”中去了，那唯一是作为修辞上的点缀品，其意义仍然是他们所根本不了解的。接受革命演说者的极端的政治要求的农民们的心理也大致如此：他们需要的是土地，他们的确准备尽各种力量和可能来保卫它，然而当他们支持对土地的要求时，他们最好不过地懂得这个要求的意义是什么。至于这个要求所引起的政治纲领，那么它之于农民亦如“家里的圣母像”之于混乱时代喀山的韃靼人一般，不过是不理解的修辞上的点缀品。他们认为谁能够给他们土地，他们就准备跟谁一起走。结果就是：为了同一“小块土地”，在沃伦地方，农民同反动分子结成了联盟，而在伏尔加的什么地方则准备同极左派结成联盟。

有人向我指出许多这样的情况，即农民对政治完全不是漠不关心的，他们自觉地醉心于革命者的政治要求；我不准备争论和反驳，我也知道类似的情况。但世间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对于影响革命知识分子的想象来说，这些情况是十分充分的，但它们远远不足以使它们能够把它们看成是农民群众的情绪的标志而不会欺骗自己。这是例外情况，而且这些情况的存在只是证明着规则。

就拿著名的“农民联盟”来说。谁也不会否认，参加这个联盟的农民都是最容易理解极端派的政治纲领的。在该联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决议：“为了起草国家根本法而召集的立宪会议应当通过立法的道路规定稳固的、公平的和符合人民意志的土地制度。”也许可以假定，该联盟的成员就自己的政治观点说至少是

同极端派一致的。但情况并不如此。比方在该联盟的第一届代表大会上弗拉基米尔省的一位代表说：“在人民的意识中，土地就像空气和水一样是上帝的赋予。谁需要它，谁就应当得到它。需要多少就得到多少。农民在地里，贵族在府邸；在贵族那里土地只是附属物。他们绝对不应当因为土地而要求报偿。”请想一想这些话吧。其中除了极端派的经济要求——剥夺地主而不付赎金——以外还表现着极有特征的政治概念：“农民在地里，贵族在府邸”。——这同莫斯科俄国时的概念完全一样：沙皇在首都，沙皇有宫廷；贵族在府邸；农民在地里。可以明显地看出，谈到土地在这个无疑是极端派的农民的理想中的意义时，事情完全不像往日黄金时代那样，那时土地很多，每一个人需要多少就可以得到多少，或者如老话所说：**哪里有他的犁，镰刀和斧头就会来。**我国社会革命党人美化我国的旧“基础”的做法是很错误的。但是他们的美化也只限于经济基础，对于**首都的沙皇、沙皇的宫廷和府邸的贵族**，他们所持的意见自然也是和“农民联盟”的弗拉基米尔的代表不同的。但要知道，这也就意味着知识分子的政治语言仍然是农民所不了解的。我所说的也只是这种情况。

农民的政治情绪正是我所描绘的这样，这一点已经由我国人民代议机关这段为时虽然不长、但却令人痛心的历史清楚地表明了。国家杜马的议员们到彼得堡去。人民用热烈的呼声欢送他们。议员们临行时对人民说：“请你们支持我们。”人民激动地大声说：“我们支持你们，我们用胸膛保卫你们。”议员们在塔夫利达宫集会的时候，邮递员和电报员不断地给他们送来人民的祝词、委托书和充分同情的保证。议员们好比登上了七重天。但是人们把他们驱散了，然而**人民一声不响**，像普希金的《波利斯·戈都诺夫》中的情况一样。这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呢？是格鲁波夫城^①的历史中的一章么？不是，这完全是一个大误会：议员们前往彼得堡的时候深信，

^① 谢德林在《一个城市的历史》中虚构的一个偏僻小城，其居民习于造谣、诽谤、行贿、懒惰以及敌视一切外乡人。——译者注

人民的同情是他們的力量的泉源。而人民之所以用热烈的同情欢送他們正是因为人民认为他們是能够帮助自己对付自己的敌人的一种力量。一旦他們被驅散，人民也因之就“一声不响了”。人民产生了困惑。

人民无言的困惑在我国或多或少先进的政治活动家中間引起了不少悲观失望的情緒。但这种困惑是可以預見到的，而且本来也应当預見到。如果誰預見到了它，誰就不会因为这种預見得到证实而陷入灰心丧气的状态。他只会力求采取行动，使得这种困惑变得尽可能更小。換言之：他就会尽一切力量在人民和他們的代表中間消除这个大誤会，以便使农民的思想中产生真正的政治觉悟。而这是可能的，我上面提到的那些一般規則的例外情况就是凭据。我說过，这些例外情况证实了一般規則。但它們不只是证实了一般規則。它們也說明了，将来規則可以改变，而且已經存在着必然会要促使規則发生变化的一些条件。所有反对現存政治制度的人的任务就在于尽可能更好地利用这些条件。但这些条件过去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得到了利用。

在解释这一点以前，我想举一些例子來說明，在人民和他們的政治代表之間的确有过我所說的那种巨大的誤会。

一九〇五年在克利沃罗日埃鎮市发生了由馬祖伦克兄弟领导的强大运动，农民們在乡民大会上起草了自己的決議，他們在決議中特別坚定地請求«підвтворить насчет землі»^①，——他們天真地感到高兴：

多亏有好心人在替我們为一小块土地而奔走^②。

用《克里木信使》的話來說，农民們认为，国家杜馬可以輕而易举地解决土地問題：“我們的农夫們建議沙皇如此这般，沙皇一签名，事情就办得了。”^③

① 乌克兰文，义不解。——譯者注

② 馬斯洛夫引用了关于这个情况的报道，第二卷，第207—208頁。——著者注

③ 同上，第307頁。——著者注

布卓卢克乡格利果里也夫村的农民們向杜馬呼吁时写道：“斗争吧，杜馬的議員們，因为我們在挨餓。”^①

在沃伦斯基省，根据《沃伦报》报道，农民的一切談話都是以土地問題为中心，同时居民絲毫也沒有怀疑过国家杜馬的全权：“难道部长們比杜馬更大！……他們怎么会有权不給我們土地！”等等^②。

面对着这些事实，看来不可能怀疑：当人們在杜馬中就“行政权应当服从立法权”这个題目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說时，农民群众对于这是些什么样的权力，这两种权力之間的現存关系是怎样的，以及这种关系应当怎样，是完全沒有任何正确的認識的。无怪乎当“行政权”进攻“立法权”的时候，农民群众只落得扮演一个一言不发、困惑不解的見证者的角色。

杜馬可能是而且本来也应当是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的一种极好的、沒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的手段。它本来应当通过反证法、即通过在人民面前暴露自己在法律上的軟弱无力的办法，向人民表明，他們应当为自己的代表夺取怎样的权利。但这不光是議會演說，甚至也不光是議会的決議和冲突所能办到的。必須經常評論这些演說、決議和冲突——特别是冲突；否則生动的政治教訓仍然是人民不大了解的。当驅散第一届杜馬的时候，在俄国民主派面前出現了宣传全权的人民代議制思想的极好的机会。这种机会当时革命者不善于加以利用，而立宪民主党人則不願意去利用。“人民自由党”——正如穆洛姆采夫先生在法庭上談到維波尔格宣言时所承認的这样——害怕驅散杜馬会在人民中間引起革命运动。由于害怕这样的运动，立宪民主党議員們就提出了維波尔格宣言向人民推荐的消极抵抗思想。我不会在这里斥責这种害怕人民爆发的心理；我早已說过，自称为人民自由党的党实际上可惜是人民半自由党。但是現在的問題不在这里，現在的問題在于立宪民主

① 馬斯洛夫引用了关于这个情况的报道，第二卷，第 281 頁。——著者注

② 同上，第 309—310 頁。——著者注

党当时对可能发生革命的信念是我上面已经指出过的政治错误的产物。立宪民主党人也像以列宁为代表的那些空想主义革命者一样很不了解当时人民的情绪，这些革命者硬说，在解散杜马以后，人民明白地看到了召开立宪会议的必要性，因此只要规定武装起义的期限就行了。当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现在对革命者的空想主义轻蔑地耸一耸肩时，他们本应当问问自己：“我们自己是不是早已摆脱了自己的……翻了边的空想主义呢？”从这个使我们感到兴趣的方面说，我国“清醒的”立宪民主党政治家也都是像列宁的同志们一样的毛孩子，不过（和后者不同的地方）不是胆子大的、而是胆子小的毛孩子罢了。但是胆怯不值得赞许……

当时不可能举行人民起义。但很多人认为它是可能的，甚至是非常可能的，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人民已经领会了本来还需要向人民解释的那些政治真理。既然把这些真理看成是人民已经领会了的，所以甚至那些不仅不像立宪民主党人一样害怕人民起义、而且非常努力于号召起义的人也就没有向人民解释过这些真理。革命者所谓人民的政治思想已经成熟的夸大的说法妨害了他们自己的努力加速这种思想的成熟过程。

的确，在驱散第一届杜马的时代俄国社会民主党中间曾经有（甚至在形式上还占优势）一派人通过了著名的斯德哥尔摩决议，驳斥了抵制政策，并且宣布说，武装起义完全不能认为是（像“布尔什维克”当时所武断的一样）我国解放运动已经达到的阶段。这一派的社会民主党人把杜马同政府的不可避免的冲突看成是对人民进行直观教育、使他们认识他们还没有懂得但一定要懂得的那些政治真理的手段。“孟什维克”避免了“布尔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所犯的那些错误。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们自己没有犯过错误。

我且不说驱散第一届杜马以后号召进行总罢工。在当时条件下这种号召是相当重大的错误。不过这毕竟是细小问题。特别糟糕的是“孟什维克”虽然在理论上领会了正确的策略观点，却没有

使这些观点得到广泛的实际运用，要知道这种运用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这些观点的本质自身**所迫切要求的。“孟什维克”也没有摆脱掉我国革命者的老毛病即“**知识分子习气**”。“孟什维克”也往往只准备满足于**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阶层**（他们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腔调已经习惯了）所了解、然而广大群众仍然完全不懂得的那些**文献、“决议”和“口号”**。我把这种情况也称为知识分子习气。正是由于“知识分子习气”才没有恰当地利用最近两年来大大地丰富了俄国的实践和理论的那些十分值得注意和极有教益的事件来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在第一届杜马中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第一届杜马的驱散；政府在农民的“土地规划”方面的措施；第二届杜马；它的解散；社会民主党党团的被捕；六月三日的政变；最后，**在人民中间进行共和国思想的宣传**造成极好的机会的无数“行政当局的个别错误”。

就我所知道的我国的宣传鼓动著作来看，我应当说，这些事件和这些错误根本没有使我们写出通俗的政治著作。（要知道，我们现在之所以不能没有这些政治著作，其原因也就像如果人民最广泛的阶层没有卷入政治斗争我们就不可能取得对旧制度的胜利一样。）这样的政治著作没有产生出来，妨碍它产生的正是“知识分子习气”。

因为这个可怕的病而痛苦的人们，从知识分子的观点看待生活，因此也就是从这种观点看待政治著作。只要他们能够用**知识分子**所了解的方式来阐明一定的社会现象，他们就不再关心任何东西，虽然人民根本一点也不理解这种现象，虽然他们自己不断地谈到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因此当起草我们的“口号”、决议等等时，人们在起草过程中永远只注意“**知识分子**”的而且还是**小组的心理**：某些文字之所以被采用是为了向某些“实际工作者”说明情况，而某些文字之所以被采用又是为了不让某个**伊克斯或伊格列克**^①谴责我们有机会主义，等等，——结果就得到从“知

^① 伊克斯、伊格列克，均俄人通称。——译者注

識分子”小組习气的观点看来也許是天才的、但对于广大群众的宣传工作无疑是很少好处的某种东西。

还有一点也請注意。既然決議是斟酌了“知識分子”的心理以后才写出来的，“口号”也是这样通过的，既然知識分子需要“广大的远景”和愉快的預言，所以远景展开越大，特定的团体許諾将来会有的愉快的事情越多，它的革命性的声誉就越会得到确立。由此可見，特定的革命者的議論越輕率，他就越被认为是**极端派**。換言之：輕率和革命性是同义語。

这一切都会是十分可笑的，如果不是极端可悲的話。“知識分子习气”是我們最凶恶的敌人。它比任何东西也比任何人更妨碍社会民主党在爭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中起它有权起的领导者的作用。的确，高加索社会民主党所传染的“知識分子习气”比我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少得不能相提并論，也許它甚至还完全没有传染上这种习气，請看一看他們在自己地区内所作的事情吧：如果我們現在或者不論什么时候在俄国做他們那里做过的事情，那时我国旧制度就不会剩下任何一点创屑了……

浮士德說，**事业在先**。从革命**事业**的观点看来，而不是从革命空談的观点看来，我們应当重視自己在著作上以及在任何其他方面的一切“发动”。我們的**事业**只有一个，即加速提高广大群众政治觉悟的过程。从**这个事业**的观点看来，应当承认，最极端的革命者不是比所有其他人更輕率地保证我們未来取得胜利的人，而是比所有其他人更多地加速这个过程的人。这就是整个革命智慧的全部内容。

所以如果我們的同志們也正是从这个**事业**的观点来看溫和的右派农民的土地草案，那是很适当的。草案本身是完全不能令人滿意的，也是很天真的。但是它表明，甚至农民中間的落后阶层現在也被生活进程本身所迫而打开了自己的眼界，它們不仅在草案中把篇幅留給“小块土地”，而且也留給政治。这个草案是一个事实，它一方面表明农民思想的落后性，另一方面則证明，甚至这个

落后的思想也不能不前进。“温和的右派”草案的巨大意义也就在这里。革命者只能巧妙地接近这些落后阶层，而不要去吓退他们这种暂时还是微弱的、笨拙的和胆怯的政治思想，以便通过慎重地但是经常地影响这种思想的道路使它得到力量、活力和勇气。

离开这条道路，就不能达到胜利。当代的革命问题——在某种确定的意义上——可以称为**军事问题**。试问，拥护人民公敌的那些政治上落后的士兵是什么人呢？无非是身穿**军装的俄国农民**。

（译自《普列汉诺夫全集》第十五卷第415—427页）

斯捷潘·果卢别所著 小册子的序言

斯捷潘·果卢别：《通过知识分子习气
这个障碍物（一个工人致我党
知识分子和工人們的信）》

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九〇八年巴黎出版的小册子《通过知识分子习气这个障碍物》上。文章对果卢别的《一个工人的信》的观点作了有批判的介绍。普列汉诺夫在这里宣扬了阿克雪里罗得的非党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他认为伦敦代表大会通过布尔什维克的谴责这种思想的决议是“知识分子习气”的表现，是不信任工人阶级主动精神的表现。实际情形完全相反，工人代表大会思想“模糊了无产者和小业主的观点的差别”（《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340—341页），实现这个主张就会为“成千的远没有定型的小资产阶级涌进工人政党”（同上第339页）大开门户。普列汉诺夫不过是借口工人的主动精神反对社会民主工党罢了（同上第九卷第407页）。列宁在许多文章中批判了这个孟什维克派的取消主义口号。

这本《一个工人的信》加上这样一个标题，也许可能引起许多误会，甚至不满。

这位工人作者邀请其他有觉悟的工人联合自己的努力来破坏“知识分子习气这个障碍物”。为什么他认为必须这样做呢？他使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追求它的伟大的最终目的的解放运动中起着

什么样的作用呢？他是不是贊同那些对工人运动胜利的条件理解得很坏、却希望用万里长城使体力劳动者同“知識分子”隔离开来的工人的意見呢？而且“知識分子习气”这种輕蔑的說法是不是由这种对“知識分子”的否定态度引起来的呢？——这就是信的标题在懂得說明知識分子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現在对我们多么重要、懂得在作这种說明时多么容易在这一方面或另一方面犯錯誤的讀者的头脑中自然产生的一些問題。不过，除了懂得的讀者以外还有不懂得の讀者。就像在有的时候一样，就像在所有的地方一样，不懂得の讀者在这里也比懂得的讀者为多，而在不懂得の讀者中間，认为知識分子对工人階級的（或者說得更确切些：工人階級对知識分子的）合理关系不仅一般說来、而且甚至具体說来都早已得到闡明、认为对这个問題表示任何怀疑都意味着简单地暴露出执拗精神和不服从“主管机关”的那一类人，却在我們这里起着不小的作用。

对于这类人說来，光只《一个工人的信》这本书的标题就足以使人怀疑是什么有害的异端思想或恶毒的阴谋。

我赶紧来安慰一切种类的讀者，无论是懂得的讀者或是不懂得的讀者：斯·果卢別同志不想玩弄任何阴谋，也沒有宣传任何异端思想。他很不喜欢“知識分子习气”。但他根本不反对真正的“知識分子”。他对待知識分子的态度可以用“他的信”的如下一段話來說明。

“有人可能向我指出，我想培植敌視知識分子的精神。但这是不正确的……如果任何一个工人同志用这个观点来了解我，那他就会犯深刻的錯誤……如果我们用敌对的态度对待知識分子，我們不仅会是可怜的盲人，不仅会在对待他們的態度上是不公平的，而且会看不清他們向我们提供的那种巨大的力量的真正价值，也不会理解自己的无产階級政党，却把站在无产階級观点上、正在为它的利益而斗争的战士赶出这个党。总之，我們就会像我們的敌人損害我們一样損害自己。”

可見，我們的這位工人作者離開把“知識分子”驅逐出進行鬥爭的無產階級隊伍的想法是相去十萬八千里的。他看得很清楚，這種驅逐行為會多么有害地影響這個階級的利益。再說一遍，他不是反對知識分子，而只是反對“知識分子習氣”。進行獨立思考的工人對“知識分子習氣”的這種反對態度就是下面這封信的全部主旨之所在。

誠然，我們的作者在反對“知識分子習氣”的時候，有時弄到打擊知識分子的地步。舉一個顯著的例子。他把山上海道中的一句話拿來作為自己的信的題辭：“如果你們的正義勝不過文士和法利賽人的正義，你們就進不了天國。”^①

這是優美的題辭。但是這個優美的題辭使人有理由認為，我們的作者像耶穌看待當時猶太的文士和法利賽人一樣，也用同樣的眼光看待我們黨內的“文士和法利賽人”。大家知道，耶穌根本沒有在文士和法利賽人身上看到“巨大的力量”。他對待這種力量的敵視態度給他自己的事業帶來了損害。就其本身說“文士和法利賽人”在當時的猶太人民當中是一個巨大的力量，這一點“加利利的木匠”^②自然是清楚的。但是他也清楚地知道，在他們和這種巨大的力量之間不但不可能有任何友好的結合，而且必然要產生誓不兩立的鬥爭和敵對行動。我們已經知道，果盧別同志對待和他同時代的“文士”的態度完全不是這樣的。正像我們已經知道的，他認為他們是意中的同盟者。把意中的同盟者稱為法利賽人是不恰當的。試問，同法利賽人能有什麼樣的同盟呢？不過，要求工人們一定比這些同盟者“更正義些”，那也是奇怪的：“正義”是極好的東西，但它不是任何人的私產。簡言之，果盧別同志的優美的題辭是不得體的。它所表示的完全不是果盧別同志想說的意思。但這只不過是遠不像專門著作家那樣自由地揮毫運墨的人著作上的疏忽和錯誤罷了。同時，雖然這遠不是我們的作者唯一的筆誤。

① 參看《聖經》《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節。——譯者注

② 指耶穌。——譯者注

虽然他在跟“知識分子习气”进行斗争时不止一次地在自己的信中打击着“知識分子”，但是他的笔誤毕竟只是笔誤，必須是很坏的視力才会因此忽略作者真正的思想。

我們的作者所敌視的这种“知識分子习气”究竟是什么样的玩意儿呢？他认为它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

如果我对果卢別同志的了解是正确的，那么沾染上“知識分子习气”的“知識分子”的主要特点就在于不了解“工人階級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①自然，沾染上“知識分子习气”的“知識分子”很同意适时地、甚至也同意不适时地重复国际工人协会奠基者的这个伟大的結論。但是他們在重复这个伟大的結論，对工人階級強調指出他們只有通过他們自己的努力才能解放自己的时候，由于誤解，自己却給提高工人的主动精神造成障碍。然而工人的主动精神越是提高得少，工人政党内部的“知識分子习气”就会更加猖獗，而患这种病的知識分子就会更加热心于保存妨碍工人表現主动精神的那些障碍物。結果出現一种恶性循环。工人政党必須摆脱这种处境。否則就有墮落和崩潰的危險。

果卢別同志說：“我們党內的觉悟工人早就成了我們的‘委员会委員’傲慢地^②对待的某种卑微的人。他們早就因为无所事事而痛苦。他們不知道自己該干什么。他們的战斗精神也像强大的、但没有石油的喷射器一样真正在熄灭。我們大多数的知識分子不是只要有可能就把自己的地位自觉地让給工人。他們不但不支持工人积极参加自觉的国内生活，而且也不支持工人在党的策略和綱領的每一个新步骤中进行自觉的积极的批判活动。总之，他們不是力求提高工人的主动精神。相反，我們却看到他們同这种主动精神进行斗争。”

我不知道，当果卢別同志說“大多数”知識分子至今都用不信

①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363頁。——譯者注

② 着重字体是果卢別同志自己用的。——著者注

任的态度对待工人的主动精神的时候，他是不是正确。但是我根据自己的观察知道，过去有一个时候，大多数知识分子对工人的主动精神是俄国无产阶级运动往后的胜利所绝对必要的条件这个思想的确是很怀疑的。不过我们不宜在这里来分析这种怀疑态度的原因。只要指明它存在过以及就它现在存在而言它真正是对无产阶级的犯罪行为就行了。而且如果你想到这个犯罪的怀疑态度的种种对事业有害的后果会多么明显地引起觉悟工人们的注意，那时你就会开始很好地理解这封信的作者总的心情以及他所有这些显然是无心的夸大和笔误。有些现象是不可能始终对它漠然置之的。

我们的伦敦代表大会谴责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一事可以作为“知识分子”（同时不止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受“知识分子习气”影响的工人）对待工人主动精神的不信任态度的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在这种谴责中无疑表现了引起我们的作者公正的愤怒的“知识分子习气”。这本《信》是在伦敦代表大会以前写的。但是既然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早已在我们党内的一些集团中受到谴责，所以果卢别同志认为必须在自己的信中把很大的篇幅留给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问题。应当承认，正是这些篇幅是信中最成功的地方。可以说，我们这位工人作者预先就胜利地驳斥了患“知识分子习气”这种病的人后来在伦敦反对工人代表大会时所说的一切言论。

在涉及这个问题的那些极好的篇章上，只有两个小节引起我的困惑莫解。第一，我不明白果卢别同巴·波·阿克雪里罗得的辩论。第二，我认为作者对工人代表大会可能具有的策略意义解释得不完全正确。

巴·波·阿克雪里罗得曾经在某一号《社会民主党人报》登载的一篇短评中反对一些同志从工人代表大会会对我们党组织产生怎样的影响的观点来考察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他认为从这个观点看问题的同志是不合理地用自己的、无论如何暂时还只是无产阶级群众的阶级组织的萌芽的那个组织的局部的、集团的或狭

小党派的利益来代替工人阶级的**普遍**利益。果卢别同志坚决反对巴·波·阿克雪里罗得的这个意见，而且不知为什么对“萌芽”一語感到不安，认为其中有使党难堪的什么东西。例如他写道：

“工人阶级不仅现在是一种力量，将来也是一种力量。它的**根本**^①就是应当有自己的社会党。不能一面建议它组织成一种政治力量，一面又用半讽刺的态度对待这个必需的和伟大的根本……既然大费周章才建立起一个像样的政治组织，就不能忽视这个**真正的工人**的阶级政党，不管这个党多么年轻，不管它怎样不完善。在信仰社会主义的工人那里，只有一个党，就是社会民主党。”

我认为这里有很大的误解，然而过错不在巴·波·阿克雪里罗得！

巴·波·阿克雪里罗得从不怀疑信仰社会主义的工人只有一个党，即社会民主党。但是他看到，这个党可惜暂时还没有走出萌芽状态（这里阿克雪里罗得的感情恰恰是遗憾，而完全不是半讽刺），同时他提醒自己的同志们注意，不是无产阶级为这个暂时还很年轻的党而存在，而是这个暂时还很年轻的党为无产阶级而存在。难道这不对么？难道果卢别先生^②看不出，巴·波·阿克雪里罗得在提醒这一点的时候，正是**反对**这封信的锋芒所指向的**同一个“知识分子习气”**么？要知道患“知识分子习气”这种病的人，例如果卢别同志在自己的信中与之争论的小册子《工人代表大会还是工人政党代表大会》的作者，——要知道这些人都深信不是安息日为人而设，而是人为安息日而生^③；要知道，只要他们觉得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威胁着迄今所存在的那个党组织时（这个组织之不适于**觉悟的工人**已经为这封“信”十分有力地指出来了），他们就会决心停止这种发展。果卢别同志怎么没有理解到在这种场合巴·波·阿克雪里罗得**不可能是他的敌人**，而只能是他的同志

① 着重字体是果卢别同志自己用的。——著者注

② 原文为“r.”（先生），似系“r.”（同志）之误。——译者注

③ 语出《圣经》。——译者注

呢？至于工人代表大会可能具有的策略意义，我們的作者說：“把民主派联合起来——部分地說已經意味着召集非党的工人大会。”我认为，这是很好的思想，但是这个很好的思想表达得**可能使人得出錯誤的結論**。完全正确：代表大会会給工人运动强大的推动，从而会使无产阶级取得它有权得到而只是由于“知識分子习气”的政治錯誤——应当相信这不是永远的——它現在才放弃了的那种地位，即取得国内所有的民主派分子都将团结在它的周围、都将向它靠攏的**盟主**（领导者）的地位。我认为这也是果卢别同志的思想。但遺憾的是他沒有充分地認識到，**联合一切民主派分子是一回事，同他們完全合并又是一回事**。**联合**（即同盟）是必要的，而**完全合并**对于社会民主党则会有致命的危險。无产阶级政党願意伸出手来支援能够帮助它达到它的目的的那些社会团体，但同时应当保持自己本来的面目，即仍然是**无产阶级政党**。如果把它变成**劳动者不定形的政党**（这是社会革命党人十分希望的），那就是它的发展中的倒退現象。

我深信，我这样說时，並沒有說出任何比果卢别同志新鮮的东西。我深信，他自己也是这样想的。但是我要重申，在他的“信”中有一些說法可能給不合理的“知識分子习气”一种借口来譴責他自相矛盾，譴責他輕視原則的純洁性，等等等等。所以我曾經希望提出一个修改意見。这个意見也許可以預防这些攻击（哪怕是預防一部分）。因为它預先就指出它們是沒有根据的。

如果果卢别同志論述工人代表大会問題的那一章在我看来不仅是有趣的，而且也是很有教益的，那么他論述我們的派別分歧、糾紛和爭吵問題的那一章却使我——我可以坦率地、同志式地說出这一点——根本不滿意。果卢别同志写道：“只要弄清楚和深刻地考虑一下我国工人和知識分子对待实质上是統一的社会民主党内的**分裂現象**的那种态度，就不难得出結論說，分裂像头上打雷一样从上面即从‘理論家’那里落到我們身上來了，它像某种‘异己的楔子’插进了工人家庭，并且坚决地力求把它劈成两半，然后再劈成若

千小队，其中每一队大概都将有自己的‘老家人’^①，并且按照番号认为是某某。真的，这一切都会是可笑的，如果不是如此可悲的话，因为这不是号召我们大家进行工作，而是号召我们大家开玩笑。”

结论是：“分裂”不是“知识分子习气”造成的，而恰恰是“理论家”造成的。假定这是对的，虽然这是不对的，但问题其实不在于找出祸首，而在于怎样整顿事业。所以果卢别同志对这个根本问题的答复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如果听信他的信，那就可能以为，我国觉悟工人要扮演的是不困难的嫖母角色，即呵斥互相殴打的气势汹汹的“知识分子”儿童，从而使孩子们规规矩矩、安安静静。我一点也不反对嫖母的呵斥。干吗不呵斥呢？甚至很该呵斥一下。但是光只呵斥是不顶事的，糟就糟在这里！果卢别同志引证使法国社会党人统一起来的一九〇四年阿姆斯特丹国际代表大会。但是尽管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就统一问题向法国社会党人提出了自己著名的建议，却并未局限于提出一个良好的建议。它消除了引起分裂的那个原因。它这种做法就在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上给了西方——立宪——国家的无产阶级一个十分明确的策略指示。为了消除我们的分裂，必需解决我们在策略上的争论。这个争论是在非立宪——de facto^②——国家中进行的，即在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环境中进行的。无产阶级无疑能够解决这些策略争论。它无疑应当解决争论。归根到底无疑只能由它来解决争论。但是，为了解决争论，觉悟的工人必需用更加深思熟虑的态度对待它们，而不要再把它们看成是“异己的楔子”，看成是“理论家”毫无意义的游戏。这些争论不是游戏。啊，不！这里的问题涉及我们党的存在。在这里，你严厉地申斥“知识分子习气”是无济于事的。在这里，工人们应当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们越是迅速地解决它，他们就会更快地消除“知识分子习气”。让他们尽快地着手解决它吧。果卢别同志本人就在自己的信中涉及到各种策略问题。

① лядька, 指革命前贵族和富人家带孩子的老家人。——译者注

② 真正的。——译者注

而且就他所涉及的那些問題來說，他都作了正確的解決。但他只是涉及到它們罷了，應當直接去探討它們，應當從根本上把它們分析清楚。我們希望，在果盧別同志**第一封**這樣的信以後，將繼之出現**第二封**探討我們黨最迫切的策略問題的**信**。

再說兩句話：果盧別同志引證倍倍爾的話，倍倍爾說，當資產階級罵他的時候，他就會對自己說：“可見我是對的。”這話說得很機智。但是說得機智的話也要用機智去理解，然而我耽心，我們這裡很多人對倍倍爾的這句話的理解……**完全不一樣**：他們以為，可見，在這個或那個問題上凡是**資產階級所贊成的**意見永遠都是不對的。其實這是胡說八道。今年春天資產階級的《Temps》^①很贊成茹勒·蓋德在里爾反對工團主義的言論。資產階級也贊成過蓋德反對愛爾威的鬥爭。這是不是說蓋德錯了呢？

果盧別同志把我反駁一些同志的話（這些同志拿我國自由派政論家稱贊我這樣一種情況來吓唬我）稱作淘氣行為——這個名詞是他從我這裡借用過去的。我曾經回答說：——可是你們受到了無政府主義者的贊揚。果盧別同志對這個答复喊道：“這是怎樣一種辯論呢？”不過我承認，我不理解在這種場合下究竟是什麼東西使他苦惱。

我們這裡的人對怎樣看待其他陣營的人贊揚和斥責我們這個問題解釋得很壞。這種情況——請果盧別同志原諒我——甚至也表現在這封信上。然而如果這種說法是對的，那麼，指出對這個問題作片面的答复是有害的和沒有根據的，這個意見究竟怎麼會使人感到苦惱呢？

這就是我想就果盧別同志的“信”申述的全部看法。我衷心希望它有盡量多的細心的和善意的讀者。我想起一句諺語：“**萬事起頭難**”。我願意相信，果盧別同志的聲音不會始終是孤單的。其他像他一樣的——即能獨立思考的和忠於自己偉大事業的——工人

① 《時代報》。——譯者注

將繼之發表意見。

同志們，歡迎光臨！在我國工人政黨的文壇上，缺乏工人作者早就是一種顯著的現象。

巴黎，一九〇八年。

（譯自《普列漢諾夫全集》第十五卷第 428—435 頁）

过去的教訓

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九〇八年日内瓦出版的《没有蔷薇花的荆棘》论文集中。

作者用孟什维主义的观点总结了第二届杜馬以来政局变化的經驗教訓。他认为人民（主要是农民）对政府、对杜馬还有很深的幻想，和农民有骨肉之亲的军队还是专制制度可靠的支柱，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就是“使人民的觉悟革命化”，“使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朝有利于革命的方向改变”，这样就“可以建立一种力量能够胜利地抵抗反动政府的实力”，簡言之，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实行革命的實力政策”。普列汉諾夫根据这个总的观点分析了各种具体策略問題，分析了对第二届杜馬社会民主党党团活动的評價問題。他基本上肯定了党团中孟什维克代表的机会主义活动，同时大肆攻击布尔什维克。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否定工农联盟思想的言論。他直接宣称：“硬要自己相信对土地的经济要求已經使农民变成了无产者在政治上的同志和可靠的盟友的那些革命者也是錯誤的”。

列宁指出，普列汉諾夫对待“过去的教訓”的态度是“机会主义”的，他不是“掌握并且帮助群众掌握革命斗争經驗以进行更頑強和更坚决的斗争”，而是“掌握立宪民主党人背叛革命的‘經驗’并把它传授給群众”。

列宁在《政治評論》（載《列宁全集》第十三卷）、《論俄

国革命的“本性”》、《沿着老路走去!》、《談談对俄国革命的估計》(均載第十五卷)等文章中估計并且分析了第一次革命失敗以后俄国的政治形势,总结了“正面的教訓”和“反面的教訓”(第十三卷第421頁),批判了普列汉諾夫的謬論,确定了党組織在反动时期的任务。

第一届杜馬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活动已經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历史陈迹了。現在来证明六三政变和逮捕社会民主党議員是十足的国事犯罪行为,完全是多余的。整个文明世界都知道这一点,就連斯托雷平先生自己也知道,而在現在的情况下这是最重要的。早在第二届杜馬最初的某一次會議上,他駁斥一位立宪民主党发言人时曾經直接宣称:在他看来,实力高于权利。我絲毫也不想反駁这个其实远不新鮮的見解。我甚至准备贊揚斯托雷平先生的坦白作风。在我看来,現時唯一不空泛、不虛幻的問題就是:

为了使俄国人民有可能用实力来支持自己无可爭辯的权利,我們应当怎样行动?

从这本論文集所收載的米特罗夫、查帕里泽、策烈铁里等同志的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這個問題是我們的第二届杜馬議員同志們从他們刚刚开始进行議會活动时起就十分注意的。米特罗夫同志甚至称它是悲劇性的問題。所以,看一看我們的第二届杜馬党团的經驗中有怎样一些解决這個問題的材料将是很有益处的。我們应当力求尽可能更好地利用这种經驗,因为这个党团过去的成員以及他們所代表的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为着这个經驗曾經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

我們就考察一下这个經驗。

米特罗夫同志說:“我所謂悲劇不是人民生活的表面現象(像貧窮和飢餓这种看得見的悲劇乃是通常的現象)。悲劇藏在人民内心深处,局外的观察者是看不到的。我想,第二届国家杜馬所有党派的大多数成員,自然除开‘右派’,因为‘右派’的‘悲劇’

就是他們在選舉中遭到失敗，都在思想上或在感情上體驗過這種悲劇。

悲劇的結局落到了代表最廣泛的居民階層(城鄉貧民)的黨的大部分議員頭上，無論人們對這個比其他政黨更接近居民群眾的黨組織的缺點說什麼話，——這個結局可以說是內心悲劇的外部實現。”

當時人民情緒的主要特點是什麼呢？可以簡略地用這樣一句話來說明：**人民的要求的性質同人民認為實現這些要求所必需做的和可能做的事情的性質不一致。**

人民提出的一切要求中最主要的要求是土地要求。米特羅夫同志指出：“誠然，工人階級的代表用稍微不同的語言說話，但是他們說的話工人群眾是同意的，在他們工人的心理中，土地問題的重要性是不含糊的。‘土地！’——到處都眾口一詞地談論它。歷史這樣提出來的民族要求統治了一切人的思想……”

土地要求等於是要求剝奪在俄國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即大土地占有者。為了實現這個**經濟要求**，必須有**政權**。政權只有在人民表現了不可戰勝的革命力量時才會落到人民手上来。試問，這兩個必要條件當時是不是存在呢？

要取得政權，人民就應當追求它，而要追求政權，人民就應當認識到，他們的經濟要求只有通過政治革命才能實現。米特羅夫同志的選民們是否懂得這個道理呢？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從他那里知道這樣一點：“直接的印象是這樣的：儘管居民同意你們的意見，當你們談到經濟同政治的不可分割的聯繫，談到土地和自由的時候，當這些居民真正想像這些詞的時候，他們能夠清楚而且明確地提出來的只有一個：即‘土地！’在這裡，每一個發言者都是真正的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因為他們可以最詳細地向你們敘述這個或那個居民點、這個或那個葡萄園的歷史，敘述同當地土地占有者的關係，和作出最有利的土地安排計劃。”

總之，米特羅夫同志的選民們是“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而完

全不是政治家。他們很清楚當地能夠經營的各種土地的历史，但是他們只是“同意”那些說經濟同政治、土地同自由有不可分離的聯繫的人們的看法，而當他們自己想像這些詞時，他們就只能始終重復同一個經濟要求：“土地！”在第二屆杜馬選舉時代是這樣，直到現在在頗大的程度上也仍然是這樣。不久以前第三屆杜馬的農民小組提出了一項聲明，認為必須從速審查十一月九日法律，以便農民議員們夏天分散回去以後可以向自己的選民們解釋他們在這個問題上作了什麼事情。這個聲明中很具特色的是以下兩點：

“（一）我們這些全俄農民代表，願意提醒國家杜馬和政府注意，我們留在杜馬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土地問題。（二）同時我們要補充說，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沒有黨派的區別，無論在第一屆杜馬、第二屆杜馬或第三屆杜馬，我們一直都堅持一條：必須解決農民的土壤需要。”

這個聲明在我國反動派陣營中造成了極大的驚慌。這也是不奇怪的。農民通過自己的聲明表明，土地問題既不能用軍事審判來解決，也不能用遠征圍剿來解決，另一方面，當它還沒有解決，保守派要對農民寄予可靠的希望，那是絕對不行的。《蘇維埃報》在談到關於農民的土壤應支付的金額的討論時寫道：“這些討論給人的總印象是不愉快的。使人耽心的是革命者和立憲民主黨人在農民議員中間進行的陰謀發生了作用，所以農民在談到自己對杜馬的要求時立刻採取了這樣的立場，好像杜馬是一個敵視農民利益的營壘。”（第一百三十號《言論報》上引用了這段話。）

我且不談所謂立憲民主黨人和革命者在農民議員中間進行“陰謀”的問題。立憲民主黨人對於所謂他們企圖影響農民議員的說法曾經在刊物上提出過抗議。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可以不相信他們。至於革命者，例如社會民主黨人，那麼，還需要通過經常不斷地影響農民議員的選民們的辦法為自己开辟影響農民議員的途徑。但無論如何有一點是不容懷疑的。

現在的杜馬實際上不過是敵視農民利益的營壘，所以農民議員——不管他們屬於什麼黨派——決不能認為大土地占有者是自己的朋友和保衛者。用革命的精神影響農民之所以可能就是因為農民的利益同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之間存在着毋庸置疑的和不可調和的對立。但是這種影響無論如何是需要時間的，現在還很難說它究竟什麼時候會帶來所有那些可能帶來和應該帶來的成果。在期待這些成果時應當用清醒的眼光看待局勢，而且不要忘記，以農民集團的名義所作的聲明完全證明不了我國農民議員政治上有很大的進步。正像第二屆杜馬選舉時期的情況一樣，農民現在只能清楚地和明確地提出一個要求：即“土地！”這個經濟要求同任何政治任務有沒有聯繫，這一點他們至今仍然是模糊的。所以他們不分黨派全都斷然宣稱：“我們留在杜馬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土地問題。”他們雖然清楚地看見自己的目的，卻看不見能夠使得他們達到這個目的的那些手段。因此，不僅那些以為農民在政治上愚昧無知會使農民成為舊制度可靠的支柱的反動分子是錯誤的，就是硬要自己相信對土地的經濟要求已經使農民變成了無產者在政治上的同志和可靠的盟友的那些革命者也是錯誤的。

我早在第五期《社會民主黨人日誌》上就指出過（參看〔上面〕《論俄國土地問題》），農民現在要求“土地”的情緒不是革命者創造出來的，而是“俄羅斯國家的歷史”所創造的。我在那裡說過，俄羅斯國家逐漸地變成了托馬斯·霍布斯夢想過的那個利維坦，它按照每個人的職務和地位分給他一塊土地。土地占有成了認真服軍役的必要條件；它也成了“有賦役的人”認真履行自己對國家的義務的必要條件。這就是我國舊制度的經濟基礎。^① 不難理解，生長在這個經濟基礎上的意識形態“上層建築”會是怎樣的……如果土地是有賦役的人認真履行自己對國家的義務的必要條件，則完全自然的是，每當“國王的孤兒”受到“土地的壓迫”的時候，他們就

① 參看本書上冊第 302—304 頁。——譯者注

会要求(按照自己的方式要求,按照“孤儿”的方式要求,但毕竟是要要求)再次重新分配土地。^①但是要求再次重新分配土地在“国王的孤儿”的心目中完全不是革命的要求。完全相反!“当沒有接受革命宣传的农民(要知道目前受到这种宣传的毕竟是不大的少数)談論必須从地主手里夺回土地的时候,他的头脑里并没有想到他正在震动某个‘基础’。完全相反!他认为自己是他世代代目为神物的那个經濟基础的**保守者**,因为俄罗斯国家在整整若干世紀的过程中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所以他真誠地认为反对重新分配的地主是**暴动分子**。在某种意义上,即在有**自觉意图**的意义上,他的确也是保守者。”^②現在从第三届杜馬那里要求土地的那些“右派”农民无疑也是这样的保守者。而且有理由认为米特罗夫同志的相当大一部分的选民也属于这类的“保守者”。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才产生我上面所指出的农民的經濟要求的性质和农民希望借以實現其要求的那些手段的性质之間的不一致。选民們对米特罗夫同志和其他左派議員們說过:“我們支持你們”。但是这个支持的諾言在他們的嘴里是什么意思呢?最可能的是当左派議員在杜馬中开始談論土地的时候,他們的选民們就准备比方用宣誓来证明,沒有土地人民真正会“走投无路”。但是从这种证明到用革命的办法支持极左派的要求还相隔很远。米特罗夫同志說:“我記得一个庫班的哥薩克人,我曾經和他一起坐过两站火車的路;他形象地說明了他对国家杜馬和杜馬策略的观点,这总的說来反映了所有居民(至少是庫班地区)的观点:‘国家杜馬应当像未婚妻一样,当她走进丈夫家里时,起初总是百依百順,后来一旦认清了环境,住慣了,就会变成完全的主人’。”

这其实不是“策略”,而可以說是完整的战略。但是在这种战略中完全沒有表现出革命的心理。如果国家杜馬像走进丈夫家里

① 《論俄國土地問題》,《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五期,第13頁。——著者注(參看本书上册第302頁。——譯者注)

② 同上,第15頁。——著者注(參看本书上册第303—304頁。——譯者注)

的年輕的妻子，那就得知道，根据人民的概念，不是丈夫應該服从妻子，而是妻子應該服从丈夫。因此很明显，一个黑海的战略家根本不会想到国家杜馬在对待自己的“丈夫”（即对待最高当局）的态度上可以扮演例如当年天后叶卡捷琳娜在对待自己的至尊的丈夫的态度上所扮演的那种角色。一位黑海統帥首先希望妻子不同丈夫爭吵，而是服从丈夫。在他看来，只有通过順从，她才能影响丈夫，才能成为家里完全的主人。很难想出更“机会主义”的战略了；但是从这样一些人身上期待另一种战略暂时还不可能；他們在宣布急进的經濟要求的同时竟认为（而且正如我上面所說的一样，也不能不认为）这些要求实质上是保守的。

請注意，向米特罗夫同志說出自己的战略見解的那个哥薩克人的心理絕对不是独一无二的。例如米特罗夫同志坚决地說，后来他才不怀疑，整个俄国的居民都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他們到处“这样提出了大規模的‘土地’要求和同一个軟弱无力的策略”。

这些居民之所以喜欢**軟弱无力的策略**，因为他們在大多数場合下还完全不了解为什么需要革命**实力的策略**以及这种策略的具体內容会是怎样的。其次，他們还不习惯于把自己看成是政治力量的泉源；相反，他們指望杜馬是一种可以保卫他們不受世代压迫他們的人的侵害的力量。实际上当然只有人民才能使杜馬成为强大有力的。然而在人民看来，杜馬之所以使他們变成强大有力的，是由于自己同“丈夫”即同最高当局的亲密关系。这种情况就足以使得人民在驅散杜馬的时候变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人民（我說这話时是指农民群众以及具有农民情緒的群众而言）指望从杜馬那里得到很多东西；但是他們甚至沒有想像到他們可以积极地支持杜馬。对于离开村社以后按照上級的命令穿上軍装并且被分配到团队、营队和海軍步兵部队的那些人民，也可以这样說。

尔·格罗斯同志在自己的文章《士兵和国家杜馬》中說道，当

世界上出現了國家杜馬以後，士兵們就把實現自己兵營里的渺小意願的希望從指揮官老爺們身上轉移到人民代表身上。“他們和其他許多人一樣，認為只要人民代表說句話，一切都會從這句話中產生出來。他們深信，人民代表的一句話就足以消滅他們兵營里的醜惡處境。所以兵營一直期待着，夢想很快國家杜馬就會把自己仁慈的目光投到它身上來，並且開始談論如何改善它的命運。”

但是不管“兵營”對國家杜馬會給予它的那些恩惠幻想得怎麼多，無可懷疑的是，兩次驅散人民代表只有借了“兵營”才是可能的。如果彼得堡的居民起來保衛被驅散的人民代表，那麼兵營就會向他們射擊，像它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向工人射擊一樣。我願意承認，在這裡突出的例外也是可能的；但是一般規則畢竟是：如果居民起來保衛杜馬，期待杜馬的恩典的“兵營”就會開槍射擊居民。“兵營”的心理是按照農民群眾的心理的樣子形成的。作為農村子弟來說，士兵本來應該清楚地理解“偉大的全國性的土地要求”的意義，但是在絕大多數場合下他們對待這樣一些政治條件的態度是盲目的；如果沒有這些條件存在，解決土地問題就始終是無益的幻想。

情況就是這樣。只有根本不瞭解這種情況才會堅持把政策建立在這樣一種信念的基礎上：即像“布爾什維克”在斯德哥爾摩代表大會上硬要我們相信的一樣，相信武裝起義是我國運動已經“達到了的階段”。如果在驅散第一屆杜馬以後，列寧主張通過革命的“三人小組”和“五人小組”號召武裝起義，而無需等待第二屆杜馬的選舉，那這只是證明“布爾什維克”這位可敬的領袖始終是一個頑固不化的空想主義者。

但是除了空想主義策略的保衛者以外，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队伍里還有不少真正的**社會民主主義**策略的擁護者。

我們的第二屆杜馬議員同志們，面對着他們的大部分選民即農民向他們提出的那個“軟弱無力的策略”究竟是怎樣表述這個社

会民主主义策略的任务的呢？

在这里我們首先看一看查帕里泽同志的論文《第二屆国家杜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

查帕里泽同志也肯定地說，在第二屆杜馬时期要人民举行反对政府的公开起义那是不可思議的。他問道：“它（即我們的党团——格·普·）能不能在提出人民的要求时利用把它派遣出来的人民的力量威胁政府，它能不能在說明宪法基础的全部虛幻性时号召人民举行公开的起义呢？当然不可能。

“党团懂得，这种性质的发动注定会使它成为一小撮脱离真实的现实生活和搖擺誰也不害怕的紙劍的叫喊家。它懂得，号召現在采取行动，即使成功，其結果也只会是一部分有觉悟的无产阶级举行孤立的起义，他們一定会被人无情地击倒在地上。”

无产阶级的代表們清楚地看到，現在我国的力量对比关系使人无法指望有成功的革命发动。人民——即跟着先进的无产阶级走但在觉悟方面远比他們落后的人数众多的居民群众——坚决建議社会民主党代表采取米特罗夫同志中肯地称之为“軟弱无力的策略”的那个策略。我們的党团不能閉眼不看这种坚决建議的无可爭辯的事实。閉眼不看这个事实无异于走到空想的領域里去。但是另一方面，它也不能同“軟弱无力的策略”和平共处。同这个策略和平共处意味着背叛无产阶级的革命本性和革命使命。摆脱这个实际上可能是悲劇現象的矛盾的出路何在呢？出路有一个：党团本应致力于使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朝有利于革命的方向改变。它本应致力于使人民的觉悟革命化。它越是成功地履行了这个义务，实行革命的實力策略，拒絕选民們所建議的“軟弱无力的策略”就越有基础。所以我們的党团立即着手履行自己的这个义务。

查帕里泽同志繼續道：“党团自己确信不可能用立法的办法使国家实行和平改造，它力求使居民也接受这个信念；它力求向居民指明，沒有坚忍不拔的和始終不渝的斗争就是最起碼的权利

人民也不能得到。为了使全国的注意集中到杜馬里所討論的問題上，为了特別突出地指明人民的希望和意願同政府的希望和意願这两者之間的根本区别，社会民主党党团力求把人民生活最迫切的問題提到首位；它始終坚持在杜馬中就一切重要問題进行原則性的辯論，并且不断地同立宪民主党人借口所謂杜馬的‘工作能力’希望把所有一般性的辯論都轉移到委员会去的做法进行了斗争。”

查帕里泽同志接着指出，我們的党团广泛地利用了质詢权，并且为了建立对行政权的真正监督，在一切重要場合下都曾要求把一些特別的杜馬議員、甚至偵查組派遣到地方机关去。他說：

“由此可見，社会民主党党团为了在实现无产階級社会主义教育的同时也实现对全体人民进行政治教育的任务，曾經把广大居民阶层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杜馬工作上，而且它在說明如果杜馬沒有人民的有組織的力量做后盾、它的权利完全是虛幻的时候，曾經用看不見的紐帶把所有在杜馬的推动下参加政治生活的人同杜馬联系起来，它把这些人团结到杜馬周围来了，以便今后在同旧制度的艰苦斗争中依靠他們。”

这恰恰是我們党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表述了它的基本原理的那个策略。人們从两个观点对这策略进行了攻击：一些人譴責它是机会主义；另一些人則发现其中有过分多的烏托邦式的革命主义。

譴責它是**机会主义**的那些人坚信武装起义是我国解放运动已經“达到了的阶段”。現在任何人都看得到，抱有这个信念的人是大錯特錯了。在自己的策略考虑中（“估計”目前“形势”），这些人不是按照人民的本来面目看人民，而是把人民看成本来應該有的那个样子……以便适应他們那个革命人民的理想，才不会使他們的革命“指示”丢脸。

那些譴責这个策略是**烏托邦式的革命主义**的人犯了另一种錯誤。他們無疑是估計了人民当时的情緒；他們懂得，这时大多数选

民群众都没有超过“软弱无力的策略”。从这方面说他们是对的。但是当把他们把这个“软弱无力的策略”变成他们自己党的策略，当他们想强使无产阶级政党接受这种策略的时候，他们就再错误不过了。

只有政治上落后、对经济和政治的联系仍然还是完全无知的那些选民群众，才会指望“软弱无力的策略”产生良好的作用。只有相信政治奇迹，即相信旧制度会自杀的人，才能相信这个策略会产生良好的作用。但是相信政治上的奇迹恰恰就是乌托邦，而且在这个场合下这种信念绝对不会不再是乌托邦的，因为传染上这种信念的人——人民自由党党员——同革命的意愿是格格不入的。乌托邦主义并不永远是革命的。

至今一直责备第二届杜马我党党团的策略有乌托邦式的革命主义的人们，在自己的政治考虑中一直把人民看成政治上落后的人。他们不愿意看到，随着人民在生活沉痛的教训下政治认识的提高，即随着人民觉悟的增长，人民正在起变化，也应当起变化。而且正是因为他们不愿意从严肃的政治活动家唯一应当采取的这个观点来看人民，正是因为社会生活本身是不断的变化过程，他们就使得自己不可能对人民群众的政治教育发生多少重大的影响。

责备我们的党团有乌托邦式的革命主义的人肯定地对党团说：“话讲够了，该从言论转到事业了”。但是当时最重要的事业是什么呢？俄国正在经历的这整个历史时期最重要的事业是什么呢？就是建立一种力量能够胜利地抵抗反动政府的实力。在真正反对我国旧制度的人们那里，不能有任何其他的事业可以作为独立的政治任务。任何其他的事业都应当从属于这个主要的事业；任何其他的事业都应当从这个主要事业的观点予以评价；凡是有助于这个主要事业的就是好的、有益的、革命的；凡是妨碍它就是坏的、有害的、反革命的。所以如果人民自由党拒绝干这番事业，那么它只是以此表明，在同旧制度的斗争中它自己不能从言论

轉到事業。

必須從這個觀點，即從反對舊制度的人主要的政治任務的觀點來考察所謂“愛惜杜馬”的問題。既然拒絕抵制的思想，既然承認自己的代表參加杜馬是有益的，俄國社會民主黨自然應當“愛惜”杜馬，就像任何一個戰士應當愛惜他希望用來多少有力地打擊自己的敵人的那件武器一樣。但是戰士之珍視自己的武器只是直到他有可能利用這件武器進行這樣的打擊時為止。同樣，社會民主黨只有在它有可能利用杜馬來動搖舊制度、從而提高人民的政治覺悟的範圍內才會珍視杜馬。無論如何要“愛惜”杜馬，為了“愛惜”杜馬而不去提高這種覺悟，意味着鄙棄自己固有的目的，意味着背叛自己首要的和根本的義務。

社會民主黨黨團也是這樣看這個問題的。查帕里澤同志說：“除了杜馬內一小撮黑幫分子外，自然誰也不會希望解散杜馬，但是‘愛惜’杜馬的目的和方法，不同黨團各有不同。社會民主黨通過長期的和頑強的鬥爭終於得到機會沖上了杜馬講壇，從這裡它可以公開地向全體人民說話，它當然決不會願意拋棄這個權利。社會民主黨認為，現時採取任何步驟指望在沒有人民運動的條件下用杜馬的力量奪取新的權利，都是一種不可磨滅的罪行，因為如果採取這種步驟，政府就有可能攻擊人民代表機關，而外表上看來還好像完全合乎憲法。不過社會民主黨之愛惜杜馬，重視杜馬，只是因為杜馬起了團結人民群眾並且推動他們作進一步鬥爭的政治水泥的作用。一旦杜馬不再滿足這個要求，它就會變成空洞無味的清談館，在社會民主黨看來就沒有任何價值。”

一句話，我們的黨團在自己的策略考慮中沒有把人民看成是一種他們應當如何如何的人，像某些沒有耐心的革命者所認為的一樣，也沒有把他們看成是一種政治上落后以致不能理解經濟和政治的聯繫的人，而是把人民看成是一種在我國政治矛盾的暴露過程中發生變化的人。它的全部策略從頭到尾都是為了要大力地促進這個發展過程。所以當我們現在回顧我們的第二屆杜馬黨團

的活动时，我們应当以感謝的心情承认，这个党团完全正确地理解了自己的任务，即完全正确地理解了在政治觉悟方面大大高于农民群众并且十分关心于用革命精神教育这些群众的觉悟无产阶级政治代表的任务。我們党团在第二届杜馬中的策略是它的政治遺囑，而我們在政治上的成熟性将表现在我們能够在何种程度上理解和执行这个遺囑。

我說这話的时候根本不是想断言，我們的党团在第二届杜馬中完全没有錯誤。第一，只有什么事也不做的人才从不犯錯誤；第二，我們的同志們本着无产阶级代表完全應該有的正直精神自己就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不过我要請讀者注意，其中最重要的錯誤同最热心于誹謗我們党团的策略的人所謂的錯誤是毫不相干的。

这些錯誤中最主要的已經由策烈铁里同志十分中肯地指出来了，他說：“一般說来，用討論策略来代替实现策略，这就是我們初期的最大过錯，是最不恰当的、把党內的作法搬到杜馬中去的方式。”这的确是很大的过錯，还在我党伦敦代表大会上我就指出过这一点。实际上，日本人在和俄国士兵相遇时并不是向他們就自己在同他們斗争时将采取什么策略发表演讲，而是干脆利用自己的策略优势打击他們。但是用空想主义的精神誹謗我們党团的人則认为，党团的主要的战斗任务正是在于发表类似的讲演，如果我們的同志們不願意这样做，他們就叫喊机会主义、背叛革命、背叛无产阶级，以及諸如此类。

恩格斯在自己的一封致左尔格的信中說得对：任何运动都不会像它还处在发展的宗派主义阶段时那样做出这样多无益的工作^①。最近几年来我們的运动事实上已經大大超越了发展的宗派主义阶段；但是它的許多“领导人”的心理可惜还未能适应新的政治条件，而仍然深深地浸透着宗派主义精神。这些落后的运动“領

^①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給美国人的信》第 229 頁。——譯者注

领导人”（运动远远地超过了他们）给俄国无产阶级在杜馬党团中的有觉悟的代表们指定了许多无益的工作。谁愿意想像这些代表曾经在其中进行工作的那个环境，谁就一定得注意他们那些落后的有宗派主义思想的同志强迫他们去做的那种无益的工作。

当我读到或者听到“第二届杜馬社会民主党党团”一语时，我不由得回想起策烈铁里同志那张刚毅严肃、但同时是忧郁的面孔，我觉得不是别的，正是一想到由于自己那些烏托邦式的誹謗者的政治偏見所造成的无謂麻煩而迫使这位同志馬上去完成那个巨大的、然而无益的工作，这张严肃刚毅的面孔才出现了忧容。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这种麻煩的回忆也透露在这本文集所收載的策烈铁里同志的文章中。可見，策烈铁里同志是在回忆这些麻煩的影响下談論我們党团的策略过錯的。而果然不出所料，他完全不是在他的党内敌人們对这些过錯所发表的叫喊那个意义上来談論这些过錯的。他的結論是，我們党团的最大过錯不是它同宗派分子的胡說断絕了关系，而是它终于向这种胡說作了某些不自願的让步。对这些胡說的让步就在于……面对着敌人的炮火有时不去实现策略而是討論策略。

策烈铁里同志很好地形容了作这种让步以后所出現的尷尬情况。他說，当他准备好了自己将在杜馬中发表的第一篇演說时，他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我們党团在对待政府的态度上将采取什么立場以及在同政府斗争时将坚持什么策略。直接批評政府的行动在他看来是第二位的任务。他承认：“只是在发表演說时，当批評政府的那一段話引起了我没有預料到的注意并且由于右边的打断几乎变成了純粹的對話时，对我本人說来，这方面才提到了首位。相反，只要我一轉到解释策略，听众的注意就冷淡了，右边的叫喊声一平息，我就感到这些議論不必要，并且在这个想法的影响下刪去以前认为最重要的那些議論。不过，我来得及就策略問題所說的那番話自然也是多余的，正像在应当斗争的地方任何关于斗争方式的議論都是多余的一样。”

这是对的。如果策烈铁里同志有一些不对的话，那么不对的地方只在一方面：即他毕竟不是始终足够坚决地在自己的文章中强调说明在应当斗争的地方发议论是多余的。例如策烈铁里同志在谈到阿列克辛斯基关于预算问题的发言，并且指出在这篇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演说中发言人批评了政府所奉行的、违反国家最迫切的需要的农奴制政策时说道：

“但是关于社会主义者的理由他总共说了两句话：他建议杜马否决预算时会指出，我们社会党人本身不仅拒绝批准这个预算，而且拒绝批准任何阶级预算（классовый бюджет），同时我们认为否决这个预算是整个杜马多数的直接义务，如果他们真正希望忠于民主派的任务的话。这样做是不是忘记了或者忽视了社会主义宣传的任务呢？我觉得不是。自然，最好是多少比较详细地发挥我们对于一般阶级预算的原则观点，但问题的实质不在这里。如果作最详细的叙述，在现今的条件下这个方面本来应当退居第二位。无论我们怎么对待一般的阶级预算，事实上摆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专制政府的预算，这个预算由于具有农奴制拥护者的阶级预算的性质，就同整个国家的切身利益发生冲突。所以用各种办法打击它，本身并不包含任何特殊的社会主义内容。”

这也是对的。用各种办法打击专制政府的预算，本身并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内容。但是策烈铁里同志对于来自空想主义阵营中的诽谤者作了完全不必要的让步，他说：“我觉得打击专制政府并不意味着忘记社会主义宣传的任务。”对于这个问题不应当用假定的口吻说话，而要用肯定的口吻，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谈这个问题也就是对付俄国革命者根深蒂固的偏见。

早已亡故的米海洛夫斯基在批评我国恐怖主义者错误地理解（像他所认为的那样）自己的政治任务时写道：“你们的杀害行为本身并不包括任何社会主义内容。这是纯粹的政治斗争行为。”^①米

^① 《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政治书信》，第二封信（社会革命“民意”党文献，第172页）。

——著者注

海洛夫斯基把社会主义同政治对立起来了。这种对立是我国革命者从蒲魯东和巴枯宁那里继承下来的教条。自从馬克思主义出現以来，这种教条就被认为是站不住脚的了；我国的馬克思主义者懂得，——不过話又說回来，可惜远不是完全懂得，——任何階級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然而俄国革命者如此习惯的、社会主义和政治的旧对立并没有完全絕迹。例如我們看到，它在策烈铁里同志也不得不加以考虑的、社会主义宣传任务同民主主义鼓动任务的那种对立中留下了非常显著的痕迹。但是这个新对立也和过去的旧对立一样是没有根据的。

社会主义宣传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向无产阶级說明他們获得解放的历史条件。在我国，推翻旧制度无疑是这些条件中的一个。但是推翻这个制度要求所有那些希望夺取政治自由的居民階級和阶层同心协力地对它施加压力。社会主义的宣传应当向无产阶级說明这个道理，无产阶级也应当了解，当自己的代表們在杜馬中給专制政府以严重打击时，他們也就是在完成他們的无产阶级事业。如果这种說法是对的，那么很明显，民主主义的鼓动——自然得要它是以应有的方式进行的——乃是解决已經落到我国无产阶级肩上的那个历史任务所絕對必要的——一个手段。不用說，从民主主义鼓动的直接目的不是根除資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个特殊的意义上来看，这种鼓动不是社会主义的事业。恰恰相反，民主主义鼓动的最近目的是建立这样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資本主义生产关系将获得最大的发展。但是，正如馬克思早就說过的，工人們知道，或者至少應該知道，“他們自己的革命运动只有借助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等級和专制君主制的革命运动才会加快起来。”既然无产阶级知道或者至少應該知道这个道理，那么把社会主义宣传任务同民主主义鼓动任务对立起来就不合邏輯了。民主主义鼓动不是社会主义宣传；但是指出民主主义鼓动的充分必要性应当是俄国社会主义宣传的第一步。所以从事民主主义鼓动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忽然想起提醒他注意他的社会主义义务的那些人面前，毫无

必要感到內疚。他有充分的权利对他們說：“我进行民主主义鼓动正是因为我很好地懂得我作为社会主义者的义务。”而且在他作这个答复时不应当有任何怀疑的語气；他不必說“我觉得”，而应当說：**我坚决不移地深信**。換言之，这就是說，策烈铁里同志的策略甚至比他自己所想到的还要正确。所以在反駁策烈铁里同志时我想請讀者注意这个情况。

譴責我們的第二屆杜馬党团有机会主义的那些空想主义者之所以对它特別生气，因为它认为沒有必要鄙弃人民自由党。这些空想主义者在曼捷里别尔格同志的文章《第二屆国家杜馬一生的最后两天》中讀到关于立宪民主党人面对着即将到来的国家政变所采取的行动的令人失望的消息时或許不无幸灾乐禍的心情。他們也許会喊道：“啊哈，我們过去攻击人民自由党不是无缘无故的。”但这将是一句无聊的空話。問題完全不在于立宪民主党本身是好是坏，而在于在一定的条件下它能不能給政府造成一定的困难。假使能够（而它毕竟是能够的，我国黑帮分子瘋狂地仇視它就证明了这一点），那么无产阶级就沒有权利不利用它的反政府立場，而是有义务支持它，以达到自己本身的目的。当无产阶级利用资产阶级的反政府立場和支持这个立場以打击沙皇制度时，那就不是它为资产阶级服务，而是资产阶级为它服务^①。这对馬克思主义者說来是不言而喻的；只有布朗基主义者才可以不了解这个道理。而且最妙的是，我国某些社会民主党人所謂我們党团有机会主义的种种責难很有点像当年巴枯宁在自己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一书及其許多别的著作中硬說馬克思背叛无产阶级事业的那些譴責。

还在一九〇五年秋天我就写过：“反动派力求孤立我們；我們

① 关于这一点詳見我的小冊子《我們和他們》。圣彼得堡，一九〇七年：我在我党伦敦代表大会的一次會議上对罗·卢森堡同志的答复〔參看本书第326—327頁。——譯者注〕。——著者注

应当力求孤立反动派。”^①我这句话使我国空想主义者对我产生了至今尚未冷静下来的愤怒。从《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军事和战斗组织第一次代表会议记录》^②中，我看到，不过在第二届杜马选举前夕，我的某些同志曾经认为我这句话是极端有罪的。

他们得出了结论，说力求孤立反动派等于力求孤立于革命之外。例如在这次代表会议上作了《论目前形势》的报告利维茨基同志就是这样看的。我很遗憾，正像从这些记录（第七十九页）中看起来的一样，利维茨基同志的报告速记稿还未经过整理，所以我无法弄清这位同志激动地大声地攻击我的究竟是哪些话。我主要根据阿利宾同志的发言来判断一下他的攻击。阿利宾在反驳他的时候说道：

“报告人特别攻击了普列汉诺夫同志，因为他向党提出了孤立反动派的要求。根据利维茨基同志的意见，孤立反动派就完全等于孤立于革命之外。我弄不明白，利维茨基同志这个肯定的断语是怎么来的；我只有用他忘记了除开自由资产阶级以外还存在着农民和相当民主的、甚至急进的小资产阶级阶层才能说明它。我们迟早必须孤立于自由资产阶级之外，因为我们的要求永远超过他们的纲领。我们甚至在敌人营垒里看见他们，但是我不认为普列汉诺夫同志对这一点知道得不如我们。”^③

阿利宾同志说得对，他说，我们迟早必须完全孤立于资产阶级反政府派之外；如果他用稍微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思想，他就会更对。为了更确切，他应该说，自由派的、甚至急进派的资产阶级迟早会使自己孤立于革命无产阶级之外。但是第一，这里自然

① 参看本书上册第283、326页。在一九〇五年秋天普列汉诺夫的论文中没有查到这句话，但这句话实际上是《我们的处境》一文的基本思想。——译者注

② 参看列宁写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一月军事和战斗代表会议的记录》一文，见《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397—406页。——译者注

③ Ibid（同上。即指《我们和他们》一书。——译者注），第80页。——著者注

产生一个问题：什么时候将有这种事情呢？第二，应该问一问自己：甚至在自由的和急进的资产阶级开始使自己孤立于无产阶级之外的情况下，无产阶级为了自己同旧制度斗争的利益，应该不应该力求利用这个资产阶级的反政府立场呢？在策略上我国自由的和急进的资产阶级已经开始使自己孤立于无产阶级之外，但是这种情况还没有使它同旧制度言归于好。如果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政党用自己的策略促使资产阶级同旧制度和解，而不是使它同旧制度的冲突尖锐化，无产阶级的这种做法就完全不对头。它这种做法就会是对自己的敌人的一次大效劳，换句话说，它就会大大损害自己本身的事业。其次，在军事和战斗组织代表会议上发生的一切争论清楚地表明，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很不了解当时农民的情绪。他们全都以为，在政治方面农民已经成熟到足以积极地支持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动。因此——而且仅仅因此——他们才能说：“俄国革命作为人民群众的运动，结束了‘和平’斗争的时期，走上了武装起义的道路。”^①如果这是对的，那么对我们说来设法使自由的和急进的资产阶级同旧制度的对立尖锐起来的必要性，的确就会是毫无目的和毫无益处的了：因为要打倒敌人，联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力量就足够了。^②不幸的是情况根本不是这样。这一点从我上面所引证的米特罗夫同志的文章中可以看的最清楚。这篇文章表明，人民（即主要是农民，正像我上面预先说明的一样）那时决没有打算走“武装起义的道路”，甚至十

① Ibid, 第59页, 瓦林同志《关于过去武装起义的尝试》的报告。——著者注

② 实质上, 把农民和资产阶级这样对立起来是不正确的: 农民本身就有很多资产阶级的东西。——确切些说, 小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我保留这个对立, 因为这是阿利宾同志的做法, 同时还因为它是反对我们的那些空想主义者的头脑中牢固的偏见。我愿意告诉他们, 甚至从这种实质上错误的对立的观点来看, 他们也是不正确的。至于作为对农民进行适当的政治教育的结果出现的那个力量对比关系, 则只要记住士兵是农民的亲骨肉就会对它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农民的政治觉悟达到适当的程度, 意味着刺刀、大炮和馬刀不会起反对我们的“作用”, 而会起拥护我们的“作用”。——著者注

分确定地建議采取“軟弱无力的策略”。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根本不了解当时人民情緒的情况，我們的所謂左派同志們才對我們的第二屆杜馬党团大肆攻击。这些所謂左派同志既然认为农民已經有了足够的教育可以立即采取革命行动，自然要用有成見的眼光来看党团給自己提出的那个不断提高人民政治觉悟的任务。我們的所謂左派同志既然用輕視的态度看待这个任务，所以他們沒有促进这个任务的解决，而大大妨碍了任务的解决，这也是自然而然的道理。我們党团处境的主要悲剧成分恐怕也就在这里。米特罗夫同志认为是我們党团处境中可悲的那个东西（即人民的政治力量同他們的經濟要求的急进性质的不一致），实际上是十分自然的，所以它不能长久地始終成为我們在杜馬中的同志們感到不安的根源。同时我們看到，我們的党团很快就不再因为这种不一致而感到不安，它甚至采取了許多旨在消除这种不一致的适当办法。坚持馬克思观点的革命无产阶级代表們不难从历史必然性的观点弄清农民的政治落后性。要从这个必然性的观点来看自己同志們（这些人背熟了馬克思主义固有的術語以后驕傲地說道，他們的活動是不自觉的历史进程的自觉表現）的政治落后性就困难得不能相比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无疑的是真理在我們党团一边，而不在它的誹謗者一边。所以这个党团的活動越是經過時間的考驗，它的策略的充分合理性就会表現得更加明显。

所以每當我們面前提出我們应当怎样利用过去的教訓，我們应当怎样行动，以便使俄国人民終於有可能用实力維護自己毋庸置疑的權利的問題的时候，除了下面这个答复以外，我們是不能对它作其他回答的：

我們应当繼續按照我們的党团在第二屆杜馬中进行工作的那个方向进行工作；我們应当實現它关于从政治上教育我国人民的那个遺囑。

它的遺囑是可以實現的，其保证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甚至右派农民又重新提出“伟大的全国性的土地要求”，而當他們提出这

个“伟大的全国性的要求”时，他們——根据我国保守派极有特色的說法——在第三届杜馬中所采取的行动（自然他們也感觉到了）竟好像他們是处在敌人的营垒中一样。

Der Widerspruch ist das Fortleitende, ① ——黑格尔老人說过：矛盾引导着前进！

（譯自《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十五卷第 436—455 頁）

① 最后一句話就是譯文。——譯者注

馬克思逝世二十五周年

政論家短評

(摘 譯)

這篇文章于一九〇八年三月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三号上。这里摘譯的是文章的末段。最后的删节号是原文有的。本文跟《普列汉諾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三卷第二一五——二一九頁收載的同一标题的文章是两篇內容不同的文章。列宁在讀到这段文字以后，立即写了《沿着老路走去!》一文。列宁指出，普列汉諾夫“小心翼翼地企图证明孟什維克要无产阶级依賴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是正确的”，“为了迎合那些反动的孟什維克理論”就“伪造恩格斯的話”，以便“让伯恩斯坦們和斯特列尔措夫們大大地开心”(參看《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23、29頁)。

.....

再說兩句話。恩格斯也批評过馬克思。但是他充分地掌握了批評馬克思所必要的准备材料。而且他的批評所得出的結論是严肃的和對事业有益的，尽管“修正主义者”企图按照自己的見解来歪曲它們。这些結論，归結起来就是认为一八四八年馬克思(当时恩格斯也完全同意他的意見)在兩方面犯了錯誤：第一，他低估了当时資本主义发展的能力；第二，他高估了当时沒有覺悟的絕大多

数无产阶级采取革命行动的能力。如果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年善于避免半个多世纪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国犯过的这些错误，那对俄国该多好啊！……

（译自《普列汉诺夫全集》第十六卷第 298 页）

附 录

馬克思哲学的进化

这篇文章写在一九〇〇年以后，具体年月不詳。文章最初发表在一九二四年莫斯科出版的《“劳动解放社”文集》第二卷上。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对馬克思主义創始人哲学发展的道路作了完全錯誤的說明。在他看来，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发展的“整个道路是由三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黑格尔的抽象的自我意識，第二阶段是費尔巴哈的具体而又抽象的人，第三阶段即最后阶段是现实的人，生活在特定社会經济环境下现实階級社会的人”。这个論点同样說明，普列汉諾夫“忽略了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政治实践的和階級的差別”（《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第 611 頁），說明他不懂得这种差別必然要反映到他們的哲学思想上去。

老实說，真該把哲学算作可疑的科学。过去，在泰利士-亚里斯多德时代，哲学是无所不包的。它統轄了一切科学領域。大家知道，概括古典思想的亚里斯多德是許多門科学的普及者和創立者。他是形而上学家、物理学家、动物学家、伦理学和邏輯学的創立者。他的一部比較不著名的作品《問題集》，包括当时众所周知的人类知識各部門的种种問題和回答。古代的論文大都用《論自然》、《論宇宙》作标题。哲学对科学的这种霸权一直維持到十九世紀前二十五年末。还在十八世紀末期，怀疑主义者大卫·休謨曾

經写道：“这仿佛是一种对哲学的侮辱：它的最高权威本来到处都得到承认的时候，人們却迫使它在每一个場合都去为它的結論作辯护，在和它相抵触的一切科学和艺术面前替自己申辯。这无异于控告一个国王背叛他自己的臣民。”（引自馬克思为他的論伊壁鳩魯的博士論文所写的序言，*«Nachlass»*^①，第一卷第六十八頁。）馬克思的一位大学里的老师、自然学教授——或者用当时的術語來說，一位自然哲学家——斯特芬斯曾經因为一个学地质的学生願意研究具体事物，而不研究“抽象精神”，就給他下了一个不好的評語。迷恋康德，特别是迷恋黑格尔的风气，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簡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用米海洛夫斯基机智的說法，就是在莫斯科河两岸对黑格尔哲学也糾纏不休（暗指斯坦凱維奇和赫尔岑的哲学小組）。

現在这一切都改观了。各个科学行省都相繼地离开了包罗万象的哲学君主国，于是过去认为“无所不包的”哲学現在則应当——可以說——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它弄得完全茫然失措了，而且至今还在繼續寻找自己的对象，建立自己的方法。許多大思想家——包括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內——都否认它有独立存在的权利。例如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論》中就說：“既然对于每一个别的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們闡明自己在事物的以及我們关于事物的知識的总联系之中的地位，那么，关于它們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变成多余的了。这样从全部以前的哲学中，还保存独立意义的只有关于思維及其規律的科学——形式邏輯和辯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属于自然的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之中了”（*«Anti-Dühring»*^②，第三版第十一頁）。在另一个地方，恩格斯称哲学是“已故的”科学。

哲学現在不像大卫·休謨时代那样傲慢自負。它认为科学的头衔是最光荣的，而且不仅不幻想得到統治其他科学的君权，如果

① 《軼文集》。參看馬克思：《博士論文》，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2頁。

譯者注

② 參看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24頁。——譯者注

人們堅決不移地承認它是科學思想的自由共和國里一個有平等權利的公民，它倒是更覺得幸運。

然而如果我們認為可以同您一起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礎**，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是以下列論點作指導的：

一、無論馬克思或者恩格斯，對哲學的看法並非始終都這樣糟糕，像根據已經引證過的恩格斯著作的一個地方應該得出的結論那樣。在《Zur Kritik der Rechtsphilosophie》^①中（《Nachlass》，第一卷第三九八頁），馬克思寫過如下一句預言式的話：“哲學把無產階級當做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地，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作自己的精神武器。”^②

二、最近出現了從哲學上論證馬克思主義的完整的文獻。只要指出普列漢諾夫-別爾托夫、安東尼奧·拉布里奧拉、克羅齊、沃爾特曼、馬薩利克、布爾加柯夫、司徒盧威、別爾嘉也夫、弗·阿德勒、潘涅庫克的名字和科學社會主義機關報上其他作者的一系列的論文就夠了。

三、即使我們接受恩格斯把哲學的領域限制為思維及其規律的領域，這個領域還是相當廣大和相當有趣的。也可以把這個領域理解為“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基礎”。

四、思維及其規律的理論必須以對自然和生命的總的綜合觀點為前提。我們看到，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就作過這樣的總的綜合。我們認為辯證哲學是把哲學思想統一起來的一次最出色的嘗試。

五、如果不像古典的形而上學那樣，認為哲學是關於絕對實體的科學，對於這些實體，用恩格斯中肯的說法，我們只知道一點，就是我們對它們絕對毫無所知，——那就必須給哲學下這樣一個合理的定義：

哲學是把特定時代智力發展和社會發展所達到的階段上人類

① 《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譯者注

②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67頁。——譯者注

經驗的总和統一起来的綜合思想的体系。簡言之：哲学是特定时代所認識到的存在的綜合。我們往后会看到，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得出的各种結論完全符合我們的定义。

对社会思想的需要是由社会存在和智力存在的一切条件所引起的。个别科学越发展，这种需要就越坚决地寻求滿足。个别科学的結論不过替包罗万象的科学綜合提供材料罢了。思想領域像社会經濟領域一样，可以应用某种經濟原則，按照这个原則我們应当力求利用最少的手段达到最大的效果。这仿佛是思想領域中的一种集約經濟，仿佛是一种思想凝聚。人脑在适应周围环境的过程中，借助于概括的思想来对付环境，这个概括的思想力求在似乎混乱的状态中找和諧，在无限的多样性中找統一，在似乎沒有根据和偶然的現象中找最大的合理性。于是又发生一个問題：这种科学的統一是否可能，包罗万象的科学綜合是否可能？对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找到答案。不要扯远了，我們暫時只說，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这样，我們可以心安理得地开始叙述我們的題目。它的对象是具体的东西，而不是虛构的东西。

首先我們談一談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发展的过程。我們預先要断然申明一点：就是这两位唯物主义思想家在哲学和科学上是完全一致的，两个天才人物的史无前例的理想的友誼使他們联合在一起，好像为了一个共同的創作已經結合为一体了。許多哲学史家在談到馬克思时簡單地把他算作黑格尔派的左翼。这不完全确切，因为他們根本不知道馬克思最大的哲学著作之一：《Die heilige Familie》（《神圣家族》，一八四四年著，一八四五年初出版）。在这部著作中，正如我們下面要指出的，馬克思最尖銳地批判了所謂左派黑格尔主义者——布魯諾·鮑威尔及其同道。但是，黑格尔在馬克思的哲学进化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馬克思对待黑格尔的态度并不像初浅地对《資本論》的作者进行研究时可能觉得的那樣簡單。这个态度发生过很大的变化。

它經歷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在青年时期，馬克思是黑格尔哲学的絕對崇拜者。这是三十年代后半期的馬克思。他的論伊壁鳩魯的博士論文就属于这一时期。論文的序言注明是：一八四一年三月。当时馬克思二十三岁。在馬克思的这个第一部理論著作中，黑格尔的 *Selbstbewusstsein*——即自我意識——起着指导思想的作用。

按照年青的馬克思的意見：“应当认为，黑格尔的《哲学史》的龐大的和大胆的计划，一般說来是哲学史的开始”。^① 他认为黑格尔是“伟大的思想家”(den riesenhaften Denker)^②。他崇拜哲学的“絕對的、世界的”(weltbezwingend) 威力，它将像伊壁鳩魯那样对它的反对者說：“那擯弃群氓的神灵的人，不是不誠实的，反之，那同意群氓关于神灵的意見的人才是不誠实的。”^③ 馬克思繼續說：“哲学并不掩盖这一点。普罗米修斯的箴言：‘我痛恨所有的神灵’，也是哲学的箴言，是哲学对所有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識具有最高的神性的、天上和地下的神灵的判詞。除了自我意識以外，沒有別的神灵。”^④ 这是黑格尔的风格。大家知道，黑格尔认为自我意識的精神是絕對的存在物。这种同情古代神話中最革命的典型人物、諸神的敌对者和盜火者普罗米修斯的神話的态度，以及用自我意識(这个自我意識后来在反对他的布魯諾·鮑威尔那里变成了“批判的思想”)的名义“痛恨天上和地下一切神灵”的这些大胆的話，乃是未来的革命家馬克思的特点。

这就說明，为什么恩格斯會說他和馬克思之認識費尔巴哈是他們的哲学发展的决定因素，是同过去的破裂，或者用他自己的話說，是“自我解放的行动”^⑤。这是从黑格尔主义的思辨哲学下的自我解放。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发展中的第一个时期的結束。

現在我們对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知識分子普遍迷恋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的风气可能觉得难以理解和奇怪。这种現象自然有它的原

①②③④ 參看《博士論文》第2頁。——譯者注

⑤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二卷第365頁。——譯者注

因。德国的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德国的文化当时处在很不高的发展水平上。像我国七十年代的民粹派知識分子一样，当时德国的知識分子都证明德国必須閉关自守，資本主义和革命的无产階級不可能在德国得到发展，他們认为資本主义是一种英国病，而革命的无产階級則是法国特有的一种疾病。在不能进行社会政治活动的条件下，先进知識分子的創作思想的全部力量就都傾注在哲学和文学上面了。周围生活越是沒有乐趣，脫离生活的思想就越变得抽象。思想在自己周围既然找不到任何值得崇拜的东西，于是就崇拜自己，认为自己是絕對者，差不多是神。在法国，革命一次接連一次，震撼和激动了整个世界，这时德国却发生了哲学体系的不流血的斗爭：一个体系被另一个体系所代替，——康德排斥了沃尔夫，費希特排斥了康德，黑格尔排斥了費希特，而且这个斗爭也大大地激动了世界——学者和哲学系学生的世界。

但是在康德的无法反駁的批判的著作以后怎样解释形而上学的胜利呢？在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这部似乎永远破坏了建立迷雾般的形而上学体系的可能性的著作以后，像馬克思这样的天才怎么可能沉醉于黑格尔的《精神現象学》呢？第一，这表明，上述的現实的原因原来比哥尼斯堡的哲学家^①在意識形态方面所进行的批判更有力量。既然当时德国的社会气氛本身包含了形而上学体系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因素，那么康德在哲学上所进行的批判，无论它多么强烈地影响了个别天才人物，一般說来在同形而上学斗爭时是无能为力的。

第二，康德本人，由于他的哲学具有两重的（二元論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形而上学和抽象思辨哲学空前繁荣的局面。这种局面他生前即已开始，死后还是繼續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康德是最强大的、因此也是最危险的形而上学家。就康德哲学的基本思想表现在反形而上学的《純粹理性批判》中而言，这种

^① 指康德。——譯者注

思想究竟是怎样的呢？可以用两句话来说明。康德证明了，人的理性，除了感官经验以外，没有别的手段可以扩大我们的知识，或者像他所说的，可以 *apriori*^① 形成综合的理论。我们思想的一切无限多样的内容都是经验给我们的，而且只有经验才能给予我们。经验之外的思想是空洞的、没有内容的。这是对自以为超越于经验之上、成为先验之物的形而上学的死刑判决。但这是康德所做的一半工作。康德走得更远。他提出了一个问题：经验本身怎么可能？并且坚决地回答说：经验之所以可能唯一是因为我们的感性和我们的理性具有先天的、非经验的或超经验的因素：时间、空间和因果性。我们讲科学，讲科学规律。但是科学规律的前提是，随时随地都对现象进行某种综合，换句话说：规律本身包含着普遍性和必然性的概念。但是难道能够根据经验认为某个事实是普遍的和必然的吗？经验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有限的。只能用经验确定所有我们已知的场合下由已知的方式完成的现象。但是当我们说**随时随地**的时候，我们就超出了经验的范围。因此，康德企图在经验本身上打开一个缺口。他使科学本身变成了形而上学的支柱。他不像今天的实证主义那样，从不可能有普遍的和必然的经验知识中得出我们一般的知识都是相对的结论，而是得出结论说，没有先天观念就不可能有科学。他说：“自然中没有规律。是我们的理性把自己的规律强加给自然”。这是康德的基本指导思想。如果说我们的思想没有经验就是空洞的，甚至是毫无内容的，那么没有先验的——即先天的——思想的经验，就是盲目的，甚至是不可认识的^②。思想创造科学，为自然立法。因此，建立在迷信的基础

① 先天地。——译者注

② 这句话的原文是：Если наша мысль без опыта пуста до бессодержательности, то и опыт трансцендентальной, т.-е. безаприорной, мысли слеп до неузнаваемости. 既不合文法，也没有意义。如果把 *безаприорной* 拆做两个词：*без* 和 *априорной*，把 *без* 排到 *слеп* 之后，那就通了。——译者注

上的人类理性的这些立宪的和立法的职能为往后的形而上学广泛地打开了門戶。既然我們的理性可以創造科学和自然規律，可見它的力量是无限的。

所以費希特譴責康德不彻底。他以理性的这种立法权和立宪权为依据，并且使理性变成宇宙的絕對創造者。他說过，世界是我的理性、我的我的产物。黑格尔走得更远。他把这个具有創造精神的、立法的理性变成了絕對精神。而且我們这个貧乏的世界原来只是某种看不見的精神的貧乏的摹本。体现这个絕對精神的就是領会了黑格尔学說的人，更正确些說，是領会了黑格尔学說的哲学家。世界被顛倒了。哲学家获得了神的、創造的职能。他的头脑就是世界的實驗室。科学、宗教、艺术、法律、社会和家庭，——这一切在完成了一系列惊人的辯证过程以后就从我們理性的这个實驗室中以現成的形式出現了。对思想充滿热情的人——而年輕的天才的馬克思无疑就是这样的人——热烈地迷恋这种把理性、即把高談哲理的知識分子捧得如此之高、可以說捧上了天的哲学体系，那是不奇怪的。沒有比創造的快乐更大的快乐了。理智的辯证法游戏像麻醉剂一样使人沉醉。

康德的小心謹慎和受过科学訓練的理智让理性起立宪君主的作用，它的立法权由我們的五官即經驗限制着和保证着。費希特和黑格尔用恐怖的手段消灭了这些民主主义的保证，并且宣布了理性的专政、“精神的独裁”。現在理性的权力是无限的。抽象的思辨哲学日益把具体世界、具体生活变成了死板板的抽象名詞，以迎合占統治地位的专制制度的嗜好和利益，于是专制制度承认黑格尔哲学是普魯士警察国家的官方哲学。

但是生活在发展。革命运动的浪潮从法国冲到古老的、溫文尔雅的德国来了；民主运动席卷了广大的社会阶层。青年德国的領袖路德維希·貝尔尼^①和亨利希·海涅受到了放逐，无意中來

^① 貝尔尼(一七八六——一八三七)，德国政治家，小資產階級激进反对派首領。《巴黎通訊》(一八三〇——一八三三)是他的两本主要著作之一。——譯者注

到了革命运动的中心、当时民主派的麦加——巴黎。在这里贝尔尼写出了他的充满革命的热情和怒火的《巴黎通讯》。从这里海涅向 ancien régime^① 发射了一支毒箭。这个运动吸引了马克思，由于自己的坚定性格和才干，他立即处在运动的中心地位。他做了出色的民主派机关报的编辑。他为了进行严峻的实际斗争放弃了思辨哲学的妖邪怪异的王国。同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斗争当然会使青年马克思降低对黑格尔哲学的热情。

于是就进到他的哲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即他同传统的黑格尔主义作坚决斗争的时期。这是四十年代的时期，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哲学文件就是《Heilige Familie》^②。

马克思在《Heilige Familie》中最无情地嘲笑了黑格尔哲学；这是通过他对黑格尔的后裔的批判，通过对布鲁诺·鲍威尔和爱德华·鲍威尔兄弟的批判进行的。不过黑格尔本人也受到了批判。在《Heilige Familie》中，他毫不怜惜地摘掉了思辨哲学身上伟大哲学的光圈，充分暴露出它的全部抽象性，同时也揭示了它的内在的逻辑结构。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哲学中有三个因素，即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和黑格尔本人所具有的、以这两个因素的矛盾为基础的、绝对精神的统一。但是，马克思问道，什么是斯宾诺莎的实体呢？这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自然。什么是费希特的自我意识呢？这是形而上学地改装了的、脱离人的精神。而这两个因素的形而上学地改装了的统一就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H. F.》，《Nachlass》，^③ 第二四七——二四八页）。换句话说，马克思在其哲学发展的第二时期认为黑格尔哲学是两个虚构的虚构的统一。著作上的情况和算术一样，零加零还是零。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精神和物质、上帝和世界相对立的基督

① 旧制度。——译者注

② 《神圣家族》。——译者注

③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 177 页。个别的意思有出入。——译者注

教教条的思辨表现(«H. F.»，«Nachl.»，^①第一八六頁)。馬克思在另一个地方說，思辨的批判把人变成邏輯的范畴(Ib. ^②，第一九五頁)。思辨哲学，即黑格尔哲学，在解决一切問題的时候用思辨理性的語言代替了健全思想的語言，把現實的問題变成了思辨的問題。它歪曲正常的、人的問題，并且像教义問答那样，对它所臆造的問題作出自己的回答(«H.F.»，«Nachlass»^③，第一九二頁)。精神把群众看成是材料，并且只在哲学中才得到自己的絕對的表现。历史的过程是无意地完成的。以哲学家身分出現的絕對精神只是 post factum^④ 才上場的(Ib.，第一八七頁)。真理在黑格尔看来乃是自己論证自己的自动机器^⑤(第一七九頁)。历史一变而为形而上学的主体，就是說它得到体现^⑥(Ib.，第一八〇頁)。馬克思用下面一段話特別鮮明地說明了黑格尔的抽象方法的虛构性质：“如果我从现实的苹果、梨、草莓、扁桃中得出‘果实’这个一般的观念，如果再进一步想像我从现实的果实中得到的‘果实’这个抽象观念就是存在于我身外的一种本质，而且是梨、苹果等等的真正的本质，那末我就宣布(用思辨的話說)‘果实’是梨、苹果、扁桃等等的‘实体’，所以我說：对梨說来，决定梨成为梨的那些方面是非本质的，对苹果說来，决定苹果成为苹果的那些方面也是非本质的。作为它們的本质的并不是它們那种可以感触得到的定在，而是我从它們中抽象出来又硬給它們塞进去的本质，即我的观念中的本质——‘果实’。于是我就宣布：苹果、梨、扁桃等等是‘果实’的简单的存在形式，是它的 modi^⑦。誠然，我的有限的、基于感觉的理

① 《神圣家族》《軼文集》。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108頁。——譯者注

② 同上。參看上書第118頁。——譯者注

③ 參看上書第115頁。——譯者注

④ 事后。參看上書第108頁。——譯者注

⑤ 參看上書第100頁。——譯者注

⑥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101頁。——譯者注

⑦ 样态。——譯者注

智辨別出苹果不同于梨，梨不同于扁桃，但是我的思辨的理性却說这些感性的差别是非本质的、无关重要的。思辨的理性在苹果和梨中看出了共同的东西，在梨和扁桃中看出共同的东西，这就是‘果实’。具有不同特点的现实的果实从此就只是虛幻的果实，而它們的真正的本质則是‘果实’这个‘实体’。

可見，基督教认为只有一个上帝的化身，而思辨哲学却认为有多少事物就有多少化身，譬如在現在这个例子里，在思辨哲学看来，每一个单个的果实就都是实体的，即絕對果实的特殊化身……一个普通人說苹果和梨存在着的时候，他并不认为自己說出了什么特殊的东西。但是，如果哲学家用思辨的術語說出这些存在的东西，那他就是說出了不平凡的东西。他完成了一个奇迹：他从‘一般的果实’这个非现实的、理智的本质造出了现实的自然的实物——苹果、梨等等，就是說，他从他自己的抽象的理智（即他以为在他身外的一种絕對主体，在我們的例子中就是“一般果实”）中創造出这些果实。每当思辨哲学家宣布这些或那些实物存在时，他就是进行了一次創造。”（Ib., 第一五六——一五八頁）^①

可見馬克思十分尖銳地批評了一般的黑格尔哲学，而特别是布魯諾·鮑威尔所謂的“批判的批判”。他在《Heilige Familie》（第一一四頁）中写道：“批判（鮑威尔的）所做的，仅仅是‘用現存事物的范疇来制定公式’，也就是用現存的黑格尔哲学和現存的社会意向来制定公式。公式除了公式便什么也沒有。而且尽管它（即鮑威尔的批判）在竭力抨击教条主义，但是它还是宣告自己是教条主义，而且是妇女的教条主义。它是一个老太婆，而且将来仍然是一个老太婆；它是年老色衰、孀居无靠的黑格尔哲学。这个哲学搽脂抹粉，把她那干癟得令人厌恶的抽象的身体打扮起来，在德国的各个角落如饥似渴地物色求婚者。”^②

如果馬克思当时认为黑格尔哲学具有他和恩格斯在他們哲学

① 参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 71—72、74—75 頁。——譯者注

② 参看上书第 22 頁。——譯者注

发展的最后时期即第三时期（这时他们已經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赋予它的那个意义的话，他就不会如此极端尖锐地和**毫无保留地**批评它了。大家知道，他们那时认为黑格尔哲学是創造了进行研究的强大武器即辩证方法的一种哲学体系。在《神圣家族》的二十多頁篇幅中，我們一次也沒有遇到对黑格尔哲学的**这个**积极意义的評价。現在我們只有得出結論說，在四十年代里，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同在黑格尔哲学掩护下的反动派作斗争，由于同左派黑格尔主义者在哲学上的庸俗作风作斗争，反对他們用輕蔑的态度从他們的“批判”思想的高峰看待激动的、沒有受过教育的、“非批判的”群氓，才对黑格尔采取了绝对否定的态度，当时沒有想到把谷粒同莠草分別开来，把辩证方法同绝对精神分別开来。

同布魯諾·鮑威尔及其同道的斗争是有社会政治原因的。这些先生們认为宪章主义和法国无产阶级群众的政治斗争是肤浅的、沒有經過哲学論证的和不深刻的运动。他們希望利用他們那种高踞于现实之上的批判思想来拯救社会。所以馬克思不断地用他那辛辣的諷刺鞭斥他們，无情地揭露他們可笑的自命不凡和对具体的历史现实的完全无知。

馬克思和恩格斯之了解費尔巴哈哲学就属于第二个时期，即反黑格尔时期。关于費尔巴哈的影响，恩格斯本人写过如下的話：“我曾认为我們还負有一項荣誉债务，就是要完全承认：在我們那个狂风暴雨时期，費尔巴哈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對我們起了更大的影响。”^①“狂风暴雨时期”，用我們的話說，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即反黑格尔时期。大家知道，“狂风暴雨时期”（«Sturm-und Drangperiode»）常常有一种矯枉过正的傾向。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进化中，这种傾向的表現是，他們在四十年代对黑格尔哲学采取了极不公正的态度，而完全改变了三十年代对待它的极端狂热的态度。

^① 参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 356 頁。——譯者注

但是，我們且回到費爾巴哈的影響上來吧。按照馬克思的意見，費爾巴哈結束了“無限的自我意識的破爛貨 (alter Plunder)”^①。費爾巴哈是黑格爾的對立者。他從現實的人出發，並且把神學和形而上學看成是人的創造活動的產物。哲學通過費爾巴哈從抽象概念的天國降到實實在在的地上。馬克思在《Heilige Familie》(第一九五頁)中說道：“他認識到人是全部人類活動和全部人類關係的本質、基礎”^②。在當時的馬克思看來，人、人類應有的生活、人道精神乃是產生神奇力量的字眼，它們打開了理解現實生活的道路。像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馬克思比費爾巴哈的人，即比這個過于一般的、因此也就是過于抽象的存在物走得更遠。但是他對費爾巴哈的人是有好感的，認為它可以反對黑格爾那種使活生生的人屈服于僵死的抽象概念的作法。馬克思宣稱，費爾巴哈用清醒的哲學來對抗醉熏熏的思辨。(《H. F.》，《Nachlass》^③，第二三二頁)

在《Heilige Familie》中，馬克思對法國和英國唯物主義作了簡略的歷史敘述。他發現必須用費爾巴哈的人道主義來補充哲學唯物主義。唯物主義會通過反對現存的政治制度的鬥爭而得到發展，正如它通過反對神學和形而上學、反對一切形而上學……的鬥爭得到發展一樣。唯物主義和人道主義的聯盟永遠會戰勝形而上學。法國和英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就是費爾巴哈的人道主義同唯物主義的這個綜合。^④

如果十八世紀的唯物主義曾經戰勝了十七世紀的形而上學，這首先應該歸功於法國生活的實際要求。社會的注意全神貫注在實際利益上(第二三四頁)^⑤。我們不可能詳細地談到馬克思在《Heilige Familie》中對各派唯物主義體系所作的卓越的歷史評

①②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 118 頁。——譯者注

③ 參看上書第 159 頁。——譯者注

④ 參看上書第 159—160 頁。——譯者注

⑤ 參看上書第 161 頁。——譯者注

論。只要指出一点。在《Heilige Familie》中是沒有一点保留意見的迹象的，而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发展的第三时期即最后时期的著作中，——那时保证他們在历史上占有如此光荣的地位的世界观已經完全形成了，——我們却可以看到这样的保留意見。我們处处都感觉到，这是一个过渡时期，这是发展的中間阶段。馬克思和恩格斯离开了黑格尔，从他那里解放了，但是还没有完全走上他們“自己的”、真正的道路。他們的整个道路是由三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黑格尔的抽象的自我意識，第二阶段是費尔巴哈的具体而又抽象的人，第三阶段即最后阶段是现实的人，生活在特定社会經濟环境下的现实階級社会中的人。所以这两位建立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人的发展路綫我們是完全可以弄明白的。他們的思想逐渐地加深和扩大，从抽象发展到具体，从历史上沒有內容的东西发展到历史上确定的东西，从心理的个人主义和主观的道德主义发展到历史的客观主义和唯物主义。

現在，所有力求在馬克思主义中加进所謂一般人的和道德的因素，从而对它进行“改良”和“修正”的人，只要认真地研究一下这个世界观的起源，都应当承认，他們实质上是利用馬克思反对馬克思，換句話說，他們利用处在动摇时期的馬克思反对成熟的和最后形成了的馬克思，也就是利用作为人道主义者、費尔巴哈的崇拜者的馬克思反对作为辯证唯物主义者的馬克思，他們利用的是已經成为历史陈述、連馬克思本人也认为已經过去的发展阶段。

我們且不去管我們的口号不應該是“向后看！”，而應該是“向前看！”，也不去管如果“循着馬克思”，但是按照同馬克思本人相反的方向发展，也許可以达到他更早的发展阶段，直到他的青年时代狂热地喜爱黑格尔的“自我意識”，不适时地随便对它祝福，这一切我們都不去管它，应当注意的是下面这个相当重要的情况。在所謂高級意識形态的全部历史过程中，我們时常遇到下面这个事实：**理論上**对人的評价越高，**实践上**对人的态度就越低越坏。例如試拿傳統的基督教來說。它用神秘主义的态度，使人得到榮耀的地

位，把人变成自己崇拜的最高对象。实际上，却使他处在地上和天上的剥削者的权力之下。没有哪一种不公正的现象，没有哪一种残酷行为不会得到神圣的基督教教会莫名其妙的认可和赞许。再拿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个形式上有很高价值的、官冕堂皇的民主主义口号来说。一百多年来，这个出色的口号最好不过地同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上剥削群众的现象和平地相处。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在恢复了神秘主义的人以后，立即把他放到普鲁士政治制度的木棍下。蒲鲁东以永恒真理、永恒正义的名义写了两卷毛奇式的战争辩护词^①，而“冷酷无情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则是第一国际的领袖。

（译自《普列汉诺夫全集》第十八卷第 323—334 页）

^① 指蒲鲁东于一八六一年在巴黎出版的《战争与和平。对国际法的原则和结构的研究》。毛奇（一八〇〇——一八九一），普鲁士元帅，手工业战争时代普鲁士最杰出的军事家和思想家之一，克劳塞维兹的信徒。——译者注

奧古斯特·倍倍爾

(摘 譯)

這是一篇紀念倍倍爾逝世的文章，發表在一九一三年《現代世界》雜誌第八期上。全文共五節。前四節頌揚了倍倍爾為無產階級事業作出的貢獻。這裡摘譯的是第五節。在這一節中，普列漢諾夫繼續利用倍倍爾關於工會中立的言論來替他自己的機會主義的工會中立論張目。列寧早在《工會的中立》一文中就曾經指出：“不应当在倍倍爾犯錯誤的時候仿效倍倍爾”(《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444頁)。

.....

五

覺悟的無產階級一定要組織自己的力量。它要在兩個領域內，即在同企業主的直接經濟鬥爭領域(工會)和政治鬥爭領域(工人黨)內把力量組織起來。關於工會同工人政黨的關係問題在社會民主主義文獻中好久以來就占住了，而且至今還繼續占着不小的地位。連倍倍爾也不得不談到它。早在一八七二年(那時工會代表大會即將在愛爾弗特舉行)，他就在社會民主黨的《人民國家報》第四十六號上登載了一篇至今還值得注意、特別是值得俄國讀者注意的文章。倍倍爾在文章中寫道：

“不能否认，德国**有組織的**工会运动是相当落后的。工人阶级分裂为各个不同的派别和相互間残酷的斗争对这一点有不小的促进作用。工人们在各个不同的社会政治組織內互相反对，这已經不是好事了，而更坏的是（在这种場合往往是必不可免的）同一个部門、甚至同一个工厂或作坊的工人们也分裂为两个或三个陣营，并且互相反对。”倍倍尔宣传过**工会的統一**。他越是坚持工会的統一，他就越是赋予工人的工会組織以更大的意义。他說：“**工人运动的未来**就在于工会。在工会中群众会提高阶级觉悟，学会同资本家进行斗争；这些工会通过自然而然的途径，无需任何外力作用，就会把工人变成社会主义者”。

这太多了。但这还不是一切。工人学会重视自己工会的統一以后，就会力求在自己的政治組織中也統一起来。（請不要忘記，倍倍尔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內发生了拉薩尔派同爱森納赫派的残酷斗争时写这篇文章的。）倍倍尔說过：“**消除工人中間現有的分裂的办法就是工会**。当工人们终于相信工会組織的必要性时，他們很快就会看到，政治上的嗾使攻击就不再有地位了；对統一和協議的需要很快地增长着，克服那些对这种嗾使攻击有个人兴趣的分子的反抗也不会有困难。”^①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統一以后，倍倍尔繼續不断地強調工会組織統一的必要性。一九〇〇年五月，他在柏林工会大厦作了一个报告，这里我且摘引如下一段話。

① 在这篇专门紀念倍倍尔的文章里，我根本没有打算进行辯論；但我认为可以 *pro domo sua* [对自己的問題。——譯者注]提出下面一点意見。一九〇五年春天，鉴于我們当时的分裂情况，我曾經写道，只有工人运动的繼續发展才会結束这种情况，而我們的未来就在于（当时开始产生的）公开的工会。一位思想深奥的政論家从这里做出了这样一条結論，說我当时是起来反对党。但是难道像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断言工人运动的未来在于工会的倍倍尔什么时候起来反对过党么？有什么办法！并不是所有的政論家都是同样穎悟的。——著者注

倍倍尔对自己的工人听众們說：“在工厂里或者一般地說在工业企业里做工的工人們具有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和政治信仰，而且他們的民族属性常常也各不相同；因此工会应当**不問宗教和政治观点、不分民族出身地**接受工人們作为自己的成員。全体而无例外地把一个职业的同事結合为一个組織，应当是工会政策的首要戒律；如果破坏了这个原則，它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或者說，只能不充分地完成任务。”

从这里可以得出結論說，工会不应当同任何宗教团体或政党发生組織联系。工会的大門应当向工人打开，而完全不問他属于哪一个党派。

“工会沒有任何权利去問一个工人他的政治信仰如何，或者命令他除了工会以外还应当属于哪一个党。如果工会善于保证工人必要的相互宽容，那么未来我們就可以得到繁荣和胜利。”

倍倍尔的看法就是这样。人們譴責他，說他主张工会**中立**。但是有各式各样的中立。倍倍尔所坚持的那种中立完全沒有排斥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恰好相反。倍倍尔直接說过：“我肯定地认为，党的政策和宗教問題同工会应当是不相干的；但是我又肯定地认为，工会应当更加广泛和更加坚决地贯彻**工人的政策——即阶级斗争的政策。**”

这一点需要解释一下。我力求用倍倍尔本人的話来作解释。工会組織向国家提出一系列它不能靠自己本身的力量来满足的要求；結社、集会和罢工自由的要求；工人在衰老、疾病、不幸事故、丧失劳动能力的条件下的保险待遇；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保护等等。总之，凡是涉及大多数工人或全体工人的利益的那些社会經济条件，作为工人組織的工会都应当在刊物上和各種會議上加以討論。應該承认，这是广泛的政治活动領域，而所有上面提到的問題都将只从工人阶级的观点来討論，而且正是工会可以保证做到这点。工会——特别是工会的报刊——之所以应当对这些問題給以更多的注意，因为如果始終站在自助的立場上，那就根本不可能

使这方面有任何变化和改善。因此工会的责任就是在这里所指出的任务的范围内进行政治活动。

倍倍尔对待工会的这种态度也使他的某些亲近的同志苦恼。他们甚至在刊物上同他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争论。但是倍倍尔在这里始终是忠实于自己的。

上面我已经说过，他一贯坚持的规则是，不强迫工人群众接受合乎他的愿望的这些或那些策略手段，而是帮助他们去掌握这些手段。倍倍尔对待工会和党的关系的观点只是下面这个极宝贵的规则的概括：工会不要强迫工人接受社会主义，而要采取这样的行动，甚至使得虽然参加了工会但是充满着资产阶级偏见的那些工人也变成社会主义者。工人的主观逻辑不能不服从他的地位的客观逻辑。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识。如果倍倍尔在努力影响工人群众的时候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一点，那么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也许是因为他异常清楚地记住了他自己的精神发展史：因为他自己刚参加工人运动时仍然是社会主义的敌人，这就是说，他自己的主观逻辑不得不让位于雇佣劳动同资本斗争的客观逻辑。

在向耶拿党代表大会作关于大规模罢工的报告时，他再一次谈到了自己对工会中立的看法。他曾经在那里宣称道，他的主张并不是要工会在对待政治问题的态度上守中立，而是要工会不把自己看成是任何政党的附属品，因为工会应当把所有的工人都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而不管他们的政治思想方式如何。同时他补充说，要在整整一年的期间这样编辑这个或那个工会的出版物：绝对不要说出“社会民主党”这几个字，使自己的读者变成社会民主党人。这句话很能说明倍倍尔鼓动手法的特色。

不妨指出，倍倍尔对工会和党的关系的观点也就是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在同属于全德五金工人协会的一批工人谈话时说过：“如果工会想完成自己的任务的话，它就绝对不应当同任何政治联盟联在一起，或者依附于这些联盟。使工会处于这种依附地

位无异于使它受到致命的打击”，等等^①。……

(譯自《普列漢諾夫全集》第十六卷第 260—263 頁)

① 这篇談話是馬克思路过汉諾威时向工人們发表的。同他交談的一个工人在一八六九年《人民国家报》上复述了这篇談話。这篇綜合报道的原稿在刊登以前看来是請馬克思过目了的，因为馬克思曾答应必要时可以证实报道的正确性(关于这一点参看奥古斯特·布林格曼的著作，《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Zimmerer-Bewegung》(《德国木工运动史》。譯者注)施图加特，一九〇三年版，第一卷第 364—365 頁。托托米安茨先生的《工人运动的形式》一书也引用了馬克思同五金工人的这篇談話。——著者注

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和俄国 社会民主党人应当采取什么 策略向外国社会民主党人 提出的一些問題

一九〇六年十一——十二月，普列汉諾夫为了爭取各国(主要是西欧)社会党人支持他的孟什維主义策略方針，向他們提出了下面三个問題。列宁曾在《无产階級及其在俄国革命中的同盟者》、《卡·考茨基〈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一书的俄譯本序言》(第十一卷)、《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綱領》第四章第五节(第十三卷)、《无产階級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第十五卷)中，詳細批判了普列汉諾夫的錯誤。

一、俄国革命的一般性质是什么？我国正在发生的是資产階級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

二、面对着俄国政府为了孤立革命运动而作的絕望的努力，社会民主党在对待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爭取政治自由的斗争的資产階級民主派的态度上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三、在杜馬选举时期，为了利用資产階級反政府党的力量以进行反对我国“旧制度”的斗争，而又仍然站在阿姆斯特丹決議的立場上，党应该采取什么策略？

(譯自考茨基：《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
列宁編并序，莫斯科-列宁格勒，苏联国家
出版社一九二六年版，第26頁)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索引

- 哲学的定义：(下) 405—406
- 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过程：(下) 406—417
- 实践和理論：(上) 181—186；(下) 130
- 对矛盾的看法：(上) 228, 229；(下) 125, 227
- 关于辯证法和形而上学：(上) 2, 3, 226—229；(下) 199—208
- 关于目的和手段：(上) 2, 4, 49—53, 55—57, 138；(下) 34, 43—49, 63, 81, 113, 174, 208, 210—213, 353, 354
- 在国家問題上的观点：(上) 209, 210；(下) 17, 18, 20, 21, 96, 351—355
- 无产階級专政：(上) 70, 147, 214, 218；(下) 187, 208
- 工农民主专政：(上) 190, 192—194, 197, 205, 206, 211, 212, 214—221, 238；(下) 9, 73, 187, 210
- 把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民主主义专政同社会主义专政混为一談：(上) 126—128, 147—156, 205—208, 211, 212, 216—221, 281；(下) 9, 73, 187, 239—242, 394, 395
- 夺取政权：(上) 147—156, 194, 197, 220, 333, 335, 338, 339, 345, 346；(下) 73—75, 175, 245, 254, 351—354, 382
- 对待武装斗争和武装起义的态度：(上) 50, 51, 126, 128, 138—145, 166—170, 173—175, 197, 260, 262, 264—269, 278, 282, 283, 340, 344—346；(下) 2, 26, 32, 33, 63, 73—75, 85, 88, 89, 145, 156—159, 168, 213, 238, 252, 256, 257, 260, 261, 265, 284, 321—323, 334, 336—338, 366, 387—389, 398
- 把实力同暴力截然分开从而否定暴力：(上) 47—57, 137—140, 345；(下) 211, 213, 381, 386, 388, 390
- “生产力論”：(上) 290, 291；(下) 209, 210, 245, 400—401
- 俄国資產階級革命的性质：(上) 116, 117, 119, 126, 127, 131, 140, 141, 219, 220, 241, 242, 252, 306；(下) 55, 175, 187, 203, 239—242, 310, 395, 400, 401, 423
- 俄国資產階級革命的前途：(上) 126, 154, 219, 220, 241, 242, 252；(下) 187, 239—242, 395, 400, 401, 423
- 俄国資產階級革命的動力：(上) 119, 128, 131, 140—142, 145, 246, 252, 260, 261, 279, 314；(下) 9, 13, 55, 56, 209, 210, 239—242, 308, 310, 400, 401, 423
- 宣揚无产階級同資產階級“分开走，一起打”：(上) 136—145, 150, 154, 215, 216, 221；(下) 13, 40, 82, 144, 177, 230, 231, 243
- 宣揚无产階級在革命中仅仅保持“极端反对派立場”：(上) 151, 216, 218, 343,

(下)6, 50, 245
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 (上) 131, 258—260; (下) 53, 183, 234, 235, 376 参看“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对待农民和农民运动的态度”条
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 (上) 116, 118—131, 140—142, 145, 243, 244, 246—262, 266, 278—281, 296, 315—317; (下) 2, 6—14, 30, 35—37, 39—52, 55—64, 66, 88, 132, 133, 136, 154, 165, 174, 185, 186, 202—207, 227, 228, 235, 242, 243, 274—278, 288—294, 302, 308, 310, 319, 323—327, 339—342, 365, 378, 395—398, 423
对待“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上) 120, 121, 247, 257
对待立宪民主党的态度: (上) 341; (下) 2, 7—9, 64, 65, 78—83, 124—130, 132, 136, 155, 160, 168, 185—187, 192—197, 215, 216, 229—233, 252, 254, 255, 262—264, 278—282, 287, 314, 340, 365, 366, 381, 383, 389, 390, 395
对待地方自治运动的态度: (上) 116, 122—123, 129, 130, 132
对待军官和军队的态度: (上) 141, 142, 144, 145, 260, 340, 344—346; (下) 87, 88, 90—100, 158
对待总罢工的态度: (上) 243, 244, 262, 274—277, 279, 281, 282; (下) 89, 103, 117—121, 128, 260, 366
对待黑帮分子的态度: (上) 263, 264, 266, 276, 311, 317; (下) 2, 86, 94, 164—166, 197, 217, 263, 275, 285, 289, 290, 296, 297, 301, 302, 304, 395
对待农民和农民运动的态度: (上) 166—174, 176, 216—221, 247, 262—264,

266, 283, 284, 292—294, 299, 301—309, 311—313, 320, 330, 331, 341; (下) 27, 28, 38, 39, 66, 83, 87, 137, 139—152, 243, 246—249, 318, 356—365, 368, 369, 382—386, 391, 398, 399
在土地问题上的观点: (上) 166—176, 262—264, 283—309, 329—339; (下) 65, 66, 83, 141—151, 210, 229, 230, 247—249, 356—358, 360—365, 367—369, 382—386, 399
反对土地国有化: (上) 175, 284, 295, 298, 299, 303, 330—335, 337
主张土地市有化: (上) 175, 294, 295, 297, 333
对分配土地的看法: (上) 169, 284, 294—296, 298—300, 302, 304, 330, 333
土地革命: (上) 166—170, 174, 176, 284, 296, 301, 303, 304, 330
对待杜鲁的态度: (上) 257, 258, 262, 263, 284, 285, 318—327, 341—343; (下) 1—3, 7, 8, 14—18, 20, 21, 25, 27, 52, 53, 62, 63, 66, 78—85, 88, 127—132, 159—161, 164, 168, 169, 173, 174, 190, 215, 252, 259, 260, 262, 264—266, 273, 274, 276—287, 309—323, 335—336, 357—359, 363—366, 381, 384—388, 390—395, 398, 423
反对抵制: (上) 262, 263, 284, 285, 319—326; (下) 63, 79, 84, 85, 131, 132, 160, 161, 164, 178—190, 252, 256, 283—287, 319, 337, 359, 390
“选举协议”: (下) 174—177, 192, 197, 205, 206, 214—217, 224, 231—234, 243, 244, 274—277, 288—291, 296, 297
立宪会议: (上) 174, 175, 321, 341, 343; (下) 79, 81—84, 159, 160, 319, 320, 359

立宪幻想：(上) 318—326, 340—343, (下) 17—22, 26, 79—82, 131, 159, 160, 164—170, 283

鼓吹革命者要“明智”、“灵活”、“谨慎”等：(上) 2, 3, 228, 289, 312, 330, (下) 12, 16, 48, 118, 120, 177, 185, 234—236, 274, 275, 340, 369

关于党的性质：(上) 6, 22, 23, 37, 44, 70, 71, 104, 135, 224, 225, 229, 233—237, (下) 69, 106—110, 152, 172, 220—222, 270, 293, 327—329, 338, 339, 373—376

关于党章第一条：(上) 63, 64

关于党的纪律：(上) 7, 8, (下) 299—302

对待民主集中制的态度：(上) 11—12, 38—39, 68—72, 80, 133—135, 158—159, 163, 207, (下) 103, 220, 288—291, 299—302

关于党内斗争问题：(上) 2—45, 59—83, 105, 114, 157—164, 224—239, (下) 67—71, 101, 180—183, 268—272, 294—305, 307—329

关于分裂和团结：(上) 5—9, 13, 22, 23, 35, 37, 38, 41, 42, 65, 66, 75, 77—78, 112, 181, 224, 225, 228, 229, 231, 232, 236—239, 269, (下) 67—70, 180, 269—271, 307, 308, 330, 331, 350, 376

公开暴露党内意见分歧：(上) 2—9

迴避对组织问题上的原则分歧的论战：(上) 10—13

关于“补选”《火星报》编委的问题：(上) 27, 30, 72, 75, 112, 113

关于旧《火星报》编辑部内部意见分歧问题：(上) 105—109, 110, (下) 182

把存在对意识的关系问题同被领导者和领导者的关系问题混为一谈：(上) 85—105, 119, 132—133, 195

党和工会的关系：(上) 277, 278, (下) 103—117, 330, 331, 343, 346—351, 418—422

“工会中立论”：(上) 278, (下) 102—122, 330, 331, 343, 346—351, 418—422

对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态度：(上) 3—8, 11, 33—37, 61—64, 66, (下) 7, 112—116, 119—121, 308, 309, 312, 332, 333, 347, 350

对待孟什维克的态度：(上) 25, 28, 40, 62—65, 68, 72, 75, 81, 83, 112, 228, 232, 233, 236—239, 255, 271, 293, 305, 322, 323, (下) 45—47, 67—71, 73, 76, 292, 295—298, 304, 332, 333, 335, 342, 366, 367, 388, 389, 391—395

对待无政府个人主义者的态度：(上) 7, 8

对待经济主义的态度：(上) 2, 14—23, 34—37, 45, 62, 65—68, 86—87, 132, (下) 36, 37, 40, 105—106, 109—110, 290, 313

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想抓“指挥棒”，要在党内搞“专政”：(上) 12, 25—26, 38, 65, 70, 104, 111, 163, 195, 237, (下) 101, 270—272

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不“善于让步”，不“爱好和平”：(上) 4, 28, 33, 38, 39, 41, 64, 66—68, 75, 83, 104, 110, 113, 114, 228, 229, 233, 236, (下) 45—47, 270, 271

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是“分裂主义者”：(上) 5, 6, 8, 9, 35, 37, 38, 41, 65, 66, 224, 225, 228, 229, 231, 232, (下) 23, 24, 67—70

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是“波拿巴主义者”：(上) 69, 71, 74—76

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是“馬基雅弗里

派”，(上)196, 231
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是“个人主义者”：(上)229—231, (下)72
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是“超知识分子”、“超人”等：(上)105, 225, 226, 229—231, 233—236, 239, 301, (下)156—158, 172, 173, 214, 268, 270, 272, 359—361, 367, 368, 373—377
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是“冒险主义者”：(上)144, 145, 282, 313, 314, 322, 323
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是“革命空谈家”：(上)248, 268, 282, 283, 339, (下)15, 26, 27, 63, 65, 66, 75, 131, 184, 236, 265, 320, 322, 326, 368
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是“假急进派”：(上)131, 133, 134, 325, (下)13, 52, 64, 183, 184, 207, 209—215, 254
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是“假预言家”：(下)322
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是“宗派主义者”：(上)6, 11, 229, (下)24, 133, 172, 173, 392, 393
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上)116, 249, 250, 280, 281, (下)8, 9, 11, 12, 14, 31, 194, 203, 204
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是“无政府主义者”：(上)48—53, 104, 127, 133—134, 208—215, 248, 283, 300, 320, 327, (下)17—19, 22, 42, 62, 71—73, 175, 240, 243, 246, 316, 321, 327, 328, 334—336, 344
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下)322, 335, 343, 348—351
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是“巴枯宁主义者”：(上)104, 133, 134, 209—215, (下)18, 333, 334, 336, 341, 394

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是“布朗基主义者”：(上)49, 197, 198, 215, 220, 221, 235, 238, (下)9, 22—24, 26, 27, 29, 32—34, 38—40, 44, 47, 48, 52, 53, 57, 73—76, 79, 156—159, 182, 183, 189, 326, 333, 334, 396
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是“阴谋家”：(上)70, 104, 135, 144, 145, 159, 194, 197, 237, 238, 339, (下)26, 33, 52, 53, 74—76, 156, 157, 170, 171, 182, 265
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是“民粹主义者”：(上)103, 104, 116, 131, 194, 216—218, 321, 331, 338, 339, 346, (下)9, 35, 36, 38, 57, 74
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是“涅查也夫主义者”：(上)69, 70, 104
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是“饒勒斯主义者”：(上)215, 220, 221
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是“苏兹达尔主义者”：(下)60, 61, 180
借口反对馬赫主义等攻击布尔什维克主义，誣蔑列宁“不关心哲学”，“不关心理論”：(上)17, 152, 182—185, 189—192, 194—195, 254, 271, (下)44, 52, 188, 205, 312, 324, 333
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是“唯心主义者”：(上)90, 325, 340, (下)12, 23—25, 185, 187, 208
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是“主观主义者”：(上)95, (下)35, 36
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是“空想主义者”：(上)9, 90, 321, 335, 339, (下)23, 24, 34, 38, 57, 64, 72, 208—211, 240, 253, 334, 337, 366, 387, 388, 392, 394, 396
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是“形而上学者”：(上)2, 3, 37, 62, 121, 226, 227, 229, 321, (下)13, 34, 44—48, 50, 53,

57, 58, 133—136, 202, 204—206, 211,
212, 214, 215, 217

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是“教条主义者”：(上) 38, 235, (下) 13, 23, 24, 80,
162, 173—175, 177, 186, 195, 197,
214, 215, 289

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是“公式主义者”：(上) 40, 75, 284

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是“形式主义者”：(上) 40, 159

攻击列宁是“鲍威尔主义者”：(上) 103